



# 江阴 初青 往事录

岁月有痕 青春无悔

卞宏 主编

江阴市档案局(馆)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有痕青春无悔 / 卞宏主编.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11  
(作家视线丛书. 第 5 辑)  
ISBN 978-7-5059-7343-5

I. ①岁… II. ①卞…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1269 号

|      |                           |
|------|---------------------------|
| 书 名  | 作家视线丛书 第五辑                |
| 主 编  | 卞 宏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王小陶                       |
| 印 刷  | 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印 张  | 14.5                      |
| 版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59-7343-5    |
| 定 价  | 38.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编委会

名誉主任：高 佩

顾 问：姜 宪

主 任：龚振东

副 主 任：卞 宏

委 员：吴红敏 缪红珍 蔡智峰 邬丽雅

张德城 章文照 蔡意同

主 编：卞 宏

副 主 编：蔡智峰

执行编辑：黄剑宝 顾君卓 彭 蓉





# 难忘的岁月

(代序)

姜 宪

五月的一天，我接到市档案局长卞宏的电话，要我参加商议编辑我市知青上山下乡回忆文字的集子。我欣然答应，因为我也曾是知青，对知青有特殊的感情，对知青生活有特殊的感受。在档案局会议室，我见到了同是知青的蔡意同、章文照、姚锦华、高新群、张德城，受邀参与编辑的邬丽雅及档案局领导卞宏、蔡智峰等人。原来，他们对此事已商量讨论多次，手上约到了不少知青写的回忆文章，编辑后即将结集出版。

我看了他们的编辑提纲，涉及到知青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插队的，有插场的，有在本地的，也有在外地的，反映了当时江阴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情况。我觉得，那个时代知青上山下乡搞得轰轰烈烈，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涉及到千家万户，是共和国不可缺少的一段历史，不管世人对那段历史如何评价，把它如实地反映出来，载入江阴的史册，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与会同事要我写篇文章作序，其实我可以写回忆文章，作为集子中的一篇。但盛情之下，难以谢绝，只得写些文字，聊当代序。

我是68届华士高中毕业生，1968年9月插队落户到华士公社华西大队。当时是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华西大队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果然一到华西，就深深感受到农民大干苦干、改变农村落后状态的冲天干劲和精神风貌。在华西大队简陋的会议室，我看到

了挂在墙上的三张地图：旧貌图、现状图、规划图。从中可以看到华西过去是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土地七高八低，高像笠帽顶、低像浴锅潭，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十年倒有九年荒。在吴仁宝书记的带领下，华西改天换地，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现状图与旧貌图相比，华西面貌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心村已有雏型，周边还散落着十几个零碎的小村落。规划图则描绘了今后几年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土地成方，绿树成行，新村成型。我为插队到华西感到欣慰，对华西的未来充满信心。

那时是“以粮为纲”的年代，我编在“改天换地战斗队”，主要任务是平整土地，把七高八低零零碎碎的田块建成旱涝保收的“吨粮田”；拆掉十几个小村落，建设一个新农村。早上天刚亮，大队部的高音喇叭一放京剧《沙家浜》中“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大家就出早工了，干了一两个钟头，再回来吃早饭。晚饭后还要挑灯夜战，收工时还要挑一担老村拆除的砖瓦、椽木回新村。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真是感到苦和累。到了“双抢”时节，顶着烈日酷暑，面朝黄土背朝天，抢收抢种双季稻，真是夜以继日地干，腰酸了，田埂上躺一会儿，口渴了，捧点河水喝。只有在那时我才深深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当时的华西有“做煞大队”之称，尽管很累很苦，但华西农民好像有一股干不完的劲，我从心底里佩服他们，佩服吴仁宝书记超常的领导才能、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超前的战略眼光。我一直抱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态度，积极投入到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中。当时实行的是“大寨式评工记分”，记得在华西的五年中，我每年要出工350天左右，第一年是8分工，第二年是9分半，第三年就是10分了。因为我有些文化，吴仁宝书记要我帮着写些文字材料，主要是会议发言和经验总结，现在华西存档的几十套资料就是我整理的。以后我到华西曾翻阅过，觉得写得很不满意，但那时我就这样的水平，没有很好地把华西的业绩和经验总结反映出来。我在华西的表现，得到了大家

的肯定。我曾作为知青的先进参加过苏州地区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3年8月，华西大队推荐我去江苏师范读书。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华西，从事教育工作。

现在我已退休了，回顾当年的插队生活，真是感慨万分。五年的插队落户，影响着我的一生。后来我在学校、乡镇、机关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工作再苦再累，有了华西“做煞”的经历，什么苦、累都不在话下。五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我了解了农村、农民，理解他们为改变“一穷二白”而作出的艰苦努力，增强了群众观念，在以后的领导岗位上努力做到勤政廉政，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做好事。华西大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也教育着我，工作中努力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五年的经历，对我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待人处事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难以忘怀、回味无穷的五年。我从心底里感谢华西农民和吴仁宝老书记对我的教育和关爱。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历史。在这股历史潮流中，广大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入，为国家承担了义务和责任。对此，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历史将记上浓重的一笔。现在看来，尽管这场运动使广大知青丧失了上学深造的机会，过早踏上了社会，给家庭和农村带来种种麻烦和不幸，尽管广大知青在这场运动中命运不同，有的成功幸运，有的普通平凡，有的痛苦辛酸；但深入基层、接触群众、了解基层、理解社会、锤炼意志是共同的。编辑出版这本江阴知青上山下乡的集子，主要从积极向上的方面来记载反映这段历史，使大家知道生活的艰辛、劳动的光荣和应尽的社会责任，激励世人建设美好家园的斗志，让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幸福之中。我想这就是此书出版问世的意图所在。



## 目 录

|                   |     |       |
|-------------------|-----|-------|
| 难忘的岁月（代序） .....   | 姜 宪 | (1)   |
| 风雨兼程十五载 .....     | 张德城 | (1)   |
| 知青精神与世永存 .....    | 郑 元 | (8)   |
| 艰苦的磨练 永恒的财富 ..... | 孙国建 | (12)  |
| 我的“桃园”生活 .....    | 夏锡良 | (23)  |
| 我在农场种棉花 .....     | 陈玉娣 | (34)  |
| 大漠红柳别样情 .....     | 周淳洁 | (42)  |
| 青春的追忆 .....       | 刘振声 | (50)  |
| 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 ..... | 缪明丰 | (60)  |
| 岁月有痕 青春无悔 .....   | 翁 捷 | (64)  |
| 八年磨砺八年收获 .....    | 黄国清 | (80)  |
| 往事回眸 .....        | 闵建澄 | (85)  |
| 在农场演唱样板戏 .....    | 范迪明 | (101) |
| 瀚海夕照明 .....       | 许一青 | (103) |
| 蹉跎岁月 .....        | 李培生 | (107) |
| 珍藏 .....          | 符维龙 | (112) |
| 竹笛知青 .....        | 孙可立 | (114) |
| 滚一身泥巴 炼一颗红心 ..... | 赵佩华 | (123) |
| 在武装连的日子 .....     | 汤珍珠 | (126) |
| 插队漫忆 .....        | 钱应乾 | (130) |
| 回忆下乡插队的日子 .....   | 宁慈美 | (146) |

|                  |           |
|------------------|-----------|
| 那段岁月，那般情谊 .....  | 沈 耘 (150) |
| 插兄插妹 .....       | 闵建澄 (154) |
| 那年，我十六岁 .....    | 武明剑 (161) |
| 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 | 何达源 (165) |
| 我的下乡之路 .....     | 谢 愉 (169) |
| 岁月如梦 .....       | 章文照 (175) |
| 上山下乡十三年琐忆 .....  | 柳蕴强 (215) |
| 梦回精神家园 .....     | 周锦艳 (223) |
| 跨越世纪的年代 .....    | 徐士复 (227) |
| 上山下乡追忆 .....     | 胡云湘 (231) |
| 我的十年“回乡”生涯 ..... | 何达源 (233) |
| 四十年前支疆的回忆 .....  | 许一青 (238) |
| 初到掘港农场 .....     | 王福民 (240) |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风雨兼程十五载

——谨以此文纪念江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张德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波澜壮阔、震撼中华大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渐行渐远，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那场运动，记载了一段难忘的历史，凝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当年，大批青年燃烧的激情和火红的青春，在为生存而搏斗的磨砺中逐渐消逝。历史以千万人十多年的青春和血汗为代价，磨练出了这一代人的坚强意志。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变得成熟而稳健，豁达而睿智，从而成为了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和经济建设中的一个相当稳定的中坚群体。

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在中共中央1956年11月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第一次出现了“上山下乡”提法。在此形势下，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成为那个时代上山下乡的楷模。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还没完全褪去，江阴，这座江南的宁静小城，85位澄江镇的城镇知识青年到了当时全县边远而欠发展的璜土、石庄、西石桥公社插队落户，这是我县历史上首

批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上山下乡被列入了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由于江阴的地理和历史原因，9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沉重地承载了近百万人口，人多地少，注定一部分江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能远走他乡。

——1964年10月，澄江、周庄、华士等城镇、公社知识青年156人插队落户到昆山县石碑、陆桥公社。

——1965年8月，澄江、周庄、青阳、华士、南闸、长泾、顾山、北涇、祝塘、西郊、要塞等镇（公社）的知识青年612人长途跋涉数万里，插场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新园农场。

——1966年4月，澄江、周庄、华士等镇的知识青年719人，在吴县先上了山，后又下了乡，最后在藏书公社落了户。

而就在这同时，世界发达国家正在通过城市化走向现代化进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众多中小城镇随着农村现代化而崛起。而我国由于照搬学习苏联模式，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公有制经济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就业渠道被一一堵死，正是由于一系列经济方针的重大失误，我国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将城市中多余的新生的有文化的劳动力，送往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转化为农民，以缓解城市的财政和就业压力，从而铸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名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 二

时光流逝，到了1968年下半年，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渐渐消退，风云一时的红卫兵完成了莫名的“历史使命”之后，向何处去？便迫上眉睫。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声令下，涉及千家万户、牵动



亿万人心、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席卷中华大地。

——1968年9月25日，澄江镇七个管区的66、67、68届高中、66、67届初中毕业生首先动员去吴江县金家坝、莘塔、八坼、北厍、屯村插队落户。一声汽笛长鸣，几艘轮船载着热血沸腾的500名毕业生奔赴再教育的新农村。到12月，扩大到全县所有城镇的知识青年，包括年方十六七的68届初中毕业生，计3270人到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3月，又一批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前两批未及下乡的613人被动员去了如东县掘港农场。同年8月，又动员509人到本县农村插队落户，回乡务农216人。

——1970年元月，动员在本县农村插队落户398人。同年4月、5月，动员853人去滨海县滨淮农场，动员460人去连云港东辛农场。

通过连续几年，带有某种强制性动员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论长子、独苗，也无论家庭状况如何，把当时因“文革”动乱大学



1965年8月，江阴县知青车队进入和田地区招待所时，受到当地干部群众夹道欢迎（江阴市政协办提供）

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而滞留在城镇的“老三届”、“新三届”初中毕业生全部送到了“广阔天地”。尽管知识青年也曾有过犹豫、迷惘和无奈，但他们还是在“反修防修”和“缩小三大差别”的革命理想的感染下上路了。世人莫不为此惊叹。在“文革”那种无序的状况下，短短一二年时间，全国就把几百万名，仅江阴就达数千名中学生井然有序地迅速动员到了农村、农场。不可不谓是“壮举”。当时，他们都很年轻，许多人才十六、七岁，许多家庭是四五个子女全部下乡并各奔东西。他们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乡”前后的种种人生跌宕和磨难时，仍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迷惘时，没有沉沦。他们在生活中磨练出了自己奋发向上、坚忍不拔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成为了富于牺牲和献身精神的一代人，如果他们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而能顺利学习深造，他们十年的辛苦和汗水不是消耗在为了温饱而从事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单劳作之中，他们又会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呢？

### 三

知识青年不可选择地遭遇了那个特定的年代。在“扎根一辈子”的革命口号下，他们在户籍上、生活上、心灵上斩断了与城市的连线；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他们身处被改造的尴尬境况。在战天斗地的艰苦农村劳动中，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辛、劳动的繁重。随着时间的逝去，他们面临文化的困乏、招工招生的无望、婚姻的无助，更有遥遥无期也许可能长达一辈子的再教育生涯。他们将自己青春的生命融入了当时还很贫穷而广袤的田野与农村。许多知青都曾经体会到，一年的风里来、雨里去，可能年终收入不仅两手空空，还要倒欠生产队。春江水暖鸭自知，个中甘苦，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今天，经常见诸报载，农民工从农村走进城市，心灵的反差、生

活的艰辛、劳动的繁重、收入的微薄……让人深为同情和感动。而当年的知识青年，是从优裕的城市走进贫穷的农村，那其中的生活和心路的历程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给当年福建莆田李庆霖的复信，揭示了知识青年面临的种种困境。后来，各级党委、政府将这项工作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了统筹解决和重大调整：

——1973年6月，江阴县委、县革委会召开了工作会议，对知识青年的领导和教育培养、粮油柴草和住房安置、同工同酬和自留地、卫生医疗和婚姻、照顾病残知青、国家招工招生、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犯罪分子、城镇中学毕业分配去向、城乡密切配合等十个问题明确了统筹解决的措施和方法。

——1974年9月，江阴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对城镇中学毕业生的上山下乡从原来的“一刀切”、“一片红”和“长子女带头下乡”的做法调整为“根据家庭成员实际情况，区别对象，实事求是地确定留城镇分配还是上山下乡”。对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归侨学生这“五种人”，不动员下乡；已经动员下乡的“五种人”，逐步通过病退、困退等办法迁回原籍城镇，符合招工条件的，优先招工安排。

——按照中央1973年的有关文件精神，在以后的城镇中学毕业生中40%开始直接分配工作，但有60%毕业生还是以上山下乡为主。县委根据湖南株洲经验，以及我县实际情况，开始在有条件的社队办起了知青点或知青场、队，集体安置下乡知青，由原来分散插队安置为主，调整为以知青点集体安置为主的做法，并实行了厂社挂钩、对口派遣带队干部的模式。全县先后有350个厂矿企业实行了挂钩，办起了知青点（场、队）71个，先后集体安置了下乡知识青年2629人。

——1973年12月20日，根据省委部署开展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全县共立案审查的案件共62起，其中强奸、诱婚、

逼婚等迫害女插青46起，迫害、摧残下乡知青12起，贪污盗窃、挪用上山下乡经费、物资4起。在全省统一行动时，我县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千人大会万人听”的全县广播大会，对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宣判了一批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分子。

## 四

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我县先于全国终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时，我县自1963年首批知青下乡至1978年，前后历时15年。15年中，全县共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2203人，接收外地回乡知青1661人。这场发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运动，走过了它曲折兴衰的历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趋于沉寂。

1978年12月，随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结束，返城风潮席卷全国。从1978年初开始，我县部分在新疆新园农场、江苏掘港、滨海农场的知识青年到省、县革委会门口上访、绝食、静坐。当时除去历年因病退、招生、招工、参军和因父母退休、退职顶替等原因调动者，尚有下乡知识青年9709名。由于“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经济正在逐渐恢复之中，这为知青的安置创造了条件。统筹安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原籍、返回城镇工作，面广量大，政策性很强。当时通过多种渠道，广开就业门路，动员各公社（镇）、企业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分类兼顾、就地消化，分期分批统筹安排，到1981年6月基本安排结束。1984年1月，对安排在社镇小集体企业的下乡知青，全部改办为县属大集体企业性质职工。

火红的青春，难忘的历程。这场在全国前后延续二十五年，江阴也先后经历十五个春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整经历练了一代人。他们以青春的代价，伴随着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而跌宕起伏，承载着那场社会大动荡的牺牲与磨难。他们曾经被冠以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称号而受到礼赞，又迅速地

从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蜕变为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他们从优越的城市环境来到穷乡僻壤，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跌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难生涯。变幻的时代风云，巨大的生活落差，这一代人的内心装载了丰富的阅历，装满了无限的嗟叹与沉重，装满了苦苦的求索和思考，装满了对历史和命运的无限感慨；他们丢掉了应该拥有的，收获了很多不该得到的。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忘江河万古流”。历史的车轮已然驶过，特殊的社会经历、过早的生活磨难，赋予了这代人坚毅、执著、耐劳、奋发的坚强品格。这场运动是焉？非焉？留待后人去评说吧。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需要几代人的平凡而孜孜以求的奋斗，而这一代知识青年正在默默地归于平凡，并成为历史——但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知青精神与世永存

郑元

当我年近花甲，回顾往事的时候，江阴上山下乡、支边插场的知识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出的知青精神，又让我记忆犹新。那份刻骨铭心的情怀，一直叫我魂牵梦萦。

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江阴林场去的。那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像一股洪流，别无选择。先后到林场去的知青有八九百人。我一插场就到何家塘种桑树、育桑苗。那时林场有大片的桑田和苗圃，另外还有蚕种场。我学着用野桑枝给种植的一棵棵桑苗嫁接。此外更多时间做的是挑粪给桑树施肥等农活。两只大粪桶装满了粪便有一百多斤重，知青也和林场的老职工那样挑起粪桶就走。挑着重担走路很快，走了一会心就跳得像要从喉咙口蹦出来。几天下来，肩膀就压肿了。于是我进城买了一个粗布做的垫肩和一双山袜。第二天兴高采烈地穿戴上，“全副武装”地披挂上阵了。可是我这种样子并没有赢得赞许的目光，大家反而像看笑话那样看我，让我觉得很难为情，后来我就把垫肩和山袜藏了起来。当时我想，人家都把做这些重体力活当成很平常的事，我却把它看得很特别，想方设法保护自己。还有比我们早插场的老知青，他们吃的苦更多，吃苦的时间更长，锻炼得几乎跟林场老职工差不多了，我应该向他们看齐。和我一起到林场的女知青做的活也不比我们男生轻，有的人累得哭了，哭过以后照样干活；有的人累得病了，病好以后又下地了。许多人的手上留下了永不



蜕去的老茧。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六年七年，有些人坚持了十几年。

漫漫人生路，苦苦寻前程，岁月如长歌，回首见精神。那样艰苦的环境，那样繁重的劳动，是什么支撑着大家坚持下来的呢？后来经过一次次的回忆和思索，知青们在实践中锤炼出的一种精神在我们脑海里渐渐地清晰起来，那是胸怀大局的奉献精神 and 刻苦耐劳的拼搏精神。那时国家非常困难，知识青年在城里很难分配工作，只有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奉献青春。知青到了农村、农场后，就和当地的百姓打成一片，和他们一样刻苦耐劳，时间一长，就和他们融为一体了。知青回城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以前我们已做了在农场干一辈子的打算了。在断绝了任何幻想的情况下，实现了从“怕吃苦”到“能吃苦”的转变。因为知青和林场老职工同甘共苦，林场老职工也把知青当成一家人了。现在回想起来，在碱水里泡过的苦涩青春，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大批知青回城后，仍然接受着种种新的考验。不少知青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后，又遭遇了下岗等挫折。可是他们一直从容坚定地面对人生，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许多人又重新撑起了再就业的风帆。是知青精神始终在支撑着他们百折不挠地前行，而且教育、影响着他们的后代。

要说当年的知青与现在的年轻人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就是老知青有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从艰难困苦的磨练中闪现的，所以很朴素。那时我就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以自己的创造力和能力，赢得大家的尊重。一个偶然的机，林场把我从何家塘调到林业机械厂当钣金工，制造加工茶叶用的揉捻机等。到小厂当一名普通工人，对现在有些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屑一顾，而那时对我来说，却把它看得无比珍贵。起初兴奋得晚上觉都睡不着，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想着车、钳、刨。开始学习操作技术时，由于没有经验，我被“奶子榔头”敲掉了一个手指甲，后来虽然长好了，却与别的手指甲不一样了。因为师傅们对我很好，我就专心地跟他们学习，除了学专业技术以外，还学会

了做煤油炉、铅桶、喷壶以及修自行车、修锁、配钥匙、补脸盆等手艺。下班后，我掌握的这些手艺用场很大，经常帮助同事和朋友修修补补，大家相处得都很好，视我为知己。

然而知青毕竟是读过十年书的，记得在学校的时候，人人都有过远大的理想。下乡插场后，有些虚无缥缈的目标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破灭了，有些具体的目标却在实践中慢慢地清晰起来。我终于明白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更感到在学校里学的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用的。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必须趁年轻的时候抓紧学习。那时没有电脑，县里经常开大会要抄写大量的表格等材料，人手不够，就到林场借人去帮忙。我被借去写材料，才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够好、不够快。回林场后我就开始练字，几年的锲而不舍，这倒成就了我以后的一番事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进一步拨乱反正，“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逐步恢复。1979年江阴公、检、法系统到林场招干，我参加了那次招干考试。笔试就是听写：放一段录音报道，要大家准确地把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我一直坚持读书、练字，从未间断，听写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我边听边记，几乎没有差错。于是我被招到江阴法院当书记员。法院的书记员作现场记录要有一套硬功夫，我的那套功夫就是在林场的6年锤炼中打磨出来的。改革开放后，许多知青成了企业家、专家，在他们成长的经历中，都体现了上山下乡期间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特别是在离开了学校、离开了父母、没有老师和父母的督促、条件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还坚持学习、自强不息的人，是没有任何困难险阻克服不了的。知青们因地制宜地探索出种种切实有效的学习方法，同时在艰难中学会了坚强。因此回城后，能够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在百忙之中抓紧学习，甚至和比自己年龄小十岁左右的人在同一个课堂听课，拼命把年轻时失去的学习时间抢回来，并且在改革的实践中，把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变成了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

林场的知青陆续上调以后，知青情结仍然没有了结。每年大



家都要聚在一起回顾当年的知青生活，畅谈知青之间和老职工之间的深情厚谊。我与林场的老职工也经常来往，他们手把手地教我干活的真诚和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感受每个知青都很深。那种苦难中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是永远忘不了的，而且现在还在发扬光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现代史中的重要事件，那个年龄，也是知青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林场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每一个知青都得到过林场老职工的盛情款待和热心帮助，亲民、爱民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已经牢牢地扎下根来，即使到两鬓斑白音容改的年龄，我心中仍然珍藏着那段宝贵的记忆。比如现在，我与农民工就特别谈得来，和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在法院先后当书记员、审判员、庭长、院长，处理问题时脑子里会很自然地想到维护人民利益，从不把自己当一个局外人居高临下地看问题，而是把自己当成局内人，一心一意地为当事人办事。由于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法律是一门艺术，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其实对我来说，这种学习和实践，从到林场时就开始了。在那漫长的六年时间里，使我懂得了追求公正、善与爱的艺术，当上法官后，“人民”这两个字的分量，就在我心中越来越重！

从1974年插场至今，转眼间37年过去了。当年知青的子女都过了父辈上山下乡的年龄。当孩子在困难面前感到痛苦和迷惘的时候，我就要给他讲一讲那个特殊年代父辈用血汗凝成的知青精神。那是“胸怀大局的奉献精神、刻苦耐劳的拼搏精神、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我期待着现在的年轻人能够理解和传承知青精神。

# 艰苦的磨练 永恒财富

孙国建

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巴尔扎克

## 难忘的少年时代



1977年作者参加群英会照片

文革前，我爸是江阴县南菁高中的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母亲是小学教师。我们一家六口，住在南菁中学隔壁的公租房内，快乐幸福地生活着。文革开始后，我爸就“靠边”，不久被关进“牛棚”，批斗、挂牌、游街、毒打，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母亲在心惊肉跳中度日如年，我们姐弟四人都在小学或初中上学，因为是“黑五类”子女，受尽了一些人的白眼和欺凌。

1968年秋，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两个姐姐毫无疑问

作为第一批知青下乡。大姐(18岁)分配到吴江县插队落户;我二姐(17岁)分配到江阴与沙洲交界的山观公社东风大队(现香山村)落户。1970年1月小年夜前,我爸从被关了三年半的“牛棚”中放出来,戏剧性地成了“下放干部”。第二天,还没落实好下放地点,我们全家就被红卫兵连人带东西拉到澄张公路旁的“风起亭”,扔下东西,车就开走了。我和妈妈、弟弟站在寒风凛冽的马路上瑟瑟发抖、欲哭无泪,直到天快黑时,父亲去联系的东风大队承书记派农民兄弟把我们一家接到我二姐所在的13队落户。像我家这种下放,当时叫做“扫地出门”,原来的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从此,我家在江阴城里就没有一点私有财产了(因为我爸妈都是徐州人)。我的生活在农村重新开始,那年我17岁。

刚下放时,全家就挤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房屋破旧,冬天刺骨的寒风顺着缝隙吹进来,冻得我们全身发抖,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冬天。当时的大队书记承其昌是一个很正派的基层干部。我插队第二年,就根据县里的政策争取到了部分建筑材料的指标,准备为我们全家造个简单的“家”。在他的关照下,生产队队长王品扬带领队员扛石头、和泥巴,帮我们在村里盖了两间简易的平房。东风大队地多人少、民风淳朴,是全县知青插队的一个点,我们这个落难的“走资派”家庭在这里并没有受到歧视。加上父母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困难的左邻右舍,所以邻里关系比较好。

## 我要做保尔、雷锋一样的人

我爸是知识分子,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虽然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迫害,党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恢复,但对党的信仰和忠诚丝毫没有改变。全家落户到农村后,父亲找出他珍藏多年的几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及《雷锋的故事》等,让我们姐弟几人在工休后反复阅读,希望我们从这些英雄人物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书中的故

事使我这个青春少年热血沸腾，我暗下决心，活着就要像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雷锋一样，将全部的生命和精力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这样活得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行尸走肉。我不能庸庸碌碌度过一生，必须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作为！我也深深知道，自己是作为“走资派”的子女下放到农村的，当时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像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付出比普通工农兵子女多几倍的努力。

记得下乡第一次参加农活，是去舀大粪。当时我人矮小，身体单薄，粪勺又重又大，拿也拿不动，站在粪池旁，臭气熏得我直想吐。可挑粪的农民一个接一个，我只好硬着头皮舀大粪。回到家，手酸得连筷子也拿不住，看见饭直打恶心，下午还得继续干，这真是脱胎换骨的劳动。到了庄稼要施肥的时候，我和队里的青壮年天不亮就起身，步行七八里路到山观公社供销社挑一百多斤化肥回香山。那时，我还是个少年，从没走过这么多路，挑过这么重的担子。肩膀、脚上都磨出了泡，双腿直打颤，但我想着保尔、雷锋的吃苦精神，硬是咬着牙，发着狠，一拐一拐地挑回队里。一到队里，人就像散了的架子，瘫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我还经常去挑氨水，氨水是用船运回来的，有一股很刺鼻的臭味，直冲脑门，连呼吸也困难。要挑几里路，才能挑回村。

我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各种农活，从挑担、割麦、岔田、插秧到搓绳、摇船……每一件农活都力争做到又快又好。一年下来，我也和队里的社员一样拿十折工分了。

## 艰苦磨练

上世纪70年代，农村都要种双季稻，最折磨人的农活是“双抢”。7月底、8月初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这二十多天里，我们要冒着酷暑把前季稻“抢”着收起来，把后季稻“抢”着栽下去。我和社员们一样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起来开早工，空着肚



1975年山观公社江阴县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及带队干部合影。后排左五为作者

皮拔秧、垒田。水田里有成群的蚂蟥，专挑有伤口的地方咬，挥之不去的蠓虫、蚊子成群结队围着你的身体不停地叮咬，冷不丁还有水蛇冒出来吓唬你。白天，冒着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割稻、挑稻、垒田、插秧，晚上还要脱粒、拔秧，往往要做到十点以后才收工。每天回家，都是筋疲力尽，连脚都懒得洗，倒头便睡。任凭蚊虫叮咬，全然无知觉。体力消耗这么大，也没什么营养补充，主要靠没有多少油水的青菜、韭菜、咸菜下饭，豆腐、百叶在那时可都是奢侈品。粮食青黄不接时，靠红薯过日子。一个农忙下来，每个人都要瘦掉一大圈。在这种炼狱般的考验中，我咬着牙坚持。出工比大家早，收工比大家晚，挑担比大家多，垒田比大家快，脏活累活比大家干得多。

春天，农活不多的时候，队里组织我们搞运输，让社员们把香山采石场的石头运到张家港。我也参加了这个劳动，每天天蒙蒙亮，就到采石场用小车将石头推到河边，然后踩着跳板把石头抬到船上。那跳板只有20多公分宽，一头搁在岸上，一头搁在船上，外行人空身走在上边都是一晃一晃的。刚上去时，还真有些害怕。但我想别人能行，我肯定也行。谁知它还真欺生，当我们抬了三百多斤石头，走到上边时，我由于没有把握好节奏，连人带石头摔到河里。早春二月的河水冰冷冰冷，刺得汗毛孔直发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疼，脚上也被石头砸了个口子。我从水里爬起来，飞快地回家换了身干衣服，伤口用红药水一涂，撕块布一包，重返河边，继续干活。与我搭档的农民小伙子并不嫌弃我，继续与我合作抬扛，终于把一万多斤石头全部抬到船上。然后他掌舵，我拉纤，沿着河边的小路，一步步地将船拖到张家港，再将石头一块块抬上岸卸下来。最后把船再拉回家时，人已筋疲力尽，躺下去就爬不起来。任凭肚皮呱呱叫，也不肯动弹了。这种活干了一阵后，我突然想到，这船在水里行，非得靠拉纤吗？不是有的船已经用“挂机”了吗？“挂机”即柴油机，在当时是属于“计划”产品，不是有了钱就能买的，是农机水利局计划分配的。我向队长毛遂自荐，说水利局有个爸爸的朋友在当局长。文革前，他常来我家，也认识我，我愿意去试试。于是我到大队里开了介绍信，找到了这位叔叔，在我的软磨硬泡下，这位叔叔破例给我批了一套“挂机”设备。这条挂机船装好后，第一次运行时，小村里那欢庆的场面，不亚于今天谁开了一架直升机到乡下，我也成了一位“功臣”。从此，我们生产队的运输船告别了摇船拉纤的苦力生涯，一下子进入了“机械化”的时代，给生产队的经济增加了收入。但石头还得由我们抬到船上，到了目的地，再抬下来。

社员们看到我干活像小牛犊一样，事事抢在前头，不怕累、不怕脏，慢慢开始欣赏我，就让我做记工员、仓库保管员、小队会计。我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账目准确、清楚，大伙儿都信任我。休息时，我还给社员们读报纸、读战报（大队办的报纸），学毛主席著作，谈心得体会。通过学习理论知识，社员们有了思想动力，劳动的干劲更足了。大队书记、大队长看我干活不但有股虎劲、牛劲，脑子也灵活，后来又培养我做大队农技员、河蚌育珠推广员。当时大队的河塘里都养了三角蚌，培植蚌珠。我努力学习养蚌珠的知识，买了有关资料、书本，自己钻研，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公社农科站咨询，回来再传授给农民。蚌也会生病，出了问题，我就日夜查资料，解决问题。经过两年多的刻苦研究和精心培育，我熟练地掌握了养蚌技术。起蚌时，看到那颗



颗闪亮的珍珠，想到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为队里增加收入，我就忘记了所有的劳累，获得了劳动带给自己的幸福感、成就感。我越发认定，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太需要我们这些有文化的青年与村民一起奋斗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每个冬天都要开河，每次我都踊跃报名参加。先后参加开过利港河、应天河、太浦河、立新河。那时的开河是人海战术、重体力劳动，各地都派精壮劳动力参加。冬天寒风凛冽、冰天雪地，钉耙盆一下，手都震得发麻，虎口开裂冒出鲜血是常有的事。我和社员们就这样一下一下垒出泥块，先装在簸箕里，然后挑到岸上。河越开越深，路越走越陡，有时陡到要上边的人帮助拉了扁担才能上去。开河时，为了突击赶进度，经常组织劳动竞赛，看哪个人进度快。1975年年底，开立新河时，我参加了突击队，专拣“硬骨头”啃。大冬天人人穿着单衣、草鞋，我干脆光着脚，冒着刺骨的寒风，踩在冰碴上。脚底板上常常划得血痕斑斑，痛得钻心，但还得挑着二百多斤的担子，爬着陡坡，走几十级台阶，从河底挑到岸上。每天早晨5点半起身，夜里十点多钟收工，吃饭都是由专人送到河边。超强度的劳动，考验着每个人的体力和意志。1976年元旦那天，我父母亲特地到乡下来看望我。我虽然好久没有见到父母，心里也很想念双亲，但想到弟兄们都干得热火朝天，我怎能趁机休息一会呢？我想到保尔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冬里，饿着肚皮修铁路的情景，我咬咬牙，没有去会见父母。元月三号提前完成了任务后，才回家与父母团聚。

## 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由于我的出色表现，山观公社把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多次参加县、地区召开的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连续几年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农业学大寨群英会标兵，多次作为先进典型在大会上作介绍发言。1976年3月，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那年我22岁。

入党后，我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抓全大队的农业和一个片的工作，蹲三个点。

这一年，我虽然做了“官”，但全年劳动347天，实做工分4200分。“双抢”中，我在第一生产队“蹲点”，天天跟班劳动。晚上夜工开到10点多钟，收工后大队干部还要碰头，通报各队生产进度，研究工作计划。凌晨3点就起身到大队开响广播，再走一里多路去一队开早工。我自己以身作则，任劳任怨。整个农忙坚持一线劳动，没比社员少流一滴汗。

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动，透支的体力得不到很好的恢复。这一年患上了“静脉曲张症”，犯病时双腿经常痛得我头昏眼花。可我用手按摩一下，继续参加劳动。

这年冬天，大队计划平整八十亩土地，我主动请缨要求负责这项工作。承书记劝我“让其他人去抓，你的腿有毛病”。但我想我才23岁，又是新党员，我这点毛病与保尔相比，算得了什么？我接下了这个任务，组织全大队劳动力进行会战，每天劳动16个小时，60多天完成了59万土方的工程。我靠勇气和意志吓退了病魔，坚持在第一线作榜样。并将我挑的任务单独划出来，我一人挑土近700个立方，也就是每天要挑十多个立方土。凡是参加过这类劳动的，都知道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

在农村几年，我深深体会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民真累。但毛主席教导我们“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改变落后农村的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身上，我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我觉得，建设新农村，再苦也是甜的。我多出一滴汗，后人就能少花一点力。我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要做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我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来。在农村有三次进工厂和进城的机会，我都主动放弃，把名额让给了其他知青。

直到1979年底，最后一批知青返城时，我才离开农村，在农村整整干了十年。十年插队虽然耗费了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



华，却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是这十年的磨练，铸就了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永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

正是这十年的磨练，养成了我艰苦朴素、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

正是这十年的磨练，培养了我失败前不气馁，在荣誉前不忘形的人格定力。

我想所有经过插队锻炼的知识青年，他们回到城里后，在困难前都会更坚强，在事业上会更追求，在生活上会更朴实，在荣誉前会更淡定！

## 回城后的发展

回城后，我被安排在纺织品公司的一个商场做营业员。活是轻了，但毛病来了。到医院一查，是静脉曲张症发作，这是我在农村长期超负荷劳动时落下的病。在农村时，由于精神绷得紧，硬是靠意志压住了病魔。1981年，由于长期站柜台做营业员，下肢的血回流不上来，旧病就发作了，双腿站也站不了。医生建议立即住院动手术，一共开刀6个小时，动了10刀，才将两腿曲张的静脉全部割除了。手术后，休息了一阵，继续上班。

在纺织品公司工作，我又保持农村工作时养成的拼劲、狠劲，忘我的工作，很快得到同事和领导的认可和赏识。由于表现突出，被转



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后排左二为作者）

为国家干部，后来还兼职担任公司团支部书记。1992年被破格评为“高级经济师”。

后来我任江阴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帮助市里招商引资。2000年军队不许办企业，我打听到北京军事医科学院办的“四环生物”要卖掉，我将捕捉到的这个讯息立刻向市里汇报。阳光集团的陆总独具慧眼，决定买下这个公司。后来由我牵头，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实现了资产重组，将濒临倒闭的江阴制药厂与北京四环生物重新组合成“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受陆总委托，2000年去北京任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我同时担任江苏、北京四环生物公司董事长。

为了把公司做大做强，我发扬在农村十年练就的不怕苦、不怕难的硬骨头精神，走南闯北，广交朋友，拓展销售渠道。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公司现已成为江苏省最大的非PVC袋装输液生产企业。近年来，我狠抓新项目的自主创新，与北京工业大学组建了曾毅院士工作站，全力开发国家二类新药，成为我市医学科研创新的一大亮点。2010年9月，由于我以前在北京出过车祸留下的后遗症，我的两节颈椎开始剧烈地疼痛，在上海长征医院开刀，手术进行了8个小时，输血3200ml，颈椎上打了2根钢筋，8个钉。手术后，由于恰逢公司销售方面进行重要的招投标工作，我放弃了医生的休养建议，很快从上海回到江阴，全身心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不辞辛苦，整天奔波。因为这就是下乡磨练带给我的性格——做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 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

因为有十年农村插队的经历，我特别同情贫苦农民的孩子。前几年，经有关方面介绍，我结对资助了两个贫苦大学生，每人每月1000元生活费。去年这两人都已大学本科毕业，今年我又资助了两个贫苦硕士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我看来，能够帮助穷苦孩子读书，是使他们从根本上脱贫的一大善事。我还多次支

援灾区，捐款献物。这种善举，我还将继续做下去。

香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香山的父老乡亲培养了我，我与他们的感情血浓于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插队第一年，我全年劳动所得40余元。在春节前，我全部买了猪肉、年货送到五保户、困难老党员的家中，给他们拜年。以后每一年，我都要从自己的劳动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钱去慰问他们。插队时，农民生病、造房、娶媳妇缺钱，找我借钱，我从不推托，总是借给他们。直到我工作上调后，还有不少人没还钱，我也不催他们还钱，就当送给他们。村里有几户孤寡老人没有收入，丧失了劳动力。我们虽然当时也不富裕，但在父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精神影响下，我一直关心着他们，把他们视为自己的长辈。平时除了帮他们的自留地种菜、种稻，还经常给他们送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他们生了病，我掏钱陪伴他们看病就医。五保户范某夫妻两人经常同时生病，我就把家里烧好的饭菜送到他们家里，范某有肺气肿，半夜发病，气都喘不过。发病时，他老婆来叫我。我二话不说，冒着寒气，背起老人就往医院跑。他们万分感激，视我为他们的儿子，有什么事都愿意跟我讲。

我队另一范姓夫妻，家中有三个孩子，生活拮据。孩子上学吃饭，都很困难。为了让他们的孩子继续学习，我开学前都会资助他们，让他们不失学。在农村，我学会了理发、补套鞋、补塑料鞋，我经常给他家和村里的小孩子们理发、辅导他们学习。在经济上，我全力资助范家，直到他三个孩子成家立业。回城后，老队长在1990年生病，我送他到江阴人民医院检查，查出是胃癌，我出钱帮他请名医，安排他吃饭、洗澡、住院治疗。他出院回家后，我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想要盖房子，要问我借8000元钱。当时8000元钱是一个大数目，我二话没说，把家里积蓄全部拿给了他。他在临终前终于盖起了四间新房。老队长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国建真好！你是我家的恩人”。后来，我就把这笔钱算作送给他家。我与社员们打成一片，对残疾人更是关心帮助。队里有个哑巴，孤寡一人，平时大家都不愿理他。我去了以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后，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不歧视他，与他交朋友，跟他打手势交谈沟通，他总是对我竖大拇指，干活也喜欢跟我一起干，而且特别卖力。现在哑巴也年近六旬，我还经常接哑巴到城里来，陪他洗澡、看电影，给他买衣服、物品。村上的农民只要有困难找我，我都会鼎力相助，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2007年，由我发起、出钱，组织了全体在东风大队插队的知青三十多人回香山重游故地，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烈欢迎。为了感谢香山村父老乡亲给我的精神财富，活动结束后，我出资两万元，买了一套健身器材送给村里老年活动室。前年承老书记住院时，我请名医为他检查身体，安排他住条件好的病房，并多次探望他。在经济上也给老人家一定的帮助，直到老人家去世。我觉得人活在世上，能关心帮助他人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上到国家主席、共和国元帅，下到像我父亲一样的基层干部都不能幸免，使许多家庭遭受了不幸。

知青下乡，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更可怕的是造成了文化断层，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延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但对我而言，我却在插队的磨练中，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提升了战胜困难的毅力，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大凡经过十年浩劫的人，面对以后的政治运动，都是显得很淡定；大凡经过插队磨练的知青，面对以后工作的困难，都比较坦然。这大概也算是“十年动乱”的一点正面意义吧！

# 我的“桃园”生活

夏锡良

1968年下半年，我到江阴西石桥公社水产场南队插队落户。水产场是西石桥公社的一个较为富裕的大队，财力雄厚，每年要上交公社不少资金。它共有三个生产队：南队、北队、东队，外加一个刚上岸居住落户的船民群体，被称之为“东场渔业队”。另有一个养殖鱼苗的“渔业组”（挂靠在北队）及一个“副业组”（挂靠在南队）。当时其他农村生产队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经济上生产队是独立经营，各自分红。唯独水产场三个生产队是“二级所有”，三个队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它的经济运行及年终分配模式等一切经济活动由水产场场部决定。当时“副业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水产场在1958年时曾栽育的18亩桃树已长大成为一片桃园。在我插队之时，这片桃园已有十年树龄（桃树的树龄一般为20至30年，盛产期在7年树龄以后）。

## 一、来到水产场桃园

1969年1月的一天，我和桃园的老沈、知青小江及南队两位当地社员一行五人被安排赴璜土小湖附近的“璜土第一园艺场”学艺：学习冬季桃树修剪技术。十多天后，我们学艺结束回场，我与老沈及小江三人就住进桃园。从此我就生活在桃园，劳动在

桃园，开始了我的三年半桃园生活。

虽然我们是比较独立的一个生产小组，但依旧属于“南队”管理，上下工等作息时间安排、工分的记录、口粮等生活资料的分发、年终决算的工资分配等都由南队统一管理。在桃树采果期间的突击劳动中，由南队的社员来突击帮忙。农业队秋收秋种时期，是桃园的空闲期，我们要去农业队支农劳动半个月。农业队夏收夏种时，尽管桃园也是大忙时节，在插秧时，我们仍要到农业队去帮助支农插秧一个星期。

秋冬季节的修剪是一种技术活。我们桃园共有800多棵树，树冠都比较大，一个人如果尽力修剪，没有其他事务干扰，一天也只不过修剪4到5棵树，修剪质量要影响到明年挂果的多少、产量和收成。另外，冬季要施河泥或菜籽饼等基肥，保证来年挂果的效率。春季秋季虫害的治疗、果树病害的防治也是管理人员要掌握的要领。我在回城时经常到江阴新华书店去买一些薄薄的农业技术小册子阅读，以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尽量做到科学管理果树。桃树挂果后，五月下旬开始要进行疏果及包桃。那时水产场经常请澄西中学的高中学生来“学农”，让他们来桃园包桃子，但是管理人员就是我们五人，既要指导他们，还要做好纸袋、铁皮条等后勤保障工作。学生来了一大批至少有300人以上，要提醒他们小心碰落果粒、节约用料，指导他们合理操作等等。那几天是我们的大忙时节，一到夜晚整个人就要瘫下来似的。西石桥水产场的桃树主要有三个品种，六零桃（六月底出果）、白凤桃（七月中旬出果），白花桃（八月十天左右出果），还有少量的红花桃、蜜桃、盘桃等等，口感最好的是七月份的白凤桃。

出产的桃子80%是分批装箱，用船运到江阴北门外五一棉纺厂附近的果品公司仓库，供县城各商店销售。果品公司给我们的批发价是：最高的一级白凤桃仅0.18元/斤（五只一斤），最低的三级白花桃仅0.09元/斤。其余的桃子（主要是过分成熟的）在桃园门口向小商小贩们或个人出售，出售价格倒也不低于果品公司的价格。桃园占地18亩地，桃子出产大小年不等，从1969年到



1972年四年中，我们每年出售的桃子收入大约在4000到8000元之间，平均每棵树产出50到100元。

## 二、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

由于刚到农村，我们知青对农村的劳动很不适应。水产场的特点是田多人少，60年代末还在平整土地、开垦荒田，把大批生长蒲叶（用作做蒲包）的蒲田挑平改作耕田。社员们的劳动量特别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走出水产场，外人看水产场社员，相貌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岁”。我们初来这种环境，处于这种长时间劳作的状态，很不适应。冬季天刚亮就要起来打早工，到上午八点半才回屋吃早饭。夏季每天要到晚上八点多才收工，时间耗得太长。

我身材瘦小，腰围不满2尺，特别怕挑担，人家能挑150斤以上，我只能挑100斤左右。记得有一次公社分配给桃园一批肥料，要我们几人去挑，空身走到市镇上也要40分钟，我们每人一天要挑五趟，最后一趟我晕倒在路上，醒来后还是要挑回来。好在后来生产队长知道我这个弱项后，不大安排我做挑担活而做一些技巧的手工活。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干的是苦活，我们也还得去农业队帮忙。好在我的手法活做得比较快，插秧、割稻总是在生产队得第一名，也并不感到劳累，就是怕挑河泥。

桃园里的劳动很艰苦。治虫阶段，戴着草帽、口罩，抬着一只装满已配制好农药的大粪桶，一人打气，一人用喷雾器喷洒着“二二三”、“乐果”等毒性较强的农药，在果园中弯腰行进。果园里很闷湿，从东头打到西头走出果树林，已是汗流浹背。初夏或秋季时节，我们打药水时一般只穿一件旧的外套，钻进果园走一个单趟，出来时已经浑身湿透，再一晒太阳，衣服上马上结一层白盐霜。

冬天，我们要在一个半月里整枝修剪。隆冬时节，北风劲吹，树林里的气温相当低，那时我们要戴两副手套，才能使手不

致被冻僵，以便一手拿锯、一手拿老鹰钳劳作。当时每人配一架木制人字梯，有一次风实在太太，一不小心我的一位同伴被风从梯上吹下来摔了一大跟斗。有时为了赶进度，穿着雨鞋站在雪地里照样修剪，一双脚经常被冻僵。

除了劳动的艰辛外，我们还面临着生活上的困难。桃园里有三间小屋，外墙抹了石灰，里墙连石灰也没抹，只看到一块一块的红砖。三间房里面用芦苇扎的芦杞隔开，连房门也是芦苇席做的。西屋住三人，东屋放桃树枝作燃料烧饭，中屋当起居室及一个二眼灶，我和老沈、小江（后来和老沈、胡老师）住在这桃园小屋里生活。

生活上最难的是吃饭问题。生产队的社员们家有老人烧饭，他们的早餐、午餐时间控制得很紧，只有半小时到1小时。我们与他们同步上下工，有时刚吃到饭时已经上工了，吃饭总是像抢饭似的。我们的居所既是生活居所，又是劳动场地，桃子上市季节，有几十个社员帮我们劳动，每天有上百个小贩或顾客上门买卖。桃子果实上有一种细毛绒，风一吹就飘散在空气中，粘在身上奇痒无比。七、八月间我们无法摆脱皮肤痛痒之苦。

桃子上市季节，住所周围一片混乱，没有办法烧菜，只能每天喝冬瓜汤。一直到八月中下旬我们的小屋才能恢复平静。但到了八月中下旬，那时种的秋菜没有长大，午饭和晚饭只能萝卜干下饭吃，记得有几顿还只能烧油盐饭吃，即大米饭里加些盐和几滴油。

桃园位于水产场东南角，地处江阴、武进两县交界的一条界河旁。我们除了一只广播喇叭外，与外面几近隔绝。桃子出果时期，场部会拉上一根供电线让我们开夜工劳动照明用。出果期后电线就撤了，我们就只能用煤油灯照明，渡过那漫长的黄昏及夜晚。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唯一的活动是听广播，从天刚黑听到九点多，听着那位操着标准江阴西乡口音的女播音员说“明天再会”后就上床睡觉。有时想看些书或写封信只能就着一盏煤油灯，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读写。

最害怕的是秋天或隆冬季节，因为我们三位都是外乡人，在



农闲季节要轮流回家。如果一人回家，小屋有两人生活倒也罢了。有两次其他两人都回家了，我一人留守看屋，真是寂寞极了。白天上工还有其他社员伴着，一到下工后就我一人守在那三间小屋，有些害怕。小屋南面不到三十米就是蒲滩，里面有许多野鸭，夜里叫起来怪吓人的，再加上我们小屋建造的那块土岗原来就是个坟场窝，白天从后门口就能够看到十几个小坟堆。还有南队那些社员们经常用一些似真似假的传闻来吓唬我，弄得我好几夜睡不着觉。那两次的经历，让我真正品尝到了“孤独”的真实味道。

小屋很小，极其简陋。屋顶的横梁是用粗毛竹做的，时间长了看上去有些弯，让我感到有些害怕。四周墙体除了东西两间屋的南墙上有两扇玻璃窗外，北墙面上只用砖砌了几个空洞，每到十月底我们就要找些新的塑料纸封它几层，以防北风吹进来，到了第二年夏天那塑料纸就要老化破裂。冬天风很大，小屋内很冷，经常处于冰点以下的室温，湿毛巾被冰冻的时期很长。有两次冬天夜里下了鹅毛大雪，天亮起来后我们发现被子上已有一层近1厘米厚的冻雪，害得我第二晚只能到农业队其他知青处挤铺。

夏季桃子出果时期，三间小屋的两间成了堆放桃子的库房，我们住房的房门虽然关着，但芦席隔墙挡不住桃子的毛绒飞舞，弄得到处都是桃毛，我称之为“空气在桃毛中”，于是整个夏季我几乎都是睡在看护桃园的窝棚的芦苇席上，当然晚上睡前我要在手脚上涂满避蚊油，整个夏天我要消耗四到五瓶避蚊油。

在那几年，虽然劳动艰苦，相比其他公社、大队的知青，我们的收入尚算可以，一般来说男知青能挣360个工左右（普通社员能挣420到440个工），那几年每个工价约0.75元至0.85元，扣除粮食及分到的农副产品外，每年能收入200多元现金。

### 三、生产队的李队长

桃园挂靠在“南队”，南队队长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队长姓

李，年长我十四五岁，现在可能已年近八旬。他是一个脾气大、嗓门大、会骂人的火炮将军，说话快、转身快、手脚快，小学文化程度，烟瘾很大，8分钱一包的劣质烟成天不离嘴，爱喝酒但酒量不大，喝了几口就面红，就训人、骂人。连我和小江算在内，南队知青有十人。李队长开始时对我们有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一则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在城里不好好念书，犯了错误到乡下来接受改造，接受他们的监督；二则认为我们来了抢了他们的工分，会使他们收入降低。开头派工时对知青也不够照顾，看到知青劳动不能适应时还会有一些幸灾乐祸的讥讽。此种状态一直到了1969年冬季评工分时达到了冲突的顶峰，期间有些社员硬要把我们的工分压到六折，他也支持他们。我们知青团结起来，共同抗议交涉。经过几夜时间的努力，最后他们让步，我们知青的工分分成两个档次，分别提高到7.5折或以上。

不打不相识，从此之后他和我们知青尤其和我经常接触，队里的事情都要和我聊，聊生产队的复杂情况，谈知青的去向。我对他表示：每个知青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不想抢他的领导权，倒是有些社员是他的竞争对手，知青力量也不小，倒是他可以利用、团结的一股力量。慢慢地知青们成了他的好朋友，有的成了为他出主意的“谋士”。后来他也很照顾知青。记得1972年我离开桃园去当代课老师前，他来桃园小屋和我长谈了两个小时左右。至今大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 四、“技术员”老沈

在三年半的桃园生活中，我一直和老沈住在一起。老沈是无锡洛社下塘前沈巷人。比我年长约20岁左右，左腿因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拐一拐，而且左手也先天性半残疾。他的一只右手加上他的牙齿能做许多我们常人都不能做的事情，比如修修淘米箩、菜篮、一些工具。桃树整枝时他和我们一样干，烧饭做菜样样都来，挑担也能挑上五十来斤。老沈是文革前夕由水产场引进

的培育番茄苗、瓜秧的一位土“师傅”，每月固定工资三十元。文革后育蕃茄苗、育瓜秧的副业停止了，1969年初和我们一起被派到了桃园，我和他一直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房间。

老沈其实和我们一样，以前对桃树的种植、培育没有经验和知识，但一直摆出“老师傅”的架势，以求得获取每月三十元工资。我有几次发现他在果园管理上犯了一些错误，也懒得去“揭穿”他，只能私下和他建议，去调整办法，免得让村上的社员、队长对他不利，对他的“饭碗”带来威胁。

老沈很聪明，肯钻研，也非常勤快。他要对得起他那份超过队长的经济收入，因而在桃园里努力地劳作，早起晚睡，维持着桃园每项主、副业生产。小屋旁有几亩旱岗地，在老沈的指挥下，我们在春天里种满了番茄、西瓜、冬瓜等经济作物，而且每年都丰收。卖给小贩们也很便宜，西瓜批发每担只有七元钱，冬瓜每担五角。每年下来上交给场部的瓜果收入也不少，大概要有五六百元甚至接近千元。这可能就是老沈长期能在水产场留用而不被辞退的原因。

老沈由于半残疾，很晚才结婚，家中妻子及二女一子的生活均要靠老沈每月三十元钱的工资中的大部分来支撑。所以他很节俭，什么都舍不得买。夫妻俩挺和睦，我见到过他妻子带了小儿子来桃园探过一次亲，他们相敬如宾，感情很好。

几年的桃园生活，老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家务活基本上是他干的，只是挑水挑柴由我来做。村上社员由于嫉妒心理对他经常攻击，而且还有些污蔑性言语，但我很体谅他的苦衷，尽量在不同场合帮他说话。1970年夏末桃子刚落市，老沈大病一场，住在澄西医院三天，我和另一位社员老单轮换陪护，他也很感激我们两人。

## 五、桃园失窃案

桃园里另一个知青小江是扬州城里人，投亲靠友来到水产场

落户。他人高马大，近一米八的个子，头上带了顶军帽一副军人的样子，力气比我大多了，喜爱唱京戏。在那七个“样板戏”盛行的时代，他是最受欢迎的人，每次劳动他都要唱上一曲。最拿手的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狱警传”和《沙家浜》里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两段。唱得挺专业的，社员们及桃园里的人都经常起哄要他唱戏。可惜水产场没有成立宣传队，否则的话他是第一人选。每当广播里唱样板戏他都爱跟着唱。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从家里带来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功率很大。主要在晚上听听收音机里的京剧，小江也跟着唱，有几次还把收音机带到劳动场地的田埂上播放样板戏，平时他把收音机锁在他的大木板箱里。

大约半年之后某一天中午，劳动完毕我们回屋休息做饭，突然发现小屋的后门大开，屋里小江和老沈的木板箱以及我的藤条箱的锁都被撬开了。小江少了一只收音机，我和老沈各少了一件毛线衣，我箱子底层的纸皮夹里的大约五元钱倒是没被拿走。我们马上报了警，公社的几个人来查看，询问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什么结果，说是要调查，结果一直不了了之。当时这个案件轰动了整个水产场和附近几个大队的一些村庄。从此以后小江感到很沮丧，整天无精打采，他的损失比我们大多了，我们的毛线衣大约值15元钱左右，他的收音机大约要近百元。加上其他原因，不久小江离开桃园，到北队去了。后来虽然同在一个水产场，接触也不太多。1978年知青大返城时，小江回到扬州当了一名警察，退休前是扬州的一位派出所所长。2011年春节他有事来西石桥，我和另一位同场知青老钱与他碰面叙谈了一番。

## 六、下放干部胡老师

小江走后，就剩下我和老沈两人在桃园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1970年秋季，场里安排来了一位来自澄西中学的下放教师。那天由在学校当厨工的小李师傅挑了一担行李送他到了桃

园，一头是铺盖，一头是箱子。胡老师拿着一只装着面盆、热水瓶的网线袋，戴了一只大草帽来到我们的小屋。因为他是下放教师，事先已隔好了一个半间屋的小房间给他单独住，当然只是用芦苇席当墙作门简单隔开了一下而已。

胡老师身高1米75左右，身材单狭，花白头发，走起路来像是要被风吹倒似的。他比我年长二十七八岁，当时已经五十出头，是位拿66.5元高薪的英语老教师，听队长及有些人传言他有些历史问题，文革中被打成“特务”，一直未被清查出名堂。在过了干部下放浪潮后的大半年，他依旧被下放到水产场来劳动。刚来的一个月里，可能是刚出“牛棚”的原因，他沉默寡言，与我们基本没有交流。开始时，他不但做桃园的农活不行，就连烧火做饭，淘米洗菜等家务活也不行。过了一个月后，大概看到我们俩对他在生活、劳动方面的真诚相助，他的话才慢慢多起来，好长时间后我们才对他逐渐了解。

胡老师是武进县人，出身大户人家，年青时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后就从事英语教学，先在江阴东乡任教，文革前的1965年被调派到澄西中学。爱人和儿女在无锡城里生活，夫人是位小学老师，大女儿是北京某学院65级大学生，当时还在农场锻炼未分配工作。对他的所谓“嫌疑”问题和遭受到的迫害及不公正的待遇，他闭口不谈，我们也不便多问。我真想不通这个弱不禁风，举止木讷，看上去连只蚂蚁都不敢踩的一位老者竟然还要被“下放劳动”。他真的不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让他到我们这个偏远的桃园来受这种苦，真是一种罪过。好在因为他不要拿队里的工分，李队长也同情他，我们也随便他，让他自己看能帮助做什么就做什么，家务劳动也算劳动。到后来也能烧烧火，淘淘米，整理整理柴火什么的，有时到果园帮助拖些树枝回屋，有时在我们看护桃园时帮助替换一会儿岗，让我们回屋吃顿板。但是他那种“先生”腔，连七八岁的小孩也不怕他，经常和他捣蛋。

每当傍晚时分，胡老师便点煤油灯看看自己订阅的杂志，并且带来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经常翻看，只有这时才能

看得出他曾经是位英语教师，平时不讲一点英语。后来我主动和他交流英语单词及语法，他才稍稍多讲一些英文方面的知识。他经常夸我的英语基础好，还称中学里有些英语教师的水平还不如我。

胡老师要参加每月一次的公社下放干部为时半天的学习例会，隔夜他要做几小时的准备，小心翼翼地准备着次日的发言稿或其他，不管刮风下雨，一大早吃过早饭就急着上街，直到下午在西石桥街上的小饭店里吃过中饭后才回桃园。每月中旬过了13号他会赶到公社里去拿工资，然后回无锡一次，住上四五天再回来。

就这样胡老师、老沈和我一起生活了一年半左右，直到1972年春季，一纸调令把他调入申港中学任教。临走前一夜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我羡慕地说：“胡老师你可以脱罪了，今后你可以去从事你应该从事的教学工作了。”他却忧伤地对我说：“我怕我胜任不了。现在的学生又不想念书，我怎么去教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倒很希望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退休。我当初不想来，现在倒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第二天，我送胡老师去申港中学，就像当初小李师傅送他来桃园时的情景一样。我挑上一担行李：一头是箱子，一头是铺盖，胡老师在后面提着一个网线袋，里面放着面盆和热水瓶。步行七里路我把他送到了申港中学吴子沫校长的办公室。临别时我说了一句伤感的话，“我成了第二个小李了，看样子我今后要做伙头军了。”胡老师笑笑说：“我看你能成为一位英语老师的。”此话真的被他言中，没过几个月我真的去西石桥五七中学当英语代课教师了。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路过申港中学看过胡老师。大约在1974年春节后，我再去申港看他时，申港中学的教师说胡老师已经调到青阳中学任教了。大概在1975年，胡老师来过一封信，大意是由于他的性格缘故，教书很吃力，也不太适应了，身体又不太好，他已经病退回无锡了，让我有机会去无锡的话去他家里



玩等等。1976年秋天我上调到江阴自来水厂后，借去无锡自来水公司出差机会，按照他信上的地址找到了胡老师家。看到60岁不到的胡老师精神状态已经大不如前，满脸苍老，说话慢慢吞吞，思维迟钝，我伤感不已，不知道是因为文革中吃的苦太多，还是因为他不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以致于他衰老得如此之快。

我在1972年8月离开水产场桃园去当代课教师了，桃园已成为过去的一段记忆而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见到水产场的朋友时，经常谈到桃园趣事。不久他们对我说：“桃园因桃树的树龄太大，出产不高已被挖掉了，小屋也被拆了，那片岗地有的被挖了鱼塘，有的种上其他作物。”听到这消息，我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心中真不是滋味。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年在桃园劳动时千方百计想离开它，可如今它被毁了，自己又那么怀念它曾经的点点滴滴。

2002年冬，我和水产场的知青们结伴第一次回场，我一个人单独来到原来桃园的地方。昔日的一切荡然无存，那里的地形大变样，已找不到原来桃园的一丝旧迹，只是通往西石桥镇的乡间小路还在。在路边我原来居住的小屋旧址旁，已架起了一座输送高压电的大铁塔，四周的一切安静极了。我在铁塔周围转了大约20分钟，观望着大铁塔前后左右的一切。30多年前，我曾生活于此，劳动于此，曾经把我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让我从一个不谙世事、刚踏出校门的青年，逐步走向成熟，明白了生活真谛。



## 我在农场种棉花

陈玉娣

我在掘港农场插场10年，先在十连种田6年，后在农场办的纺织器材厂工作4年。我在连队种田，有大半的时间是在十连青



在棉花田（朱梅英提供）

年突击班种植棉花试验田。曾经魂牵梦萦的试验田，伴我度过近1300个难忘的日日夜夜，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艰苦的劳动锻炼我，科学的知识充实我，战友的情谊温暖我，丰收的喜悦陶醉我，往事历历在目。

我原在十连一排劳动，1972年3月的一天，连指导员林立功突然找到我谈话，要把我调到连部所在的二排担任刚成立的青年突击班副班长，和班长於银苹带领10名战士（兵团年代的农场职工和知青与军队一样都称战士），种植40亩棉花试验田。

青年突击班清一色姑娘，平均年龄才20岁多一点，其中4名女知青，我和李学云、张秀文是江阴知青，还有1名徐州知青孙

和艳，都是从十连各排挑选的骨干；其余8名是农场女青年职工。当时，我心里很矛盾，自己到农场才三年，既缺乏种植棉花的知识和技术，又无领导经验，现在要和班长一起带领全班战士种植棉花试验田，我能行吗？但又想到兵团战士讲究的是服从，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有些犹豫。指导员拿出《毛主席语录》，针对我的“活思想”，翻到语录本第128页和第171页，和我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认真”和“什么叫工作”的两段语录，这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时兴的方法之一。指导员对我说，我们兵团战士最听毛主席的话，心里有“认真”两个字，又有“工作就是斗争”和“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精神，就没有干不好的事情和完不成的任务！他还说，青年突击班挂在二排，由连部领导，圣开荣连长是你们的技术总指导，你还用怕吗？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了。

第一次来到棉花试验田，我看到田块的北边有几座老职工的住房，旁边还有防风沙的林带和小河塘约百亩荒地，其中40亩种棉花，其余种水稻。牛犁过的泥堡子比脸盆还大，干枯的杂草倔强地从泥块的缝隙贼头贼脑探出，向我们示威。

要将这样一块荒地整治成棉花试验田，谈何容易！圣连长像看透大家的心思，说，我们要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探索途径和经验，把荒地变成棉花高产田，这就是种植棉花试验田的目的。这个任务就落在姑娘们的肩上！一番话把大家已凉了半截的心又说热乎起来了。接着，圣连长向大家详细讲解棉花播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还为大家作示范。从此，我们从翻地、斩泥（把泥堡子敲碎）到挑猪粪施基肥，从做垅到挖排水沟，样样农活都要自己干。时间不够，我们就起早贪黑拼命干。累了，大家不哼一声，互相捶捶背，相互鼓励，然后继续干。

翻地斩泥，钉耙敲在僵硬的泥堡子上，只留下钉耙的齿痕，还震得虎口生疼。我们手上磨出一串串血泡，用手帕、布条捆绑一下，咬紧牙关还是干。从养猪场挑猪粪到试验田，路远，肩膀被担子压得又红又肿，痛得扁担不能挨着，挑担时姑娘们一个个

成了《封神演义》中“歪脖子”申公豹，还相互说笑取乐，嘻嘻哈哈的笑声不断飞扬在田间上空。挖排水沟原是男壮劳力挖的，现在自己挖，特别是我们4个女知青，从未拿过10多斤重的大铁锹，带血泡的手一沾着铁锹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额头沁出黄豆大的汗珠。我们的臂力也不够，只能把整个身体压在铁锹的手把上，使出浑身吃奶的力气，像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挖，但丝毫不落后8名农场女青年职工半步。几天下来，两只手腕子肿得像猪爪，连吃饭的碗筷都不能拿。我们把田里纵横排水沟挖得像棋盘的线条横平竖直，沟沟相通，沟壁铲得光溜溜的，沟底还向田两头略有些坡度。田四周的排水沟挖得特别深，人站在沟底能超过膝盖，这样，便于将来及时排尽试验田内涝积水和旁边水稻田的渗水。经过大家20多天的精耕细作，平整松软和赏心悦目的40亩棉花试验田展现在我们眼前，一次性就通过连部组织的验收检查。

第一年种植棉花试验田，我们就遭遇到农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草灾”。棉苗才出土几天，春雨就连绵不断地下个不停，草也趁机疯长，把棉苗淹在草的海洋里。这是老天爷存心要考验我们的决心和毅力。眼见一棵棵幼嫩瘦弱的棉苗叶子发黄，病恹恹的样子，大家心急如焚。救苗如救火，大家不约而同地穿上塑料雨衣，扛起锄头就下棉田薅草（锄草）。在棉行行距中薅草还马马虎虎，可棉苗根部四周的草就十分难薅，一不小心就会把棉苗也薅掉。我们4个女知青想了一个办法，先薅行距中的草，再蹲下身子用手拔棉苗四周的草，这样虽然很累，但一棵棵棉苗保全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又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棉田湿度大，薅过的草根沾着泥，仍旧碧青碧翠。大家又想出一个好办法，每天薅下的草带出棉田，倒入肥料坑沤肥。我们用愚公移山的办法，用毅力将40亩棉花试验田的草薅尽。看着棉苗一天天有起色，别提心里有多高兴啦！第一个硬仗，旗开得胜，更坚定了我们种植棉花试验田的决心和信心。

但是，父亲意外病故对我打击极大，思想产生波动。1973年

3月底，我回江阴探望身患胃癌已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一米八几的魁梧身材，如今已是一把骨头，我望着父亲止不住地流泪。父亲拉着我的手，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断断续续说出：“找你舅舅想办法调回江阴……”那时，除大姐出嫁，家中还有



棉田里的学问（赵惠提供）

55岁的无业母亲、双目失明的二姐和尚在上学的弟弟，如果父亲有个三长两短，我在农场怎能安心？棉花试验田还怎么种得下去？我笃信舅舅能帮我调到江阴林场，但仍属“农”字头，心有不甘，再说，总不能巨细事务都找舅舅帮忙啊！于是，我半路折回，推说舅舅不在家搪塞过去，父亲也自此不再提及此事。4月18日，我见父亲病势略有好转（其实是回光返照，当时我并不知道），就返回农场。这一别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既没有为父亲送终，还差点贻误为父亲守灵。25日中午，我收到父亲病故的电报，悲恸万分。当天到江阴的班次已没有，翌日一早乘汽车赶回家已是下午4点多，离父亲殡葬仅一个晚上。父亲已经65岁，是家中的顶梁柱，去世后，原本拮据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我的思想在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留农场”还是“回江阴”之间。后来，由舅舅出面联系，将我55岁的母亲安排在江阴豆类制品厂做临时工，17岁的弟弟也由政府分配到钢绳厂当学徒，全家人的生活总算安顿下来，也减少了我的一份牵挂。平时，我省吃俭用，从牙齿缝里挤出钱接济家中。青年突击班的姑

娘们以不同方式，对我表达她们的关心，安慰我。许多十连的江阴知青探亲返回农场，以及圣连长利用到江阴华西大队参观学习的机会走访我的家，都向我传递家中平安的信息。大家的深情厚谊，温暖了我的心，使我逐渐平静下来，把父亲去世的哀戚深埋心间，思想逐渐稳定下来，恢复了原来的活力和朝气，以感恩的心，更加积极投入种植棉花试验田。

棉花从4月播种，到10月开始采摘棉絮，生长期和管理期长达六七个月。青年突击班的姑娘们每年除参加连队的“三夏”收割麦子和插秧、“三秋”收割稻子和种麦，以及冬季上河工挑泥，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把全身心放在棉花试验田上，像虔敬服侍父母和细心照顾孩子那样培植棉花。



女知青在掘港农场（右二为作者）

棉花生长期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病虫害。我曾屈指指数过，我们的棉花试验田曾遭受过五六种重要病虫害。因此，喷洒药剂防治棉花病虫害，是我们经常性的劳动

内容之一。一些治虫的常用农药，只需闻闻气味，不看标出的品名，我们都能正确地分辨出来。

4月底，试验田绿油油的棉苗惹人喜欢。可是，我们意外发现有少量棉苗苗茎基部被地老虎咬断倒向一边，造成缺苗断垄。尽管我们进行过棉种选种和药剂拌种，田间又喷洒过药剂，能有效防止地老虎的发生，可是，由于某些因素，每年总有“漏网鱼”，在春间棉田出现地老虎的第一代幼虫。我们决定捕捉地老



虎，虽是无奈之举。地老虎有昼伏夜出活动的习性，利用被咬断倒地棉苗和土壤松动的新痕迹，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地老虎遁藏的方向和地方，只需用小棒仔细拨开土块，定能稳稳地捉到地老虎，恰如瓮中捉鳖。每天黎明，我们就下棉田捉地老虎。雾气很浓，头发、衣服很快就被雾水沾得湿漉漉的，不禁觉得寒气一阵阵袭人。这时，能见度也低，大家猫着腰，像巡逻在边防的战士，睁着警惕的双眼，沿着一行行棉苗巡捕，决不放过一只地老虎和任何疑点。每人每天能捉到几十条地老虎，集中后送到连队养鸡场喂鸡。嘿！这些貌似可怕、黑不溜秋、浑身皱纹的地老虎成了鸡的绝妙“活食”。一周后，棉苗渐渐茁壮成长，苗茎也长粗壮，地老虎不再构成对棉苗的威胁，接踵而来的是年发生20至30代的棉蚜虫。

别看棉蚜虫比半粒芝麻还小，对棉苗危害极大。它十分刁钻狡黠，常常躲藏在棉叶背面，像暗藏的敌人，暗中用口器刺入棉叶幼嫩组织吸取汁液，造成卷叶枯萎；它排泄的蜜汁，诱发腐生霉菌。喷洒药剂防治时，我们必须弯着腰凑近二三十厘米高的棉苗，药剂还必须从叶背面往上喷，难免药剂从叶面四周喷射到自己的脸上，“吃”药剂是常有的事。那时，我们年轻气盛也嫌麻烦，并不戴口罩（要自备），而且，口罩一旦被药剂喷潮，捂在嘴上反倒“吃”得更多。所以，喷雾器筒内的药剂一喷洒完，我们就赶快到田边的小河塘漱洗一下，然后再回到棉田继续喷洒药剂。

6月中旬，棉花试验田里星星点点开出第一批花蕾，接着又陆续结出棉桃（棉铃）。我们知道这叫“伏前桃”，是棉花好收成的预兆。想到辛勤劳动没有白费，大家恨不得唱歌跳舞来庆祝一下。圣连长却警告我们别高兴得太早，棉铃虫和棉红铃虫（又名棉花虫）频发高峰期即将到来，幼虫钻入棉花花蕾和棉铃中为害，落蕾脱铃，造成僵瓣和减产，思想上要做好治虫保花蕾棉铃的准备，准备打大仗、打硬仗和打持久仗。圣连长还建议我们对棉株喷洒矮壮素和追施一次尿素，防止棉株疯长（已达我们齐胸



知青所用的锄头（刘强捐赠）

高度）和棉铃养分不足而掉铃。为了棉田通风透阳光，我们钻进棉田为每一株棉株整枝和去掉下部老叶。实践中，我学会区分雌枝和雄枝。枝条略扁有丫杈的是雌枝，能开蕾结铃；独根圆溜溜的枝条是雄枝，应去掉。别看这活挺繁琐，可却是个技术活和精细活，来不得半点马虎。在棉田蹲的时间久了，憋得喘不过气，两腿发酸发麻发胀，猛一站起身竟会头昏眼花，真有点找不到方

向，连走路都迈不开步。

七、八、九三个月，果然如圣连长所说的那样，棉铃虫和棉红铃虫特别猖獗，轮番上阵。连队插秧一结束，我们就投入棉田接二连三喷洒药剂，才把虫害降到最低程度。说句老实话，在棉田喷洒药剂没有上河工挖河挑泥累，也不比插秧苦，但在暑热难忍的大热天，不动都不停地淌汗，何况在赤日炎炎下，背着灌满药剂有几十斤重的喷雾器，穿着卡其布长袖、长裤腿的服装（防止被棉枝刮破手脚），左手不停地上下掰动加压手柄，右手不停地在棉株的上下左右移动喷射杆。穿行在齐胸高的棉株行中，如同走在没有尽头的夹弄堂里，让人真有些受不住。同时，还要眼观六路，防止喷射杆将花蕾和棉铃碰伤、碰掉，这可是我们即将到手的劳动果实啊！汗珠像断线的珍珠不停地从额头往下掉，从每一个汗毛孔冒出来，衣裤上千姿百态的汗碱和汗渍，像国画大师的奇丽山水画作。每次喷洒药剂到田头，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走到水桶前，“咕咚、咕咚”喝一大碗白开水，补充体内水分，坐在树阴下小憩，恢复一下体力，然后自觉地再回到棉田喷洒药剂。无风，棉田像个大蒸笼，又闷又热；有风，气温不减丝毫，风还把药剂吹到脸上，呛得连连咳嗽，吃饭时都觉得嘴里有股



药剂味。知青间曾开玩笑说，喷洒药剂时穿的衣服，洗衣的水都能当灭蚊子的药水。

吃尽千辛万苦，换来满田白棉朵朵。10月是棉铃吐絮高峰，也是采摘棉絮的旺季。班里的姑娘都在暗暗较劲，比谁采摘的棉絮多。记得有一天傍晚，大家都不愿收工离开棉田，我也只顾手上采摘棉絮，没有在意脚下的排水沟，一不留神，左脚腕蹩了一下，顿时就肿起来，不能动弹。班里的农场女青年职工王惠琴看到我跌倒在田，立刻赶过来仔细看我的左脚，不容分说就把我背到田头，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坐着！等我取了自行车送你去看医生。”她不顾一天的劳累，直接把我送到掘港镇东郊一家祖传伤科世家老中医处诊治，来去近30里路，回到十连天已漆黑一片。之后，她每隔几天就送我去换药（都是在晚上收工以后）。不久，脚伤就治愈了，也没有留下后遗症。至今，我仍旧时时想起这件事，心存万分感激之情。我觉得，青年突击班不但是一个劳动的集体、团结的集体，还是一个情谊笃厚的集体。

我在十连青年突击班三年多时间，收获试验田棉花三次，籽棉亩产年年增长，年年刷新掘港农场籽棉亩产记录，在农场小有名气。第一年亩产籽棉是十连平均亩产的两倍多，第三年亩产籽棉接近210斤。记得那是在1974年，试验田里绽出一拨又一拨白花花的棉絮，像盖着一条条厚厚实实的棉花胎，采也采不完。我们白天采棉絮，晚上就趁着月光继续采棉絮，忘了疲劳，忘了饥饿，只有喜悦。

1975年9月，我被组织上安排到掘港纺织器材厂担任车间负责人。自此，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十连，离开青年突击班，离开40亩棉花试验田。

# 大漠红柳别样情

——1965年至1982年支边去新疆亲历记

周淳洁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描绘的塞外风光。40多年来，这样壮丽的大西北风光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40多年前，我刚满20岁，就和江阴、吴江、无锡3县1000多名支边青年，分批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奔赴新疆于田县新园农场屯垦戍边，先后在南疆的和田专区于田县、墨玉县两地开始了我整整18年的崭新人生。

## 红柳意志大漠情

红柳和骆驼刺、胡杨一样，是大漠戈壁中常见的植物。那根根坚实的枝干，从沙漠深处探出头来，一丛丛，一簇簇，给死气沉寂、漫天黄色的沙漠增添了些许生机。每每让所有看到的人，惊叹它置身浩瀚戈壁所积聚的顽强的生命力。因此，通常也把在戈壁沙漠里坚韧而顽强生存着、奋斗着的人们，都喻作红柳。

1965年8月，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肩负着民族的责任，踊跃报名，毅然决然地与亲人告别，支边到新疆，被分配到于田县新园农场。初到农场时，还没有等我们从新环境

中回过神来，现实就迫使我们接受严峻的考验。这考验，当时叫“闯三关”。首先是思想关。报名之初那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情和热情，早被漫天风沙冲刷冷却，家乡和亲人在祖国的另一端，相隔万里之遥，时有袭人的乡愁，但思想不通也得通。其次要闯生活关。当时，我们住的是透风透光、用芦苇扎把和泥糊作墙的房子，睡的是一张大土炕，10个人一个个并排着睡，土炕占房子三分之二。吃的是县里拨下的每人45斤定粮，每月18元生活费，没有一点蔬菜和副食。这对于我们这些在江阴也并不富余的家庭子女来说，还算能过得去。第三关劳动关就难过了。割芦苇，修水坝，挖水渠，开荒种田，植树造林，每天劳动8小时，都是重复着简单、乏味的劳动，一两个小时下来，已够累的了，况且是整天干，天天干。每天收工，每个人都精疲力竭。对于我们这些20岁左右、在城市里生活惯的刚从学校里出来的青年人，简直是脱胎换骨的改造，更是灵与肉的洗礼！

我曾经参加过于田县克里雅河上游修水坝的劳动。那是在寒气袭人的4月，没有房子，我们住的是“地窝子”，即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一人深的坑，上面用木头架上，盖上芦席，再用土压实，留个口挖成斜坡，供人进出，睡觉打地铺。河道附近，地下水位较高，地窝里阴湿寒冷，我们在里面住了两个多月。筑水坝的任务相当紧急，必须在夏天昆仑山上融化的雪水下来之前完成。我们所在分队的任务是把鹅卵石运到大河边，供专人用水泥砌成水坝。由于距离较长，运送的方法是接力运，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赛一样，两人一组用柳筐扛，来来回回运着，不久就干得满头大汗了。遇到低洼积水处就赤脚趟水过去。当时，1只面饼2两重，体重90多斤的我一顿要吃4只。因没有蔬菜、副食，这4只面饼还是不够，就用家里寄来的全国粮票向当地老乡兑换包谷饅，填填肚子。值得骄傲的是，在我们和维吾尔族老乡展开的劳动竞赛中，他们的劳动任务始终没有我们完成得多，流动红旗一直保留在我们汉族知青中队里。

因工作需要，我被农场抽调回苏州接了另一批支边青年，就留在了同一专区的另一个县——墨玉县的卡瓦克农场。有一年的冬天，零下十几度，我们支青，背上铺盖，步行30多公里去修水库。与维吾尔族老乡一同露宿在水库边戈壁滩上，晚上两人铺盖合并，连衣同钻一个被窝，汉族同吃一锅“乌马希”（维吾尔族语，包谷糊糊）和“熏库孜马克”（维吾尔族语，下到菜叶子汤里的包谷窝窝头），同啃包谷饅。一星期下来，每个人虽都精疲力竭，蓬头垢面，但在艰苦中总算完成了任务。

调到墨玉县卡瓦克农场不久，“文革”开始，场党委瘫痪，领导靠边站，干部们都回到了县里，就这样把我们丢在了离县城60多公里远的戈壁沙漠深处。我当时任三连连长，和一、二连的支青干部达成共识，必须自己管理自己。我们知青干部着手组织大家“抓革命、促生产”。早晨吹哨子集体起床、出操，早请示，晚汇报。上午组织劳动，开荒种包谷、种蔬菜，养猪养鸡，到沙



1966年4月于田河建坝劳动（前排右一为作者）

漠胡杨林子里打柴火，尽量实行蔬菜、副食的自给；下午组织大家读报、学习讨论。在这几年中，我们维持了食堂不散伙，坚持了集体生活，防止了支青乱串联或去县城参加武斗。我与连队约三分之一的支青，经常头顶烈日，脚踩松散发烫的沙子，到胡杨林里打柴火。有次险些迷路，差点回不来。长年累月，我的右肩长出厚厚的肌肉。

在农场的几年中，我处处带头，劳动时经常参加到男支青的行列，我干得不比男支青差，甚至来例假也从不休息。对体弱多病甚至表现较差懒散的支青，都能热情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我在支青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赢得了他们和农场干部的信任和赞誉。在新园农场一千多支边青年中，第一批发展加入党的只有4人，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挑选两名江阴支青回苏州接支边青年，我又是其中之一。在卡瓦克农场，1969年农场成立革委会，我担任了农场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开始恢复党组织，经农场维吾尔族、汉族的全体党员投票选举，我当选为县党代会代表，参加了墨玉县的党代会。后来我又作为上山下乡的“优秀支边青年”的代表，进了县委领导班子，当选为县委常委。

## 生死之间战友情

1966年春天，我们在于田县克里雅河道水利工地上劳动。新园农场一中队女支青吴某头痛欲裂，发着高烧，嘴唇上烧出了许多水泡，只能躺在“地窝子”里。当时工地上只有个维吾尔族卫生员，缺医少药。我们只当她是感冒发烧，后来才感觉不对劲，直送于田县医院。医生给她抽了两次骨髓，诊断为脑膜炎。因没有人照顾，她上厕所时昏倒在地上。于田县医院当时设备及医务人员不足，建议送和田专区医院，并要求农场派人陪同。我接到了这个任务，明知有被传染的危险，还是答应了。当时于田医院没有传染病房，附近也无招待所，我当天晚上就与患者合睡在一张病床上。我一夜未眠，看着她头痛得老是翻白眼，心里害怕极



团委的同事（右一为作者）

了。第二天，医院派救护车送我们俩去和田，在200公里的沙漠公路上颠簸了一天。车里挂的盐水瓶来回晃动，我和护士摇摇摆摆，勉强站着抓住盐水瓶防止碰碎。傍晚，汽车直开进和田专区医院传染科隔离病房，经专家大夫再次抽骨髓检查，确诊是结核性脑膜炎。经过4天的抢救，吴玉珍过了危险期。当时我已接到回苏州接支边青年的任务，马上要出发，我去与医生、病人告别。传染科医生很惊奇地打量着我说：“你真大胆，没有防护措施，与她近距离接触，要是传染上了怎么办？”我说：“我们都是家乡人，总是要有人来陪的，我没有想到这么多。”

在墨玉县卡瓦克农场时，也碰到过一些棘手的事。如一连有位支青蒋桂珍，母亲早亡，父亲病重，要回去探亲，但必须经县革委会批准。她就搭便车爬上装满柴火的拖拉机去县城请假，不料途中不慎摔下，被拖拉机的挂车轮胎从胸部斜压过去，当场死亡。当时一连派人到三连来通知我，已是傍晚快收工时分了。我丢下坎土曼，捡了一根打狗棒，饿着肚子就独自一人向远在11公里之外的一连赶去了，走到半路，天就全黑了。凭记忆，摸摸索索走了4个多小时，到一连已是晚上九时多了。许多支青要我先吃晚饭，休息一宿，第二天再说。我坚持要看看死者。在微弱的烛光下，我含泪端详着，死者脸上满是惊恐状。当时离一连只有4公里的二连，比我先到了不少支青，早已把空床占满了，只有



蒋桂珍的床空着。夜间，躺在死者的床上，盖着她的被子，闻着她生前留下的气息，想着今早还躺在这里的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不由得悲从中来。这是“文革”混乱所至，是把我们丢在荒漠里无人管理所至。一时悲愤、伤心，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心中更加坚定了在“文革”期间，我们要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决心。第二天，我帮助一连的支青干部召开了追悼会，安葬了她。

在新园农场、卡瓦克农场的7年间，我曾看到、经历过许多领导与群众、支边青年之间舍生忘我、患难之中见真情的动人事迹，其中蕴藏的真情让我温暖终生。

## 维、汉一家民族情

当时，南疆许多单位缺少汉族干部和职工。和田专署决定，所属的3个支青农场，即当时的洛浦县红旗农场、墨玉县卡瓦克农场和于田县新园农场，解散其中两个农场，只留下于田县新园农场。把前面两个农场里1000多名知青，根据各人的学历、工作能力、在农场的表现情况等，调派到和田市、洛浦县和墨玉县各单位任干部或职工。学历较高、表现好的进县委有关部门任工作人员。我被分配到了墨玉县团委工作，任整团、建团工作小组副组长。在一年后的县团代会上，我当选为共青团墨玉县委副书记。

墨玉县是新疆的一个大县。当时有28万人口，汉族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且都集中在县城。12个公社，每个公社只有2-3名汉族干部，其余全部是维吾尔族人。到了县城后，明显感觉到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较大的隔阂。那是在“文革”后期，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打着宗教的旗号，妄想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而墨玉县是经常闹事的一个县。党和国家组织支边青年到新疆屯垦戍边，是搞好民族团结、保卫边疆的战略决策。我既然到了县城分管共青团工作，就有责任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



我走近他们，与他们交朋友，学习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他们建立了较深的感情。

1972年我结婚的第2年，刚生了个女儿，孩子的父亲在公社里任副书记、副主任。在“农业学大寨”年代里，半个月才放一天假，还不一定有车子回家，孩子基本上由我独自照顾。1972年又是全县各公社整团、建团、恢复共青团组织的时候，我经常要去公社检查建团情况，参加他们的团代会。那时刚从农场调上来，每月只有28元工资，只能请十几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阿孜娜帮助抱抱孩子。每次下乡，我抱着孩子，与阿孜娜各骑1头毛驴，走过漫漫黄沙路，几个小时才能到公社。戈壁深处的维吾尔族公社，卫生条件极差，实在难以照料，在女儿刚满2岁时，我就赶紧将她送回江阴老家。

当时我是县里的常委，有时与县里的其他维吾尔族领导被分配去包干一个片几个公社的工作。记得有年早春，县委要求组织当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召开冬季积肥、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现场会，同时检查了解公社团委组织青年突击队的情况及事迹。我与维吾尔族领导、干部们步行去工作比较好的几个大队，走了没多久，露出一点的头发上和围巾口就都结上了厚厚的冰霜。晚上分别宿在维吾尔族老乡家里。维吾尔族人的习惯，是主人和客人同住一室，我就在他们夫妻床头的小床上睡觉，很别扭，很不习惯，久久难以入睡，熬到天快亮时，实在困了，才打一会儿盹。白天要赶二三十里路，晚上基本睡不着，但我硬是挺过来了。

我曾经去一个边远的公社里检查工作。公社大院是造在维吾尔族“麻扎”（维吾尔族语，“坟场”的意思）上的。白天，我们和维吾尔族干部一起去大队、小队检查工作，参加会议，热热闹闹，倒也快乐。晚上，维吾尔族干部全回家睡觉了，与我同去的维吾尔族女干部兼我的翻译，她的丈夫就在这个公社学校里任教师，她也去与丈夫团聚了，留我一人守着这空旷的大院，那滋

味就不好受了。那里招待所的房子年久失修，破落的门窗只能用木棍勉强顶上。窗后是大片果树林，门前有高大的葡萄架，一阵风吹过，黑影憧憧，窸窣窸窣，甚是吓人。几天过去，平安无事。事后才知道，有位细心的维吾尔族副书记特地关照公社里的维吾尔族干部，不允许对外讲有个汉族女干部住在公社招待所里，而且叮嘱食堂维吾尔族炊事员尽量晚些回家，早些回公社。知道这事后，我对那位维吾尔族干部真是感激不尽。

由于工作的性质，加上我有意识地主动与他们交往，我和维吾尔族同胞的关系较为亲密。其实维吾尔族人豪爽好客，淳朴善良，尤其是在远离县城的乡村，他们很少见到汉族女干部，特别是戴眼镜的。维吾尔族老大妈经常用手好奇地轻轻摸摸我的脸，摸摸我的眼镜，十分稀奇爱怜的样子。他们处处关心我、照顾我，而我真的像一个小孩子见到了亲人一样喜爱他们，所有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头。我在团委工作的10年里，与维吾尔族干部群众，如同一办公室的日吉浦汗、塔吉尼沙、阿不多里米提以及乡镇维吾尔族团委书记们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 后 记

2005年8月，江阴举行了支边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江阴日报、江阴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后悔不后悔？”我毫不犹豫地：“不后悔！”这不是套话假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实话。40多年前的上山下乡，支援边疆，是历史的造就，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谁也违抗不了。在新疆的18年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我还是从一次次的艰难困苦中走出来了。这段经历，锻炼了我坚定的性格，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增强了我的工作才干，磨练了我“红柳”般的意志，使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高中毕业生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每当回忆往事，我都备感欣慰。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青春的追忆

刘振声

时间总是定格在改变我命运的时刻——1966年4月8日，我跟随吴县山建队工作组第一中队（向前工区）干部、原吴县林场副场长钱桂根提前两天到达吴县，为后面大批知青做好各项安置准备工作。

—

坐在先遣小组去吴县的车上，回想着当时工作组在璜塘召开动员大会时展出的工区情景照片，那果园里红红的橘子，人们采摘果实的笑脸使知青们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好传说充满了憧憬和渴望。大家踊跃报名，离家时每个人心里都乐开了花，而没有批准上山的人眼巴巴地望着，哭得那叫一个惨。

一路上，我一直庆幸自己是个幸运儿。陶醉中，汽车已到目的地，钱场长领着我进了工区。抬眼一看，顿时傻了眼，哪里有果园？眼前都是一片荒山，食堂厕所尚在施工，宿舍也只挖了墙脚沟，宣传照片上的情景根本不存在。钱场长解释说，时间仓促，没有准备充分，但困难很快会过去，照片上的生活是要你们知青来创造出来的。

两天后的中午，江阴县知青参加吴县山区建设第一中队（同

日到达的还有二中队、三中队)到达,只见大家重复着我当时的惊讶神态,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而我早已闭口不语了。自此,由璜塘、祝塘、峭岐、云亭、长寿、申港、西石桥的社会青年和要塞、新桥吃统销粮的缺地青年农民共141人组成山建一中队(向前工区),加上随队干部2人,老农工王师傅以及钱场长就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 二

在工作组领导和果技员王师傅的带领下,全队成立了生产组、蔬菜组、饲养组和炊事组,并任命了中队领导班子,明确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除炊事组外,全体青年每天上穹窿山顶拆千年古刹,挑运砖瓦建造用房。

我被任命进了领导班子,担任事务长,负责主管生活方面的工作,每月去山建后勤工作组总部湖羊场(林海工区)领取全队每人9元生活费、35斤粮食和4两油(此后被知青们戏称3594部队),根据队领导的安排,提留一元作为买照明煤油、扫把等日用品和维修费用,并全部建账。剩下的8元作为伙食费,35斤饭票发给每位知青。食堂按30:1的比例选派5名炊事员,每天由生产组轮流派2人到食堂民主监督兼劳动,知青伙食实行每顿两个品种,每人一份供给制,工作组成员每人交9元,与知青同吃同住。

万事从头学起。我拜县林场的事务长徐云龙为师,他每天带着我去善人桥小镇买菜,买粮油,熟悉人际关系。为了学习烧好大锅菜,我和炊事员干脆就住在林场的仓库里。

过三个月左右,工区建筑竣工了,知青们进入了新工区安营扎寨。从此,饲养组买猪崽、兔崽、饲料等;蔬菜组开始播种育苗;生产组开荒造田,种果树。由于劳动强度大,许多男知青叫嚷着吃不饱。为了用好大家的8元伙食费,我必须精打细算,考虑到较远的木渎那里是国营菜场,分量足,菜价略便宜,就舍近

求远，每天天不亮就摸黑拉着板车出发，踏着砂轮似的黄沙公路，回来时还要拖着一百多斤重的菜，到早上9点多才能回到工区，又赶紧组织炊事员开始忙活午饭，酷暑严寒，风雨无阻。累倒还好说，可每半个月就磨破一双鞋子成了我最大的烦恼，没办法，只好向家中要钱。当时工区刚成立没有收益，工作组也没钱发，知青们的生活用品都只能向家里伸手要。为了让大家吃上菜饭，再苦也只能忍住。

### 三

在每天的买菜途中，总要经过几段艰难路段，最难走的就是灵岩山高坡，每次拉到半坡就会挺不住向下滑，好在当时好心人多，时常有过路的农民、学生捋袖上前，帮我一起把车推上坡顶。每天买菜回来都是一身臭汗，可当我端着食堂预留的稀粥准备回宿舍吃早饭时，经常发现我隔夜换下的脏衣臭袜却不知去向，等下午去食堂忙完晚饭后发现我的衣服已洗得干干净净，破袜子也缝补好，整齐地叠放在枕头边上。每次问是谁干的，可谁都说不知道，我看出那精细的针线脚一定是哪个女知青的杰作，遗憾的是，这个谜到最后也没有解开。我对她们的无私帮助只能心存感激，再累也心甘情愿。

### 四

炎热的盛夏，一到晚上休息时，各宿舍就有人将床板搬到室外场地纳凉。于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互相串门板，聊着，唱着，这里吹箫吹笛，那边胡琴口琴，乐声悠扬。口渴了，就去井里用吊桶打一桶天然的矿泉水，偶尔有人躺在床板上抽着廉价的香烟喷云吐雾，买不起香烟的就纸卷着烟丝抽。工作组于是也因势利导组织了几次联欢会，大家也玩得不亦乐乎。

到了星期日休息时，我们一些男青年带上电筒，挟着草席去



山建一中队篮球队合影（杨生兴提供）

山后面的防空洞消暑，在那日本鬼子遗留的罪恶空间吹牛，比谁胆大不用手电走进去，大家说累了就倒头呼呼大睡。不一会儿，就会感觉到寒气从脚底心直冲眉间，顿觉冰凉透顶，于是赶紧叫醒同伴，否则肯定要得关节炎了。

到了半月，馋肉了，便去善人桥的山建队定点肉店买两斤猪，生产组兴奋地主动增派人手到食堂帮忙，切肉、称肉，肥瘦搭配后用稻草按三两重一份扎紧，将145份肉入大锅红烧。这香味呀，让路过的青年停住了脚步，大家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吸气，不停地叭嗒着嘴唇，尽量地使口水不要流出来。据说，那天大家的劳动效率特别高，知青们就像是在比赛一样。

由于天气热，在运输途中病死、热死或挤死的猪不少。上级发出要为革命而吃肉的号召，我便向工作组申请把每人每月一元的账户里的余款挪用过来派用场，工作组同意了我的提议。当时的死猪肉才五角钱一斤，而且已经是腌过煮过的熟肉，名曰高温肉，非常划算，于是我们连续吃了几次这样的肉，大家也终于一饱口福了。

一次，江阴县劳动局局长毕晓云来工区慰问大家了，这可是家乡的贵客呀，可食堂从不买鱼的，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把鱼平分



145份，但今天是大家高兴的日子，为了便于均分，我特意买了梅齐鱼干红烧，外加炒韭菜，一荤一素招待慰问组。毕局长亲切地询问我一些情况，又怜惜地摸了摸我那磨成厚厚老茧的手，关心地叫我注意身体，我眼眶热了。事后，我听到钱场长嘀咕道：“小毛毛鱼招待大局长……”毕局长走后不久，江阴工作组奉命撤回，我们挥泪和两位工作组同志告别。后来，吴县又派来了工作组成员夏才新。

## 五

经过半年多的劳动生产，生活环境全部稳定了。“红在山区、专在山区”已在每个青年头脑中扎根。中队开始经常性地食堂大厅里开会、读报、学习政治、了解时事等。团支书物色优秀青年发展对象，妇女委员大力宣传妇女能顶半个天，县工作组夏才新告诉大家绿树成阴果实满园的美好蓝图即将实现，王师傅耐心地指导知青们种西瓜、香瓜来改善生活……几盏玻璃罩美孚灯伴随着热烈的气氛，映照墙上张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标语，闪闪发光。

不久，生产组有出产了，山芋、南瓜等等先后收获了。遵照“瓜菜代饭”的指示补充粮食的不足，省下的伙食费可以用来改善伙食增加知青的营养。饲养组用卖兔子的钱替代原来扣下的一元伙食费。自此，9元的伙食费就全额拨付食堂。工作组还吩咐用收入买了套理发工具给陈建国，让他为大家免费理发、剪发。买了只保健箱配上常用的感冒、止泻、止痛等常用药品以及红药水、碘酒等，叫张阿秀代理工区的卫生员。

山建队有条不成文的习惯，同宿舍有人回家探亲或者亲友来探望，带来的食品由同宿舍人员共同分享。中秋来临，每人发了一只月饼（我买的2角钱一只，属中等价位），还不够塞牙缝就没了。一天，偶然发现同屋苏姓室友上街拉米时买了只月饼回来并用手帕包着塞在枕头下面，我告知了其他室友。当晚天气热，大



家搬了凳子与往常一样围坐在室外场上，谁也不肯出去串门，大家都心照不宣，等着他拿月饼出来共同分享，可等了好久也没有动静，心想他要吃“独食”了。这可不行，我们得先下手为强。我去食堂边上捡了块与月饼大小相仿的石灰饼用纸巾包了，偷偷进入调了包。许久他一人进屋了，我知道他准备进屋独享了，一会儿，屋内便传出喷嚏和咳嗽声，我们在外面捧着肚子笑个不停。

钱场长工作认真，但由于长期在部队当领导，有些他认为应该而我们却反感的行为。例如熄灯后，他会来宿舍查看大家是否都睡觉了，是否有人踢被子，其实他的目的是要让大家休息好，但我们年轻人不适应他夜间悄悄查夜，特别是女知青更是反感，她们就常常来向我反映情况，谁让我是管生活的领导呢！我知道钱场长是好心，可这种方式也不妥。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报纸包了一包灰土，晚上睡觉后将纸包放到我们宿舍的门上，门稍微开了条小缝，等到他来查夜时见门没关好便推门进来，“轰”地一声，被撒了个大灰脸，随后听到他大喝一声：“就知道是你，刘……”嘴里进泥了，后面的话也没说出来，返身洗漱去了。宿舍里的床板好大一阵摇晃，可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从此，钱场长再也不查夜了。

工区毗邻向前大队第九生产队，队长叫蒋木根，他有辆自行车，那个年代可是个稀罕之物。但凡工区知青只要会骑全可去借，几乎成了公车，我也是借车的常客，他人很豪爽。在自行车外交下，我们与九队的关系很好，工区缺农具、用具的尽管去借，九队的年轻人有空时也常来工区聊聊，还有小伙子捧着大西瓜向我学习吹口琴呢。队里的老农也会来坐坐，聊聊他们抓猪獾、狗獾的经验趣闻。

工区左傍五峰山坦克团。白天坦克车轰鸣着来往训练，晚上只要部队操场上放露天电影，我们就会全体出发去看电影，那可是我们最高级别的娱乐项目了，我们称之为“接受革命教育”。散场回队沿路上就会响起当晚电影插曲的歌声，一百多人呐！前

呼后拥的一长溜儿。军人服务社也是我们爱去的地方，好多外面买不到的计划供应商品在那里就能够买到，甚至有些紧俏商品也能买到，当然这可需要花些功夫了。

## 六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山区。工区先后成立了红色战斗队、八一战斗队、红卫兵、红尖兵四个“战斗团体”，转发着从各地收来的铺天盖地的传单，四处张贴要炮打工作组的大字报，散布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调和余地！”的观念。不少知青躁动了，私欲也乘机恶性膨胀。但无论如何，饭还是要吃的，我仍干着老本行，供大家吃饱好干“革命”。

之后，大串联开始了。大多数知青外出去上海、北京串联，少数没参与的也回江阴与家人团聚了。山区最少时就剩我和王师傅、钱场长三个人。我们每天到地里拔山芋藤，喂那可怜的20几头猪，也没有心思切碎煮熟，丢进圈里不饿死就行了。可怜这些猪长得头与身体差不多长，瘦得像拉毛兔。闲着的时候就到贴着“勒令”：“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砸烂狗头”的10号宿舍内听钱场长讲他的战斗经历故事以消磨时光。

后来，中央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外出串联的人们回来了，坦克部队特意抽调了一批江阴籍的军官到工区来开展谈心活动，帮助解决青年们提出的实际困难，支持恢复生产。从林场排线接来了有线广播，送来了各类劳动生活用具，组织学语录、老三篇，整顿秩序。在乡音亲情的感召下，战斗队自行解散，回家的知青也接到通知归队，一切又重归正常。有了广播，我们可以及时聆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每当最高最新指示发表，当晚就组织学习讨论。工作组配有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凡有重要消息，我就会带着报纸去九队读报宣传。蒋队长吹哨召集小队会，村民们听着我那八分江阴话、两分吴县话的口音，虽没笑出声音，但我也看见

他们的嘴角几乎弯到了耳根。

那个时候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工区有一次请向前大队的一位姓唐的老农民来讲述忆苦思甜，听他结结巴巴、唠唠叨叨讲当年如何苦呀苦的。忽然间，大家发现他的裤子湿了一片，原来是小便失禁了。下面的男知青们咬住嘴唇作严肃状，女知青们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巴窃笑。台上的领导发现不对劲了，赶紧带头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一片响亮的口号声中迅速把老唐送回了家。

接下来要吃忆苦饭。队里用清糠、柚树皮、野菜等煮了一大锅，强调旧社会贫下中农就是吃的这种东西，谁吃得多就证明他的阶级觉悟高，不吃就是不革命。大家都懂得这代表着什么，只



1966年江阴上山工作组干部离开吴县前留影。  
背景为知青所在的东方工区（柳蕴强提供）

见一声令下，所有人都闭着眼睛闷吞了下去，结果大家当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

1967年7月22日夜，东边苏州方向火光冲天，枪声大作。第二天买菜时听得议论，说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造反派与保皇派双方开始了互斗。那晚为攻克阵地放火烧毁了闹市区的许多商店和民房，继而某部又攻克苏州医学院，烧毁了实验室大楼和仪器。

之后，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实行军管。军管会对整个山区

建设工作组和各工区实行了军管，向11个工区派出了小分队，成立了群专小分队。全体知青以连为编制，下设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天天开展军训、会操，白天搞生产训练，晚上搞政治学习。

## 七

1968年春，我们种的桃树开花了，看着鲜艳的花朵，向往着即将品尝劳动的成果。没想到，军管会认为工区人数太多，于是我们30多人于当年10月12日奉命再次打起行装，拆分到金山公社七子山区，成立了跃进工区，一切又要从零开始。筹集建筑材料盖宿舍，喊着自力更生的口号。

1969年1月8日，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号召，我们第三次打起背包，插队到金山公社天平大队第五生产队务农。天平五队地处风景名胜地天平山下不远，毗邻著名的灵岩山。该大队有不少社员是解放前从江阴移民来种客田（开荒造田）的，当年大队书记就是江阴人。五小队田少人多，在当时种植百分之百双季稻的时代颇有些优越，从鸡叫做到鬼叫的天数比其他生产队少，男劳力大部分在金山石厂劳动，农活几乎由妇女们支撑。我天赋不笨，各种农活一学就会，又是身强体壮，队长出门常常带着我。晚上队里男青年也喜欢聚到我这里听我讲讲一些有趣的故事，一起抽烟、吹牛，大家敞开心扉，亲密无间，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乡土、人情之中。

丰收了，卖粮了，包上半斤米到饭店换上一碗饭，买一角钱大众汤，吃得喜笑颜开。分红了，点钱了，露出苦恼人的笑。一年劳作下来竟然分得好几十元，算着布票裁布做新衣，拿着肉票、鱼票等各种备用票采办过年的年货。在上山下乡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指示下，从思想到身躯我们都准备是扎根一辈子了。

直到1979年统筹解决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工作问题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9月份结束了所有知青的上调工作。我带着岁月留的沧桑，走完了上山一再上山一再下乡的全部青年时期的漫长岁月，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中年时期新的历程。

如今，日历已翻到了第45本，回顾当年同吃一锅饭、同欢乐共患难的战友们，虽然大家都已步入老年，还有的已离开人世，但我仍想念着大家，不管是回到江阴的还是留在吴县的，或者移住其他地方的，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吉祥！

## 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

缪明丰

我的父亲祖居在江阴市长泾镇一个叫小缪家的村庄，后迁到长泾镇老南街中桥附近。我有兄妹四人，我是老二。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长泾中学读高二，作为文革逍遥派的我整日无所事事。这时，我的邻居、一位在长泾医院工作的江苏省名中医陈家栋先生对我父母说：“我看你家明丰悟性尚好、人也机灵，长此下去会荒废年华的，不如跟我学医吧。”我的父母也以为然，于是我就尊父命正式拜师学医，并与陈医师的儿子陈苏及另一个徒弟黄锦成了师兄弟，一起学起了中医。

1968年下半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城镇青年纷纷打起背包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我的大哥已到青海军工厂“支内”去了，而小妹还在读小学，符合下乡插队条件的我和我的大妹缪静娟，在那一年的“9·18”就成了“插队青年”。

我与另一个叫缪国芳的本家兄弟分到了老家长泾公社长东大队顾家巷路里三队，村民们原本就是老乡亲，因此“待遇”就比其他插青好。小队长顾岳中对我们很是热情，倾力进行安置，在一户住房比较宽裕的农家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们住，前灶后卧（前半间烧饭、放杂物，后半间铺两张床做卧室），比人家住猪圈、柴房的要好多了。

我记得第一天出工干的农活是采棉花。尽管队长和老农手把

手地教，但对平生未曾干过农活的我来说简直无从下手。经过半天的努力，终于开始有点入门了，但已是背心出汗、手心起泡了。中午回家又手忙脚乱学煮饭炒菜，至于菜做得味道怎么样、饭烧得熟不熟全然顾不上了，只求吃饱，因为一会儿上工的哨子又要吹响了。几个月下来，农活有点会了、人也熟识了，我被社员们“升任”为小队记工员。

1969年初，农村开始搞起了合作医疗，各大队办起了卫生室，由公社医院抽调医生负责，同时由各大队抽调有文化的青年学习医务知识，为本大队的社员看病治疗。当时长东大队书记顾掌坤了解到我是老三届高中生，且学过中医，于是就选拔我到大队卫生室边学边看病，当起了“赤脚医生”。长东大队卫生室设在大队部所在的西缪家村，一间房子两个人，主治医生是长泾医院下派的翁祖伦医生，我作为助手跟他学习。那时，我的师兄陈苏到了花园大队，黄锦到了叶桥大队，都成了合作医疗卫生室的医生。

之所以称为“赤脚医生”，一来是我们依旧是社员身份，不拿工资只拿大队下拨的“误工费”，年终参加小队分红（公社医院下派的医生仍旧在医院拿工资）；另外，我们上午在卫生室接诊、坐诊，下午须背着药箱下乡巡回。巡回时穿村走巷，甚至到地头场边，直到卷起“裤脚管”下田给农民服务。因为要方便下田，所以赤脚的时候多，故此称为“赤脚医生”。当时农民到卫生室看病只收5分钱挂号费，不收药费。一般的小毛病我们就可以治愈，既省了农民的钱又省了到镇上医院看病的功夫。只有大病重症者，家属才请人用竹躺椅或用河泥船（离镇较远的）把病人送到公社医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办合作医疗确实解决了农村和农民缺医少药就医难、无钱看病不治疗的问题，是农民的“福音”，所以很受农民的欢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老农还怀念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好处。

有一个实例发生在还没有实行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年代。



那是一位我们长泾中学高一的同学，周六放假回到北涇家里后，因吃虾时不小心把虾头上的尖刺呛到了气管里，由于没有医生及时帮助处理，等家人用河泥船把他送到公社医院时，为时已晚，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凋零了。

我当了赤脚医生后，有一段时间参加了血防灭螺查病工作。血吸虫病曾经是危害南方水网地区农民的“瘟神”，毛主席曾经发动过“送瘟神”的战役。当时，在公社医院邹秀玲医师的带领下，各村抽调的人员集体吃住在后巷，对习礼、东新这两个病害高发区，一个个河浜、一片片湿地仔细排查，施药灭螺。同时分区分人包管，收取村民大便进行化验排查患者。那时我们都不怕脏、不怕累、不计报酬、不讲条件，认真恪职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充分展示了“赤脚医生”的本色。

三年后各卫生室的下派医生回医院了，于是由我一人独当一面开始主持大队卫生室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大队的合作医疗办得比较好，大队领导决定扩大卫生室。所以又辟出平房、设立病床以便更好地为村民服务。那时设有4张病床，是全公社各大队卫生室中仅有的设施。我为了方便病人看病，也吃住在卫生室。后来，由于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又增添了夏亦娟作为卫生员，协助我收费、配药、记账、做就诊记录和台账。我们的卫生室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村民和领导的赞扬。

我在长东村插队期间，整整当了9个年头的“赤脚医生”。在这9年中，无论是春雨秋风、夏雷冬雪，我踏遍了长东的每一条田岸，走遍了每一个村庄，熟悉了每一户农家，关心着每一个病员。我尽最大的医疗技能诊治每一个病人，服务每一个需要的人，由此赢得了村民的尊重，也获得了他们最诚挚的友情。

吴家坝的农妇王某，其丈夫在无锡工作，她一人带一儿三女在家，生计十分窘迫。一次她十岁的女儿吴某病了，咳得厉害，到卫生室来就诊。我一量体温40℃，诊断为肺炎，建议她去长泾医院住院治疗。但她因无力支付住院的高额费用，要求我就地治疗，并说：“我相信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尽心地为她女

儿配药挂水，并通宵陪在病床边观察、换瓶……经过半个月的用药治疗，病人终于治愈了。当时患者仅交了一个挂号费。王某为感谢我，为我烧了两个水浦蛋作夜宵。数十年过去了，每当已经70多岁的王某与我相遇，总会提起往事，且言辞中依然满是感激。

寿山坟自然村的60岁夏老太严重咯血，我前去出诊，经各方诊断为浸润型肺结核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我坚持每天上门为她打链霉素，并让她服用雷米封等口服药，经一年多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因她年迈无经济收入，我把她的挂号费也免掉了。以后她只要遇到我，总会捏着我的手说：“合作医疗好。我多亏了你呀！”

以上的两个实例说明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多么深得民心。我为我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而感到自豪。1977年，我应聘成了国营华士动力厂的厂医。1979年，我作为最后一批上调的知青被分配到周庄氮肥厂做厂医，从此结束了我的插队和赤脚医生生涯。

在我下乡插队的12个年头里，我当了九年的赤脚医生。现在想来，农村确实是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我学会了基本的农事技能，提高了医疗水平，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农民那敦厚淳朴的思想感情和难以忘怀的人间真情也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感染了我，成为了我的立身之本。

直到今天，我曾经服务过的长东村民依然把我当自己的亲人看待，凡婚丧喜庆大事都要招呼我到场。我退休后，他们还热情地邀请我到社区卫生室服务。平时，他们总愿到我处咨询一些健康保健知识，我也总是热情接待，认真为他们检查健康状况，并讲解治疗意见或保健知识，有时还开一些中药处方。

插队生涯是我人生轨迹中最精彩的一段，充满了艰辛甚至痛苦，也充满了欢乐和满足。它是我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何达源、宁慈美 整理）

# 岁月有痕 青春无悔

——同里湖畔记事

翁捷

青春是那么美好，让人留恋，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把我们的美丽憧憬粉碎殆尽。那时候报纸、电台、广播整天喋喋不休：“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满世界一个“乱”字了得。

1968年9月25日，西门桥武斗的血腥气似乎还没散尽，相隔一年多后的这里又是喧嚣非凡，高分贝的大喇叭刺耳地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红旗飞舞，纸花如潮，鞭炮齐鸣，岌岌可危的桥上站满了手上挥动着伟人的小红书的送行的人们，泪眼迷离，殷殷话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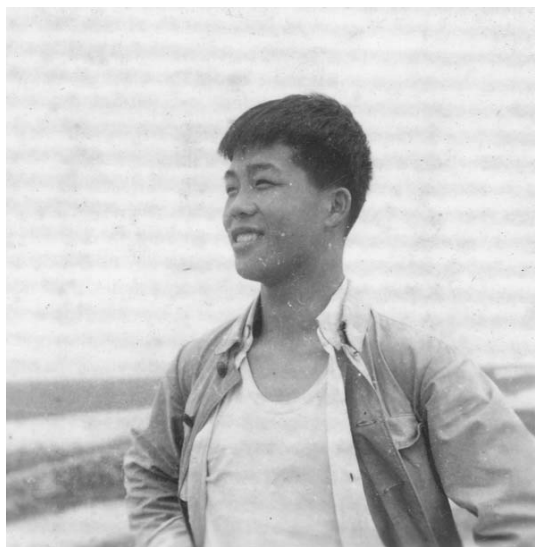
## 一、青春被凝固的地方

发出“扑、扑、扑”沉重喘气声的小火轮，拖着由5条木拖船组成的船队，缓缓驶离江阴西门的那个小码头，驶向那革命最需要的地方。什么是革命啊？时年18岁的我们理解：革命就是暴力，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红卫兵=红色暴力？太抽象了，还真的说不清楚，至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这么想的。别看欢送时刻热闹非凡，闹腾劲儿一过，很快就会演绎出

“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人间故事，我几乎一夜未眠，想着自己昨天的故事……

1967年，解放军286部队在江阴征兵，我竟然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被剥夺了参军的权利。由于本人1965年参加江苏省美术展览获少儿组奖项，接兵部队尚武团长亲自对我验审，要我去当兵，结果被江阴县澄江镇人武部的吴姓部长不负责任的政审，毁了我的参军梦。他说：“反军的人怎么能当兵，又何况来历不明”（可笑至极，我老家在同属苏州地区的吴县，到江阴100公里不到）。时隔半年，就被小火轮拖到了吴江屯村公社胜利大队插队落户。当时我的痛恨无以复加。也许《水浒传》、《荡寇志》等书籍看多了，多次萌生复仇的念头，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我幼承家训：“忍为高，和为上。”

我环顾了这些下乡的老三届同伴，不外乎三类人，1. 我们这些非工农子弟家庭出身的子女，2. 文革中被当走资派打倒的一些领导干部子女，3. 五类分子家庭（地、富、反、坏、右）出生的子女。当然工农子弟，所谓根正苗红有一点社会背景的，绝大多数都留城工作，或参军，或被推荐免试上了南菁高中、县中。我们这群人更多的是两派中受压制的一派，这些人不愿意留在江阴当地，怕以后会遭到派性的迫害，宁可远离家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安身立命。我们这501名少年男女大多数则是被“自愿”上山下乡，而被剥夺升学、参军和城市工作权利的可悲的一



作者 18 岁在吴江同里肖甸湖旁

群。

9月26日中午，终于到了目的地——吴江屯村公社（现在并入了同里）。踏上这片土地，迎接我们的是又一个热烈欢腾的场面。凡是有接受安置知识青年的生产队早早派人派船在此等候，有的是双人双桨，（这后来才知道，这隆重的礼节是用于嫁娶这样的大事的），有敲锣打鼓上前相迎的，提拿行李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到屯村的100人暂时忘掉了疲劳，忘却了哀哀的乡思，沉浸在这短暂的快乐之中。9月28日恰是中秋节，老乡们给我们送来了过节的菜肴，感受到当地农民兄弟的情谊，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暂时不再寂寞。

吴江，名副其实的水乡，湖河港叉，紧紧相连；远处村落，粉墙黛瓦，层层相叠，历来是文人墨客茶余饭饱后在其作品中激发创作激情的地方。古人云：君子谋道，小人谋食，我们现在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我们当属小人之列，得首先谋生哦，我们哪有此等闲情逸趣，去欣赏这烟雨朦胧的水乡世界？

我落户的地方——胜利大队（现在名称：邱舍村）地处同里东南，与当今名闻遐迩的昆山周庄遥遥相望，这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白显湖。我们落户的胜利大队也是“小桥架流水，人家尽枕河”。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吴江虽然是鱼米之乡，却是过着“有鱼、少米、无钱”的困顿生活。食仅能果腹，衣仅能遮体。这就是我在以后的务农生活中逐渐体会到的。

我所在的生产队平均每人可耕田2亩不到，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年年开春口粮就接不上。一位公社干部下乡检查工作，发现“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竟然断了粮，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真话：你们的穷，不是你们懒惰，而是被干部吹牛吹穷了的。我当时还挺佩服这位基层领导的勇气和胆魄。年年学大寨，年年要创高产，浮夸风阴魂不散，各级领导层层加码，基层无可奈何只能把秕谷也充入产量。老百姓说：“干部要面子，我们苦脑子”。可见吹牛、唯上的时髦领导太多了，实在是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当然我相信：这绝不是那个年代的专利，现在也许更

多。

当时农业机械化程度低下，靠人力来完成农耕劳作是多么艰苦的事情。在江阴本地插队落户的同学来信都说，江阴近郊的生产队才几分田，江阴的“双抢”一星期就可以结束，而我们所在生产队，往往要忙上一个月。每天鸡叫做到鬼叫，前茬稻还好，后茬稻夸张些说比筷子长不了多少，还指望二茬稻能有好产量？

在务农的日子里，挑担、摇船、收割、播种、耕田，耙泥、扒草、打场、撮谷，全部历练下来。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们江阴的大多数知识青年就这么咬牙坚持下来。但总不能天天过“面朝黄土背朝天，六根清净方为道（稻），退步原来是向前”这样的生活啊。

我努力学习新的东西，想多学几手能谋生的本事。我从可怜巴巴的6元钱的生活费里抠出一点买书，学习针灸，学过油漆工，代课老师，还从师傅那里看会了做豆腐，回到江阴家中小试牛刀，居然一举成功，最后还是重操旧业，做起了文化工作。

## 二、我们的迷惑与费解

刚刚去生产队的时候，队里为我们开了阶级教育课，请了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还吃了忆苦饭。我插队落户的生产队贫下中农代表王阿留走上了台，给我们讲忆苦思甜。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据说是三代贫农，而且是雇农。我们饶有兴趣的听阿留开讲。

“解放前我常年为地主做长工，不过说良心话，东家对我们长工还真的不错，一到黄梅（插秧季节），每天炖好肉，温好酒招待我们，不像现在哦，我一年到头为队里养猪，黄梅季节，整天风雨里进出，生产队连件蓑衣都不肯买给我，我图些什么啊。”在下面主持会议的大队长（现在叫村长或叫村主任）顾美耕同志，一听傻了眼，顿时棒喝：“阿留，你都胡说些什么，给我滚下去。”会场上一片哄笑声，我们这些初涉社会的知青面面相觑，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不知所措，会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接下来吃忆苦饭，这可是香喷喷的麦粬粥，还有那烤得焦黄的糠饼，我一口气居然喝了两大碗，吃了三个饼，意犹未尽。社会现实与我们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们与会知青没有谁说不好吃。解放前的贫下中农能吃上这个？还真不错，我们发育成长在1962年的那段日子里能吃得还不如这个。

有一天，阿留来我们住的地方小坐，他说：“你们住的这间屋原本是我的，困难时期没办法，卖给生产队了。”我与室友伙伴沈同学都感到纳闷：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更没有生活资料，这与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的不是一回事，书上是这么说的：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阿留在与我们聊天时经常讲到他以前的东家待他不薄，抱怨生产队不把他当人看，他的话给我们留下长时间的思考。我们的伟人说过：“在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我们今天要去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进步还是后退？这成了大多数知识青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的无知农民经常称呼我们是“臭知识分子”，我们非常生气，无奈之下我只能对他们说：“你们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不算知识分子，我们是知识青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才是代表全人类，最智慧的知识分子，你骂我们臭知识分子，就是骂共产党的老祖宗，当心成了反革命。”这些当年的农民兄弟都很老实淳朴，早被“愚民”了，没有现在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刁蛮”哦，被我们一吓，呵呵，还真的管用，从此再无人称我们为“臭知识分子”了。

我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也看到他们当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 and 吃苦耐劳的品性，也看到他们对现实中的一些不满，我们听到些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话、实话。



我们生产队还有一个人也是贫农出身，却是“四类分子”。因为他解放前参加过“忠义救国军”，戴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有运动时就会把他叫到批斗现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成了革命斗争的一件道具。只有在那个一片“打倒×××”的口号声的时候，他才装得老实，像个“孙子”，干活的时候绝对是把好手，是“大爷”。他也同其他贫下中农一样，非常热心教我们农活，一次闲聊时，还讲起了他的过去。当时参加部队是为了打日本人，在一次与日本人遭遇的时候，他一人就劈死了三个日本人。说起“忠义救国军”，这支队伍还是在你们江阴地方成立的，谁知道以后会是这样……政治上的事我们小人永远不懂，只是觉得十分好奇，虽然他是“四类分子”，我们非但不感觉到他的可恨，而且还觉得他有点可爱、可敬，是个血气方刚的好汉。

### 三、艰苦环境里的锻炼

大队了解我能写、能画、能说的这些特长，因此在农闲期间，受大队指派做舆论宣传工作，在全村范围进行环境布置。我与同时下乡的苏州市8中的知青严万文等人一起编辑油印小报，居然练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钢板字。

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我与另外两位苏州知青把全村的空白墙面都画上了、写上了，我的一手新魏碑字体就是在那个年代里练成的。视察三大区的“老人家”与那位手举红宝书的亲密战友一起画上了墙面，“老人家”的版画肖像也画了不少，“忠”字到处写，就是茅坑旁的墙面也不空着，连人家结婚的喜床上都雕刻上“要斗私批修”的字样，难道做爱还得先要斗私批修？这就是那个“献忠心”的愚昧年代，荒唐的年代。

我农活干了不少，谈不上精通，但是基本都经历了，让我最难忘的就是第一次去同里杲谷了，这次杲谷让在城市里长大的我增添了不少见识。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日子，清早气温就很高，我们三个人将

一条满载着黄澄澄稻谷的船，吱吱呀呀地摇出了弯曲延绵的港湾。同里湖碧波荡漾，湖面上几乎全是四面八方来的粳谷船，近两个小时奋力摇橹，满身臭汗的我们终于将粮船摇到了同里粮库。因为是粳谷的季节，众多早到的粮船把粮库前面的不算太窄的小河浜塞得满满的，一年的丰收喜悦全在人们的苦笑之中偶尔流淌出来：这一船船好谷子不知能否卖上好价钱，我们还指望从队里分上一点小钱，手里活络一点。船与船之间水面缝隙里漂浮着白沫与垃圾，沉重的稻谷，把船舷压得很低。原来，有的粳谷船为了抢早，半夜就来等粮库开门，可不是，他们船梢上的行灶还在散发着缕缕青烟。

“排号啦，排号啦”。粮库的工作人员终于出现了，熙熙攘攘的船队一阵骚动，随着排号的发放完毕，渐渐趋于安静。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顾老先生在众人簇拥下，拿着铁钎、木碾盘跑上粮船取样，顺手撮起一把稻谷，丢进嘴里嚼了一会儿。

“嗯，水分还是太多，只能7折。”

“顾师傅，帮帮忙，我们不比你吃公粮的，我们不容易，够干的了，算7.5折吧。”一声斩钉截铁的“不行”，就断了这位粳谷老兄的念想。一会儿，又一个声音传来了：

“老顾师傅，帮帮忙吧，我们这船稻谷肯定能达8折。”

“不行就是不行。”那位仁兄连忙递烟。

旁边的说，“前门不行，牡丹，牡丹。你看这位老顾师傅，嘴上叼的，耳朵上夹的，有前门的吗？”

“不要给前门，要给后门牌的，谁有？快递上去。”

“哈哈！”顿时一片哄笑声。

“哎，我们一个工才2毛9分，牡丹我们敢买吗？”老顾离开了他们去了别的船，照样又演绎与我们同样的故事。

这位仁兄意犹未尽地说：“我们是否跑远一点，去苏州浒关，怎么样？”

“我不去，这么热的天。”“哎，到处都一样，又不能自己卖，谁敢私自买我们的哦，不要说割你资本主义尾巴，怕连脑袋

都割了。”最后也只能这样了。船老大一声“起仓”，我们就开始上谷了。

18岁的我，体重才勉强90斤，羸弱的肩上扛起近80斤装满稻谷的栲栳，走上颤巍巍的长跳板，脑海里突然想到：这不就是样板戏《海港》里危险的“过山跳”吗？悠悠的跳板，高高的谷山，也不知爬了多少回？汗水把衣服浸润出一层层白色的盐霜。我心疼衣服，干脆光着膀子干活了，一不小心从“过山跳”上摔下，好在没危险，只是浑身沾上刺人的谷粒，又痛又痒，最后带着满是谷粒的身体，一下跃入水中，才洗净了身体上的残余物。

船舱渐渐浮起，好多船底朝了天。看着船头一堆渐渐变高的竹签筹码，众人叹了口气：“总算完了，可以结账了。”我们终于舒了一口气，这些垓完谷的兄弟，一边逛街一边打起了个人的小算盘：今年虽然有了好收成更盼望能有个好收入，不要再是2毛9啊。但愿开春口粮还能接得上，学大寨这些年，“工分大寨式，干活也坦实”。（地方土语，指出工不出力）垓谷是男人们的事情，男人们因此有机会上同里，捎带卖掉家里辛辛苦苦攒下的鸡蛋（3分钱一只），换点油盐酱醋回去。虽然口袋干巴巴的，还是要想法子为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买点礼物，花布头绳、百雀灵、糖果，自己的烟钱就省点，飞马就不抽了，改抽勇士或者是水烟吧，还有就是2两半的“手榴弹”（乙种白酒）买上几个，这是男人的至爱哦。我不由得想起叶圣陶老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书本上写的与现在发生的事情何其相似啊。明天、后天将会继续演绎着同样的故事。

我也买了一把老油条，回去烧菜。因为一月才供应4两油，这还是政府对我们第一年下乡的特别照顾。农民兄弟更少，全家几口人一年只有1—2斤食油，远远不够。老油条烧丝瓜，味道还挺不错，回江阴以后我还烧过，这也是人生百味中的一味啊。

由于垓谷，给我们江阴男知青同里碰头提供了契机。这些痛苦却快乐着的单身汉们，在会川桥旁的小茶馆里，幸会相聚，把茶临风，其乐融融，谈笑风生，宠辱皆忘。碰到一起，谈论的事

情太多，理想人生，更多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话题：自留地、工分、口粮、同工同酬啊等等。未来前途，究竟路在何方？是知青们永远的心结，无暇去领略同里古镇的精致与美丽。会川桥旁的茶馆因此成了我们知青不约而同聚会的落脚点，有苏州帮、江阴帮、本地帮（同里与盛泽）。

时隔多年，我还深深怀念着同里会川桥边的小茶馆。2004年我带女儿去同里游玩，特地去寻访那小茶馆，追忆它的旧貌，竟然萌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今日重登会川桥，闹市哪及僻乡亲，不是故乡而胜似故乡啊。

#### 四、热切期盼知识价值的回归

刚下乡的时候，农村没有通上电，家家户户煤油灯，煤油也是凭票供应，白天干活，晚上苦于没有文化娱乐活动，如何打发漫漫长夜？我让朋友去同里的印刷厂搞来一些卡纸的边角料，手工绘制了一副百鸟朝凤的扑克牌，为业余助兴之物，就是这副扑克牌伴随我们几个知青度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



为当地渔民放映水上电影（翁捷提供）

一天，在苏州知青朋友那里看到了一本“禁书”，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让我入了迷，从此我就“不择手段”地开始了地下读书生涯。《莎士比亚》戏剧集、《战争与和平》、《复活》、《高老头》、《基度山伯爵》、《悲惨世界》、《白痴》等世界名著，慢慢让我消化完了。后来调入公社机关搞文字工作，对好书的渴望愈发不可收拾，常常工作之余通宵达旦地看。然而有一天，我们公社分管宣传的党委委员沈某人突然找我谈话，说是最近传阅手抄本《初恋》，问我看了没有。我大吃一惊，这位党委委员还念了个错别字，也许他从没恋爱过，不认识“恋”，把书名念成了“初蛮”，差点让我喷血。我老老实实回答他：“看了，但不是现在看，也不是手抄本，而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图书馆借阅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14行诗）。”这位党委委员对我还算开恩，说了一通让我以后注意云云。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世界名著都成了封、资、修的产物，属于“禁书之类”。那时候，越是禁的东西越有生命力。这些文学方面的积累，对我以后完成“南师”中文专业的相关课程大有裨益。

我们这些知青中不乏求知的人，坚信知识总有一天会被尊重，会派上用处。好多朋友在那种条件下读书，并且得以修成正果。1979年恢复高考时方显英雄本色，我的好友同伴“插兄”高以俭，就是当时苏州地区文科状元（后任省文联副主席）。他的一篇《苦战》作文折服了许多阅卷老师，引起极大的共鸣。我的苏州8中的朋友号称“化学脑袋”的汪康乐则是数学第一，从而跨入江苏师院（现在的苏州大学）的校园。我的一位插队在肖甸湖边画画的朋友，苏州知青王明，其父母、弟弟妹妹都是搞美术的，受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对艺术的追求近乎“痴迷”的地步。下乡后，没有了石膏像怎么练习素描哦，捏惯了画笔的手去拿锄头的柄，怎么也不习惯。当时我们学大寨平坟丘、整土地，他居然去偷了一个骷髅头骨，洗干净，用酒精消毒后拿回知青屋，作为画画的道具。后来有老乡发现自家祖宗的遗骨少了脑袋，因此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吓得我的这位画画的朋友连

夜逃回了苏州，一时传为笑谈。还有当时地下传唱的响彻大江南北的《知青之歌》，都是那个年代知青的创作，我们江阴知青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人才，像孙可立兄弟就是。一曲高亢的“大海啊为什么浪滔滔，椰林啊为什么凝视远方……”的歌声至今犹在耳边。回城以后，听多了歌舞升平与歌功颂德的高调，直至今日，似乎再没听到过这么优美抒情、铿锵有力、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了。文化与知识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得以复兴，得到尊重呢？我们的期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一定会在沉默中死亡，但是我们只能苦苦地在沉默中等待。

## 五、年轻时我们不懂“爱”

一晃两三年过去了，我们知青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时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还是一阵子”这个问题。许多人的婚恋观或多或少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会打洞”的反动血统论的影响和支配。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的是门当户对，那个荒诞年代讲究的却是阶级相配，成分相当，做革命伴侣。农村姑娘要嫁，首选手艺人，其次解放军军官或者是战士，鲜有看上知青的。我的朋友，江阴知青孙某本与一位农村的“小芳”相知相爱，因为“小芳”家人的极力反对，嫁了一个泥瓦匠，以致造成她与孙某以后几十年的苦痛。也有出身不好的女知青感到对前途无望，嫁了个“三代贫农”。如果以现在的眼光，“贾府的林妹妹绝对不会爱上焦大”的，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也算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被迫而为之，何谈感情两字，可叹亦可悲。男知青娶村姑的也有，但是很少。一般来说，被老乡相中的，一定高大孔武有力，只要有力气干活，不一定要英俊。“漂亮的脸蛋能出大米？”像我们属于“三级残废”的一群，就更无人问津了。大多数知青还是没有跨出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这一步，了不少“孽债”，以至于后来大批回城时都成了难嫁难娶的大龄青年。



那是革命的年代，男女卿卿我我的样子被视为不雅。说句良心话，我还真羡慕他们农民兄弟，求婚来得干脆，一把揪住说：跟不跟我？跟我，咱们就走。哪像知青缠缠绵绵，一派“小资”情调。

我的同宿舍的老兄终于偷偷恋爱上了，在我的追问下，他道出了他的苦恼：恋爱对象是一位教师，人很漂亮，我们江阴知青，这位女教师的父亲因历史问题，服刑死在监狱。老兄的老妈因此坚决反对这桩事情，并且说：儿子如果不听妈的话，妈就不活了。原因何在？就是考虑到儿子的政治前途。是啊，不敢想象年轻人背着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

公社分管宣传的党委委员知道我这位老兄谈恋爱了，私下去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后同我这位老兄谈话，说是“不支持、不反对”。老兄回来对我讲，领导说的话：首先是不支持，其次才是不反对啊。最终老兄被迫妥协了，放弃了这段曾经难分难解的恋情。我为老兄的结局深感惋惜，原因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啊。我中学的一位英语老师，就是因为“爱情高于一切”的豪言壮语，不愿与被判“极右分子”的恋人（一位中学老师）分手，被开去军籍、学籍而离开军事院校，到我们学校做了一名没编制的代课教师，丧失了政治前途，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这种勇气。我多么希望我的这位老兄也能有这种“爱情高于一切”的勇气与世俗抗争哦。我们以后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发展证明：是他对了，我错了。

## 六、半夜鸡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我在公社机关工作6年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社革委会主任邹三林，土改干部，虽然50岁还不到，饱经风霜的脸上早已沟壑纵横，我们都尊称他“老乡长”或“邹老伯伯”，其实他比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大不了多少。那年我与另外几位同志编在以他为组长的工作队，下乡蹲点，实现与贫下中农的“三同”（同



吃、同住、同劳动)。贯彻以粮为纲，坚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中心任务。下午，把大队的基干民兵集中开会，布置了当天晚上的战斗任务。

午夜，万籁无声的沐庄村——公社学大寨的先进大队，突然全村一片鸡飞狗跳，大队的基干民兵四面出击，冲向家家户户的鸡笼鹅舍，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残忍地拧断了脖子。人们的呼叫声、哭喊声，鸡鸭鹅的哀鸣声交织一起，给我以强烈的震撼。这就是所谓的战斗。老乡长像一座凝固的雕像，一股劲地闷着抽烟。我刚刚给他买的一包飞马烟，一会儿就少了半包。我深深了解此时此刻他内心的煎熬：乡亲们啊，这是上面的指示，我哪能不服从，我愧对乡亲啊，这哪是工作，这是扰民、害民，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原来，上级指示要大办农业，以粮为纲，坚决割资本主义尾巴，每户农户只准养3只家禽，多的一律予以处理（杀掉），于是乎就发生了上面现代版的“半夜鸡叫”这荒诞的一幕闹剧。

事隔多年以后，我重返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又见到80多岁的老乡长。老乡长因为文化水平的原由，比不上当时的少壮派，仕途上一直是原地踏步，没有升迁，直至退休。他老人家说了一句颇具哲理的话：因为我无能，所以我平安。是啊，他当年的一些号称“精英”的部下，有的升迁了，有的则被处理了。而他能心安理得欢度晚年，这就是幸福。但是他一说起“半夜鸡叫”那件事，心里就不是滋味，久久不得平静。

## 七、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

1970年春节一过，我就匆匆赶回了吴江，临走时我妈交代我一件事：路过苏州，一定要去看看舅公，一位被打倒的老干部。

我舅公，是当年宋庆龄组织营救“苏州七君子”律师辩护团的成员，是“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朱公亮将军，新四军的老战士，当年新四军陈毅军长的秘书（时任苏州市政协秘书

长)。我怎么也想不通，老革命一下子怎么就变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敌人？

我在农村已近2年，艰苦的生活与体力劳动让我产生了快坚持不下去的感觉，刚好也想让舅公帮帮我早日跳出“农门”，就专程去了苏州。舅公老夫妻俩，都在生病发烧，原先公配的保姆等待遇也取消了。我一手扶一个，将他们送到红旗医院（现在的苏州二院）就诊。看到他们这样，我终究没有好意思开口说自己的事情。回家后在舅公的电话本上面，我发现了一长串我熟悉的老领导的名字，他们都被打倒而身处逆境。我舅公虽然也在被打倒之列，可是还想着受他牵连的战友和部下、全家被下放在同里监督劳动的潘某。舅公自言自语：“上海的黄某自杀了，苏州的杨某自杀了；常州的李顺之、戚拯居然成了李戚反革命集团的首领，这乱象何时能结束哦。”叮咛我回去后一定要代他去看看潘某，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并写信告诉舅公。回来后我立即去了同里，走了不少路终于找到他们家。这位潘叔叔满含泪水对家人大呼：“朱秘书长派他的外孙来看我们啦。”他们全家对我的到来如众星捧月一般，看到这位潘叔叔的儿子拖着一条瘸腿蹒跚走来（文革时期的受害者），我异常难过，也十分感动。我心里想，怎么回事啊，文化大革命就是专门搞自己人？老干部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卓越功勋，还遭此磨难，我们又算得上什么呢？此时我的心态反而非常平静。潘叔叔他们一家多么盼望能早日落实政策，结束动乱局面，返回工作岗位。

终于有一天，舅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而我再没为自己的事情去麻烦过舅公。我以自己的能力被调入公社搞通讯报道、电影队等文化工作，公社机关没有人知道我还有这么一位老革命的舅公，直至调回江阴。

## 八、一次难忘的公社党委会

1975年的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在沐庄村工作蹲

点，突然田野里高音喇叭响起：“翁捷同志，听到广播后，请立即回公社开会。”看着雪下个不停的田野，我很犯愁，怎么回啊？又没有雨具。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公路，有汽车，片刻就到。为了不影响开会，我舍不得一双刚刚买的白色田径鞋，竟然赤脚踏着厚厚的积雪，奔走了2个小时，赶到了公社机关。

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通报党委书记王某病情以及治疗情况，原来一向以“谦虚典范”闻名的党委书记王某，患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党委会在为他准备后事。几个委员相继发言，我十分认真地做着会议记录。委员沈说：“这是报应。”原来因为王知道沈好色，曾特设相思局，请君入瓮，沈中了王的套，已经47岁的沈利用职权害苦了一位年仅20岁的姑娘，被党内记了大过，故对其恨之入骨。

而另外的于委员则讪笑说：“王某的后事应该准备了，我悼词已经弄好，大家是否听听？”一阵哄笑声过后，于委员一本正经地讲开了：“王某经过与疾病的顽强斗争，达到了五个一：拿掉了一根肋骨、一段食管、一块肚子、一片肝脏、一块脾脏……”

“不对，是六个一。”沈委员突然发声，吓了大家一跳。沈委员接着又说了一声：“再加上一条老命。”俗话说：鸟之将亡，其声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们这些人没有为同事的不幸而难过，依旧谈笑风生，幸灾乐祸。只有我们不苟言笑的老乡长和另一位徐委员一直保持着严肃。我感叹这位王秘书，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真是悲哀，更感叹某些人的冷血与无情。

我踏雪参加那次党委会，实在后悔，而且是终身后悔，初步认识到官场的凶险，从而产生从此远离机关工作的想法。

## 九、风雪大战肖甸湖

上世纪70年代初，肖甸湖周边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遵照上级“以粮为纲”的指示，结合消灭血吸虫病，向荒地要粮，向水面要粮，开展声势浩大的冬季水利工程建设。吴江、昆山两

地邻湖而居的万千民工，打响了围垦肖甸湖的战斗。

当时没有大型机械，完全靠的是人力。据我了解，我们屯村的100名江阴知青中的大多数参加了这个浩大的工程。那年冬天特冷，泥土冻得特硬，一铁搭鏊下去，地上往往是几个白印子。被用力鏊开的冻土块，就由排成一条龙的女人们（其中好多女知青）用手传递，抛入湖中。她们怕冰碴扎破手，都带上手套，后来手套湿透了，人们的体温融化了冻土，手套上散发着缕缕水汽。男知青更多的是与农民兄弟一起挑着沉重的冻土担子，将其抛入湖中。在寒风凛冽的冬季，他们衣着单薄，却冒着热汗，眉毛上面都挂满了细细的水珠，他们重担晃悠，在大堤上你追我赶。在湖面上运泥的人们更为艰苦，他们穿着雨衣或蓑衣，因为不时地有大的排浪扑面而来，衣服也都被打湿了。在围湖大堤快要合拢的几天里，气温低、风浪大，每条船头都挂满了白色的冰凌花，在湖面上颠簸往返。围湖大堤与取土的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飞舞，歌声嘹亮，高分贝的大喇叭里响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热气腾腾如火如荼。当时名扬吴江的屯村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江阴知青为主要骨干）也到现场演出，宣传鼓动，激励斗志。演出一结束，宣传队的男男女女也全部挑起担子，投入这轰轰烈烈的工程。当时如有一只好的照相机，就能留住这永恒的记忆了。

肖甸湖围垦成功后，成立了“五七大队”，第一任大队书记是计东生同志。他是一个做实事的基层领导，后来在同里镇党委书记的任上，他的“无为而治”为同里保留了一块“不开发地区”，给后来同里的旅游业发展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我们当年流血流汗，仅仅是向湖面要粮，现在看来是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但是无心插柳柳成阴，成就了同里旅游史上的佳话，肖甸湖森林公园居然成为名闻遐迩的旅游胜地。我们由衷的为同里高兴，更为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没有虚度而高兴。

## 八年磨砺八年收获

黄国清

四十个春秋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四十年前的往事在脑海中回旋，久久不能忘怀，曾记得……

告别了夹道欢送的人群和喧闹的锣鼓声，大巴车徐徐开过西门洋桥，向无锡方向驶去，这时车厢里传来了一阵阵抽泣声，突

然有人开始哭出声音，在她的感染下，车厢里十几位十五六岁的女孩都放声地大哭起来，车厢的空气仿佛突然凝聚，本来坐在车厢里有说有笑的我们十几个男孩变得也严肃起来，个别的也眼含泪花。这是我们第一次告别父母、告别同学、也告别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江阴。那时，我还没满十六周岁。



1974年作者（右）在农场机耕队

我们这些青年，

都是初中刚毕业的学生，此时多了两个当时很时髦的称呼——知识青年、兵团战士。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黄海之滨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驻地，也就是现在的东辛农场。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从这一天起，原来朝夕相伴的同学，成了兵团战友。在那个年代，因国家经济不发达，为了解决就业和当时的政治需要，全国有上千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下午2点左右，我们在无锡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火车车轮有节奏的轰鸣声，把本来就很累的我们带进了梦乡。第二天中午，火车到达了目的地——连云港新浦站。我们各自取回行李，等待着团部的汽车，并按我们原籍的公社和管区分配到各营。我们二管区与长寿公社共十六名同学被分配在五营。下午4点左右我们坐上了去营部的汽车。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好好的天气，不知怎么就飘起了小雨，到达营部机耕连，天已黑下来了，雨还继续下着。营首长招待我们吃了晚饭，第一次吃到了韭菜炒粉条。饭后，将我们分配到各个连队，本人被分配到五营三十六连。门外老知青们帮我们行李装上牛车，我与分在一个连队的苏立年、朱祥生跟在老知青赶的牛车后面走。此时天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老天似乎与我们作对，雨越下越大。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盐碱黏土的厉害，一脚踩下去，抬脚时鞋子上沾满泥土。一公里不到的路程走得我衣服里外都湿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吁……到了。”赶车的老知青说道。此时牛车停在了宿舍门口，热情的南京老知青赶紧帮我们卸下牛车上的行李。向宿舍里望去，一盏小药瓶做的煤油灯的火苗随风闪烁，一跳一跳的，好像随时要熄灭似的。南京老知青把最好的床位留给了我，并帮我打开行李，铺好床。累了两天的我甚至来不及道声谢便倒头就睡。

“铛……铛……”当我还在梦乡的时候，给金属的撞击声惊醒，赶紧坐起来。此时老知青们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对我说：“小黄，你再睡会儿，我们去打早工，第一天你就不要去去了。”我再一次被吵醒的时候，老知青们已经满身湿漉漉地回到





1974 年作者在维护农机

了宿舍。我的早饭——棒糊糊、馒头，也帮我打来了。刚吃完带着咸味的玉米糊（农场靠海边，水常年都带有咸涩味），半个馒头还没吃完，“铛……铛……”的金属敲击声又响起来了，我赶紧跟着老知青们出门，下地干活去。从此我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长达八年

的农场知青生涯，也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在那难忘的知青岁月里，我得到了南京老知青和当地贫下中农的关心和帮助。到连队十几天，夏收开始了，因连天的阴雨，联合收割机不能下地收割麦子，只能人工抢割后用牛车和人背上场。天一稍晴，收割机就在大场上用人工喂料的方式进行脱粒。转堆时，收割机只能人工推拉移动。在推拉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我的双脚被压在收割机轮子下。“啊哟”，此时排长听见叫声，立即指挥大家把收割机向后退。脚出来了，被压得扁扁的，不能动了。当地农工张振国把我背到了营部卫生所。脚肿得跟发了酵的馒头似的，袜子、鞋子只能用剪刀剪掉。简单处理后，牛车把我送到了团部医院。经X光检查，幸好骨头没断，脚筋严重扭伤，不能下地走路，只能躺在宿舍的床上，每隔一天要换一次敷在脚上的中药。在养伤期间，得到了南京老知青、连队副指导员张芸无微不至的帮助和关怀。每隔一天，她就来帮我敷药，中药加药水的酸臭味呛得我都直反胃，可是张指导员细心地帮我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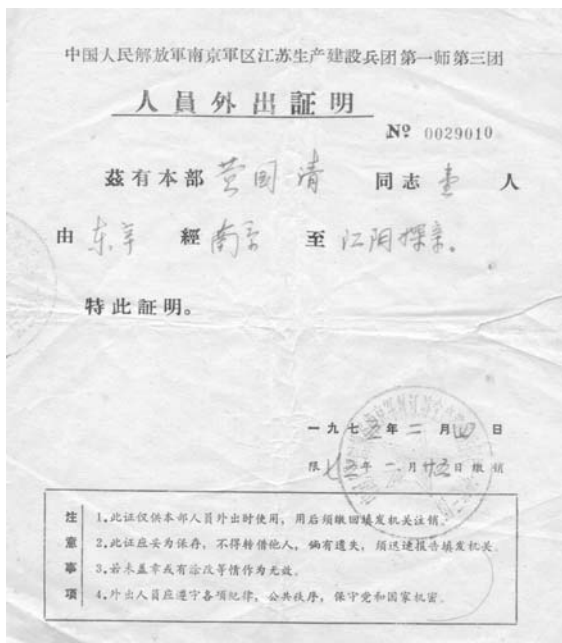


开绑带、洗脚、调药、再敷上。每次看着张指导员细心、认真地为我敷药，心底升起的一股感激之情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伤好后，我一定认真工作（当下不兴请客送礼）。为了怕父母担心，她还嘱咐我先不要写信回家说受伤的事，等伤好了再说。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是，通过张指导员四十多天的关心和照料，伤痛很快痊愈了。

1972年年底，因工作表现出色，我调到五营三十九连（机耕连）工作，当我驾驶着拖拉机在田野上奔驰的时候，心里油然而升起了一股自豪感（因为在当时的江阴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大的拖拉机，更不要说驾驶了）。在机耕连工作期间，我认真向师傅们学习驾驶技术和机械知识。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回城后在江阴港务局从事港口机械操作、维修工作得心应手，并很快被提升到港口机械技术管理岗位。当年知青经历，获益匪浅。

八年里，我们用青春和汗水，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艰辛生活的重担。天寒地冻，我们战斗在河工工地上，挥汗如雨；盛夏酷暑，我们奋战在“双抢”的田野里，享受着收获的喜悦，播撒着希望的种子。

八年里，我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掌握了各种生活的手段，坚强地生存下来了。八年磨难，八年的蹉跎岁月，成了我们的精神财富。使我们不



1975年作者回家探亲,生产建设兵团所开具的证明。

怕任何困难，使我们拥有更加良好的心态来正视和面对今天的下岗、失业等现实。正因为我们有农场八年的经历，任何生活重担都无法把我们压垮。四十年过后的今天，我们仍无怨无悔地挺起胸膛迎接着生活的考验，仍保持着宠辱不惊、穷富不怨的良好心态。

人的一生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我的农场经历就刻骨铭心。四十个春秋转眼即逝，当时坐在大巴车上的一群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现在都已近花甲之年。只因有了一起在农场的经历，使我们当年的知青拥有了共同语言，使我们更加珍惜相互之间的情谊。只要经历过那一段知青岁月的人，都不会忘记八年中大家那份真诚的情感。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往事回眸

闵建澄

我离开农村虽然较久，但回眸当年亲身经历，在乡下劳动、生活和学习等的这段往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感触多多，难以忘怀。

### 那年好大雪

我下乡那年的雪特大。破絮似的雪块借助肆虐的北风，把天地搅了个昏暗，抹平了高低起伏的旷野。天当然很冷，蚕豆叶子都冻得发脆。那年我刚插队到农村，不能脱土坯，知青房没来得及建，我们四位男知青只能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毛竹搭的仓库，禁受不住大雪的蹂躏，嘎嘎作响，风雨飘摇，令人毛骨悚然。雪花打湿了破旧的被子，愈发冷。刺鼻的农药化肥味，积年的霉变味窒息得人难以呼吸。竹床吱呀吱呀地响个不休。太冷了，只好并铺，两人挤在一起，借对方的体温取暖。倒是硕肥的耗子拖着长长的尾巴，闪着幽幽的目光，不时从床头拖沓而过，俨然是这里的主人。

从城市到农村，生活习惯的骤然改变，使我们无所适从。大家心里很难受，想哭。我们毕竟还小啊，刚到十七岁。我担心插在邻村的几个女知青不知怎么熬过。第二天，雪还是纷纷扬扬下

得紧。队长忽然来到仓库，后面迤逦着几个夹着麻袋的人，一个个缩着脑袋，黑着脸，一声不吱，开了花的棉袄用根绳捆着。原来是来称粮的，断炊了，阴历年还未到。队长骂他们无计划，他们咕噜着说肚子不执行计划，哪有办法。皇帝不差饿兵，只能寅吃卯粮，对付了再说，秋后算账。下午，队长又领来了一家大小四口。男的阴沉着脸，抱了两条开了絮的被子；女的怀抱孩子，红肿着眼；另一个大点的小孩像个雪人，被女人拉着，直着嗓子嚎。原来是家居的草房被大雪压塌了，无法存身，只能住到仓库来。刚好占用了我们空下的两张竹床。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多讲究，阶级兄弟嘛。只是，这摇摇欲坠的仓库怕也支持不住了。他们却仿佛若无其事，随即安之若素了。看到农民兄弟面对生活的困苦和遭际的艰难，是那样的坦然和宽容，我们心里的积愤和愠怒也就渐渐释然了。

天终于放晴了。惨淡的阳光照在白皑皑的原野上，分外的刺眼。有一两个黑点出来活动了。生产队里一条豁着鼻子的老牛终于抗衡不住暴风雨的淫威，冻死了。社员们边托着分到的巴掌大的牛肉，边谈论着老牛对生产队的贡献。饲养员蹲在圈门的屋檐下，一言不发，只“拍嗒拍嗒”一筒一筒抽旱烟。我们提着分到的丁点牛肉，心里不免沾沾自喜。用雪水煮肉，不腥。终于，队里催我们投入“农业学大寨”运动，数九寒冬，正是大搞农业水利建设的时候，大寨虎头山的雪远比我们这里的雪要大，这点雪，在革命社员的眼里算不了什么！从此，粗糙的扁担压上了稚嫩的肩膀，艰苦的劳动拉开了序幕。

大雪给我们上了人生驿站的第一课，那是公元1969年开始。

## 初次弄潮

五忙六月，农活吃紧，偏不少人家米落囤空，巧媳妇犯愁。我们这些来广阔天地练红心的毛头小伙，一丁点口粮早已瓮罄缸光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瓜菜代”这个口号是那一段历史

的真实缩影，人们不得不以各种“瓜菜”代替粮食，填饱肚皮。什么十条筋、白雪团、青皮绿肉……光从这些名称上就能感知瓢甜肉嫩。还有一种个大肉糯，一只足够饿汉吃一饱的瓜，干脆直接命名为“饭瓜”，以示旌表。只是肚子这东西不识抬举，吃一二只，胜似金帅苹果，欲罢不能，一旦要上升到“食为天”的高度，就不大跟大好革命形势保持高度一致，得福嫌轻。特别像我们这些已在修炼没得正果的“接受再教育者”，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一吃就胃反胀，底下把不住关，很是浪费点手纸，造粪效率倒蛮高。怪不得要到农村来脱胎换骨换胃肠。

面对一筐筐令人垂涎的“革命粮”，知青点不失时机地召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研讨会”。与会者就非常时期的非常市场经济问题发表了卓识高论，最后一致认为，物质必须通过商品的途径进入文明，这不同于早期的原始经济，有必要加入社会主义经济大循环。这副重担最后历史地落到了我和另一个插兄阿双的肩上。

翌日清早，我和阿双责无旁贷地担了两筐选出的好瓜赶到公社所在的集镇。一进闹哄哄的市场，我俩都傻了眼，原来黄的、绿的、白的瓜担子整整摆了一条街，男的女的“王婆”们在自吹自擂，招揽顾客。我俩像范进卖鸡样地呆立了个把小时，竟然无人问津。忽视实践，乃一般理论研究者的通病，今天有了实证。两人一商量，决定另辟蹊径，避实就虚。

太阳当头时，我俩汗流浹背地轮流把瓜挑到市郊，这里种菜多种瓜少，市场前景广阔。“卖瓜——”既已涉海，就得像个弄潮儿的样子，先扯直喉咙做了几次不花钱的广告，“看瓜啊，皮薄肉嫩瓢甜价廉……”果然，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几个小孩紧紧地围住了瓜筐。看来，市场已具规模。

“这瓜怎的卖法？”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首问。

“怎的卖法？稀奇！你出钱我给瓜呗。”

“我还能不出钱拿你的瓜？啥钱一斤？”她不服气地翻翻眼。

多少钱一斤？我俩倒忘了打听价钱，昨天的研讨会也严重地

疏忽了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这也难怪，这本是物价局研究的事。我还算灵活，竖了两个指头让她猜。

“二分？二角？二块？啥——你们年纪不大，心倒蛮黑。”惊讶之余的装腔作势。

“我又没喊二块，你在说嘛，那就一毛五吧！”看来价格背离了价值规律，降低一些，适应市场。

“嘿！你们也不领领市面，店里的瓜还只卖八分钱一斤，你们这种整里整脚的瓜还卖一毛五呢？鬼来买，算了，不诚心卖，不买了！不买了！”对方不屑一顾，转身欲走。

“那——你说多少钱？给个价。”

“多少钱一斤？我们也是做惯生意的，也懂行情，这种样的瓜，不想拾便宜，五分钱一斤，价钱已经蛮上路了。”

“这样齐崭的瓜，卖五分钱一斤?!”阿双跳了起来，“算算脚力钱也不够!”

“喔唷唷，小兄弟，急点啥，现在干死干活干一天能有几钿！你们还要赶回去吃饭吧，那就早点卖卖掉罢。再说嘛，这东西不是饭，非吃不可。”

心理弱点被对方抓住了，非输不可。经过一番郑重其事的讨价还价，价格指数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为六分钱一斤。一听报价“上帝”们七手八脚地尽挑好的瓜往篮子里装。我手忙脚乱地秤，阿双汗渍渍地收钱，忙了半个时辰，两只筐见了底。我俩松了口气，仔细清点货款，竟然不满6元。两大筐瓜少说也有百二十斤。这钱是怎么回事。我一转念恍然大悟，刚才手忙脚乱中有的“上帝”浑水摸鱼，倒宰我们一刀。初次弄潮，花力买教训，赔钱取经验，得失各半。

## 学艺琐忆

我17岁插了队，就在插队的那一年国庆前，经人介绍去二十多里外一个叫潘墅的地方学木工手艺。当匠人，在当时的农村算



是农家孩子常找的出路。

初学手艺，自然先做花力气的粗坯活。学木工主要要练好刨、锯、凿、雕基本功。第一天上工就是刨椽子，二斤多重的刨子在手心里前后运动，呼呼作响的刨花从手背上飞溅出来，倒还觉得颇有情趣。开头不得要领，只会使蛮力气；不到半天，手上就起了血泡，两臂也肿了起来，这才觉得远不像拉胡琴那样舒心，好奇心也就昙花一现。俗话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这可不像是生产队里吃“大锅饭”那样捏着锄头柄儿撑日头，有泡也只好咬着牙干。吃中饭时，竟然连筷子都捏不住了。匠人干活是很苦的，除了吃了中饭休息个把小时，其余时间都得手不歇、脚不停地干，不到太阳落山是不收工的。那时还没有木工机械，干活全凭力气，整天地刨啊锯的，一天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我身子单薄，力气小，做这些活觉得力不可支，但又不好偷懒，手中的斧头稍有停歇，师傅就要朝你横眼睛。想想自己总要学一点本事，再说熬出了头当了师傅，也可在朝南座位上发号施令的。想到这里，咬咬牙，斧头刨子也就不停歇了。

农村里造房都有季节，大多在春天和秋后。春日昼长，做得出活。秋后农闲，天高气爽，不会耽搁工期。也有在夏天的，那是等着要住房的人家才这么急吼吼的。夏日干活，就不是好生活了，赤日炎炎之下，一天就得晒脱一层皮。活儿也是糟人的，那时造房很少有新料，因为木材是国家配给物资，一般农民是买不到的，都是用旧木料和“解放木头”。旧木料出新，上百几十年的尘垢叮在木头上，刨子一刨，黑灰溅得你满手满脸，呛得你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所谓“解放木头”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棺材木头，这也是人们想出来的急办法，死人享受了活人还要享用。挖出来干了一阵的还好，最怕的是刚挖出来的“鲜货”，抓在手里滑腻腻的，一斧子砍上去，带有尸汁的污水四溅，有时溅个满头满脸，那腥味熏得你饭都咽不下去。

造房子要爬上爬下，特别是架梁钉椽，人站在柱子上，用竹竿撑着的柱子晃悠晃悠的，心里直发毛。如果不用柱子只做空斗

山墙，人站在无依无靠的墙上，墙也在左右晃动，比起站在柱子上还要惊险。光靠造房生活不忙，因此，木匠大多还打家具。做家具是细工活，一个个榫头都要严丝合缝。我初当徒弟大多干出料刨档的活，松木杉木的活要好做些，碰到要刨榉木等硬树，饭就不是好吃的了。有一次打写字台，料子都是榉木的，大大小小五六十根料的槽推下来，两只手掌就粘在刨把上了，原来是血泡破了，血水粘住刨把，疼得钻心。望着师父冷冰冰的脸，我只好一声不吭，含着眼泪做到完。吃晚饭时，筷子都不能拿，只好用调羹划着吃。回去涂些紫药水，明天再干。

我师父三十五六年纪，中等身材，身子骨也较单薄，平时不苟言笑，手艺不错，据说敲的榫头丢在河里都不进水，远近小有名气，带的几个徒弟也都“上路”，有的徒弟也带了徒弟。我是他第六个徒弟。据荐头人说，他要带个有点文化的，其实我初中也未毕业，“文革”牌有啥文化，好歹比他们多识几个字罢了。说是跟人家学手艺，其实师父是不教你什么的，全仗自己干活时要留心，这倒不是“教会徒弟，饿煞师父”，这大概是传下来的规矩。“技术是偷来的，是自己摸索钻研出来的。”人家都这么说。我跟师父做了半年多活，主要是造房子，但除了刨椽子桁条，一些技术性的活都没沾上手。师父也不让你沾手，一则下手活主要是徒弟做；二则做错了活，主家没有材料添，师父也没有材料赔。只晓得其中的一些说法，如“提脊超檐”“五分加一”，至于脊要多提多少才合适，心中没有数。因此，后来我回家之后，没有人敢来请我造房，我也不敢接。一直到后来再跟别人做了一个阶段，自己亲手造了房子才明白其中的诀窍。特别是为别人打了一扇满箍穿梢后门，那尖头都对得严丝合缝，得到大家的认可以后，活儿才逐渐多起来。

几位师兄，除了大师兄，其他的待我都还好。师父不在，大师兄就摆师父架子，有时指挥我做技术性强的尴尬活，其他几位师兄都会帮助我，有时他们代我做掉。过后向他们讨教，他们也肯把其中的要害关节告诉给我听。其实师父待我也还好，对我严

格要求也是为我干活不马虎，拿得出。他常说“不上规矩，不成方圆”。出料要不翘裂，拉锯要上下一线，凿眼要不歪不斜。做长凳要求四眼八撑，腿的斜度要一致；榫头拍进榫眼，既不能太紧又不能宽，而且要一次拍进，不能褪出来回手。他说，回手就不牢。木工活中，工艺要求最高的是做八仙台，三十二个尖头都要严丝合缝。做好后，两人对角拉台脚要没有“吱嘎吱嘎”的声音。

除了外出干活，师父家的活儿也要徒弟帮着做。祖父一再关照我学手艺要手脚勤快，以讨得师父师母的欢心，多学点技术。师父有四个儿子，最大的14岁，其实我只比他大3岁。收我作徒不久，又养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一心期盼的。我一去就要帮着挑水、烧饭、种菜、扫地，有时还要垫圈。师母待我很好，从未叫我去做洗尿布、倒痰盂的尴尬活，多少给我一点面子。但我最怕的是去挑垫猪圈的土块，当地人称之为“糕头”，方方正正，像糕一样，一块足有二十多斤。田埂上长长的一条堆码着，够我挑的，沉重的担子把肩头磨得红红的。我的痔疮也是那时给压下来的，挑上一天，准要便血。但为了要学到手艺，再吃苦也得咬着牙干。后来我能发愤读书，整天整天地坐着写作，其实正是那艰苦的生活磨练出来的，读书写作总比那担子压在肩头上好吧？

学艺的规矩也是挺多的，虽是新社会，但旧的一套还沿袭不变的。外出干活，挑工具箱是小徒弟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木匠工具多，斧子、刨子、凿子、锯子、榔头一大担，晃悠晃荡，挑着也是够呛的。碰到晚上，跌跌撞撞，担子更不轻。吃饭的规矩也有不少，比如拣菜只能拣自己面前的，不能乱抄菜碗。如果“眼睛像闪电，筷子像雨点”，那是非挨骂不可的，“啥吃品，前世头里没吃过！”当然要乘主人家不在时“开销”你。肉不论大小，一顿只吃一块，鱼是不能吃的，以讨“富足有余(鱼)”的口彩。徒弟放碗一定要在师父前面，不能吃到最末，乘空还要为师父师兄添饭，不过师父很少再添第二碗的。我起先吃饭吃不快，不快就吃不饱。挨了几次饿，也学乖了，碗一到手就赶快扒，尽

量少拣菜，菜拣最咸的吃，多喝汤。肚子不饱就没力气。

收工以后，任你路有多远，一般不住在主人家的，特别是主人家有年轻女子，“落铁也要回去”，这是师父再三叮嘱的。因此，十里八里赶夜路是常事。那时的路都是泥路，全凭两条腿。不像现在村村通机耕道，可以骑自行车。好在年纪轻、手脚利索，又是归心如箭，赶路也没什么不愿意。记得那年冬天下大雪，沟沟坎坎都填平了，路也摸不着，但吃罢晚饭，毋庸多说，照样回家转。没有路全凭感觉走，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到家成了雪人。还有一次早上上工，因那时没有钟也没有表，看看天好像亮了，起身赶路，哪知越走越暗，后来又起了大雾，几步之外就看不见，在小田埂上转来转去，20多里路不知转了几个钟头，浑身上下全被大雾打湿了。

当徒弟的心理压抑也是必须承受的。人家可以说说笑笑，唯独徒弟只能听，没有插嘴的权利。“老三老四，轮到你多嘴！”因此，只要看到一味埋头干活的准是徒弟。有时主人挑剔一点的，多嫌徒弟的活不好，这样，徒弟就只有挨骂的份儿，弄得不好，嘴犟一点的，挨几下也不是没有可能。我就是干错了活挨了几下，冲冠一怒，中途回家的。总之，当徒弟的滋味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徒弟就是养媳妇”，人们总是这样说的。

主人家或村上有年轻的姑娘来玩，徒弟更要注意，切不可随意答话，更不可谈笑话，被师父看到，当面就要给你难堪：“小小年纪，花心倒不小，别看花了眼，斧头斩大腿！”师父怕青年男女在一起搞出情事来，坏了名声，断掉财路，对徒弟管束很严。有一次在一个村上干活，主人家隔壁有无锡来的插青三姊妹，年纪跟我相仿。同是知青似乎有共同的语言和感受，但限于规矩，在村上干一个多月的活，我跟她们很少搭话，只是看着她们在我面前进进出出，说说笑笑。

学艺艰苦。插队下去时，除了一条被子、一顶帐子、一条席子，其他就没有什么了，连只水瓶都没有。学艺又没有工钱，虽然辛辛苦苦干一天只有1.2元工钱，但那是归师父收的，不像工厂

的学徒一个月还有个生活费。记得第一次上师父家门，衬衣还是借表哥的。到了冬天，除了一替一换的衣服外，袜子都买不起一双，那时的尼龙袜一双要三元多钱，抵三天的工钱。零用钱更不用说，袋子里从来也没有一分钱的。剃头的钱按规矩由师父来，可剃个头只要一毛钱，头不值钱。

那时拜师要办拜师酒，满师后要办谢师酒(宴)。我只是办了一次拜师酒，请了三桌。跟师父交契深厚的其他师傅师兄们都要请到，表示某某人收了第几个徒弟，今后请各位多加关照。客观上承认他是手艺人中的一员。那时的酒水也很简单，大鱼大肉的，吃到整鸡算是很客气的了，“啃！全鸡宴！”酒大多是自制的米酒，因此不要花多少钱。即便如此，请一回师也花去我父亲一个月的薪水。我因为中途“逃”回家，谢师宴自然“流产”了。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造房人家都要办一次上梁酒，瓦木匠师傅都要正厅正位，敞开肚皮吃一顿，在这种场合，师父是不会横眼睛的。记得我第一次吃上梁酒，被师兄们多灌了一杯，席散出门就觉得头重脚轻，酒涌了上来，走到路边全吐光了才好过。幸好没有在主人家里吐，否则，塌了师父的台也没好果子吃。后来，每逢上梁我就只吃菜少饮酒，免得重蹈覆辙，好容易盼上这一顿，不要反伤了身子。

1969年，正值“文革”中期，阶级斗争的热度还很高，“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广大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闲时喝稀，忙时吃干”、“瓜菜代”，用不着你宣传，农民都会自觉执行，不执行也不行，罐里没粮。如果要造房，就要在好几年前就得节衣缩食作准备。“造房娶亲生孩子”，历来是农民一生的“三部曲”。房子是根本，它是一户人家经济实力乃至社会地位的综合反映。没有房子，姑娘连亲都不肯来相。介绍对象，首要话题就是房子，小倌人的位置还在其后。由于造房是人生首要大事，因此，“房产商”从选位定址到筹款集料要倾注大量的心血，颇像鸟儿衔枝筑巢，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平时就得准备起来。能够造房也是件很荣耀的事，主家喜气洋洋，招朋唤友，玉汝于成。最光

彩的当然是上梁那天，但凡亲戚都要来吃上梁酒，空着手来是不体面的，自然要送物送钱，一是表示庆贺，二是来看一眼美轮美奂的华居，探一探主家的实力，有的还为自家建造新居规划蓝图，讨教取经。

但是造房的纠纷也是很多的，有时为了一尺宽的距离，为了屋脊数寸的高低，邻里间大动干戈的也不少见。我亲眼看见有妇人躺在新挖的墙基内大吵大闹，不许主人家动建，就因为墙基超过了2尺。还有一次，主人家刚建好的墙角被后面的户主用钉耙轰倒，理由是墙角对着他家的大门，“门对角，全家哭”，说会给他们带来灾祸。另外，造房最怕出意外，碰到跌死了人或摔伤了人，主人家就倒了大霉，赔偿不说，影响也不好，主人心理上会终身留下阴影，有的还牵涉到认为风水不好或时辰不吉利。因此，不少人都专门出钱请风水先生或“算命”瞎子掐时择日，以防不测，至少心理上踏实。如果中途碰到刮风下雨，主人也要愁眉不展，一则影响房屋质量，二则要多花费钱粮。总之，归根到底一句话，农民造房不是件容易事。也正因为这一点，房屋的自身价值以及辐射出来的社会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尽管我为别人造房而辛勤劳碌，但自己却始终造不起房。做学徒的时候，做了将近一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只能混饱一个肚子。中途回家以后，又因为队里搞缴钱记工，做几个钱都要缴到队上，否则就不准你出去做。有一个阶段，外出做工还要匠人自己带米，如不带就要在每天一块二角的工钱中按官价扣除二角，算是抵米钱菜金。那个时候造一间瓦房，最低要700元，你想想我就是365天，天天在外做又能赚多少？况且，农忙时绝对要回队里干活，主人家也不会选农忙时动手。即便如此，那段生活还是令我难以忘怀，它为我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后来的这些年里，我始终把那段经历看作是生活对我的馈赠——也许人生本该如此。



## 船老大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学会了摇橹把舵。刚巧，生产队买了5吨水泥船搞运输，无人肯当船老大，队长就动员我。我一则因为想表现突出一些，以争取早日上调；二则因为撑船待遇好，外出一天有1斤稻、2毛钱的伙补，就爽快地答应了。村民们还真叫起我“船老大”来。

俗话说，世上三件辛苦事，打铁、撑船、磨豆腐。撑船行舟也真是苦，夏天赤日炎炎，船板晒得烫掉皮，冬天寒风刺骨，竹篙一掬一把冰。至于摸黑起早，忍饥挨饿是平常事了。条件艰苦是小事，稍有不慎还要船毁人亡，我就遭遇到这样的事。

1971年的5月份，进入汛期，大队组织各生产队去山上运石头回来修堤坝。由于路途远，又是力气活，临走时，队里派两个小伙子换掉两个年纪大的搭档，仍是四人弄一条船。当时同去的还有四对水泥船。路也真远，天蒙蒙亮出发到下午三点才装满石块返航。回程是逆水，行船更吃力，不到半途天就黑了，当时正是月初，月亮露一下就隐没了，天黑风大。潮水也涨上来了，“叭嗒叭嗒”扑打着船头，我们四人，两个背纤，一人撑篙，我在船尾摇船橹把舵。水流哗哗，大家一声不吭地赶路。但是，走不多远背纤中就有人跌跤，一追问才知道有个叫富生的小伙看不清路，我想可能是营养不良患上夜盲症。没办法，只好调他上船，由撑篙的替换他。为安全起见，我叫他坐在舱里别动，天黑浪大，跌到河里可不是闹着玩的。无人撑篙，我更不敢大意，睁大眼睛盯着白亮亮的水面，手心底却渗出了汗。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如何过前面的青阳桥，那是一座老式石拱桥，桥洞狭小，水流湍急，上下落差有0.33米，这里年年出事。离石桥不远，我就停船靠岸，等三队的船来了一起过，大家也草草吃了点剩饭，积蓄点力气。后面的船赶上来了，两只船上的人集中在一起，三人在桥洞对面背纤，二人在船头撑篙，我把



富生叫在身边帮我摇橹把舵。黑黝黝的石桥高耸着压过来，白花的水漩着圆圈冲上来，船头一靠近桥洞，陡地抬高了许多。大家都不敢马虎，喊着号子，斜着身子，将船牵引过了桥。捋了一把汗，喘了一口气，又上另外一只船。三队的船比我们的大，阻力也更大。纤绳绷得笔直，篙子弯得像弓。把舵的是一位中年汉子，不知道是看不清还是太紧张，船头刚近桥洞就撞在桥墩上，纤绳一下就断了，三人滚成一堆，船左碰右撞的向后退去。也就在这瞬间，在船头撑篙的一个叫祥大的中年汉子往前一扑，没入滔滔的水流中。“不好！有人落水！”我惊叫起来。救人要紧，大家也顾不得船，纷纷跳下冰冷的水中。天黑水大，自个儿在水里都做不了主，到哪儿去救！据知情者说，祥大是个“石秤砣”，不会弄水。几个人一直折腾到天亮，也不见踪影。回家报信的带着队里人都赶到了。直到下午，用捕鱼的滚钩在离桥一公里多的地方找到尸体。望着哭成泪人的祥大妻儿，把舵的中年人吓得直哆嗦。我一个劲地责怪三队队长，怎么派个不会水的上船！其实，我心里还暗自庆幸，幸亏富生没出问题，不然，我这个“船老大”就成了“罪老大”了，下次坚决不叫富生上船。

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真正领教撑船的艰险，也真正明白队里一班人不愿担当“船老大”的原因。事故给祥大家庭带来巨大打击，也给我不算长的“船老大”生涯打下终身难忘的印记，它使我再次领悟到生活中原本蕴藏着各种各样的痛苦、艰辛和不幸。

## 今晚有电影

若哪个说，今晚有电影，准保要吸引很多焦急而渴望的眼睛。当然，这个时间要倒退二十年，那是十亿神州七部戏的时代。那时，“文革”中兴起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狂热已完全消退，电视、录像机之类可能还未画出图纸，麻将、扑克完全被禁绝，精神生活自然是十分贫乏的。好在各个公社都有电影小

分队，各村巡回放映，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虽然除了样板戏，还有《地道战》、《地雷战》以及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的片子，大家都看腻了，但饥不择食，聊以充饥再说。对于有意的青年男女来说，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看电影不过是个借口罢了，权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约会罢。

只要打听到哪里有电影，不管消息是否确切，下午干活就没有心思了，一心盼望太阳早落山。夜饭也没有心思吃，胡乱扒几口，拉件衣服，呼朋引友，喧闹着匆匆上路。有时十几里路也不需半个时辰。电影场设在生产队打谷场上，早已是黑压压一片人头，中间前排的有利地形早已被东道主抢占，我们就寻找缝隙，三钻两挤，深入腹地，就占好了位置。灰蒙蒙的小银幕上，只要有人影在晃动，下面的眼睛就望穿秋水。夏季多雨，有时天公不作美，照样撑着伞，多一份雨中的景致。一般不到放映员声明电影到此为止是不散场的。

由于信息来源的出入，或者时间地点的变更，有时连续奔走几个地点，也免不了要跑空趟，这时，最老实的人也要捏着汗涔涔的衣服狠骂几句，悻悻然不肯离去。第二天，村里人问起，免不了含糊其辞，昨天看了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来搪塞。对比现在的电影业的不景气，赶场子看露天电影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历史。

## 最爱《红岩》

我插队回武进农村时，小小年纪，正常的读书渠道已被堵塞，旷日持久的艰苦劳作代替了寒窗苦读，心里颇凄凉。但劳燕归巢，唯一能填补精神苦闷的也只是读书。下乡时，带了几本劫后余存的书，可以给我一点慰藉。其中我最爱读的是那本《红岩》。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感动我，小说优美的文笔吸引我，先烈们那种读书精神更令我钦佩。在随时都会被凶恶的敌人杀害的情况下，戴着镣铐，拖着受伤的躯体，从容地背唐诗、习英

文、解几何，这是何等的气概啊！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我完全可以自由地读书。为什么自己老是囿于个人的遭际，一味慨叹时乖运蹇呢？在先烈精神的激励下，我开始在读书的沼泽地里艰难地跋涉……

1972年，我做了民办教师，跟书接触的机会多了。尽管当时“张铁生”式的人横行恣肆。读书须冒风险，但我总不忘先烈在狱中孜孜不倦的一幕。图书室里凡是可看的书我都要翻遍。有时整天躲在里面，忍着刺鼻的霉味和蓬蓬的灰尘，尽情地在书境漫步。青灯红烛，孤寂落寞之中，自强和沉沦、苦涩和甜蜜、失落和满足、苦闷和开朗的感受，伴随着书中的滋味交织于心头，构成了只能自己体会的复杂心境。书帮助我解脱了找不到出路的彷徨和迷惘，定出了人生奋斗的坐标。其间，我曾为争取深造而奔波，但那时上学是要背景的。多少次，我只能怅然悲叹。

直到恢复高考，仗着多年的刻苦自学，我终于迈入了大学的校门。十年岁月的蹉跎，使我深深体味到读书的甘苦和艰难。因此，一旦获得这种权利，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升腾而起，促使我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毕业以后，我又多次参加进修学习，知识面广了，视野开阔了，曲折的读书经历和长期培养出来的读书嗜好，使我淡泊了读书的功利观。读书纯粹是自己人生道路上最美的风景线，读书的心境也终于在坎坷不平的磨练中走向成熟。

那部《红岩》至今伴随着我，尽管已很破旧。每当读得头昏眼花，欲倦怠抛书之际，眼前总会浮现出先烈们身陷囹圄仍顽强苦读的情景。想到自己读书的历程，我擦了擦湿润的眼，又捧起了书……

## 队里会餐

每有赴席，我都会想起生产队里的会餐。每年新麦入仓、黄秧转黑之际，劳作告一段落，队里都要举行一次会餐。说是会

餐，也不过是圈里拖头猪，河里网几条鱼，全队的男劳力撮一顿而已，比现在的酒筵要逊色得多，但在那时，却是大伙心仪已久的美餐。

女劳力是没有这个福分的，尽管队里的农活主要靠她们。即使是男的，也应是全劳力，就是我，也是沾落实知青政策的光，才通过“代表资格”审查的。能够在会餐桌上占一席之地，评工时，你报10分，人家是不敢吱声的。

乡下人讲实惠，那时，买肉要凭票，能撮上这么一顿，也算是交了好运。在数与质方面，当然倾向于数啦。经过一个忙头，早工夜工的“学大寨”，一个个拖得像猴精。有道是“忙时的力，闲时的食”，现在一个个如饕餮，满碗肥嘟嘟的大鱼大肉，才能满足与餐代表的最大需要。

到了那天，天刚蒙蒙亮，代表们就早早来到大场上，听候队长调遣。但凡一个群体，都有各式人等，队长也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杀猪的、拖网的、下厨的、采购物资的、烧火的，各自领命干开了。不到晌午，一条白光光的猪筒子甩在门板上，十几条洗净的鱼丢在篮子里，此时，忙煞了几个庖厨，劈的劈，斩的斩，不亦乐乎。

令人久盼的会餐终于拉开了帷幕，一盆盆油浸浸的红烧肉、红烧鱼飘出令人馋涎直淌的香味。正中央一桌是“首长席”，队长、队副、贫协主任、队会计、记工员等队里的头面人物早已落座。筛好酒以后，特地穿了件的确良衬衫的队长首先起立，说：“革命的社员同志们：万里东风红旗飘，革命形势无限好，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们在粮食连年丰收的大好形势下，今年夏粮又获大丰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此，我们在这里举行庆功大会，希望革命的社员同志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发扬过去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为夺取秋熟大丰收作出更大的贡献。来！让我们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干！”

酒过三巡，零拷的瓜干酒将一张张脸烧得通红，脑门上像敲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小鼓，一个个汗涔涔地放肆起来。不过，年轻人要注意分寸，特别是初出茅庐的，更要注意自己的吃相。当年张家老二吃得“武”了点，至今还有人谈论他：“眼睛像忽显(闪电)，筷子像雨点，牙齿像轧剪”，落了个“三像先生”的雅号，弄得别人后来不肯和他同桌。

“下面我来说两声。”记工员站起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刚才在厨下，我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拈了两块猪头肉，这是多吃多占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狠狠地批判，下次我向毛主席保证，坚决改正。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说过要允许同志犯错误，只要能改正，还是好同志，等会儿我自觉少吃两块，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话音未落，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会餐既有鼓劲的政治用意，也是搞好人际关系、泯灭恩怨的大好时机。借着酒这个润滑剂，红着脸面，消除误解，解开芥蒂，撤销幽怨，增进友谊，这是最好的时机。队里的事哪里出了差池，哪里超越政策，这时也可以提出来，谈重了也不要紧，大家是不会计较的。这也是会餐的潜在作用。

不管怎样，会餐还是以吃为主，尽管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吃。其实也毋须大吃，五六十条腹中空空的壮汉吃一只猪并不费什么力。黄昏时分，锅里盆里都已彻底解决，抹着油晃晃的嘴，摇着醉醺醺的脑袋大家仍迟迟不散，对着台上的残羹剩汤，放射着意犹未尽的目光。

## 在农场演唱样板戏

范迪明

42年前，即1969年3月19日，我们江阴纺校14个同学，怀揣着对“建设兵团”的无限向往和憧憬，与603名知青一起告别了江阴，经过一整夜货船“突、突、突”的航行，于3月20日清晨抵达了如东国营掘港农场。该农场始建于1958年9月，我们到农场时该场已有十年的历史，属国营建制，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低，除了机械耕耙以外，所有的农业生产全靠人工劳动。

刚来农场的几个月里，每天劳动结束，晚饭后，我们几个男知青就结伙成伴，沿着农场二工区的张黄荡河，唱着《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选段，从四连一直唱到三连（当时也是农场的场部），等玩到天黑以后，才回到各自住的老职工家中休息。如果生产队晚上开会学习，会前我们也会唱歌唱戏，以活跃当时的业余文化生活。为了更好地虚心接受再教育，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红心，我们都是主动拣重农活干。

人的一生中总会体验到各种各样的经历，特别是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有些经历往往会给人留下许多美好而又耐人寻味的回忆。

1970年夏季，为了落实毛主席的“革命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的指示，团部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组建了一个舞蹈队和一个京剧队。我被分在了京剧队。京剧队的主要任务是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全剧。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的年轻人来讲，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我们南方人，方言与京剧唱、念的发音差别极大。有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达到字正腔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人们却是用“坚决不走样”作为衡量学演“样板戏”的政治标准。

排演《沙家浜》这台戏，演员和乐队都是清一色知青担任的。我们京剧队的成员都是初学的知青，没有基本功，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头练起。这真是“手、眼、身、法、步”知者不多，“唱、念、做、打”会者更少。如拉京胡的肖仲亚，经常照着乐谱反复拉练，后来还拉得不错。乐队为了增强演出效果和气氛，还添置了小号、黑管。敲板鼓的范宾，虽然也是初学，但他能经常向行家请教，再加上他的刻苦努力，不久也就搞得像模像样了，他还带领其他三位学打锣、镲的同志一起训练，总算还能跟得上。

团部还从城市里请来了专业京剧的导演、主要演员和乐器人员，对我们进行了多次培训。由于条件的限制，演员们就在大场上，铺上稻草练习翻跟斗，练习武打。演员用的手枪等道具，包括布景都是自己亲手做的。演员的演出服装，特别是新四军、伪军的服装用布都是用当时日本化肥袋染后做成的，新四军服装染成灰色，伪军的服装染成黄色，因为化肥袋上有“日本产尿素”字样，做成的服装，常不时地能显现出来。总算演出一般都在晚上，台下的人一点也看不出来，可能还以为是什么高级布料做的呢！

经过近五个月不分昼夜的艰苦排练，这台戏终于在12月中旬通过了彩排及团领导的审查验收，并在团部试演了几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京剧队相继在团内各个连队和周围公社巡回演出，每到一处都能受到大家的欢迎。

## 瀚海夕照明

许一青

千古沉默的大沙漠欢腾了。新疆新园农场的200名支青战士开到这里，在此安营扎寨。

于田河边一长条平地现在是我们的营地。农场支青4个连队，每个连队各选派50名男子，组成了这支200人的筑路大队。4副野灶——每个连队一副搭起了。用4根木桩支一块大木板，是炊事员们的工作台，他们在台上擀面条。从附近采来红柳枝条作燃料，红柳枝条在巨大的灶膛里熊熊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枝条的根部吱吱地冒着树油，袅袅的炊烟在于田河面上飘荡，向沙漠上空飘去。那边靠西的河边平地上，战士们用带来的旧被单破被面搭帐篷，他们在打桩系绳，设计着帐篷的造型。

这里距农场50公里。我们按连队分乘4辆东方红拖拉机开到这里。靠东是一座大沙山，它高200米，长500余米，巍然屹立在我们身边。于田河从东南方向流来，湍急的流水飞速撞向大沙山，擦着大沙山的根部向北流去。大沙山阻挡了车辆驶向于田河下游的去路。

这是1971年暮春。新园农场自1965年建场，至今已整整6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男女青年已结婚生子，恋爱大军在不可阻挡地发展壮大。结婚的一对必须从集体宿舍分出去，占单独一间房作为居室；而热恋着的每一对都焦急地等待着分一间房以备成家。农场的房屋本来就勉强敷用，现在更



述说的热情（陈奇乐提供）

是求大于供，因此当务之急是盖房以备急需。那时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年代，盖房必须农场自备材料，而农场最缺乏的是用于盖房的大木料。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大沙山下的于田河上筑一条大路，以便于拖拉机从大沙山下通过，驶进于田河下游的原始森林，从原始森林里伐木，再顺利地把木材拉回农场。

一长条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帐篷落成了。有人用网从于田河里捕来不少鱼，大伙赶忙把鱼刮鳞剖腹，清洗后用水煮，一阵阵鱼香在于田河边飘散。热闹的野餐就在于田河边举行，大伙或蹲或站或干脆坐在沙地上，喝着稀面条，呷着鲜鱼汤。于田河边飞扬着一片片欢笑声。

晚餐后，大伙兴高采烈地爬大沙山。大沙山又高又陡，每往上爬一步沙土就没到膝盖，大伙比赛谁先爬到沙山顶，有人不慎从半山腰滚下去，摔进于田河里，把河水击溅起一股浪花，引得大伙捧腹大笑。大伙或先或后都登上沙山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的脚下，一道道蜿蜒的沙丘织成重重叠叠的沙浪，向四面八方的天边涌去，接住蓝色的天穹。“平沙茫茫黄入天。”高峻而绵长的昆仑山脉像一幅翡翠屏障，遮没了南壁天空。从我们脚下起步向西北方向远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东半部，那里是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下流以及

它们的终点罗布泊。从我们的脚下向西远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半部，那里是壮丽的帕米尔高原。在我们以北200多公里的大沙漠中心，是著名的喀拉墩古城遗址。晚霞燃红了于田河水，河水倒映着一轮落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渐渐，西边的沙山已衔住了落日的一角，落日变得更大更红，染红了千里一色的大漠。

瀚海夕照明。

入夜，我们睡进帐篷，于田河流水为我们唱响了催眠曲。这就是典型的“风餐露宿”，这就是真正的“天作蚊帐地作床”！我们领略了大自然的万般风情。第二天拂晓，随着一声哨响，我们便都起身，在于田河边掬一捧清水洗脸。早餐十分简单：两只发面饼，一碗白开水。有的人干脆不喝开水，掬起坎土镬，捏着两只发面饼边啃边上筑路工地。

清晨的于田河水似乎更急更大，它呼叫着从东南方向汹涌地扑向大沙山，打着飞旋急速从大沙山下擦过，呼号着向北涌去。在此筑路谈何容易！俗话说“一盘散沙”，不管你怎样用坎土镬急速地从大沙山往下撩沙土，沙土刚落进河水，就被急速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幸亏我们早有准备，从农场带来许多木桩。大伙跳进齐胸深的冰凉的雪水里，离沙山10米，把一支支木桩深深地打进河底。有人从附近刈来大捆的芦苇，我们站在水里把厚厚的芦苇贴住木桩，以减缓大水冲击沙山的强度。200名男子，聚在一起，一段一段打歼灭战。

多像古战场上的肉搏场面啊！但见沙尘蔽日，呼声震天。日光里，尘雾中，雪亮的坎土镬如电光飞掣，密集的人群在滚爬。湍急的河里，一排人站在雪水里，护着紧靠木桩的芦苇，减慢河水冲击沙山的速度，使人们从沙山上扒下的沙土不被河水冲走，有人继续在下段河里打木桩，还有人继续从附近运来芦苇。我们从南向北一段一段推进，至晌午，基本把路筑成。大伙满脸黄沙，浑身泥污，已是筋疲力尽，但任务远未完成，必须把大伙分散到大路段，用脚踩，用坎土镬夯，再一层一层覆土。因为大家

知道，这条路是危险地段，一旦发生故障，拖拉机翻进河里，后果不堪设想。一层层地覆土，一遍遍地打夯，终于把路筑得像铜墙铁壁一般。

黄昏降临了。大伙忘了饥饿和疲劳，站在河岸上，望着大沙山下那钢筋铁骨般的大路巍然挺立在湍急的于田河水面上，脸上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此刻，炊烟升起了，歌声响起了，夕阳染红了广袤万里的大漠。

瀚海夕照明。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蹉跎岁月

——江阴知青纪念插场三十周年回访农场巡礼

李培生

这次我和50多名当年江阴插场知青结伴，重返苏北滨淮农场，参加纪念江阴知识青年插场30周年活动。

2001年4月6日清晨，灰色的天空刚透出一些红色，我们就踏上了前往农场的道路。30年前的今天，江阴853名知识青年分两批奔赴黄海前哨，“屯垦戍边”。我们是带着青春、带着热情、带着理想下乡的。当年的知青，年龄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在县革委会组织的热烈而隆重、几千知青家长和群众夹道欢送的盛大仪式中，在北门小桃园码头登上轮船，经过三天两夜到达农场。

过了江阴长江公路大桥，汽车行驶在平坦的国道上，知青们在车上谈笑风生，虽然大家在同一个城市，但很少见面，各自的生活节奏固定着每一个人的轨迹。这次聚会大家又高兴又激动，仿佛回到了知青时代，年纪也倒退了几十年，谈的是插场时候的话，讲的是回城以后的事。我突然看见坐在驾驶员旁的童爱评，勾起了我的回忆。当时他在营部当通讯员，我在十连当文书，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俩经常接触。爱评是我们知青中年龄较小的一位，他个子矮小却很灵活，眼睛不大却很有神，一张孩子脸上有两个酒窝，使他看上去总是笑嘻嘻的。他学习很认真，写得一手



好文章和一手好字。他经常背着广播喇叭到田头读报播音，也常得到营首长的表扬。1974年12月，他对我说：“我要去当兵了。”我听了很高兴，也很羡慕，这简直是一个喜讯。我想，爱评在兵团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到部队一定能干好。果然，他当兵第二年就到南京指挥学院学习。学校毕业后，两次上老山前线，还立过两次三等功，后又入大学继续深造，并担任师作战科科长。转业地方后，他也干得有声有色的，我很钦佩他的才华、思路和胆识。

“吱……”汽车的刹车声将我从回忆中惊醒，我们驶入一段泥泞不平的土石路，熟悉的废黄河故道展现在我面前。想当年，每逢休息赶集，我们一年不知要经过多少次，5分钱的渡费一年也不知要交多少。30年过去了，这里没有多大变化，河边芦苇丛丛，河底坑坑洼洼，只有几条羊肠小道伸向河中心。记得是在1975年的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几位知青步行20多里路到街上采购一些年货准备带回家过年。回到渡口上船时，由于每人带着很多东西，一位名叫顾荣娣的女知青挑担上船时重心不稳，连人带物一起掉到了河里。大家连忙把她拉上船，东西倒没事，但不一会儿，衣服裤子就结成了冰块。怎么办，尽管大家穿的衣服也不多，但还是你脱一件、我脱一件地给她换了衣服。大家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中冻得浑身发抖，但仍然一路上有说有笑，歌声不断。

汽车过了“翻身河”大桥（这是一条通往大海的人工开挖的河），我们踏上了滨淮农场的土地。那熟悉的营房，是昔日生活过的地方；那平坦的农田，是昔日战斗过的地方。车停了，“江苏省滨淮农场”七个镀金大字展现在我们面前。到“家”了，农场领导纷纷出来迎接我们，场部大楼悬挂着巨幅标语：“纪念江阴知青插场30周年”、“欢迎江阴知青回访农场”、“昔日知青并肩战天斗地建设农场，今日战友重聚出谋划策振兴农场”。离别几十载，今日又重逢，有多少热情的话儿要对你说，有多少感激的话儿要对你讲。场部党委对江阴知青插场30周年回访专门召开

了热情洋溢的座谈会，场领导介绍了农场发展情况，也希望江阴知青不忘自己战斗过、工作过的热土，常回家看看。

下午，知青们分几路到连队走访，我跟随原插场在二营十连的知青到连队。老农工和连队领导早早就在门口等候着我们，一走进连队，26年前我写在墙上的“农业学大寨”等标语还清晰可见。

记得当年我刚参加完“江苏省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和“江苏省农业学大寨代表大会”回场不久，就从九连调到十连当文书。在“农业学大寨”活动的高潮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美化环境，制造政治氛围。

走到当年我的宿舍前，啊！既熟悉又陌生。当年青砖红瓦十间一幢的房子是连队最好的房子了，也是连部所在地（其他知青住的大多数是草房），东边四间是食堂保管室和炊事房，中间五间是饭厅兼会议室，西边一间前半间是连队会计室，后半间是我的文书室兼宿舍。连队会计是江阴知青叶菊华，她16岁插场，由于肯吃苦，第一年就当上了连队科研班班长。在1971年冬农场“北干渠”开河大会战中，各连队都成立了突击队，一比高低，她是突击队的队员。经过50多天奋战，十连在这次会战中得了优胜，她也得了个“牛婆”的绰号。忆往昔，在那冰天雪地的海边，我们没有房子，割了芦苇扎成捆，人字型一拽就算住房，没有食堂就在野外搭起灶头。晚上睡在地铺上，外面下大雪，里面下小雪，早上起来，被子上厚厚的一层雪，敲开冰块在水渠里取水刷牙洗脸。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知青们人虽小，但没有退却。河底结着冰，知青们还是光着脚去挖泥、去挑泥。如今回忆起这段往事，老首长、老场工都为我们十几岁的小伙子、小姑娘而自豪。

在连队会议室里，知青们畅谈着今天，回忆着过去。“两头黑洞洞，中间不放松，晚上干到九点钟。”这是十连知青提出的口号，也是当年插场的知青劳动的真实写照。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清晨，广播里响起军号声，知青开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始下田打早工，中午冒着炎热的太阳搞“双抢”，晚上还得挑灯夜战打夜工。我们人均20亩地的耕种面积，只有日日夜夜地干，才能完成种植任务。春天播种、育秧、做秧田；夏天拔草、割麦、打药水；秋天割稻、脱粒、摘棉花；冬天挖沟、开河、割芦苇柴，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尽管农场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但人少田多还得靠人工。

江阴知青在农场最长的八年，最短的也有三年，我们在劳动中锻炼，在劳动中成长。有的担任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等；有的担任农技员、通讯员、司务长、会计、文书、卫生员等；有的在农场入了党，入了团；有的参了军，进了厂；有的上了大学……

晚上，场部为我们举行晚宴，并邀请了原来营部、连部的老领导、老农工代表参加。现今的农场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昔日“八大碗”（每逢婚、丧、喜事苏北办酒总是八碗菜），今日煎、炒、爆、煮样样都有；原来“山芋干子、大麦粒子、玉米须子”为主食，现在“青禾”大米、精制白面、绿色食品应有尽有。八桌大圆台将饭厅摆得挤挤的，大家吃着说着，讲话声夹杂着碰杯声，说笑声连着叹息声。当年的知青告别父母踏上这条坎坷的道路，有辉煌也有蹉跎，有困惑也有追求。今天，我们聚首滨淮农场，重忆走过的路，我们没有后悔，只有自豪。这时我们的老指导员陈学延举杯走到我面前说：“想当初你们还是一个个孩子，负重劳动，超越自我，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你们不仅流泪、流汗还流血，实在是不容易。”我说：“不！你们不是也和我们一起在干吗？你们付出得比我们多得多，你们起得比我们早，晚上收工后，我们不洗不吃卧床就睡，是你们帮我们盖被子、放蚊帐呀。”短短几句话，引起了知青和老农工们的共鸣，没有这段人生第一步的锻炼，我们也成不了才；没有这样艰苦日子的磨练，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苦。不知是谁提议，要求当年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知青献上一首歌，于是，我和姚美芬、顾新城、姜云华四人义不容辞地站起来，唱上一首《永远是朋友》。晚餐在

歌声中结束。

场部统一为我们安排了住宿。女知青统一住招待所，男知青分住老农工开设的私人旅社。我们睡在床上，心潮起伏，谈话交流，一直到深夜。过去插场的情景，像电影一样从脑海中闪过。

2001年4月8日，我们在农场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黄海海边，参观了滨海县港务局新开发的“中山港”。站在海边，一阵阵煦风吹进新港，早上的雾气在辽阔的海洋上飘浮，它仿佛倾盖着巨大的海浪，浓雾中太阳升起，透出了曙光。这样的空气太熟悉了，这样的煦风太亲切了，农场早春的田野里不是也这样啊！

离别的时候到了，虽然劳累了两天，但我们为参加这一活动已激动了十几天，时间是短暂的，回忆是永远的。

再见，我亲爱的第二故乡。

# 珍 藏

符维龙

我珍藏着一片苇叶  
它来自艾斯汀村边的芦荡  
粗糙的筋络诠释了久远的岁月  
枯萎的叶片记载着曾经的沧桑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我珍藏着一杯沙砾  
它来自克里雅干涸的河床  
坚硬的颗粒经历过严酷的磨练  
金黄的色泽折射出大漠的风光

我珍藏着一段记忆  
它留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农场  
那里有沙丘、红柳、骆驼、大头鱼  
还有水渠边那高高的白杨

我珍藏着一段情缘  
它与青春和美丽相伴  
清纯是昆仑山的雪水  
浓烈是沙枣花醉人的芬芳



新园农场林业队部分同志合影（陈奇乐提供）

我珍藏着一段时光  
它随我漂泊在遥远的边疆  
那蓝天白云下的沙漠绿洲  
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竹笛知青

孙可立

一支8角5分钱买的竹笛，陪伴我度过八年插队生涯，让我从江阴吹到苏州、从家里吹到田头，从此与竹笛结下不解之缘，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伴我度过那终生难忘的年代，让我感受了人生初恋的甜蜜和世俗偏见的无奈、恋人分离的痛苦和人间真情的永恒，还有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农民兄弟的淳朴、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和古朴纯正的乡土风情。

1966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利港农业高中紧张地复习，准备高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则重要新闻打碎了我的大学梦，高考被暂停了，什么时候恢复要等中央通知（这一等就是11年，到1977年全国才恢复高考）。当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回到了澄江镇自己的老家。

1968年，我和孪生弟弟孙可人（阿人）积极报名上山下乡，一起被分配到苏州屯村公社双湊大队插队落户。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1968年9月26日下午2时许，在北门老船闸码头，两挂拖轮载着我们江阴500名“老三届”毕业生向吴江开去，开始了结束学生时代、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

那时，我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吹竹笛，家里人也关照我：“竹笛带去，空下来也可找找乐趣的。”其实他们不说我早已想到了，这是我在学校时为参加文艺演出特地买的，记得花了8角5分钱。我将它藏在行李中，随我去吴江插队落户干革命。



到了苏州，我才知道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古城坐落在水网之中，街道依河而建，屋宇临水而修，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貌，真正的“东方威尼斯”。而吴江，又是真正的江南水乡，当你翻开吴江县的地图，你可看见吴江县像一张长方形的渔网，那河河湖湖、港港叉叉，桥桥路路、村村庄庄，那坦荡无垠的良田与那烟波浩渺的湖面几乎在同一



后排左一为作者

水平线上。湖面上，渔歌互答、橹声悠悠，让我心旷神怡。回眸间，粉墙黛瓦江南乡村建筑，鳞次栉比。那富有特色的江南乡村建筑，坐落在绿油油的庄稼和金黄色的油菜花间，村前屋后，百年古树遮天蔽日，垂柳绿阴旁依偎着婆婆竹林，极目远眺，就像一幅水墨画卷。我漫步在这样的一幅巨画里，心像水一样柔，脚步像风一样轻，真想抽出我心爱的竹笛纵情地献上一首美曲。然而，匆匆的脚步又不得不使我放弃了这个念头。虽是初来乍到，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它——吴江。

凭着对上山下乡的一腔热情，立志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激发着我扎根农村的豪情，殊不知农村生活的艰辛和体力劳动的磨难，只是在后来的八年中才体会到。

我们到屯村公社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双淞大队派来的木船将我和阿人等8人接到了大队里，然后分配到各生产队。记得薛惠良和朱祥林分配到4队，陈国林和冯维淦分配到6队，王澄、顾惠民分配到7队，我和阿人兄弟俩分配到第5生产队，也就是港北

村。由于接近中午，我们自己做饭已来不及，再说生产队为我们安排的居住地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中饭由大队统一安排在每个生产队的一户社员家里用餐。我记得我们兄弟俩的第一顿饭是在生产队的老贫农徐木金家里吃的，为了表示欢迎，大队里买了猪肉分配到这些人家。那肉块切得足有一两重，满满的一大碗，在那个买肉必须凭票的年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贫下中农的一片深情厚谊。在徐木金家住了几天后，生产队就将我们安排在被没收的工商地主洪祥云家的厢房里。两间厢房虽然是朝东的，但都是结实的木结构，约有四十平方米，除安排我俩的住所和厨房间，还显得很宽敞，特别是小青砖的整洁地面和洁白墙面，透风明亮的吊窗和可以遮雨乘凉的前檐走廊；还有一个独门独院的院子，院子里有几棵高高的古树和一方可以自己种菜的自留地，院子北面的围墙外是一大片翠绿的竹林，推开一扇小门可以随时到竹林里乘凉、吹笛、闲谈或散步。这就是我们的新家。自此以后，我们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靠自己的双手挣工分养活自己，走向人生新的里程。

双淞大队有一个双淞港，就在我的新家门口，它九曲三弯由西向东通向肖甸湖和九里湖，向南通向同里湖。港之南称为港南村，港之北称为港北村，港南港北，一港之隔，那港面并非很宽，约三十米左右的距离，隔港对话能听得清清爽爽，南北两岸，长着许多百年古树和翠竹，村庄掩映其中，偶尔露出屋脊和粉墙的一角。

港北村坐北朝南，沿着北岸一字排开，整齐的石岸围着清澈的河水，其中隔杂着零零散散的码头（也叫河滩），既供人们上下船，又供人们淘米洗菜、汰衣担水。那时河面上漂浮着几十只大小船只，有木船、水泥船、后来还有了机帆船，我的家就在港北村的中间，打开院子门，跨出门槛十几步就是码头。

双淞大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水面多、陆地少，村与村之间一般有小木桥可通，但你要出大队就必须用船，所以，要在这里生活下去，摇船是必须学会的一门技术。生产队长肖夫林就

住在我的东隔壁，他儿子肖四大是生产队里做农活的一把好手，摇船掌舵更不在话下。他对我最好，样样农活都毫无保留地教我，特别是摇船和竖桅杆这些活你必须掌握窍门，也就是掌握得力得法后才能做到轻车熟路。我在他的指导下经过几次锻炼就基本上学会了，其他农活也是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学会的。最难忘的是我刚学会了摇船和竖桅杆后，与肖四大一起去同里湖拖水草为生产队积肥。那时生产队里规定，每两个人打满一平舱水草记10分，每高出一寸就加1分，如高出船舱20寸就可挣30分，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天能挣三天的工分。在那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这是很有诱惑力的。肖四大特地与我搭帮，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参加拖水草积肥的劳动。我俩早早起床，因为从双湊港出发到同里湖有不少水路要走，所以我下了船先按肖四大教我的办法，将一根长10余米，重百余斤的桅杆瞄准竖桅杆的洞眼，竖直拴牢，然后将篷帆拉上去，肖四大把住舵，帆借风势，顺风轻舟，那木船便像得力的骏马，飞也似的驶出了双湊港。

在湖里打水草是这样的：在船舱沿的右边先固定一个木桩，再由专门打水草的人手握一柄类似猪八戒用的九齿钉耙，齿朝外靠住木桩，看准了水草茂密的地方，用臂力扳住钉耙，使钉耙拖住水草，且越拖越多，待到可以上捞时，就用力将水草往船舱里捞，这样一次次地



后排左一为作者

捞，直到捞满船舱且堆积到两人满意为止。干这种活得两人密切配合，主要是把舵的人要看准风向和水草茂密地才能达到目的。我和肖四大这样分工：他把舵，我捞草。那次我俩刚捞满了第一把水草往船里拖的时候，忽然发现水草里裹着一条大桂鱼，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这个城市出生的人不知道桂鱼的狡猾（装死），当我捏住桂鱼往船舱里扔的时候，桂鱼突然张开带毒的鳍猛地扎进我的手掌。农村里有句老话：昂公刺着哭哀哀，桂鱼刺着买棺材。意思是说被桂鱼刺着要疼死人的。当时我痛得忍不住哇哇直叫，右手掌顿时红肿得像只蒸熟的面包。肖四大赶紧走过来，一边用清澈的湖水帮我洗伤口，一边苦笑着说：“倏个倒霉鬼，转去吧。”然后调过船头，悻悻回家。

这是我下乡后接受的终身难忘的教训，直到现在我对吃鱼还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当时的鱼刺提醒了我，像我这样一直生活在城市里，饭来张嘴、衣来伸手的城里孩子到农村锻炼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在以后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各种农活，成为了生活的主旋律。不干活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不能分配到粮食（也叫口粮），没有口粮靠什么活命？总不能靠父母从家里寄粮票和钱买粮吧，长大大的小伙子，这是难为情的。那时我们兄弟俩每年也能人均挣600个工分，到年底可分配到千把斤粮食，吃不掉我们就拿到屯村镇上去卖，再买些生活用品和荤菜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时也买些酒菜请来插兄插弟一起小乐会儿。乘着酒兴，我们一起打开院子门，带上小板凳到竹院里欢乐一番，我抽出竹笛，吹上几首拿手的曲子，唱上几首革命歌曲，引来不少大人小孩一起热闹。那时的农村文化生活确实是很枯燥的，除了广播里有几台革命样板戏外，大多以唱毛主席语录歌为主，至于在贫下中农中间会弹弹吹吹拉拉各种乐器的人就更少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中，有不少人才，这就给农村带来了少有的欢乐，特别是每当我利用休息时间吹起清朗悠扬的笛声，总会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人。那时我是生产队里贫下中农的宠儿，他们不但很尊重和关心我，还教我们兄弟俩怎样种自留

地，一年四季的新鲜蔬菜供应自己绰绰有余。

我在屯村的八年时间里，运气还是比较好的，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不满一年。一是要感谢当年的双溇大队党支部书记沈云官，他看我文化水平是高中生，又喜欢画画写字，吹拉弹唱都会捞捞，就将我从生产队调到了大队里工作，专门为大队编写阶级斗争和农业生产的“战报”，或撰写社员大会的动员报告之类的文章，好像是大队书记半个秘书的角色。好在那时的文章千篇一律，只要坚持政治挂帅，抓住以阶级斗争为纲，再结合本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就可以完成任务。二是要感谢上学时为排演文艺节目，逼得我学会了吹竹笛，使我从1970年5月开始，又进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后来又又在屯村中心小学当上了代课教师，就基本上脱离了农村。

1970年5月，双溇大队文艺宣传队成立了。宣传队员多数是插队青年，江阴人有王澄、薛惠良和我，还有苏州的、吴江的、盛泽的插青，本地的村民也有。由于我们这些插青原先都是从文革宣传队出来的，基本功较好，在我们这些插青的带领和指导下，本地村民的表演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最使我难忘的是“小芳”（化名），她基本上是文盲，却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人也聪明伶俐、端庄秀丽，在京剧《沙家浜》中演主角阿庆嫂。那时我既是乐队竹笛的演奏员，同时还兼布景、道具制作及演员的教唱工作，也就是说，在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外，还要帮她扫盲和教唱。说也奇怪，小芳在我的教导下，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无论在唱腔和表演上都突飞猛进，成为我们宣传队的台柱子；也成了我一生中的初恋对象。后来由于世俗偏见等种种原因，有情人却未成眷属，但成为我的终生挚友，这是后话。

外出演出是件既辛苦又开心的事。由于我们大队宣传队演出的水平较高，特别是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演出了名气，来邀请我们去演出的大队排成了队。他们用木船来接我们过去，吃了晚饭开演，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我是乐队唯一的一支竹笛，每次演出结束，我的舌头累得转不过弯。最辛苦的要算春节





文艺演出（孙可立提供）

期间的演出，西北风呼呼地吹，露天舞台没有一点遮挡，可苦了我这吹笛人了，手冻得发麻不说，关键是一张嘴冻得发僵。要知道吹笛主要是靠手指和口舌。这时，那些暂不上台的演员会将穿在身上的大衣敞开后为我挡风，一个接一个，直到演出结束，这是我几十年来一直不能忘怀的事情。

正当我们双溇大队文艺宣传队演出得如火如荼时，隔条大河的黎明大队也成立了文艺演出队，他们也是由江阴知青发起的。这些知青在江阴时是“联指”（当时一个造反派组织）宣传队的，与我们双溇的江阴知青不是一个派别，他们的节目多数是以歌舞、表演唱为主。宣传队长是南菁高中六六届毕业生，叫高以俭（现为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他舞蹈功底很深，排演的小节目也受到当地贫下中农的好评。一时间，我们两家宣传队就形成了龙争虎斗的局面，只要我们去过的地方，他们准会去演出。当然他们演过的地方，我们也必去无疑，不为金钱，只为面子。那个时代是不讲金钱和报酬的，最多吃顿晚饭或小夜饭，只要演出时人气旺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一天，高以俭来我们大队找我们商量，将两个大队宣传队合并起来联合演出，我们一时拿不定主意。这时，公社广播站的负

责人汪宇婷（苏州女知青）给我们两个队出了个主意，干脆通过公社领导成立公社宣传队，将两个队的骨干挑选出来，再吸收一批其他大队的文艺骨干，这样的宣传队演出质量肯定好。她的建议我们双方都接受了，双方大队也同意。于是在1971年的下半年，公社宣传队成立了，班底以我们双湊大队宣传队队员为主，黎明大队为辅，又吸收了几位苏州知青，共20多人，同样是脱产排练和演出，统一吃住。排练节目以小节目为主，《沙家浜》、《红灯记》只演片段，如《智斗》、《十八棵青松》、《痛说革命家史》等，另有小锡剧《叉河口》、表演唱《剪窗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当然，我的笛子独奏是少不了的保留节目。

屯村公社宣传队的演出名气越来越大，就连吴江县委也知道了，后来我们屯村公社宣传队成了吴江县委的对外宣传工具，每当县里召开大会，我们公社宣传队就去吴江演出。节目紧扣会议内容，自己创作、自己作曲，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喜闻乐见，深得县委领导的好评。由于公社宣传队长期统一吃住，费用也不少，为了减少开支，公社在1973年9月，将我们宣传队员分配到公社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在单位工作，有演出任务就集中几天排练及演出。我被分配到屯村公社中心小学当教师。记得高以俭因为文艺才能出众，就到公社文化站工作，其他的大多在砖瓦厂、农具厂工作。

在屯村中心小学当教师后，我仍不忘吹笛，每到放晚学后在宿舍里吹笛，总会引来一些住在街上的学生驻足观看，不少学生提出要求，要学吹笛。在这种情况下，我与校长商量，干脆成立一支民乐队，由我来教他们，因为我除了竹笛外，二胡、扬琴、手风琴都会弄弄。学校同意了，学生报名十分踊跃，我就挑选了十几位学生组成民乐队。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中心小学民乐队已初露锋芒，民乐合奏《大海航行靠舵手》、《喜洋洋》成为学校的看家节目。1975年12月我因政策规定上调回澄，学校民乐队由于没有辅导老师而解散了，怪可惜的。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1976年1月2日，是我回澄后分配工作的日子，生活就是这样凑巧，本已决定分配到云亭中学当教师的我，被当时的文化馆馆长赵沛看中，破例将我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就在顾金荣同志负责的群文科，具体辅导基层文化工作。同年10月25日，我又被分配到峭岐文化站任站长，直到2001年12月退养。

在当文化站长的25年时间里，文化站以小戏为主参加县（市）的文艺汇演，我既是乐队指挥，又兼竹笛演奏，有时还充当导演，总之，峭岐文化站的演出水平在全县（市）中也是屈指可数的。特别是1983年我们排演的小锡剧《阿福卖鸡》，不仅获得了江阴县文艺汇演的演出一等奖，还获得了无锡市文艺汇演的演出一等奖，更可喜的是我们的《阿福卖鸡》与月城文化站的《阿二接妻》、北涸文化站的《半真半假》三只小戏被上海电视台看中进行了全场录像，在华东六省地区播放多次。我当时作为县文化馆组织的乐队竹笛演奏员，全程参加了三个小戏的录制工作，这是我当文化站长以来最为风光的一件事。

如今，我已是65岁的退休老人，但是为了让中国民族器乐能后继有人，我还要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孩子学会吹竹笛。

（黄剑宝 整理）

## 滚一身泥巴 炼一颗红心

赵佩华

弹指一挥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已经过去40多年了，忆往昔在建设兵团的战斗生活，让我感慨万千、终生难忘。

1971年4月，18岁的我来到现在的滨海滨淮农场。这里人烟稀少，到处是白乎乎的盐碱地、芦苇荡和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偶见几头牛和几只鸡鸭在田埂上觅食追逐。营房周边杂草丛生，情景凄凉寒酸。刚到连队报到的几天里，大家情绪低落，生活条件落差太大，整天哭泣声不断。

选苗、治虫、摘棉花、割草施肥、挑泥巴等样样农活都要干。最令我难忘的是在一个插秧季节，午夜的月亮照得天空很明亮，我以为是大清早了，当时没有手表，又没有问问别人，就一下子把全排几十个人都叫起来下田去拔秧。我第一个带头下水秧地，突然发现一条蛇盘踞在秧草中，估计它在睡眠，并没有向我扑来。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倒退了好几步。等一块田里的秧苗全被我们拔完时，我们才知道只有凌晨三点还不到。

农场兵团各连队每年都要整合人马搞水利工程建设。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当时我已被提升为连长，在五连蹲点指导工作，整天挖泥、抬泥、挑泥，脚上、肩上都磨出了血泡。血泡破皮之后，我在肩上垫上毛巾继续干，坚决不下前线，直到最后收工。芦苇荡的奋战更艰辛，锋利的芦苇根经常戳穿鞋子扎进皮肉里，但我们都顾不上疼痛，一直你追我赶地劳动……



作者当年照片

知青们在连队里的管理都是按部队模式进行的。早晨要出早操，还时常搞连队干战集训，有时还组织晚间摸黑演练，爬草地、窜树林。“不能掉队、快跟上”的情景既紧张又快乐！

当时15元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是蛮宽裕的，因为买不到也吃不到略好一点的食品，更谈不上有高档的消费！连队的男知青绝大部分都是上半个月富裕，下半个月发愁，因为粮食计划供应不够吃。当然女

知青都会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将多的粮食给男知青。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连队领导就会安排后勤杀一头猪来改善伙食。知青们还可以在一起娱乐，有的吹口琴，有的拉二胡，有的打篮球，还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包饺子、下拉面。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人又很多，我们只能用洗过脚的盆冲洗后再去打菜盛饭，真是苦中有乐。

在当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不仅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淡水对于我们亦显得十分珍贵。连队离产盐区不足三里路，因此，吃的水都是咸的，洗衣服、烧饭、烧菜用的水也是咸的。每次干活浑身大汗后，额头与肩背上都会呈现一层白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挖了一个大池塘，引入淡水。每当天气特别炎热时，许多男知青干活回来就往池塘那清清凉凉的淡水里一跳，我们女知青真是羡慕又嫉妒啊！记得有一次，我带了几个女知青插秧回来，浑身都是泥水和汗水，我一高兴就带头跳进了池塘好好享受了一下，

真过瘾！但不一会儿问题出现了，一个老知青发现我们在池塘游泳，大叫大喊：“不得了啦，女的下池塘啦……”到了晚上，那一池水就被连夜全部放掉，随即换了新的淡水。当时我又气又觉得好笑，心想为什么男知青都能在那里天天洗澡，而我们女知青一跳下水就奇谈怪论？真封建！那时我还带着天真感叹地说：“再放满水我还跳下去！”

由于交通不便，一年一度几百号人探亲假回家只有靠汽车和轮船。团部组织十几辆汽车把知青们送到船上，几十个人拥挤在船舱里，真是饥寒交迫、归家心切，“苦乐”尽在其中。

苦涩总是最值得我们咀嚼的回忆。蹉跎岁月历历在目，这是人生的一种积累，一种镜鉴。回首往事，如果没有磨难与锤炼，没有一种特殊的信念与精神，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进步与收获。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在武装连的日子

汤珍珠

1971年5月，我和江阴400多名知青一起奔赴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现为东辛农场），第二年因为“政治素质和身体素质好”而被挑选去了团部直属武装连。当时是兵团建制，武装连设有看守所、枪炮弹药库、实验站等，其职能主要是备战、看守犯人和农业科研，指导员则是现役军人。在那里，我入了党，并一步步提拔为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度过了3年终身难忘的岁月。

### 军 训

当时兵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屯垦戍边”，“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型标语牌是团部的重要标识，我们武装连则是这个内涵的具体表现。每天清晨6点起床号一响，大家像军人一样迅速起床洗漱，宿舍里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齐刷刷在操场集合，训练擒拿格斗、投弹射击、跑步攀爬等各种军事项目，经常是一身泥巴，一身汗水。一个冬天的深夜，大家劳累一天后睡得正香，突然响起了“达嘀达嘀”的紧急集合号。我一骨碌爬起来，胡乱穿好衣服，迅速捆好被子背上枪，袜子却只穿了一只。不到10分钟，队伍就集合完毕，跑步出发了。开始还好，深夜里听起

来队伍步调一致，铿锵有力，后来就乱了。我觉得脚像灌了铅，胸口发闷恶心，像要吐血。但我拼着命地跑，坚持不掉队，终于跑完了10公里路程。回宿舍时，我们一个个像面人一样瘫了。

## 值 勤

武装连常年关押着一些犯人或不法分子，看守值勤是我们的基本任务。有一次晚上又是紧急集合，指导员一脸严肃地说犯人中一个叫“疤拉眼”的逃跑了，身上可能还有凶器。大家一下子紧张起来，分几个方向去搜捕。我当时任三排（女排）排长，找到一处芦苇荡时，只听得里面嗦嗦响动，大家呈包围状，个个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却抓到一个指导员事先安排的“探子”。原来是训练，大家虚惊一场。



左一为作者

在团部的重大活动中，我们的值勤就不一般了。记得1974年团部开公审大会，是常州知青张某某强奸杀害连云港知青陈某某，抓获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我值勤的地点距枪决现场只有十几米，当时只感到责任重大，竟无一丝惧意。但此后两天却睡不好觉，眼前常常浮现那个常州知青临刑前绝望和悔恨的眼神。

## 劳 动

武装连有不少农田，用于种子改良等实验。我们一边军训、



值勤，一边也要参加大田劳动，锄草、打药、收割，一样也不少。当时大家年轻，个个不甘落后，身体却在超负荷运转。有一次我发烧39.5度还下地劳动。记得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劳累过度又没顾上吃饭，在田边昏了过去，被知青战友们发现后搀了回去。团司令部郭浩参谋长（现役军人）闻讯后立即赶过来看我。迷糊中我睁开眼看到他，就像一个漂泊在外的孩子看到了父亲，委屈地哭了起来。郭参谋长立即要求武装连对作息时间和军训强度作出调整，以保证知青的休息。他对我们指导员说的一番话，至今我铭记不忘，他说：“还是些孩子啊，身体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当时我们知青都把郭参谋长看作是慈父般的贴心人。可惜现在已到耄耋之年的参谋长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卧床不起，记忆渐失。最近我见到南京知青去看望他时的一张照片，看到他那么孱弱而无助，不禁泪流满面。我只能默默祈盼他能战胜病魔，像军人一样重新站起来。

## 学 习

每天从起床号到熄灯号，我们都在连轴转，只有晚饭后那段时间最悠闲，但我们大部分都用来学习。要么是班会、排会、连



学习《毛选》（右二为作者）

会，要么是自学。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马列、毛选、上级文件以及自己选学的历史、文学书籍。当时我和南京知青张益新（现为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学习认真，被誉为“连队理论

家”，郭参谋长就推荐我们去为师、团首长讲课，说是官教兵，兵教官。记得我讲的是“商鞅变法”，首长们都热烈鼓掌。还有一件事，苏州知青卢群写了一本题为《我们这一代》的书，以农场知青为背景，生动描述了知青劳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很受知青的欢迎。但上面说这是棵大毒草，宣扬封资修，让我们参加团部的文学小组进行批判。我觉得书里写出了我们的心声，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



琴音（汤珍珠提供）

## 友 谊

在武装连的日子里，我们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也收获了真情和友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迷茫时相互抚慰，艰难时抱团取暖，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似的纯洁而温馨。记得我的班长叫陈德云，她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热情真诚，像大姐姐似的对我特别关心和爱护。每天她总是第一个起床，打好洗脸水，甚至挤好牙膏，然后叫醒我，有时还帮我洗衣服。军训和劳动时，她也总是尽量多帮我一点。分别三十多年后，她还一直记着我，逢人便打探我的消息。今年我们举办江阴知青赴东辛农场40年活动，到农场发邀请函时，终于与她见上了面。我们热烈拥抱，彻夜长谈。她说当年看我娇娇弱弱却又肯干能吃苦，心下喜欢又怜惜。她现在已是农场一位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我们还喝上了她自家厂里酿制的“德云牌”米酒。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至今令人难忘。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插队漫忆

钱应乾

1964年10月，我响应祖国号召，离开家乡江阴，到昆山农村插队落户，到1979年5月，我顶替回江阴原籍，其间共15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趣闻轶事颇多。这些事情虽然过去30、40年了，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一般。

### “蓓蕾”夭折

插队到农村以后，除了日常劳作以外，文化生活极度贫乏。除了听新闻广播以外，几乎无其他娱乐活动可以参加。偶尔打打扑克，消磨茫茫长夜。某一天，一起在附近几个大队插队的同学碰在一起，谈到了文化生活空白的种种无奈，萌生了自己创办刊物的想法。我说，现在，劳动之余，无书可读。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大家动手写点文字。既不荒废学业，又可锻炼自己的思路。一有机会，还可以报考大学。一人提议，众口赞同。接着，大家对刊物的名称献计献策。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既是一个符号，又饱含了人们的期望。出刊物，是新生事物，应当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且我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前途像太阳一样光明、像花朵一样美好。何不取名为“蓓蕾”呢！大家都同声说好。对于创作的题材，我们都心中有底。那就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对前途的憧憬、对当时青年不良习气的批评等等。记得当时，我们

几个同学夏晓基、薛阿根、沙庆定、沙惠民都兴趣很高，可以说是相当投入。写稿的、刻钢板的、找资料的，人人动手、个个出力。

当第一期创刊号出来时，我们都欢呼起来。它，字迹工整清晰、印刷精美，尤其是那鲜红的刊头画是一幅出水的蓓蕾，叶片上还有露珠点点，确实逗人喜爱！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啊！记得当时我为这期创刊号写下了《红花礼赞》的散文。其大意是：田里的红花草，是多么平凡，但它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它艳丽的紫色花朵，是蜜蜂酿蜜的好原料；它的鲜嫩的枝叶是美味营养的蔬菜；它成年以后，被农民割下，在河泥里发酵成为优良的有机肥料……以后，我又写了《年轻人，放下你的烟斗吧》、《读平凡的人后感》等文章，越写越有劲。

“蓓蕾”由于我们精心的培育，一天天地健康成长，其影响也一天天地扩大。附近的许多插队青年争相传阅，因为它写出了插队青年的心声，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出版到第七期，出现了意料不到的事情，原来是公社里知道了这件事。公社团委书记找我们谈话，说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拜贫下中农为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是必需的。青年写点东西，抒发自己的感情，暴露自己的思想是件好事，但是青年学生最容易产生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不健康的。希望你们同贫下中农在一起，为贫下中农服务。

书记的谈话不乏对青年的爱护，但其中也不无“威胁”的成份。这对刚走上社会的我们来说，不得不考虑“后果”。于是，我们只能“偃旗息鼓”，仅出版了七期的“蓓蕾”就这样夭折了。现在想来，也真有些后怕的。因为后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说不定用一个什么借口，给你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什么的，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我们“见好而收”，实在是“福星高照”。还真得感谢这位书记的好意呢。

## 三次遇险

我下乡以后，遇到三次危险事，都与水有关。由于自己不会游泳，自我救护能力差，难免出差错。第一次是1965年7、8月份的一个下午，骄阳似火。坐在树阴下，我们汗下如雨。为了降温，我们六七个知青一起到村后的大河——七波塘游泳。河面较宽，那时还没有桥，过河只能用摆渡船。到了渡口，我们就下水了。我不会游泳，坐在石条上，抓住渡船绳，看着他们在河中欢快地畅游。此时渡船上走出一个人，是农村工作组的小堵，他抓住渡船绳，就往岸边拉。然而我竟不知道，仍旧在起劲地为他们叫好。突然，我的双脚浮了起来，人马上就沉下去，接着眼前一片漆黑，“咕咚，咕咚”地大口吃着河水，我想，这下完了。就在我再一次浮上来时，我睁开眼，看见前面有一个黑影，一种求生的欲望使我不顾一切地抱上去。他，是我的插友沙庆定。他看见我往下沉，就迅速游过来。刚接近我，就被我从背后抱住，也吃了口河水，但他憋住气，用力把我往岸上推。我终于站住了。睁开眼，看见沙庆定同学大口喘着气，满脸通红地微笑着。我走过去抱着他的肩，热泪涌出来了，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二次是1967年的1、2月份，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天上飘着铅灰色的云，下着鹅毛大雪，大地一片银白。社员们都无事可做，早早吃了中饭，在家中睡觉。下午2时左右，我的弟弟从常熟家中到石牌乡下来探望我。轮船停靠在乡间小站——河双。由于路不熟，他边走边问，好不容易走到村里，推开我的房门。只见他满头是雪，浑身是泥，满脸通红地站在门口。这种天气，还到乡下来看我，我很是激动，忙把他拉进屋内。这时我才想起，家中什么菜也没有，如何招待他？于是我穿上皮大衣，脚穿套鞋，到半里以外的小店去买咸肉。到小店要经过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河，过河要走一条小的狭窄的跳板。那天路上的积雪有半米多厚。我踏着积雪，一步三滑地向小店走去。田野里一片寂静，没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有一个人影，只有雪落下的“沙沙”声。走到跳板边，我心中有点不安：它太窄了，上面积的雪，都结成了冰，踏上去“格格”地响，跌下去，可不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刚走两步，只听“嗤”的一声，一下子我就掉到河的中间。河里结着薄冰，刺得手上很疼。我心中很害怕，加上脚上的套鞋里灌满了水，身体直往下沉。我高叫：“救命啊！来人哪！”但田野里没有回音，大片的雪依然纷纷扬扬下着，我有点绝望了。突然我身上那件皮大衣铺开了，它像一条棉被一样盖在河面上，我被托起来。我惊喜地用手拼命向岸边划去，一下，二下，身后的冰块也“哗哗”地响着。经过几分钟的努力，我终于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岸，一歪一歪地向自己的茅屋奔去，裤子早已结成了冰，“咔嚓、咔嚓”，刺骨的寒风使我浑身发抖，牙齿“格格”地响。打开门，我一下倒在地上。听了我的叙述，弟弟和我都对这件皮大衣肃然起敬，这是一件救命衣啊！

第三次是在1968年的9、10月份，秋收季节。田野里到处是丰收景象，谷穗沉甸甸的。孩子们的欢笑声，脱粒机的隆隆声，在村子上空飘荡。那时担任民办教师的我，回到小队去参加秋收劳动，我的任务是地把地里的稻挑到船上，运回生产队去。运稻谷的船停在小河边，因为塘岸比较高，而岸上又没有木桩，所以船只能用绳系在岸边的野草上，算是把船固定好了。当时船上的稻已经堆得很高，我挑着沉沉的担子走上稻船时，重量将船压得直沉下去，一下子把岸上系船的草连根拔起，船突然向河中心飘去，我在跳板上，还没站稳，就连人带担，掉到河里，垂直沉入水中。到浮上来时已经吃了一口水，这次我倒没有惊慌，因为河面不宽，危险不大，我伸出手，借着浮力，抓住船帮，当岸上的社员高叫着：“小钱掉到河里啦！”奔到河边时，我已经爬上了稻船，真是一场虚惊。

三次落水的经历，使我深深懂得做事必须细心谨慎，任何粗心大意都可能导致“灭顶之灾”。我也从中悟出了生命的可贵和亲情的温暖。



## 马坝串联

那是1967年1月份。“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蓬勃展开，进入“大串联”的热潮。我们这些在石牌插队的知识青年，那时成立了一个“插队青年联络站”，组织青年们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有关文件，并以实际行动投入到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为了同串联的热潮接轨，我们决定到马坝去。马坝是苏北的一个小镇，那里的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是江苏省知识青年学习《毛选》的先进典型。我们步行去串联是为了向他们学习，是为了锻炼自己，更好地成长。

记得离春节还有十天左右，我们队伍大约有一百多人，分成四组，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动身那天，红日当空，迎面的北风鼓起了我们的衣衫。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公路上，青年人在一起时，总和欢乐为伴。大家说笑着，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下定决心》等歌曲，越走越有劲，虽然身上有背包、有水壶，但一点也不感到疲劳。第一天，我们走了很多路，在沙洲县接待站住下。接待站是当时全国大串联的产物，凡是进行串联的人都可以登记住宿。沙洲县的这个接待站，其实是一个大厅，地上铺着草席，席下面是稻草，有三四十个铺位。大门形同虚设，西北风“哗哗”地灌进来，条件实在是艰苦。住宿的人都是青年，来自五湖四海。那些从北方来的，身上仅穿一件黑棉袄，腰里用绳子一扎，脸冻得通红，却一点不在乎，比我们南方的小伙要精壮强悍得多。大概是到了一个新环境，也许是脑子里太兴奋了，我怎么也睡不着，其他同学也是如此。我们交谈着、议论着，直到天明。

第二天上路后，老天爷好像是要考验我们，不久就下起了雪。刚开始我们还有说有笑，走着走着，发现双脚越来越吃力，背上的包也越来越沉重，行进速度也慢下来，大家也变得沉默起来。照这样的“士气”，怎能走到江阴呢？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用拉歌的方法，使大家振奋起来。丁明朝同学是最活跃的，他先说了段快板。接着邀歌：“某某，来一只”，“某某，唱一段”。于是歌声、笑声又笼罩在行军路上了。大家腿下又有劲了，大家一鼓作气，在下午三点半，到达江阴。江阴是自己的家，我们都是几个月没回家了。久离家的儿女想父母，到底是分散回家还是集体住宿？大家一商量，还是不回家的好，历史上大禹治水时尚能“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为什么就不能？这是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候。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大家决定集体行动都住宿在江阴接待站。由于路途上的劳累，睡下不久，我们都进入梦乡。

第三天的路程是从江阴渡江，经靖江、扬州，到马坝。苏北的公路比苏南的差些，路面都是高低不平的砂石路，人走在上面很吃力，沿途的农田基本上荒芜着，呈现黄色一片。农家养的猪，都散懒地在田野觅食，“嗷嗷”地叫着。只有从江都到扬州十几里的公路是光滑的柏油马路，宽阔平坦，令人叫好。到江都时，我们经过了“江都闸”，给守闸的解放军战士看过证明以后，我们走上闸门。

有许多同学走不动了，一跛一颠的，脚上的泡磨穿了，他们身上的背包被别的同学抢去背，还被其他同学搀扶着一步步地坚持着。这些情景，都是我们在计划“串联”时没有想到的。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原来每年我脚上都生冻疮，肿起来，走路痛得很，现在脚上走得热乎乎的，血液反而流通了，冻疮也消失了，走起路来反而显得轻快多了。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有时候我们也拦汽车。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几天以后，终于到达了马坝。

## “反标”事件

到农村后不久，我就被大队推荐，担任了民办教师。当时农村教育比较落后，全大队没有一所像样的完小。我所在的自然村较大，学龄儿童很多，为了就近入学，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我就

在里面当教师。

1973年3月份的某一天，我跟平常一样来到学校。突然，有一个姓姚的学生向我报告说：“老师，我在柴堆旁小便时，发现了一张‘反标’。”我打开一看，吓了一跳。那是一张在《毛主席语录》上撕下的照片，在主席像的左右两边写着“打倒×××”的字样。我马上报告了大队党支部，党支部马上报告了公社党委。一天以后，县公检法派了一个调查组进村做侦破工作。

看那张“反标”，字迹比较潦草，不像小孩所为，大人的可能性蛮大。这种人，肯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一有适当机会，就会发泄自己的不满，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从村上的社员中去查找怀疑对象的行动就开始了。平时喜欢说坏话的社员，首当其冲，一个一个被找去谈话。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样查了几天，没有结果。接着，这些“坏话”社员被勒令不许参加劳动，在家里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写出“触及灵魂”的检查。这些人大都是体力劳动者，也没有多少文化，关在那里冥思苦想，行动失去自由，实在是苦不堪言。几天以后，工作人员要他们交代问题，谈话的口气要比以前强硬多了。什么“你一直对共产党不满，这‘反标’是你写的”。“根据‘反标’上的手印，肯定是你所为”，什么“不是你写，也是你写，赶快坦白，争取宽大处理”等，越到后来威胁性的语言也越多。但是，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任何人不会随便承认的。调查陷入僵局。最感到有压力的是几个苏州知识青年，他们大都家庭出身不好，有的父母是资本家，有的是历史反革命，有的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那种“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的影响下，他们的处境已经很艰难。这一次，他们也被作为怀疑对象。他们常感到有许多无形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精神负担相当重。我还算好，由于平时“注意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论，不在怀疑之列，但是自己也感到有责任，毕竟事情是发生在学校附近。

那时，对破“反标”案件是规定时间的，现在一拖就是半个

多月，怎么了得。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人们也越来越紧张。有群众反映，在发现“反标”的前一天晚上，学校操场上曾经放过一场电影。看电影的人来自附近四个大队，真是人山人海。这些人不也是可怀疑的吗？这样一来，调查的范围就更大了。后来工作人员找那个报案的学生来谈话，详细询问他发现“反标”的经过。这样一问，倒发现了不少破绽，其中许多细节，首尾不能衔接，而且自相矛盾。再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学生终于承认，这“反标”是他写的。究其动机，是随手涂写，毫无目的。写后感到十分害怕，又不敢对父母讲，自作聪明，交给教师，引出了一场风波，好在孩子的父母都是党员、干部，孩子又小，这事也不再追究，就此不了了之，但是无辜的群众却惨了。

## 营造新房

日常生活不外“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话题，而房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避风雨，遮阳光，是安乐窝，是避风港，它调动着人喜怒哀乐的各种情感，它伴随着人一生的脚步。1964年，我刚插队到昆山石牌公社时，被安排到同星大队六小队。那时，生产队比较贫穷。安置知识青年要造房子，由于生产队没有这笔资金，只能让我们借住在当地社员家中。这种房子都是社员平时不用的空房，阴暗潮湿少见阳光，老鼠猖獗，使人夜不能眠。一年以后，队里为我们搭建了一所茅屋。它用三根毛竹做梁，里外两间，还借用了队里仓库的一堵墙，我和另外一名知识青年夏胜基就住在里面。当时，由于社员们认为我们下乡是锻炼，不久就会上去的。所以建房时比较马虎，加上地基下沉，没几年，草房就变得歪歪斜斜，一付摇摇欲坠的样子。这就使人常常担心，尤其是在下雪的时候。

一晃几年又过去了，我们却没有任何能回城的迹象。再住在草屋里也对不起自己，看着别的社员都住上了瓦房，我们也“眼红”，于是造房这件事，就提到我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然，造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需要钱。我插队在农村，虽然做民办教师，但工资是相当低的，全年总收入只相当于农村的中等劳动力，勉强维持农村低水平的生活，哪里来钱再去造房子？几十元，几百元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一想到此，我心中就是无穷的忧虑。这件事被我父母和亲戚们知道了，他们都愿意资助我，因为他们深知“安居乐业”的道理，都慷慨解囊。这个三百元，那个五百元的。不久，就收到了二千多元，加上自己的积蓄，总共是三千多元，造房的资金算是落实了。

第二是建房材料。那时是计划经济，物价很低。一块砖只要二分钱，但是按计划分配，市场上不能随便买到。于是，购买砖头成了最大的难题，因为分配的砖头总是不够用。于是我们只能平时省下烧柴，到土窑去调换砖头。这样积少成多，居然也调到四五千块砖头，但这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队里批给我们造房子的地基，是地势较低的低田，平时积满了水。要在那里造房子，宅基要加很高，这就需要大量的砖头。公社里负责插队青年的干部姓李，他身材高大魁伟，声音洪亮，人称“周墅大人”，他对插队青年还是比较同情的。我们跟他商量，把具体情况摆出来，请他帮助。他爽快地批给我们十四吨断砖的计划。在当时，这些砖是一个大数目，还没有人拿到过，当地社员都很羡慕。我们非常高兴，真是从心底里感谢这位“李大人”。

如何把十四吨断砖从红窑运到队里，由于路程较远，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那时砂石公路极少，汽车使用不普及，内河运输主要靠挂机船。我们考虑只能从水路把断砖运回家。那天早晨三四点钟，我和爱人就起身了。请好帮忙的社员，准备好路上吃的饭菜，拿好钉耙、担子、绳索等各种工具后，天已大亮，借好的四条船和一艘挂机，也早就停靠在船坊里。六点多钟，船队伴着挂机的隆隆声，飞快地向目的地出发了。

1974年4月，新房正式开始建造。我们基于扎根农村的思想，房子当然建造得越牢越好。所以房子的宅脚相当讲究，有齐腰高。社员都说，这地基两层楼房也可以造起来。两个月后，朝南

三间宽敞的平房就出现在七波溱河边。那时，同是大桥——石牌公社跨度最大的水泥桥也已经造好。所以，只要走近大桥，就可以看到一排整齐的红瓦房，四周绿树环绕、房前冬青篱笆，煞是惹人喜爱。“这就是我的家”，我不无骄傲地说。

1979年，我顶替回原籍江阴。按政策，我把它卖给了同一小队的社员，就要离开自己花费了许多心血的家，我竟有点恋恋不舍，眼睛湿润了。

## 寄爹寄娘

1964年10月份我插队下乡时，虚岁18，刚从学校高中毕业。由于在家时，日常生活，包括洗衣烧饭，都由父母包办，自己什么也不会做。一旦插队到农村，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所有生活上的一切，只得硬着头皮自己动手。当时，队里安排我们住在当地一户农民家中的空房内，房东是一对老夫妻，就是我的寄爹寄娘。说起这一段关系，还真得谈谈这个称呼的由来。

那是我第一次坐在灶边烧饭。因为以前，在城里烧的是煤球炉，灶头根本没有见过，所以刚接触柴草，还感到很新鲜。我坐在灶后面把稻草拦腰一折，就点火推进灶洞。起初，火烧着了稻草，但不旺，我心急起来，又把稻草推进去，没料到，火却一下熄灭了，而且浓烟滚滚，呛得我直咳嗽。我只能低下头去，用力吹气。突然，只听到轰的一声，火是烧着了，可是一股浓烟，带着热浪直冲出来，差一点把我的头发烧掉，我吓了一跳，赶快跑出灶外。这时房东大妈在门口，她一看见我的狼狈相，赶快走过来，太危险了！她麻利地把灶后的柴草搬开，又教我如何做草把，如何把它点着，然后把柴灰掏空，让草把搁在上面。果然，火苗一下就蹿起来，烧得很旺，我按照她的动作试着，终于掌握了烧饭的技术。后来想想，这是利用新鲜空气助燃，这样简单的道理，自己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实在是难为情。这时隔壁的一位大嫂走过来说：“你们离家这么远，又什么都不会。李家伯母这

么关心你们，还是认她寄娘吧。”于是，我“寄爹寄娘”就这样叫开了。

我的“寄爹寄娘”是实实在在的农民。他们口头上不会花言巧语奉承你，然而在生活里，却无微不至地关怀你，从平时的柴米油盐到衣食住行，无所不及，如同亲生父母一般。1968年9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在学校上课，本来是烈日当空，可突然狂风怒号，大雨倾盆，天空一片漆黑，是雷阵雨来了。我想：“糟了，伞没带，怎能回家？”四点半以后，放学了。依然风雨交加，一点也没有停歇的迹象。这时，学生们都陆续回家。我站在学校的走廊里，看着密密的雨点拍打着地面，不禁发起愁来。学校离家较远，路滑、雨大，还要走过一座小木桥。说实话，农村的泥路实在不会走，高一脚低一脚的，况且还要过河。正在此时，从学校后面的小河里传来了我寄爹的喊声：“小钱，快上船！”原来寄爹摇着船来接我回家。我冲出雨阵，奔向河边，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向家中驶去。由于风大雨猛，寄爹虽然拼尽全力，但船还是缓慢前进，狂风吹着他的雨衣，紧裹着他的身体，雨点打在他古铜色的脸上，他毫不在乎。突然，他的雨帽吹落了，雨水顺着头发，直往下流，可他还是坚持着，手握橹把，摇啊摇，向着目的地。坐在船舱里的我，这时正钻在一顶伞下面，听着风声雨声，小船前进的潺潺水声；看着他晃动着的矫健身躯，我激动的泪水涌出眼眶……终于到家了。可是，我寄爹的全身，却被雨水淋湿了。

我寄爹寄娘也是真心实意的农民。1979年，我按政策上调到江阴工作，我自己建造的三间瓦房怎么办，原先准备托寄爹管理，同他一商量，他说：“房子托给别人照顾，总是不牢靠的，而且房子没有人去住也容易损坏，不如把它卖掉为好。”说得有理，我就预备把房子卖给本队的一家姓李的社员，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砖头、木材都很便宜。我一核算，估计整幢房子在两千元左右。照例，只要双方同意，马上可以成交。然而，小队里有一姓姚的社员也想要我这套住房，但他又不想付我那么多的钱



票，于是利用其女婿当队长的便利，用手中的职权，从中作梗。由于意见不统一，双方争执不下，只能请公社有关人员帮助解决此事。我请寄爹想想办法。他说：“这些人是得了红眼病，他们欺你们年轻。你不如回江阴，把你父亲请来，看他们怎样说话。”我想他说的话十分有道理，就回家把父亲接来，让他和我一起出面，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出钱造的房子，小队里没有任何补贴，仅在造房时，派了几个小工，所以不存在任何纠纷。公社的同志也调解说：“小钱他们下乡十几年，为小队做了不少贡献，造房派工是应该的。你们大方一点嘛。”那队长再也讲不出什么理由。于是由我执笔，写了一份卖房协议，由姓李的买方，我卖方，中间人寄爹、老李各一款，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现在想起这事，我确实感到我寄爹寄娘和我们就是一家人，他们处处为我们着想，时时想办法帮助我们解脱困难。

从那时到现在，虽然我离开生产队已经多年，但我和寄爹寄娘还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逢年过节，我想着他们，买点水果、补品，让他们高兴，他们也惦记着我们，常拿点土产、糕点，让我们尝尝。我们有了孙儿，还请寄娘到我儿子家去照料，我们真的像一家人。

## 捉蟹趣闻

蟹，现在是一种高档次的食物，价格昂贵，一般工薪家庭很少买它。然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蟹在农村随处可见，并不稀罕，价格也极低。和几个同学美美吃上一顿，也是常有的事。

1965年7、8月份，我插队不久，不熟悉农活，小队里特地叫一个农村青年小李辅导我们。一天，我们三个青年到田里耘稻。这块稻田离家较远，平时也没有人去管理，所以稻田里水草很多，像草皮一样铺满了整块水田，碧绿一片。这天下午，风和日丽，我们一边劳动，还一边说说笑笑。我弯着腰，两手用力地在



稻根四周抓着草，把草连根拔起，然后塞进泥里踩实。俗话说：“麦要压，稻要挖。”所以我挖得很卖力，不一会儿就汗流浹背。我的一只脚又踩进了水潭内，感觉上有点不一样，脚踏到一个硬的东西，而且那东西有棱角，仿佛又在爬动，我用手在泥中一摸，抓到了四只硬邦邦的脚，分明是一只蟹。然而它极不愿意束手就擒，不断地舞动着两片大刀似的螯，向人示威。我用脚踩住它，用手把蟹从水中举起。嗨，好大！它背是青黑色的，肚是土黄色的，张牙舞爪，口吐白沫。小李走过来帮忙，用野草把它绑牢。那时的蟹很多，人们下地干活，抓住一两只是经常有的事。

蟹在10月份以后，都长得结实饱满，是人们品尝的好时节。“北风响，蟹脚痒。”河中的蟹在晚上常会向岸上爬。根据这一特点，农民们常在晚上带上一二口丝网，去河中捉蟹，可为贫困的农家生活增添一点油盐补贴。因为当时的农村，生活极度贫乏，没有一点生气。捉些蟹到市场上去卖，这也算是一项小副业吧。

1967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寒气逼人，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闪亮的星星。我跟一个农村青年小姚去网蟹。小姚一手提着一盏油灯，一手拿着两口丝网和一根长竹竿，我们就向河边走去。小河离开村庄较远，在这里捕到的蟹多，且个头大。走上塘岸，只见河两岸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小草棚，里面都亮着灯，那是人们捕蟹的场所。人们为了抵御严寒，而搭建起来的临时小屋。我们钻进草棚，小姚就把灯挂在河岸边的小木桩上。顿时，黑洞洞的小屋，满堂生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接着他就熟练地用长竹竿把两口丝网张到河的中央，丝网很长，差不多把半条河宽给拦住了。两条网成扇形，网的顶端拴在岸边的木桩上。他对我说：“我们安心坐着，只要看好网下端的白色小浮子，一动，就可以拉网了。”于是，我们相对而坐，嘴里嚼着瓜子，小声地谈笑着……20多分钟过去了，浮子还是一动也不动。我有点不耐烦了，心想今天晚上可能要白走一趟，然而小姚却是镇定自如。突然，水中的浮子动了一下。我说可以动手拉网了，可是小姚却说：“不忙，待它爬上网再拉也不迟。”水中的浮子又一阵抖动，

说时迟，那时快，小姚两只手飞快地拉网，丝网刷刷地向岸边行走，激起一股白色水花，并在岸边堆成一团。只见一只大蟹被裹在网里拼命地挣扎，无奈它力不从心，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我真是太兴奋了，不住地说：“你真行，有一套。”他却说：“小事一桩，好戏还在后头呢！”就这样到深夜十二点半，我们共捕到九只大蟹。

我寄爹在大队电灌站工作。对于蟹，他见得多，我也吃了不少。每当电灌站向田间灌水时，马达一响，大河的水就被水泵抽进机房。那时河中的蟹很多，由于水流很急，它们忽悠悠，轻飘飘，身不由己地顺水流冲进水管。进水管的直径有面盆那么粗，所以吸力是相当大的。管外面有小竹篱笆围着，蟹便被阻挡在外面，它们就会向上爬，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捉住它。有一次，寄爹把一面盆蟹给我，他说：“昨天晚上水闸打水，真是大丰收了。这点蟹你们烧烧吃吧！”于是一顿特殊的蟹宴在中午就摆出来了，我们都吃得很开心。

## 同学来访

1966年10月，在我下乡插队三周年之际，我的同学陈永年专程从江阴到昆山来看望我。他是我下乡十多年中，唯一的一位在城市里工作而又不辞辛劳从家乡到农村来探望我的同班同学。

那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到河双轮船码头接他。同学长久不见面，分外亲热，他用手捶着我的肩：“嘿！看上去，你气色不错，想不到，你到农村，反而变得强壮多了。”我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都既兴奋又激动。

他说：“听说昆山农村很艰苦，你父母也担心你吧！”

我的心底荡漾着一股暖意，确实，陈永年同学是我最亲密的同学之一，我们从初中到高中毕业，六年同窗，感情深厚。他人高马大，性格豪爽，处处照顾我，帮助我。

沿着七浦塘河岸，不一会儿就到家了。晚饭是在极度兴奋中

开始的，大家说着笑着。我也破例喝了一点黄酒，满桌的蔬菜、鱼肉，最突出的是那硕大的红彤彤的蟹。我们都叫永年多吃一点。他用手剥着、大口吃着、点头赞扬着：“果然名不虚传，实在好吃。蟹肉甜津津的，鲜极了。吃了蟹，百样菜无味道。”大家提议，为友谊干杯！为健康干杯！就这样，欢笑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我们又陪他去拜访了其他几位同学，大家自然是相当的高兴。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决定下午和他一起去巴城浴室洗一次澡，顺便参观一下巴城镇。巴城的浴室在一条街道的尽头，坐北朝南。走进浴室的外间，热气扑面而来。太阳暖洋洋地从明亮的玻璃窗中透进来。浴客们有的看报，有的喝茶，有的谈笑，一派悠闲的样子。从浴室出来，我们信步走上巴城街头，我走到文具店，选购了一本日记本。我把它赠送给同学永年，作为纪念。我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同学友谊深如海、地久天长。”

## 王老先生

我落户的生产队里，有一位教书的老先生，名叫王朴安，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皮肤白净，待人谦虚、和蔼，平时满脸堆笑，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据说，他是常熟人，年轻时，在乡间的一个私塾里教过书。在国家困难时期，他拖儿带女，离开家乡，到昆山农村落脚，在小队里一住就是七八年，后来他本人也成了大队里的一名民办教师。

王老先生同我们插队青年的关系很好，共同语言较多。我们很尊敬他，常到他家里做客。他为我们沏茶、点烟、让座，然后是天南海北的畅谈。有次，我们谈到了鲁迅先生，王老先生说，他最敬佩的就是鲁迅先生。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以犀利言辞，写下大量杂文，抨击社会黑暗。

王老先生写得一手好字。他写字时，有一个特点，就是静。

他认真地铺好纸，提着饱含墨汁的毛笔，默默地思考一下，大概是在考虑写字的布局吧。接着，他就奋笔疾书，一会儿就大功告成，周围的看客是一片赞叹。王老先生也乐呵呵的，嘴里不住地说：“献丑了，献丑了。”由于他字写得好，社员写信或婚丧喜事都要请他代笔。他从不推辞，也不受礼，只吃支香烟就行了。

大约在1966年4月份，王老先生的气喘病犯了。这是他的老毛病，已得了几十年，一直未愈。一到冬天，气候寒冷，就气短、胸闷，吃不下饭，体弱乏力，只能提前退休。退休之前，他向大队领导推荐我去接他的班。因为当时，我在那一片自然村里，文化程度最高，除了教过农村夜校的初中课程外，还给大队的文艺骨干教过音乐，所以大队干部一致同意。于是，我也就开始了教师生活。

回城以后，我得到王老先生过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我会永远怀念这位善良的老人。

## 回忆下乡插队的日子

宁慈美

当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大批城镇年轻人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修地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在留校“文革”二年多后，就地插队到了本镇“长新”大队。记得1968年“9·18”那一天，在公社大会堂开完分配兼欢送大会，我们就背着铺盖跟着来领我们的大队干部一路敲锣打鼓去了插队的地方。

当时分配到长新大队的知青有6人，二人一组分别去了三个生产队。我与另一位男知青去的是一个叫吴家巷的自然村，只有几十户人家百多口人。当天，小队长把我们安排在一吴姓家废弃的猪圈里住。这是间标准的“空心椽子线香瓦”房，即竹椽草顶房，泥地上铺层稻草就是我们的床。稻草的清香和着猪粪的余臭伴我们度过了下乡的第一晚。

第二天，我们一起插队的两个知青就在老农的带领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第一次干的农活是跟着老农在一个旱岗上摘棉花。当时，顾了手里摘棉花、顾不了脚下高低不平的土坷垃，顾了装棉花的篮子不打翻、顾不了裤腿被棉枝挂住，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摘完一垅棉花已是满头大汗、手上挂彩……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插队生涯。

由于我们只带了简单的铺盖和生活用品去，因此劳作需要的农具暂时由农家借给我们。钉耙锄头、镰刀铁锹、扁担络绳、粪

桶料勺、大耖小耖、簸箕翻扒、脚踏脱粒机、手摇扬谷扇、河泥船、菱桶……一开始，如十八般兵器一样的各种农具我们不仅不知道每一样的用途，连名字也叫不准。经过几年的历练，这些“兵器”在我们手中也能运用自如了。

当然，基本的农具后来我们自己陆续添置了，毕竟自己的“兵器”用起来要顺手得多。在那个年代，扁担、竹柄、粪桶都是计划供应的，好在我们下乡知青有计划指标，因此“大小兵器”也备了不少。直到上调时这些农具就统统送给了一直照顾我的老农。

刚下乡时吃饭是在农家搭伙，尽管本家对我们如儿女一般，添菜加饭关怀有加，但总有“走亲戚”的感觉。好在过了农历新年生产队帮我们垒了一付灶头，我们开始了自己烧饭做菜的日子。开头不是饭做夹生了就是菜炒糊了，慢慢地炒的菜、做的饭也有滋有味了。为图方便，菜饭是做得最多的饭食，大米、青菜、山芋加点油、盐，一锅香喷喷的菜饭可以吃上一二天。

那个年代粮、油要计划供应，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一饱口福，平常都是蔬菜和咸菜、萝卜干、大酱下饭。我们所在的生产队由于地较多，所以口粮还是能保证。由于体力劳动强度大，又缺少油和荤菜，所以我的胃口也特别大，记得一顿吃一斤米饭是常有的事。

最开心是过春节前，队里要干河抓鱼。请专门的师傅，用柴油机带动水泵把小河水打干，捉的鱼按人头分。而干河的另一目的是把河底的淤泥刮起来作肥料。我们分到了鱼，大部分用咸盐腌了慢慢吃，头尾等则和自己去抓的小鱼虾一锅煮了美餐一顿。

那个年代为了多生产粮食，种的是双季稻，每年要种三季（二季稻子和一季麦或油菜）。所以一年到头除了过年的几天，几乎没什么闲空的时候，不管是天寒地冻的三九寒天还是骄阳似火的三伏天，上工的哨子一响就得扛上钉耙锄头或是镰刀铁锹出工。



下乡第一个考验就是秋收秋种，弯腰割稻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不说，第二天两条腿更痛得不行，硬撑了几天实在受不了只能歇一天。割完稻子就是翻稻铺、捆稻、收稻、轧稻、晒稻、缴粮，每一道“工序”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好在老农们对我们教得还是尽心的，有时真的是手把手地教，几年下来这些农活也驾轻就熟了。特别是捆稻的结怎么打既牢又快、轧稻（用脚踏脱粒机脱粒）时手脚如何协调、缴粮时挽子上肩的巧劲我都学会了。

要说收割稻子还算是“技术活”，那接下来的翻地就完全是力气活。那时还没有拖拉机耕地，完全是人用钉耙垒田，一天下来手上的血泡就排成了行，晚上睡觉两手痛到最后变得“木夫夫”了，第二天手指弯都没法弯，但还是要去垒田，直到手上起了老茧才算“凤凰涅槃”。

而在三伏天抢收抢种是那个年代的农事特色。由于种的是双季稻，收第一季稻和栽种第二季稻是在最热的季节，并且时间要求特别紧，所以称为“抢”。记得下地干活时为避免烈日的曝晒，我们把毛巾弄湿披在头上再戴草帽，即使这样的“装备”也只能撑上个把小时。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又被晒干，衣服上往往会泛出一层白花花的盐霜。晚上收工后的第一件事是到河边泡在凉凉的河水中让晒了一天的身体降温。

由于每年三季的种植，地力严重超支，那时要想产量高就要想方设法搞肥料。除了猪粪、人粪还搞绿肥，用种的红花、割的青草和罾的河泥在田里挖的河泥塘里沤成肥料，还在稻田里养绿萍让它腐烂以增加肥力。我们生产队还与镇上的屠宰场挂钩，把屠宰场的废水用船装回来浇在大田里。“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们生产队在肥料上用足了心思，所以产量要比其他生产队高一点，年终分红也比人家好。

再说说我们的居所。前面说刚下乡时住在农家的废弃猪圈里，后来不久又搬到一家农户的侧厢里。到第二年的冬天，由公社分配材料和补贴资金，由生产队动手给我们盖了两间砖墙竹椽

草顶泥地的房子，从此我们每人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小家。小家进门就是一付灶头，里面是房间，房间的西墙上开有一扇小窗（我住靠西的一间），在这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的蜗居里我度过了好几个年头。

在农村的七年里，头三年，我从小麦韭菜不分的“街上人”历练成了长年赤脚、皮肤黝黑的“乡下人”，除耨河泥、摇船外，其他农活大多能干得有模有样，还做了一年的小队会计，参与了大队“四清”工作组和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同时，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少爷”历练成了自己洗衣烧饭、打理家务的“一家之主”，尽管一开始饭烧糊了、菜做咸了、衣服洗不干净、纽扣掉了不会缝，但后来这些都成了小事一桩。

1971年下半年，我担任了大队第一家村办企业的负责人，领着一群毛丫头办起了胶木厂。从此，我除农忙季节外，基本上不用干农活了。

回想那些年在农村的日子，繁重的体力劳动是最大的考验，细皮嫩肉的手、脚和肩膀磨出了老茧，白皙的脸被风吹雨打得又黑又粗；其次是缺吃少穿，咸菜萝卜干是家常菜，破棉袄捆一根草绳是工作服；再就是精神生活的贫乏，时断时续的有线广播是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昏暗的油灯下读旧书是最好的精神享受。

农民的满足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收获亲手种养的稻麦瓜菜、猪羊鸡兔、鲜鱼活虾。每当收获的季节，品尝新米饭的香醇、家酿米酒的甘甜、自家蔬菜的新鲜，是农民最幸福的时刻。而农家生活的平静、恬淡，对生活的容易满足，乃至对外界事物的实事求是观点，这一切都有形无形地影响了我。

尽管我的大好青春献给了“广阔天地”，我的大学梦也成了泡影，但是下乡插队七年里“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开辟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那段岁月，那般情谊

沈 耘

大凡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回望那段岁月，总有一种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的记忆。我自不例外。不去咀嚼物质生活贫乏的苦涩，不去述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不去追忆患上血吸虫病的恐惧，我只想说说，在农村摸爬滚打的六年里，与当地贫下中农和干部结下的那种难以忘怀的情谊。

47年前，也就是1964年的10月21日，江阴130多位男女青年，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在夹道欢送人群的簇拥下，登上了开往昆山的轮船。我们一边频频挥手告别，一边高喊着“红在农村、专在农村，一辈子奋斗在农村！”的口号，以回应那热闹而政治味特浓的气氛。

那天下着雨，我们经过八九个小时的路途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田多人少的昆山石牌公社（百余人，一分为二，大半在石牌，小半在陆桥）。水乡的农民披着蓑衣，撑着小船，兴高采烈地各自领回分给村里的新农民。顿时，我那背井离乡的愁绪，被他们的笑容和热情冲得光光的。我所在的金星大队第一生产队有七个知青，三男四女，分住在三间新建的草房里。尽管当时这里每个劳动力日均收入不足一角钱，农民的生活十分节俭，但出于关心，也出于好奇，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有人上门送菜、送蛋、送鱼虾。生产队还按照大队党支部的指示，给我们一对一配备了教农活的老农。在这心无杂念的交流中，我渐渐了解了当地的风俗民情。我帮孤寡老人看病，为体弱者搞卫生，给有亲属

在外地的人代写信件。田头休息时，我分秒必争地给他们读报纸。在那个把成分看得很重的年代里，工人出身的我，很快被当地农民认可。

生产队长王阿六，是我插队生涯中第一个引领人。50多岁的他三代贫农，长工出身，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他用勤劳、朴实、一心为公的正气，赢得了尊重。在分工、评分等方面，我队的知青都得到他不少的帮助。在我当政治队长与他搭档的近两年里，他处处维护我，为我着想。他多次对社员说，生产上的事她不内行，你们不要为难她，但传达上面的政策，组织学习“毛选”的事，你们一定要听她的。为了让我熟悉生产情况，他不仅耐心指点，还带着我踏田查看，具体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主动权。以后进入大队领导班子，反过来向他“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又把服从放在了首位。至今，我还深深感佩他的人格魅力。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真诚、善良的人们，一次次给我以理解、宽容和帮助。有段时间，工作上的事情特别多，常常顾不上做饭而胡乱凑乎。女青年卞菊芬为我所虑，力邀我上她家搭起了伙，“全天候”的待遇长达数月；每当上公社开会遇风雨之夜，女会计丁凤珍，不忍我在四里多泥泞的小路的奔波，总会在我家为我支起临时的床铺；我所在的生产队终年靠摆渡过河，终于有机会申请到造桥的项目，只是因我工作的不到位导致计划落空，社员们虽有情绪，但事后仍给我以足够的谅解……

一桩桩，一件件，让我感慨不已，然而，更令我感激涕零的是，上调到苏州工厂以后突然遇到的一件事。1970年的9月8日，距我离开昆山农村才一个月零几天。我和母亲陪患血液病的父亲到苏州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不料因输血时发生溶血反应，抢救不及，父亲撒手人寰。这突然的变故，令我措手不及。按传统应将父亲的遗体运回江阴安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情急之下，我想到了我曾经所在的生产队。那时候的通讯很不方便，几经周折方才联系上。得知消息，社员们都非常吃惊和惋惜。因为几个月前，我父亲还在村里住了半个多月，和村里人相处得很不错。

“这个忙，要帮！”队长几乎没有犹豫，连夜派了三人摇船冒着雨直奔苏州。

然世事未料，因天气太热又经一场大雨，父亲的遗体已经受不起六七个小时的路途折腾。无奈之下，只得取消原来的计划，就地火化。40多年过去了，那三个朴实的农民一身湿漉漉、大气直喘的情景还常常在我眼前晃动。每每想起此事，心里就觉得酸酸的，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任何一种人生的经历，都可能为经历者打开一扇认识自己和社会的窗口。六年的知青生活，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坚韧，什么叫信心。

离开农村，我到了工厂，做了半年的化纤工人。半年后，我分到了《苏州工农报》。又是半年后，我踏进了《新华日报》的大门。初到省报，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主动向领导提出了不当记者的要求。也巧，报社那时正需要一个机要员。这项工作保密性比较强，以收发文件为主，政治清白的我符合条件。然而，四年半以后，我又向领导提出要求，希望能当记者。不是我能干了，而是不想一直清闲下去。当记者是苦的，但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不经意间使我超越了原来的自己：别人能苦，为什么我不能，何况我还下过乡呢？感谢领导给我以机会，让我如愿以偿地到了编辑部。那时，我整30岁，女儿3岁。

省报是人才云集的高地，别人写篇新闻稿似乎轻而易举，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算不上半成品。在我徘徊、困惑、苦闷，甚至想打退堂鼓之际，我想起了在农村时，遇到困难而咬牙坚持，最后挺过来的历历往事。于是，我给自己打气：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上电大、上函大，先后学习了三十多门课程，努力增加知识储备。同时，起早带晚下苦功，力争多采、多写、多练。慢慢地，我终于跟上了趟，有些作品还获了奖。以后，我筛选报刊、杂志发表过的约23万字的作品结集出版，取名《耘踪》。此书，记录了我在新闻领域里跋涉的足迹。主任记者的职称，也算是对我多年奋斗的一种肯定。

省妇联两届把我选为妇联执委，并特邀我参加了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暨世界非政治组织妇女论坛，成为全省唯一的随团记者。我清楚，这与我在农村当过妇女主任有关。因为了解妇女，我比其他记者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也有更多的话语权。在省妇联编写的《倡导四自——扬起女性风帆》一书中，我就担负了有关农村妇女章节的编辑工作。

下乡期间与贫下中农的感情，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日后采访生涯的走向。我到农村采访的次数相对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去东海采写一个大队党支部的典型，我在村里整整住了半个月，几乎走遍了每家每户，写出了7000多字的题为《村魂》的长篇通讯。因为此文反响比较大，当时的东海县委书记吴加庆多次在会上讲，记者为采写一篇稿子，在乡下住这么长时间，太难得了。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当年那个地贫人穷的石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林立、道路整齐。1991年9月初，我再去石牌，品味了丰收的喜悦。通过采访，我了解到技术员出身、公社新的党委书记陆泉兴大刀阔斧改革干部用人制度，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获取到翔实的材料后，我很快写出《砸掉铁交椅，“石牌”变“金牌”》的新闻，在《新华日报》一版头条刊用。文章发表后，昆山县推广了石牌的经验，前往取经者纷纷。

在为第二故乡发展而欣喜的同时，我也常常想起那些曾经同事的人。春节的时候，总要打个电话以示问候。2006年知青相聚时，偶尔听说我们当年的大队书记因妻子生病负债，经济很拮据，我当即决定前往看望。这年，正好是我退休。12月16日，我与同在报社工作的先生一起前往。老书记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惊讶。临别时，我掏出一个装有1000元钱的红包递给他，他激动得连声道谢，并让儿子送了我们很远一段路。他还是那个当年憨厚、谦恭的模样，淳朴是他永远的本色！

经过时光的打磨，一切都在变。不变的是对往事的追忆和回眸。我难忘，那段特殊的岁月；我难忘，那般铭记的情谊！



## 插兄插妹

闵建澄

1969年1月，顶着大雪，我从江阴城镇回武进农村插队。插队地点距离常州城不过5里路，沿城脚下田少人多，没有安排集体插队的常州知青，全大队12个小队只有两个田多的余粮队，各安排了4个男女常州知青集体插队，但各小队都有回乡知青。我们队里陆陆续续来了5位知青，二男三女，其中三位是回原籍，这从姓氏上可以反映出来，我，闵浩文，闵岚，还有两位是来投亲靠友的，都姓王，王小茜，王兰，由上海来插队。其中，我和王兰年龄最小，插队时刚刚跨入17虚岁的门槛。

浩文是第一个插回老家的无锡知青，本来要插到苏北去，父母舍不得，就插回了老家。说是回老家，其实这里仅有一间老屋，原先由堂房奶奶居住，现在让出来一人一间居住。刚下乡时，浩文和堂房奶奶吃在一起，后来不知何故，浩文另砌炉灶单独开伙。一间屋，一隔二，前半间作厨房，进门就是灶头；后半间搁张铺，一桌一箱，外加一张长凳，如此而已。

浩文，我们从小就认识，只是交往不多。人长得很帅，也很能干，待人接物很有一套。身体也很棒，乒乓、篮球、拳击、举重都不错，和我拗手腕，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赢我，还会装半导体收音机，这跟他日后病退回城后进无线电元件厂任厂长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后话。因为离我的老屋仅20米之遥，我常去玩，有时端了饭碗过去走走。晚上，大家谈得晚了就同榻而眠，队里的小



青年有时也来这里啰唆。我们在一起甩石锁、练俯卧撑、举石担。我本来身体很单薄，排队站久了还要晕倒，那个阶段的体育锻炼，为我日后体质的增强，应该说功不可没。我们暇时一起去邻村常州知青处打篮球，去大队的洪福庵小学打乒乓。村里有用解放木头(棺材木头)钉的篮球架，虽然没有一只是合乎标准的，但大家在满是尘土的场上奔走跳跃得很热烈。大队里每年春、秋季节都要举行篮球赛，这给我们单调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亮色。知青自然是球队的主力。

就在我插队的第二年(1970年)夏天，队里开始种双季稻。双季稻的特点是天越热越要种，当时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在赤日炎炎、地皮发烫的中午，我们全在田里栽秧，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当时为了避免晒脱皮，都套着厚厚的长衣长裤)，虫子、蚂蟥叮得人身上痛痒难耐。我脚下踩到一样东西，以为是黄鳝，用手抠出来一看，是条水蛇。大家见了都叫起来，我也忙向旁边甩去。这时候，有人提议去大河里洗个冷浴，凉快一下身子再来栽。我村地处江南水乡，大河小河纵横交错，当时的河水还算清澈，村上这么多人的吃喝洗涮都在河里。提议得到了一班少年氓(小青年)的赞同，大家呼朋引伴，兴冲冲地跑到河边，“嘶咚嘶咚”往水里跳，当然少不了我们这班好动分子，况且都是游泳弄水的好手。有人还从桥上跳下摔“冬瓜”。

不料，那次洗冷浴回来，浩文当晚就发热，体温近40度，赤脚医生来打了针也没见效。大家都很关心，看看不行，第二天就送常州医院，以后就回了无锡，从此再没有回生产队劳动。再后来就到常州棉织十一厂去当了合同工，一直到办理病退回无锡。他人能干，混得还不错。改革开放以后，听村上人说他去办了什么公司，发了，自家还买了轿车。因为不知道他家迁至何处，至今没有消息。在和浩文近两年的交往中，我向他学到不少东西，到底是大城市来的，见过世面，我要感谢这位兄长。每次我回老家，队里人都要向我打听他的消息，其实我也不清楚。

闵岚跟我差不多时间插队，队里5位知青，算她年龄最大。

她是由北京插队回来的，父母都在大学里教书。当时，扎着两条短辫子，白里透红的脸，眼睛大大的，眉清目秀，人也不胖不瘦，身材姣好，是3位女知青中最漂亮的。她已经读到高中，是我们中间学历最高的，一口京语，说话挺悦耳。记得刚来时，赤了脚，在田埂上走路歪来扭去，像在跳舞。挑担时，弓着背，还得用手托着扁担。看她做不来，队里就派她放牛，那是轻活，工分不高，只有女劳力最高分的一半。牛也是那条最老实的豁鼻子牦牛。有一次，放牛回圈时，她用手指着另一条牦牛问人家，肚子底下吊着的是啥东西。惹得在场的人笑得直不起腰，也害得她明白以后，羞得满脸通红，丢下牛绳就逃。从此，这事就作为一个话柄，常有调皮鬼取笑她：“小岚，那牛肚子下吊着的是啥？”闵岚开始还有点害羞，后来混熟了，也佯装不懂，反问道：“那只要问问你自个儿，你肚子下吊着个啥？”对方有时也厚着脸皮，涎着口水问：“你说呢，你最知道哇！”

“我说嘛，跟牛肚子下的玩意儿一样！”

“你见啦？”

“见了！那吊东西，没嘛子两样。”

说笑话归说笑话，乡亲们也手把手教闵岚农活，特别是栽秧，拈秧、移步教了很多次，但终因她年岁已大，学来学去，总不及我们利索。

这样一来，厚脸皮也就红了脸。

闵岚后来跟一位家在常州火车站的大学生谈上了恋爱。那位大学生在家待分配，是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学生。家境一般，父亲听说是拉板车的，因为离火车站近。我们不知闵岚怎么会和他对上象的。于是，闵岚有空就往常州跑，有时放了工也去，第二天再回来上日工，早工是赶不上的了。后来，听说闵岚怀孕后，男方叫她打了胎，再后来，不知怎的，那位男大学生又不要她了，那也许是在闵岚上调无望的情况下，男的又要分配到外地去。为此，闵岚心里很抑郁，好长时间没听到她的笑声，但她也没有死乞白赖地去缠着对方，后来就回到北京去了。我在她去北京之

前，见到她一次，脸色黄黄的，眼睛四周有黑圈，脸色也很憔悴。以后，天各一方，再没见到她。问她的本家，说她随父母去了江西，也不知在江西何处。不过，我还是时常要想起她，因为我同情她的遭遇。

王小茜是由上海闵行插队回来的。大串联时候，闵行我去过两次，主要去参观万吨水压机，当时作为“文革”成果向人们展示的。我们村百分之九十的人姓闵，杂性都是外来的，王姓是由苏北迁来的。她家也仅有一间乱砖砌的房，家中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奶奶。小茜其实也不是她现在的父亲生的，是她亲父死后由她母亲带过来的。她继父在拖轮上跑运输，因为穷，很晚才找到一个已结过婚的寡妇。小茜很文静，平时不声不响，扎两条小辫子，戴一副眼镜，胖胖的脸上有不少浅淡的雀斑，但并不引人注目。有人说她的生父是资本家，“文革”中吃不住群众运动，自杀身亡。她母亲于是执意要嫁一个出身好的，就跟了她现在的继父。我也只是听说，从未听到小茜自己讲过，也不便问她。为什么要去揭人家的伤疤呢？因为她细皮嫩肉，就成了蚂蟥蚊蚋进攻的重点目标。我们那里的蚂蟥也特多，粗的细的，黄的黑的，弯曲着身子，悄无声息地靠近每个目标。小茜白光光的腿上，总要挂着红红的血流，惨不忍睹。有人教她带一只小瓶，里面放些盐，抓到一条就扔在瓶里。但她不敢用手去拉，也只是被动应付，不能阻止蚂蟥们的进攻。后来，我教她下水前，先用肥皂蘸些水涂在腿上，或者搽一层避蚊剂，这样要好些。拔秧的时候，她索性穿了半靴下去，但也不行，防备不严，蚂蟥爬进套鞋，鼓鼓地吸饱了血，掉在套鞋里休养，反而把套鞋染得一片红色。

她跟我们一样，所有的农活得从头学起，农民们也手把手地教她。劳动也还算勤快，只是早工常常不去。下乡不到三年，因为是独女，符合上调条件，她父母就为她办了回沪手续。由此，也就失去了音讯。前几年，我回老家，她家的老屋也早就荡然无存了，故地重游，留给我的还是深远的回忆。

王兰是最晚来的一位上海知青，因为跟王小茜的继父是伯侄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关系，所以投亲来了我队。圆圆的脸，短头发，个子不高，来时恐怕也只有17虚岁，一副小姑娘模样。来的那天，是我摇着水泥船去接她的，应该说是第一个见到她。一只箱子，简单的铺盖和一些日用品。坐在船上，她忧郁地一声不吭，也许是离开父母的愁绪还没有化解。我因为是老家，从小生活在这里，家中有祖父母和叔叔婶子，村上的人也全都熟悉，一点也没有陌生感。而她却不同，对村上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再说又是一个女孩子，自然是有些担心的。王兰没有房子，开始时跟小茜挤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就租隔壁人家的半间屋，聊以寄身。别看王兰人小，手倒蛮巧，织毛衣、勾窗帘之类都会干，还会踩踩缝纫机，自己做条裙子什么的。她见我沒有绒线衣，曾要我买了头绳给她结，但我没钱也不会买，弄件大翻领的球衫穿着，还感到蛮神气的。我们都是平民的子女，父母亲的收入都不高，尤其是我，插队以后，完全要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他们要好一些，家中多多少少给一点，浩文家中每月给他10块钱，在当时就算是“地主分子”了。王兰安顿下来以后，就参加队里的劳动。她人虽小但比王小茜能干，一般不随便缺工，胖胖的圆脸上老是挂着汗珠。拔秧的时候，因为蚊虫多，她就用块布把头包起来，包头布上也就老是湿漉漉的。收工回家，还要用煤油炉自己烧饭煮菜，不像我有现成的吃。她等弄停当，就又要出工了，所以老不得闲着。王兰是1970年冬季时插队的，差不多晚我们两年，那时，浩文已回家养病(病历卡上写的是浸润型肺结核，也不知是否真实)。到1971年，王小茜又按政策回沪，闵岚也时来时不来，恋爱失败以后就回京去了。因此，真正留在队里的就我和王兰，再说我因跑运输，也不大在队里干农活，因此对王兰的情况了解不多。尽管我家和她租住地只隔一面柴场，因男女有别，我很少去她那里，她也很少到我这里来。

王兰应该还是比较孤独的，后来不知怎地要搬出来，另外租房住。据王兰说，房东的儿子常从门缝里偷窥她洗澡。一个姑娘家，无任何隐私可言，确实是非常难堪的。当时，队里社员们的

住房都很紧，找来找去，最后，队会计家隔出一个后半间让她寄身。我说，你不好住到王小茜原来住的地方。她说，王小茜家也只有一间屋，前面搭个灶烧饭，后面半间住着个老太婆，又不是嫡亲的奶奶，住在一起也不合适。我想，她是嫌那个老太婆脏，那个老太患有严重气管炎，老痰不断，王兰又是很爱清洁的。一个姑娘家住在有男人的屋子里，终究有诸多的不便，但自己没房，寄人篱下，只能将就着过。可人家却不将就，女主人的眼睛像防贼那样处处盯着她，特别是男主人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女主人那双警惕的目光中传达出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令王兰浑身如针刺般的不自在。王兰也从来不敢穿着短裤跨出自己的“闺门”，哪怕套着睡袍都不敢。

后来，大队在芦荡里和大河边办起了副业场，养鱼养鸭，种西瓜，栽果树，各队都可以派4人去场上，12个小队就是48人，再加上些头头脑脑的，人也不算少。由于离村有一段路，场上造了十几间屋，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值班，场上的东西都要人看。王兰不顾别人的劝阻，自告奋勇要求到场上去，条件是场上安排她半间屋住。有人长住那里看守，又不要多花工分，场部自然求之不得。队里肯去的人可不多，因为不好种自家的自留地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可是小农经济下农民们的理想王国。所以去的都是些光棍汉、知青，要不就是队里的“三角黄石”，那些干活吊儿郎当的人。因此，我不主张她去副业场，但鉴于她的处境，又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跟她联系其他队里的女知青，申请去场上，跟她作个伴儿，也好安全些。果然，三教九流的人聚在一起，除了头上有帽子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不敢轻举妄动，那些光棍懒汉都想沾王兰她们的便宜，当面说些下流话是家常便饭的了，有些不规矩的家伙说着还要动手动脚，有的甚至一点也不避开她们，扯开裤子小解，弄得姑娘们很难堪。有时，半夜三更来敲她们的窗，或者点一把火在窗下搞恶作剧，害得姑娘们提心吊胆。后来，有人将这些情况反映给公社、大队的知青干部，知青干部又到副业场来关照了场部领导，警告了那些单身汉们，

情况才有所好转。但王兰她们还不敢大意，在房间里备了大棍和小刀，以防万一。

1972年10月，我被选送至镇江地区民师班培训学习，后来又去别的公社担任民办教师，不大回去，有关王兰的情况了解不多。以后，听说她顶替回沪进了厂，因为没有留下确切地址，至今不知她的情况如何。唯一使我内疚的是，在我熟悉的老家，没有给予热情周到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我至今常常忆起她的原因。

现在，我们整个大队都被征用拆迁，全部住进了高楼大厦。这里随着各类机械的轰鸣，都开发成房地产了。在现今名为“世茂香滨湖”高耸入云的楼盘上，已找不到一丝我插队时的痕迹。每次经过这里，我都眼睛涩涩的。在这里，我们的青春已没有一点可以见证的印痕。

(文章所涉及人物使用的是化名)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那年，我十六岁

武明剑

那年，我虚龄16岁，两年制的初中刚毕业，人生得小模小样，在当时的所有插场青年中，我是最小的，乍一看还是个少年。记得到农场报到时，有位南京的插兄开玩笑说，这小孩身上还有奶腥味。当时家中兄妹五人，经济负担重，虽然我还不到下乡插队的岁数，但早点出去自谋生路，还可减轻家里的负担。更何况那时上山下乡的热潮搞得轰轰烈烈，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宣传标语，广播里整天在大力宣传鼓动。我自己还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想先通过插队落户后再去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从小就有的志向啊！

1971年5月20日下午，是我们出发的日子。那是一个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彩蝶纷飞，令人神往的日子。我沉浸在对新生活憧憬和向往的兴奋里，全不顾母亲的悲伤、父亲的沉默和兄弟姐妹的依恋。儿是娘的心头肉，儿行千里母担忧！那几天，母亲为我的远行一直在做着准备，替换的衣服、鞋袜、日常生活用品等，还为我专门做了一些粽子，以便路上充饥。那些天，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常常用呆呆的目光注视着我，叹着气。眼看就要出发了，全家人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父母帮我拿着行李，要送我到轮船码头，峭岐中学的李淑英校长(当时叫主任)也专门来送行。和我同行的共14人，14个家庭组成的送行队伍浩浩荡荡，行走在窄窄的老街道上。轮船码头极其简陋，到了轮船的甲板上，我转



作者初到农场

身朝岸上一看，只见母亲泪流满面，嘴里还在不停地告诫我一定要注意身体，父亲一声不响地站在我的身边。我看着父母和家人沉重悲伤的神情，似有一种酸痛涌上心头，便一溜烟钻进船舱。少顷，只听“呜”的一声长鸣，轮船要起航了，又听得一声哨子声，轮船便慢慢驶离了码头。从此，我离开了生我养我十六年的故乡，开始我漫漫八年在东辛农场的插场生涯。

初去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件是那天晚饭时第一次吃到药芹炒肉丝，因我在老家从未吃过这菜，一股浓浓的药腥味叫我恶心得直吐；另一件事那时确实还小，贪睡的毛病加上一路的疲劳使我一夜睡得像死狗一样，以致清早起床的哨子都没有听到，醒来后一看，临时用稻草铺就的大统铺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四仰八叉地躺着，不知天南地北，还以为是睡在家里，赶紧起床穿衣奔出去，同志们早已端着饭碗在吃早饭了，现在想想真的好笑。

在农忙季节，我除了在连部做些类似文书的事情外，还要参加劳动，如割草、放牛、看青等。割来的草主要是喂牛，那时农场的牛车是主要运输工具，每逢收割季节，一辆辆的牛套车穿梭在田间场头，上千亩的庄稼果实都得靠牛车拉到仓库场上，然后脱粒、扬谷、晒干、入库，再缴给国家。我们连队共有十几头牛，每天的用草量是很大的，割草的工具不是竹编的筒篮和短柄镰刀，而是套着牛车和手持类似大草原牧民的长柄镰刀。那镰刀像一轮弯弯的月牙，刀刃磨得飞快，割草时手握长约二米的刀

柄，利用右大腿和腰部扭转的力量，“刷刷刷”地将草齐齐地割倒在地，然后一捆捆地装到牛车上，堆成一个小山形，再驾着牛车往回赶。这时我可以悠然自得地躺在草堆上，那蓝天白云和高高的白杨林伴随着我，闭上眼睛，哼着歌曲享受一番劳动后的快乐。

看青，除了是一种责任，还有另一番情趣。每个连队都有一二千亩地的庄稼，有人专门看护，一防野兽及飞鸟的侵害，二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其实所谓的阶级敌人也不过是一些爱贪小便宜的农民。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看青是当作一次政治任务来完成的。看青常常是白天我一个人手握木棍转战在广阔的田野，跑累了就挑个没人的地方，头枕草地，面朝蓝天睡上一觉；晚上手握雪亮的手电筒，继续转田头直到休息时回驻地。那时正长身体，又常常缺粮饥饿，有些知青就乘看青的机会，顺手偷些老百姓的白菜、山芋、萝卜、鸡蛋等拿回宿舍煮熟了大家一起分享。特别是鸡蛋，为了逃避“罪证”，他们悄悄地在鸡蛋壳上用针钻出一个小洞，然后都仰起脖子将里面的蛋黄和蛋白吸个精光，再悄悄的放回到鸡棚里。现在想想真是缺德啊，因为那时的老百姓要靠鸡蛋在市场上换取油盐酱醋。一次，下着大雨，路上无人，几个知青便悄悄地游至对岸的苹果园偷了大半蛇皮袋的苹果，回宿舍饱餐了一顿。也难怪，在那个艰苦和饥饿的年代，每月的定粮只有28斤，月工资先是15元，后来逐步加到17元，19元，23元，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日日见长的身体，那点粮食好似木樨花喂牛，那点工资只能扳着指头一点点地花，难得吃只荤菜是最大的享福。

每年的除夕有一顿聚餐，连部就会杀一头大猪，知青都会异常的兴奋，早早地等待着开饭的钟声。一盆菜端上来，十双筷子一齐下，犹似风卷残云，不消几分钟就盆子朝天，连汁汤汁水都扫得精光。

1973年连队分红，我第一次分到113元，这是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得来的一笔巨款，长到那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



小河旁（前排右一为作者）

记得我激动地将钱塞到枕头底下，然后双手护住枕头卧倒在床头，美美地享受了一番。年底回乡，还给妹妹买了一双红布面塑料底的新鞋子，让妹妹在街上风光了一下。后来听说妹妹穿了几天也舍不得穿，藏了起来，非到有喜事时才穿出来。

1974年我当上了营部通信员，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村间田头，很辛苦。每逢下雨天就只能靠自己的双脚步行，有时深夜送加急电报要来回跑几十里路。我当了四年通信员。1977年，连部办了家灯管厂，又调我到厂里当出纳会计，一直干到1979年1月离开农场回乡。

（黄剑宝 整理）

## 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何达源

1967年出现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文艺宣传形式之一。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毛主席、共产党。数年间，宣传队风靡大江南北，席卷全中国，它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68年9月，经历了2年的文革运动后，我们长中的高三毕业生，在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后，就都或“插队”、或“回乡”去了。我也回到了我的老家蒲市大队，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在原河塘公社的10个大队中，我们蒲市大队不但地域广、人口多，而且历史文化底蕴较深厚，代有人才，故有“书香门第”的称誉。

1969年春季的一天，生产队长从大队开会回来，带信给我说，“你明天去大队宣传队报到”。当时大队里的高中毕业生为数不多，另外，我也参加过大队的民兵训练，他们“起用”我，主要是从事一些宣传队的文字编写工作。

宣传队统称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前面冠以单位或“造反派”组织名称。那时，大队的宣传、扫盲等活动都由大队团支部负责。于是团书记就成了宣传队负责人，队员由几个村年轻的文艺爱好者男女10多人组成，年龄最小的是我村上的何英，仅十五六岁。宣传队里的文艺骨干有两个，一个是蒲市里

蔡家原在云南读书、后回乡的蔡树昶，小个子，很精神，有较好的音乐功底，拉得一手好手风琴；另一个是城里人赵倩，一个十分干练、活泼的姑娘，有着极好的舞蹈功底，是我们全队的舞蹈教练和编排。我记得，能和她相媲美的，只有江阴城里“插队”到河东大队的一个叫田翠丽的高挑、美丽而善舞的女孩，同样，她也是河东大队宣传队的台柱子。

宣传队大多利用夜里或者阴雨天排练节目，天气好，则在队里参加劳动，几乎没有缺席的。宣传队没有“编剧”、“导演”，大都是集思广益、一起讨论选什么节目、歌曲，然后自己编舞、排练。排练时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只要大家一致认为好，就成定论。节目主要是表演《毛主席语录》和歌唱“红太阳”的，也有一些切合当时形势、诸如春耕生产之类的节目，大多自编，道具主要是一本《毛主席语录》。表演时，右手握“红宝书”，手举左胸前，就是标准式动作。草绿色的仿军服加一顶仿军帽，腰里扎一根皮带，左胸袋上别一枚圆形的毛主席像章，就是当时宣传队统一的制式服装，也是社会上最流行、最时髦的服饰了。男队员里穿一件白衬衫，但大都是假领头（里边仅是一件汗衫），装装样的。女孩们则就漂亮多了，大都有一件绒线衫（都是手工编织的），并且她们统一颜色，或红或绿，配上统一的白跑鞋或黑面子的搭扣鞋，在那满是草绿、灰色的年代里，就成了令人目眩而难忘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我们蒲市的一律是红绒线衫配黑布鞋，而钱巷上的则是绿绒线衫配白跑鞋，最为抢眼、美丽。

演出的节目，除当时的流行革命歌曲、语录外，大多以本地民间喜闻乐见的锡剧演唱为主。记得我们曾演出过一出《划线》的小戏，是讲农民造房多占集体土地而接受教育的小锡剧，很是精彩，受到了一致好评。我对锡剧的了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懂得了十字大陆调、黄调、紫竹调什么的，然而，也许因先天的因素，一开口就是通俗唱法，终让人好笑，因此，始终没能出师。

那时大队常召开村民大会，会议大都在大队部前的砖场上举



行。会议结束后，就是宣传队演出的时间了，大都在平地上，四周围着村民，男女老少数百人。当时的文艺活动很匮乏，所以看演出成了村民最喜爱的文艺活动了。有时也在夜里演，用木板搭成小台，挂上汽油灯，照得雪亮一片，那盛况远比今日每家每户关在家里看春晚来得热闹。隔天早晨，场上总能捡到小孩挤丢的鞋帽之类。有时大队之间也相互邀请同台演出，规模就更大了。演出同时也暗含有竞技的意思。一次冬寒，我们与河东大队宣传队一起到钱巷大队去演出，真是盛况空前。回家时，恰值暗星夜，大家在麦田里飞奔，只吓得那些女孩在后面直叫喊。我们哄笑着，只得又回去寻得她们，一路相伴回家。

若逢公社重大活动，如征兵等，各大队宣传队就要去演出。公社社会堂不大，台小且矮，只有膝盖高。一次欢送新兵入伍，我唱了支《再见吧，妈妈》，歌词至今记得：“再见吧，妈妈……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我记挂，等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台下那些母亲悄然抹泪的情景，至今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头……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江青推出了8个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杜鹃山》和《龙江颂》。于是，又掀起了学唱、演样板戏的热潮，它成了各单位的政治任务。1970年，江阴全县普及样板戏，通过层层培训，全县各单位迅速建立了1500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唱样板戏。

河塘公社也从各大队抽调文艺骨干组成《沙家浜》剧组，有20多人。也许我编了些快板之类的节目，我奉调参加了剧组。第一次集中，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张湘初主持召开，很是鼓励了一番。我饰演剧中人物赵镇长，负责向芦苇荡送粮，连台词似乎也没有。乐队有好几人，由协进做过道士的老顾掌鼓，他是我们全队年龄最大的，已将近40岁了。

我们用粗纱布染成水灰色，每人做了一套新四军服装，一支拖着红绸布的木手枪。排练由集训过的队员负责，大家都十分认

真，夜以继日，劲头很足。当时京剧和锡剧出现了混唱的变异，在《沙家浜》中最为典型，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一段主唱词就是脍炙人口的锡剧唱腔，很符合苏南地区的口味，至今还传唱不衰。

最有趣的是扮演沙老太的，年仅20多岁，圆脸、大眼睛，额头描上皱纹，头发染成花白色，但一开口仍是清脆的声音，掩饰不了她年轻的本色。因此，只要她一上场，我们就会忍不住笑起来，于是剧组内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演出是政治任务，除了在公社演出外，还要轮流到每个大队演出。演出在晚上进行，由大队负责搭好戏台子。每当锣鼓响起时，吃过晚饭的村民们，拖儿带女，扛着长凳，向戏场集聚。向台下望去，只见人头簇拥，坐的、站的，还有的爬到场沿的柴堆上和大树上，黑压压的一片，秩序是出奇的好，那种场景真是令人难忘。

参加宣传队是不发工资的，无论在大队或公社时都是记误工，到年终由大队或公社按工价下拨到我们生产队，由生产队记工参加分红。因为宣传队员连阴雨也记误工，所以我们一般比队里的劳力会多上些工分，因此，我们也成了队里人很羡慕的对象。

《沙家浜》剧组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巡回演出结束后不久，就解散了。公社里对我们剧组的男队员是很照顾的，尽量安排了我们的工作，把我安排到粮站去做司磅员。于是，我又成了河塘粮站的一名临时工。

转眼40年过去了，但文革中我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往事却依旧清楚记得，如在眼前。

## 我的下乡之路

谢 愉

打开尘封的记忆，从心底流过的岁月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68年10月，我刚从高中毕业，与另一位知青一同被安排插队利港。那天上午8时许，我们被欢送到黄田港码头，准备乘船到利港，岸上震耳的锣鼓声欢快地敲击着，大红的标语赫然写着“热烈欢送知青到农村去”。我的心有点酸，强挤着笑容和送别的亲人们一一道别。

船缓缓地起锚了，激起哗哗的水声，冲淡了喧天的锣鼓声，船沿着长江边上一片又一片飘白的芦苇滩，飞快地向利港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进发。

船内似乎很安静，没有谈笑声，都各自低着头想心事，然而一声悲切的哭声响起来，这低沉的悲鸣声似乎触动了大家的神经，许多女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那伤心的痛哭声像决了堤的潮水顿时在船舱内此起彼伏，伤心的哭声在四周飘散开来，是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还是割舍不下相依生活了十多年的家庭和父母，我不得而知，而此刻的我心中何尝不满含着离别的辛酸呢？因为我的家已经破碎了，年仅48岁的妈妈不久前生胃溃疡死于无锡二院，姐姐两个月前刚刚出嫁，弟弟同时分配插队到苏州吴县，而我的父亲则远在千里之遥的兰州。我完全明白，自己就像失去了巢的小鸟，今后的人生之路要靠自己去搏击、飞翔……

当我刚踏上利港这块热土，脑海里的第一印象是，利港是个穷乡僻壤。我所看到的是白茫茫的芦滩，低矮的茅草房，没有烟囱、没有高楼、也没有像样的街道。然而利港人的淳朴和热情却像烙印般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那天生产队来领我们，一见面，浩华队长就热情地自我介绍，告诉我们说，欢迎你俩到我们生产队来插队，今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有什么难处就尽管告诉我……坤大会计则主动抢过我手中沉甸甸的行包，他们簇拥着我俩，在一片欢快的锣鼓声中向缪家村走去。此刻的我，内心所感受到的是难以言表的亲情。

## 在插队的日子里品尝艰辛

我插队的时候，恰逢秋忙开始，下乡的第二天，我俩便随队劳动了。那天早上，东方还没有破晓，大地还沉睡在黑沉沉的夜幕下，一阵尖利急促的哨声便早早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这哨声告诉我要出早工了。带着还没有消净的疲劳，揉揉惺忪的双眼，我急忙起身，胡乱的几把火把早饭烧好。哪知近两个小时的早工回来，早已饥不择食的我打开锅盖一看，粥竟然没有烧熟，米依然是生的。无奈之下，我俩只有一路小跑，去镇上买点早点充饥，可还没有等我们吃完早餐，出工的哨声又再次在耳边响起。

秋忙中，最繁重的要数挑稻了。记得我第一次去挑稻，望着别人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虎虎生生的来来去去，可对于肩头从未挑过东西的我，却犯了愁，总不至于不挑吧，我强打精神试着一头挑起6个稻捆头，跟着其他人向场上走去。哪知稻田离打谷场有好长一段路，刚走了二十多步我就觉得肩头似乎有千斤石压得我气喘吁吁，汗流浹背。我想在路边歇一下，但挑稻是不允许歇的。望着渐渐离我远去的别人，我只能咬紧牙关，弓着背，弯着腰一步一步向打谷场走去。晚上，睡在床上，两个肩头又红又肿，痛得我碰摸不得，而我的胸膛、脊背骨似乎要断裂了……

那时为了增加粮食产量，种双季稻，突击搞双抢，劳动强度

特别大，早上五点钟就得蹲在水田里拔秧，午后，则半天弯腰在水田里莳秧，炎热的骄阳火辣辣地炙烤着我的背，可怕的蚂蟥一次次地叮上我的腿和脚。蹲在水田里久了，两眼发花，头又沉又晕，手臂酸疼得抬不起来，可我还得咬紧牙关苦苦地支撑着自己，心中只是急切地盼着能早点收工。

那天收工很晚，天早已拉上了黑沉沉的夜幕。我不想吃东西，只是浑身软瘫着躺在床上。突然窗外电光闪闪，沉闷的雷声滚滚而来，霎时，风狂雨猛。望着昏黄中不停地摇曳的灯光，看着一道道可怕的蓝光在眼前掠过，听着一声声令人心惊战栗的炸雷，我的心中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恐惧。艰苦的生活使我实在失去了再支撑下去的能力，我的精神近乎崩溃了，想逃回城去的念头不止一次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然而，最终我战胜了自己，因为我清醒地明白，回去了，今后怎么办？人生之路又在哪里呢？几个月后，我终于慢慢适应了这块锤炼我成长的热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也开始适应了这里多种多样的繁重农活。

在插队的日子里，我特别忘不了村民给我的悉心关怀及照顾。队长的母亲担心我吃不饱，常把煎好的热乎乎的油饼给我送两个来；出工了，怕我们吃不到热饭菜，常常抽空帮我们俩烧好饭菜，还特意为我俩炖上一碗蛋汤；脚扭伤了，四处为我找樟木叶，戴着老花镜亲自揉碎了为我敷在脚上……村民们的关怀让我真正感受到这里有亲人般的爱，有家一般的温暖。

## 在社会的大海里勇于游泳

一年左右的时间，在生活上、劳动上、情感上，我终于和村民们融合在一起了。在生产队里，我担任了民兵排排长，在大队我担任了第一任拖拉机手。大忙的时候，我不分日夜和陆小甫两人整天开着拖拉机，为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翻耕打田。虽然每天弄得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但我乐此不疲，浑身似乎有使不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完的劲。当大队需要搞文艺宣传的时候，虽然我自知没有艺术天分，但我没有一丝犹豫，一口应允担任大队文艺宣传队队长，拉起了由24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那时大家演出的热情十分高涨，在江阴锡剧团同志的热情指点、引导下，我们居然编排了一台又一台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我们用轻快的舞蹈，欢乐的歌声，为贫下中农带来了生活乐趣和欢笑。当大队开展政治运动时，我又热情地参加了公社、大队的材料组，日日夜夜找人写材料，内查外调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在大队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学会了在社会这个大海里勇于游泳，学会在时代的熔炉里不断地锻造自己，我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赞许。公社知青办推选我作为知青代表出席了全县群英大会，当我随着各镇的群英代表步入江阴人民大会堂参加庆功表彰大会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份荣誉来之不易……

## 在教学的园地上默默耕耘

1972年2月，我被大队推荐当了一名代课教师，被分配到朝阳小学担任语文教学。为了上好第一课，我整整一夜没有睡好觉，反复思量这一课怎么上，教案写好后满以为会得到大家的好评，谁知一堂课下来学生反映听不懂，教师反映讲得太深奥，显然这一课失败了，我不禁有点泄气，那是我几天几夜的努力啊！这时缪进行校长及时鼓励了我，肯定了我教学上的认真及热情，也指出我存在的问题。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吃透学生这一头，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症结找到了，我又找回了信心，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经常听他们的课，和他们探讨修改自己的教学方案，在周巧英、孙秀云等教师的指点关怀下，我终于走出了教学的困境，迈开了教学生涯的第一步。

在以后的二三年间，我分别在东风小学、徐市小学任教。从1974年开始，我被调到徐市中学任教。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



平，探求新的教学模式，我勇于接受片公开课的教学任务，在李彪、徐瑞堂等教师热情指点下，我终于成功地在澄西片完成了《爱莲说》这一课公开的教学，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作为一名只有高中文化的教师，我深知自己知识的浅陋。为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我努力克服教学上的繁忙、家务生活的琐碎，从1978年6月开始，参加了语文函授。四年来，我坚持风雨无阻，从不缺课，1982年7月我终于领到了江苏师院颁发的高师中文函授毕业证书。

从1993年开始，我被调到利港中学任教，一直担任初三两个班语文教学。为了教好毕业班，我辛勤耕耘，努力拼搏，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第一线，在这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一次次品尝着失败后的苦涩，同时也分享着成功后的喜悦及甘甜。当我的学生刘斌欣喜地告诉我，他以618分的高分考取北大的时候，我的心中涌动的是作为一名教师特有的幸福和自豪。

从教36年来，我一直担任语文教学，我爱好文学，特喜欢读高尔基写的《海燕》，喜欢吟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喜欢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语文这块生机勃勃、芬芳飘香的园地里，有我不息的生活激情，有我精神上永恒的寄托和追求，她是我咏唱生活赞歌中一道道充满灿烂阳光的风景，是我多姿多彩生活中寻求欢笑的乐园。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语文与我结下了解不开的情缘。

从教36年来，有22年我担任班主任工作。我爱护我的学生，关心他们的思想、学习、生活，关心着他们的成长。有多少休息日，我登门家访；有多少个白天我挤时间和他们谈心；多少个夜晚我伏案思索，怎样才能把班级工作搞得更有声有色。当董雪梅同学毕业后写信给我，向我反映曾在班级中发生的、至今依然留在她心中的委屈时，我深深感悟到教育学生需要有耐心，需要尊重，需要有一颗呵护的心……

22年的班主任工作，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我付出了我的心血和汗水，数次荣获江阴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主

任的称号。

## 在夕阳晚照的日子里放歌

2004年12月，我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离开了我讲演了几十年的讲台，回到了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生活一下子平静了许多，然而我依然追寻生活的梦。

如今，我拥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市供电局工作，儿媳亦和我一样，当了人民教师，在市二中教书，孙子在城中实验小学读二年级，我和老伴相濡以沫，共享着和和美美的晚年生活……

我的下乡之路是一条漫长的路，因为它让我承载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的下乡之路是一条洒满阳光的幸福之路，因为它让我在这条路上经受锤炼和考验，它让我在农村这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搏击风云，茁壮成长。

有位名人说过：“人生当是一次充满挑战的长途旅行。”我赞赏这样的人生观，生活之舟不应完全停泊在宁静的港湾，我们要将生活之舟驶入生活的大海，在与生活风浪的搏击中，用自己平凡的劳动，去拥抱生命的精彩与美丽。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岁月如梦

章文照

1968年—1978年的10年间，全国共有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其中大中城市的知青多数去了离家千万里的西部、北部地区，中小城的知青主要在本省、本地区安置。多数知青安置在农场、林场和建设兵团，还有不少知青直接插队落户到生产队，后期主要是安置到知青点。每一位知青、每一个知青家庭都有着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和故事。

我是千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员。1966年夏，我于江阴县中学初中毕业，准备报考高中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经历了两年多的停课闹革命后，于1968年10月，进入了首批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行列，插队落户于江阴县西石桥公社苍山大队第七生产队务农，那一年我17岁。

岁月就像流水，流过去了不可能再回来，而我对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有着太多的感慨和回忆。那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岁月，40多年过去了，还是那样清晰，是苦、是甜、是酸、是辣，个中滋味，我和千万上山下乡知青一样，难于言表。八年的知青插队岁月是一段经受磨练、影响和改变自己一生的如梦岁月。

我回忆和记叙了自己插队落户时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故事，以期能从微小之处或多或少地反映这段难忘的历史，让我们的子女和后人或多或少地了解这段难忘的历史。

## 1. 落户苍山大队梅家村

西石桥公社苍山大队第七生产队原叫“梅家村”，我的父母亲考虑到姐弟两人最好能在一起，相互有个照顾，向居委会提出了请求，居委会同意我们姐弟两人都到西石桥公社插队落户。

1968年10月6日下午，我与姐姐背起了简单的行李，在西门车站集中，乘卡车赴离县城西面三十多里远的西石桥公社。到达西石桥公社后，我们的行李卸在公路到街上的路口，300多位知青步行到公社大会堂集中，由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公社知青办俞老师宣读分配决定。俞老师刚宣读结束，就引来一片哗然，很多知青对分配不满意，特别是分到边远大队的知青，认为分配不公。我被分配到前周大队，我二姐分配在苍山大队，我们也不满意，向负责人提出分配在一起的要求。俞老师也非常为难，无法使大家都满意。后来俞老师通过与大队、小队来接收的干部商量，同意我们知青如有意见的，可直接与大队、生产队干部商量，只要落实接收单位，公社可以做些调整。我和我姐找到了苍山7队的队长，告知了我们的情况，他们同意我到苍山7队插队。另外几位相熟的知青愿意在一起插队，也去和苍山其他生产队的



部分苍山大队知青合影（章文照提供）

领导商量，得到同意。这样我们一行就在天黑时光，领取了自己的行李，随着前来迎接的队长、社员们来到了公社北面的苍山

大队。我和二姐就落户于苍山大队梅家村。

苍山大队共有7个自然村12个生产队，这次有6个自然村中的7个生产队接收了共24位知青。

## 2. 中秋晚餐

离开公社大会堂，苍山7队的孙国民队长和8队的梅庆荣队长带领社员挑起我们的行李，我们一行9位知青就在初起的月亮中跌跌撞撞来到了离开公社北面近4里路的苍山大队梅家村。

梅家村是一个东西向的自然村，东面是8队，西面是7队，梅家村因梅姓为大姓并较早定居而得名。

我所在的7队有梅姓6户，孙姓4户、王姓2户，其他陆、裴、张、邱、彭姓各一户，共有近100名社员，148亩农田。8队和7队联在一起，除梅姓外，主要是范姓、江姓人家，人口和土地情况相差无几。村中除梅、范、江姓有一些像样的瓦房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泥墙茅草房，村中没有通电。

由于知青的到来，7队8队的领导已责成7队的两家批斗对象腾出4间正屋的南半边来临时安置我们，这是村中最好的房屋之一，在7队谷场中央的北面。三位女知青就挤在西面半间屋中的一张大床上，我们六位男知青就住在东面二个半间用门板搁起的床板上，每间三人，还有西面的半间是大门，并计划在靠北处砌一付灶头。

匆匆放好行李，队长就领我们去吃晚饭。这时圆圆的月亮已经升起，1968年10月6日正值是中秋节，这一天我们没有在家中和父母亲团圆，而是来到了陌生的梅家村。队长将我们9人领到7队队委王杏生家中，一进杏生家的大门，就见厅上摆着一桌酒菜，我们顿时激动，心想社员们真好，刚到就有酒菜款待。但队长却领我们去后面灶边的另一张小桌子上，有几样蔬菜，有西乡特有的中秋芝麻薄饼和西乡特有的粢粉粥。原来前面的酒菜是杏生“搭会”筹钱准备结婚而请客的，与我们无关。我们已是十分

的饥饿，大家狼吞虎咽，吃到了下乡后第一顿中秋晚餐，虽没有吃到酒菜，也是十分的香甜。

### 3. 添置农具

当时，每位知青插队都有一笔安置费，大概总额在280元左右，这笔钱是给生产队专款专用的，包括我们半年的生活费，大约8.5元一个月，用于购买定额口粮和食油。分配每三人一组的生活用具——马桶一只、木澡盆一只、木脚盆一只，每人一张竹榻、二只三角竹架，再就是农具添置，另外最重头的是每位知青有半间房屋的建筑材料费，主要包括砖、瓦、木料、毛竹、钉子等等，这些物品都在安置费中开支。

安置好我们9人的临时住所后，队里就派人陪我们去西石桥街西北的生产资料部领购分配的物品。我们的这些生活用具中，马桶、澡盆、脚盆、竹榻等能马上拿到，而建房用的材料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逐步领购。

领购了生活用具后，队领导又为我们每个人购置了必要的农具，每人一把钉耙，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条扁担、一副担绳，一对粪桶、一对簸箕等等。对这些工具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年学校都有“支农”，多少接触过一些，但每个人抱着自己将拥有的工具，都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惆怅。

队领导还为我们9人选购了两只大锅、一只汤罐和火钳、菜刀、锅铲和碗筷等，回队后马上在我们临时住所的西二大门北面砌了一副灶头，我们需要自己开伙仓了。

### 4. 年轻人相交相融

我们9位知青来到梅家村，引起了社员的很大关注，毕竟我们是城里人，穿着打扮、谈吐礼仪、生活习惯都与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刚经历两年多的文革运动，我们有了许多故事，也有着



很大的活力，因此许多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农村知青和社员都主动和我们交往。晚上经常有不少青年人来到我们居所，议论、争论，不亦乐乎，我们很快和村里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如7队的小洪、盘根、阿华、杏云、美秀等，8队的小玉、定荣、又根等，都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

我队的盘根比我大七八岁，是一个上门女婿，他是个泥水匠，在村上他是个象棋高手，我们插队下来的第三天就到我们的住所来下棋，我竟然侥幸连赢他三盘，他摸着脑袋连连讲“怎么会的？怎么会的？”因此我们也就成为了铁杆棋友，农闲和晚上经常在一起较量。

7队8队的收割场在村的中央，两个场地相连，当时农村时兴篮球运动，场上有两副篮球架子。村里的一批年轻人都喜爱这一运动，一天他们邀请我们知青来一场友谊赛，他们是身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六位男知青中，一个是腿脚不好（不久就病退回城了），一个是从不玩篮球的，盛情难却，我们只能是赶鸭子上架，勉强整队出战，结果是大败而归。

农村的年轻人，对我们知青的帮助很大，在生活上、农活上都是我们的老师，而后我们和他们在一起捕鱼捉蟹、打狗网鸟、赶村看电影、打牌下棋、走村串户，这让我们在艰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快乐。

## 5. 9人一顿要吃9斤米饭

我们下乡后的第三天，就开始独立开伙仓，我们9位知青的米、油都放在一起，另外有一些上街买菜的钱也集中在一起。我们采取了轮值制，每天由一位知青负责烧饭。早晚是粥，中午是米饭，负责烧饭的人每天很早起来烧粥，每人3两米左右，其他人可睡晚一些，起来吃了粥上工，中午负责烧饭的人在10点左右提早回来烧饭，每人半斤米的标准，晚上也是提早回来烧粥，每人3两左右，提早回来的时间，队里不扣工分。

我们刚下乡的时光还属农闲，过了几天就开始割糯稻了。糯稻种植的面积都很少，因为糯稻产量低，只有450~500斤左右，而粳稻产量要高一些，一般可达750~800斤左右。糯稻虽然产量低，但属早稻，可将农忙时间分散一些，再则春节的糕团、自酿的米酒都需要糯米，所以每个生产队都会种一些。割稻的农活我们都比较熟悉，每年支农时都做过，只是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得厉害，捆稻要学一下，但也不是很难，但要捆得好，捆得快就要用心了。男知青还要挑担，一担重量在130~140斤，捆得好的担子，挑起来一晃一晃，每捆上面两个更是一跳一跳，煞是好看，这叫凤凰担。开始时我们是挑7层的担，逐步加码也挑9层的担了。

随着农忙开始，劳动强度加大，消耗增加，饭量也增加了，一天到晚感到饥饿。大家一起商量要增加每顿粥饭的数量，不知不觉，中午的米饭从5斤米逐步增加到6斤、7斤、8斤，直至增加到9斤米的数量，仍是一顿吃光，三位女知青也毫不逊色。那时候的米也是十分的好吃，是武农早和农林36的品种，一斤米饭也就是一碗半饭，毫不费劲地吃下去，只是由于口粮只有这么多，只能控制好上限，一顿饭吃到9斤米之后就没有再敢往上添加了。

## 6. 搭伙吃猪头肉

1968年的秋收秋种，公社要求各生产队从10月下旬开始，在12月10日前种好麦子。那时候我们7队有148亩水稻田，都种了水稻，这些稻收割后，除有30~40%的可种植油菜和红花草外，都要种上麦子。7队没有电，没有拖拉机，只有一头老牛，这头老牛又要轧稻（一种木制转盘，牛拖着转动木制齿轮，带动皮带连接轧稻机轧稻），还要耕地，十分辛苦。农忙时社员们都要开早工、打夜工，早工是割稻，夜工是男的挑稻，女的轧稻，除牛拉轧机外，还有脚踏轧稻机。

那一年是湿年，农忙时经常下雨，对种麦带来很大影响。种

麦先要垒田，用钉耙把地一块块翻过来，然后是落耙，把大块的泥块弄小，将麦子撒上后，用锄把泥块再削小，将麦子掩在土中，十分费工、费力，加上下雨地湿土粘，生活很难做。那一年，我们知青和社员都是脚上冻疮、手上开裂，十分艰苦。

好不容易种好了麦子，大家稍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又是开沟清沟。开沟主要是手上的劲，要用铁锹左、右裁一下，再在中间掏出一块，扔到麦垅上，一天下来，手上满是血泡，晚上将泡挑破，第二天用布扎了再挖。沟深6—8寸，后来发展到要1尺2寸。

12月下旬，我和社员们一起开沟清沟，忽然有一个社员在挖沟时触到一块木板，大家知道，肯定是有一口棺木在此。当时农村中都是土葬，每家的先人去世后都是葬在自家的土地上。合作化以后，特别是成立人民公社后，土地归集体所有，并且进行了连片整理，整理过程中，很多坟墓被平整了。有坟主的家庭将祖辈棺木挖出，先人遗骨另行安装，而棺木就由后人利用了。造房子用的椽子、搁板、农具，甚至家具都有用棺木做的。由于长期埋在土中，这些木头是潮湿的、黑灰的、有气味的，但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一件可利用的宝贵财富。

这次我队社员触到了一个棺木，大家聚在一起，回忆证实了是无主的棺木，大家决定将它挖出来。这是一口杉木棺木，质地一般，年代也久了，挖出来后，马上有一位社员愿意花5元钱将它购买，大家同意了，队长宣布这5元钱不入队里的账了，由男的全劳力搭伙吃一顿。所谓全劳力是指出勤一天拿10分工的劳力。我们5位知青插队后，队里讨论，我们第一年的工分比值是8折，即队里的男全劳力是10折，劳动一天得十分工，如开早工，打夜工另加工分，而我们是得他们的8折，同样劳动一天得8分工。而女社员的全劳力是男全劳力的8折，两位女知青是女全劳力的8折，即是男劳力的6.4折，记工员每天计工都是按10分工计分，到年终时累计后再按折率折算成实际工分。第二年评工分时，我们知青大都升为10折，也有个别只评到9折。我们三位男

知青当时还不是全劳力，但也列入可享受此待遇的人。队长马上委派两位社员半夜就到西石桥街上的肉铺上排队，购回一只猪头，当时猪头是0.36元一斤，5块钱购得10多斤重的一只猪头。第二天晚上我们男劳力约20人就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猪头肉，那个味道太美了，大家吃得畅快淋漓，兴奋异常。

## 7. 谷场飘起了知青的琴声

和我一起插队到梅家村7队的一位男知青张覃彪是一中的学生，家住城内大毗巷，和我家只相距2个门牌号。他喜爱音乐，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下乡时带了一把小提琴和口琴等乐器，休闲时拉拉琴，自得其乐。他为人腼腆，不喜爱热闹，女社员尤喜欢和他开玩笑。

农忙开始了，社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劳动。一次队里白天收稻，男社员挑了稻往场上送，女社员在场上轧稻扬稻。当我和张覃彪挑担到了场上，不知哪一位女社员提出请张覃彪为她们演奏，女社员都赞成，我们男社员也起哄叫他上场。拗不过大伙的盛情，他回住所拿出小提琴，站在谷场的北边房屋边，面向大家拉响了小提琴。“白毛女”、“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一首首美丽动人的旋律在秋日的谷场上空飘扬，拌和着轧稻机的转响和扬谷的沙沙声。社员们拄着扁担、吸着旱烟、嚼着山芋、凝神细听、不断鼓掌的场景，形成了一幅“秋日谷场美景图”，这幅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可惜我没有水平能将它画出来供大家回忆欣赏。

## 8. 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中传达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

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们知青插队后，大队革委会也经常组织知青学习交流。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在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下，都是要求进步积极工作的，但由于当时极左的思潮影响，不能敞开思想来学习交流，只能是形而上学地学习。记得有一次知青在一起交流学习，我悄悄地与旁边稍年长的知青说，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我有些想不明白，如果说是发展到了顶峰，也就是说不会再发展了，这好像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吧。这位知青兄长很紧张而又善意地说：“文照，你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出去瞎讲，当心有人打击你。”从此我也就很注意了，少讲少评为好。

我们梅家村9位知青，虽然是在两个队，但第一年还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时是要“献忠心”的，每天吃饭前，我们9人都要站成一排，面对墙上的毛主席画像，集体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后才能用餐。这样的情景延续了好几个月才结束。

转眼过了1969年元旦，这时是农闲期间，农活主要是麦田敲麦、清沟、积肥等，不是十分紧张。公社要求各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农闲期间，通过文娱的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迎接党的九大召开。苍山大队革委会也要求大队成立宣传队，由团支部书记组织落实。宣传队员主要从知青中挑选，再加上一些本地知青，规模在15-20人左右。

我们24个知青中有近半数的人进了宣传队，再加上本地知青邱林保、孙丽华等，大约有十六七个人。宣传队员集中到汉墩头村的小学内，集中住宿、伙食，紧张地排演节目。没有老师和指导员，我们是自编自演，以原来在校时的文娱骨干为主，我是属跑龙套的角色。张覃彪、匡立伟、章乃洪负责乐器，我二姐章文耘是骨干，有独唱和领舞的任务。紧张地排练了半个月，大约10来个节目，有歌舞表演“喜迎九大”，我记得歌词有这样几句：“长江滚滚向东流，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啊迎九大。”有独唱、男女声小合唱、大合唱、表演唱“唱支山歌给党

听”等等。春节前参加了公社的汇演，在西石桥公社大礼堂内多支宣传队进行了演出，苍山大队的宣传队属中档水平。后来又在大队进行演出，在大队部旁边的农田中搭了一个舞台，各村的社员都来观看。我们十分用心，表演很成功，只是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表演一个歌舞节目时，一个身体重量级的知青将一块台板踩断，脚陷了下去，引来一阵哄笑，但未影响整个演出，反而为演出增加了气氛和笑料。

期间，宣传队还连续几次串村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一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宣传队就敲锣打鼓到各个自然村，大声宣读毛主席的指示，高喊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口号。有一次是夜间，我们冒着雪，串遍整个大队，很辛苦，但更多的是兴奋。

## 9. 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苍山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集训和演出到春节就结束了。插队后的第一春节——1969年2月17日，我们没有回江阴城内与家人团聚，而在苍山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夜，我们简单吃了年夜饭，就敲锣打鼓去各村各户转了一圈。第二天年初一，我们回到村里到各家各户去拜年，社员们非常热情客气，我们的口袋里装满了花生、蚕豆和瓜子，我们被拉到各队的社员家中喝酒，一直沉浸在热闹和兴奋之中。

年初二，我们决定回江阴城家中。西石桥公社地处江阴城区与常州城区的中间位置，距江阴和常州城区有三十六七里路，澄常公路在西石桥街区北面300米经过，路北有一个两间屋的公共汽车站。车站上只有一个姓袁的50多岁的老站长，每天也仅有6-7辆汽车往返澄常之间，到江阴的票价是0.41元。票很紧张，但并非买到票就能上车，而要看在西石桥站有多少旅客下车，下得多即能上得多，如果车辆客满而无人下车，则有票也无用，只能顺延到下一班再上。我们一行有十几个人，想坐汽车一起回江阴



是不大可能的，加上节日期间往返客多，更不可能一起坐车回去了，大家一致决定，步行回江阴。

1969年的春节期间，下了几场雪，年初二这一天雪还没有化尽。我们一行十几个年轻人，尽量轻装上阵，排成长蛇阵沿着澄常公路的右侧，快步行进。不时几个人聚在一起开开玩笑，推推搡搡，不知不觉，3个多小时就走回了江阴县城。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黄山部队到苍山大队“支左”的两位班长。到江阴后，有几个知青先回家了，还有的人一起到通江路林耐伟家中吃了中饭。饭后我们一起到城内映红照相馆拍了合影，照片上的十一位年轻人佩带着毛主席纪念章，显示出朝气，也略带着羞涩，照片上题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69.2.18”。这是我插队近8年中唯一留下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拍照后，两位班长返回部队，我们知青朋友就开始相互间的拜访，下午是在我家相聚吃饭，年初三到年初六，我们就轮流到各家认门、吃饭。父母亲们看到我们这样团结友好，都非常高兴，希望我们在今后的岁月中能互相帮助，互助照顾。这样的活动加深了我们苍山村知青间的感情和互助，直到现在，我们仍像兄弟姐妹一样的来往。

## 10. 学习农活，做一个合格的社员

1969年的春节过后，我们陆续回到生产队中，开始认认真真地务农。我们苍山大队的24个知青表现都很好，没有一个长期呆在城里不干活的，也没有经常东游西荡、偷鸡摸狗的。

农村里各式各样的活计很多，虽然并不是很难学，但要会做，做得有模样，做得好，需要虚心学习，辛勤去做才行。有几样农活至今印象很深：

搓绳。农村里许多地方需要草绳。生产队里主要需要秧绳，就是在蒔秧的时候，用来规定和限制每人蒔秧间距范围的绳子。一般的地块需要用长度50-60米以上的草绳，每个生产队需要这样长度的草绳70-80捆。当时还没有尼龙绳，只能自己搓草绳。

到了1972年后有了尼龙绳，而且种了双季稻，大家学华西莳秧方法，在尼龙绳上固定好行距、间距的标记，由2个人拉一根有间距标记的尼龙绳在水田的两边按行距移动，社员们就根据绳上的标记莳秧，这样莳的秧整齐划一，煞是好看。社员成了插秧机，但效率极低，与现在的插秧机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后话。不仅队里要草绳，社员家也要用草绳。西石桥还有做芦花靴统的传统，除自己穿外，还可上街去卖，0.5-0.6元一双，是一项副业。还有的社员会做蒲包，就是将池塘边的蒲草晒干后，在农闲时做成蒲包，蒲包用途非常广泛，是当时的包装箱、包装袋。搓绳的稻草，以及做蒲包用的蒲草，都要经过“打熟”的过程，一般是在地上置一块半圆型光滑的青石，将需要“打熟”的稻草、蒲草等放在上面，再用直径15-18公分的木质榔头用力敲打，不断翻身敲打，直至稻草、蒲草柔软而有韧劲为好。“熟”好了稻草就可搓绳，左右手上下搓动，边搓边续草，搓得好的人又快又匀又牢，不会搓的人不仅慢，而且粗细不匀，到田里两个人隔几十米用力一扯就会断。我也认真地跟他们学习，手上搓到了起泡，而且十分枯燥，但好歹也算会搓绳了，绳子质量可达中等水平。以后的几年，都要搓上几捆给队里交差。我也曾自己编织过多双草鞋，夏季穿着草鞋在田埂上挑担、行走，既轻便又合脚，很实用。

车水。我们队里有一架水车，当时大队里有电力站和水渠，种植水稻时不必用水车车水了，但由于生产队还没有通电，加上做小块秧田、干河积肥捉鱼，还是需要用到水车的。在用水车时，我也就跟着老把式们扛起各个水车部件到河边，然后进行安装，再跟着踩水车。我是很想踩好的，但越是想踩好，看着下面的踩脚，越是踩不到位。在老社员的指教下，稍稍能跟上去踩了，但总是有人跟你开玩笑，忽快忽慢，我就经常会“钓田鸡”了。好在使用率并不高，在1970年秋季通电后，水车就不再使用了。

打槌枷。槌枷板是一块由几块毛竹条拼在一起，长约30-35

公分，宽10多公分，厚在1.5~2公分，用牛皮捆紧的竹板，一头有一个竹钉，连在一根一人多高的竹竿上，可在拍杆头上翻转，人们上下挥动竹竿，这槌枷板就随着翻转，当竹竿下到地时，槌枷板正好平面与地上物品接触，人们用它为麦子、油菜、各种豆类等脱粒。但要使槌枷板每一次能平面触到地面的物品，也是需要技巧的。开始时，不得要领，往往只有槌枷板的一头到地，把场地磕去一块土；有时槌板不在竹竿上翻转，卡住了。练了好久才能勉强应付。这种活一般是女社员干的，特别是夏季，麦子收割送到场上，铺开了晒干，由妇女队长带领一批女社员，一字排开，同时翻拍。只见竹竿上下翻动，听着“噼啪噼啪”的声音，尘土飞扬，一排人动作一致，不断移动将地面铺晒的麦子逐一拍完。然后放下槌枷，收起麦秆，清扫被拍下的麦粒，再将另一批麦子铺开吹晒，这时可稍稍休息一下，再来下一场战斗。我也学会了这一农活，后来自留地上的麦子、黄豆等都是自己用槌枷来脱粒的。

耨稻。稻秧插下去成活后不久，就要耨稻。耨稻是手持稻耨在水稻的行穴间推耨，使田中杂草脱落泥中，有利除草、松土，促使稻秧根系生长，但如掌握不好，会损害到稻秧。耨稻是在一柄长竹竿上装有一块长约30公分，宽约10公分，厚约3公分的履形木框，下置耙齿。每次耨稻，我们都像出征的战士，带着长柄武器，到田中排开，一起用力左右来回与“敌人”厮杀。

绣花。或叫“做花边”，这是当时农村中妇女增加收入的一种副业。由公社的花边站向妇女发放花样、白布和锦色线，妇女们拿回来后，先在布上用复写纸将花样描印在布上，再用圆的竹框绷紧，用各种颜色的锦色线绣出，绣好后再交给花边站验收，获取一定的劳务报酬。花边站再将这些绣好的花布加工成枕套、台布、桌布和工艺品。我的二姐也向女社员学习绣花，因晚上没有电灯，在油灯下又看不清，她们就成群结队到电灌站去，二三十个人挤在电灌站的灯光下绣花，有说有笑，很有乐趣，一直要到深夜才回家。

农村中所有的生产和生活的技能，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学会了垒田、种麦、割麦、撒灰、蒔秧、耖稻、耨稻、治虫、铡牛草、开河泥塘等等农活；学会了种植山芋、油菜、花生、黄豆、芝麻和各种蔬菜；学会了养鸡、养猪；学会了烧大锅饭、烧细粞粉粥、做水笃饼、油摊饼、做山芋粉丝、做手擀面、做米酒，学会了腌制各种蔬菜。掌握了这些生活和生产的技能，我们就成了一个合格的农民了。

我们还曾背纤拉船到公社粮站运送公粮，到江阴化肥厂装过氨水，兴修水利挑过利港河的土方，推了独轮车去夏港换取稻种，因为种植双季稻后柴草不足而在农田中挖过乌泥等等。我们所学会的许多农活，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很多已不再需要和使用，只是成为历史的回忆了。

## 11. 捕食田鸡，不光彩的行为

当时农村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家家户户的口粮都不够吃，加上食油很少，鱼肉更是难得看见，只有到大的节日才能吃到一些荤食。社员家中一般都在自留地上种一些山芋、南瓜、蚕豆、黄豆来弥补粮食的不足。由于少油、少荤，一般人的饭量都大得惊人，为了又能吃饱又要省粮食，江阴西乡人常吃粞粉粥。秋冬季的粞粉粥，是在烧粥时，先在大锅中少放一些米烧开后，加上一些筛米时漏下来的碎米粞并再捣碎成半粉状的粞粉，这样烧出来的粥，就显得有糊状，显得稠，吃上三碗就能饱了，但实际上不熬饥。夏季是搗粉粥，在粥中加入由元麦磨成的粉，也同样显得稠，凉后喝下去很滑爽。有的社员会捣鼓，冬天到田里挖黄鳝，夏天捉些螃蟹捣碎了烧糊吃，或摸些螺蛳，捉些小鱼改善生活。

我们知青要比农村社员好一些，回家后一般都会带一些猪油，带一些食糖。有时还会带一碗菜干头烧肉，每天吃一块，可吃十天半月。有条件的带上一块咸肉，在烧饭时切上几片放在饭锅里蒸一蒸，这就是上品了。但不管怎样，总还是以蔬菜为主，

每个人都感到嘴巴淡淡、腹中空空，很想吃上一些荤食。

在1969年夏季，稻秧插下去后，田鸡（青蛙）就开始大量繁殖。当时澄西地区农村里的人不吃青蛙的，所以田鸡很多，白天在田埂上走时，不时听得青蛙跳入水中的卟卟声，到了晚上就听得蛙声一片。田鸡多了稻田里的虫就少了，所以农药打得很少，那时候生态环境很好，即使流经水田的池塘水也能饮用。我们知青为了改善生活，就开始捉田鸡了。到了晚上，特别是暗星夜的晚上，我们每人一支电筒，带上一只虾篓或一只面粉袋，就在稻田的田埂上边照边走，田鸡一般都在田埂的中间，电筒光照到它后，它的眼睛会什么都看不见，只能一动不动伏着，我们就快步上去一把抓住，往篓里或布袋里一放，不需多久，每人都能捉上几十只。回到住所杀死剥皮，和着茄子红烧，味道十分鲜美。这样连续几次，年轻社员也来尝到了其中滋味，他们也仿效我们去捉田鸡吃了。记得在1970年的夏季，我和我的队长，以及邻队的几个知青朋友，在我家玩得较晚，就想着捉田鸡吃小夜饭（夜宵）。我们几个就分头去捉田鸡，我二姐和另一个知青在家烧米饭。我们捉了不少田鸡，马上杀了烧好，就着米饭，吃得很有滋味。但吃的时候总感到米饭中有一些火油味，都没吱声，大口地把饭吃完。原来我二姐他们在烧饭时，不小心将灶上的油盏灯（一只小的玻璃药瓶，在瓶盖上装了一个铁管，管中放一根棉绳，一头浸在瓶中的煤油中，一头点燃来照明，当时我们生产队还没有通电，晚上用它来照明，条件好的，在卧室中用美孚灯，有灯罩，比较明亮和防风）碰倒了，瓶中的煤油流出来渗到米饭中，但当时粮食太紧张了，就没有重烧，也没有吱声，等吃完了才告诉大家。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的口腔中还隔出一股浓浓的火油味。

到了1971年，开始种植双季稻，农药使用多了，再加上社员们都开始捕捉田鸡食用，不仅人吃，叫孩子们用一根竹竿绑上一只鞋底，来拍打小田鸡，拍死后喂鸡鸭。由于大量捕杀，田鸡的数量越来越少，再过了两三年，田鸡几乎绝迹了，而农田里的虫

子越来越多，我们知青捕食田鸡是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在农村的近8年时间里，我也会像社员一样，去摸些螺蛳、蛤子，捉些小鱼，还参与过打狗及捕捉竹林中的麻雀等，用来改善生活，在干活时打死的蛇，也拿回家剥了皮烧着吃，真有些饥不择食。

## 12. 种好自留地，增加副食品

自留地是农村社员重要的经济和食物来源。队里的土地根据上级的要求主要是种植水稻、麦子、油菜等粮食作物，而自留地社员有自主种植权。首先是种蔬菜，社员的日常蔬菜都要自己在自留地上种植，一般都不会去集市上购买蔬菜。第二是种植麦子、油菜、南瓜、山芋、黄豆、胡萝卜等来补充分配粮食的不足，同时为饲养猪、鸡鸭提供饲料。再是种植花生、红豆、芋头、蚕豆、芝麻、向日葵等经济作物，来增加自己的食物品种。

我们刚插队时，并没有马上分到自留地，等秋收结束，地里原来种植的作物全部收割完以后，就根据政策为我们分配了自留地。我们苍山大队社员是每人1.3分地的自留地，大约有80多平方米，一般多是旱岗地，人口多的社员家还有少量的水田。根据政策，一人户的家庭是分2个人的自留地，二人户的家庭是分3个人的自留地，若干年中增人不增地。我和我二姐算是一个二人户，分到了三分九厘地的自留地，都是旱岗地，我村的其他知青每人分得二分六厘自留地，其他队的知青有的没有分到双份。我们生产队紧靠通往长江的利港河，在河的东面。我的自留地就在这河边的岗上，西面是一条沿河通往公社的不足一米的小路，东面就是我的自留地，从高到低，都是沙土，土地不肥沃，容易受旱，适宜种麦子、豆类、山芋、花生，低的地方可种蔬菜。

我们知青都很珍惜这宝贵的土地，在社员们的指导下，种上了各种各样的作物。种自留地很有乐趣，看着自己种下的幼苗，



慢慢成长、成熟，很有成就感，但是也很辛苦，特别是农忙期间，要开早工打夜工，要自己烧饭，还要抽出时间种自留地，往往要做到很晚很晚。我比其他知青要好一些，队里收工回来，我二姐烧饭，我就能去自留地干活。肥料主要是人粪、灶里的草木灰和垃圾杂草堆成的灰堆，数量不多，肥力不够，所以一般产量不太高。每年我们都能收获几十斤黄豆、花生，二三百斤山芋，几十斤麦子，不仅自己增加了副食品，父母和弟妹也能享用。有一年我还和另一个社员交换了二畦水田，种了芋头，也是十分有趣。收获的山芋挑着到外面去磨成淀粉，回来做成粉丝和粉皮，将粉丝晒干了慢慢吃。蔬菜都是自己种的，青菜吃不了就腌成咸菜，做成菜干慢慢地享用。种的茄子、长豆吃不了，也做成茄干和长豆干，在缺菜时调剂着吃。

我的弟妹和亲戚，来队里看望我们时，都到自留地上帮着干过活。有一年我的一个在内蒙古插队的表弟来看我，帮助我收割花生，看着一颗颗、一堆堆从地中挖出的花生，十分的新奇和兴奋，直到现今，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回忆。

### 13. 三间土坯屋，四个大烟囱

到了1969年春夏，安置知青的建房材料逐步分配下来，每位知青分配到半间房约8-10平方米的建筑材料，包括砖、瓦、方木桁条、杂木椽子，一些做门窗的木料及每人三根毛竹，折合人民币约125元左右，由生产队派社员去公社的生产资料部肩扛担挑或水泥船逐步运回到队里。我们队里共五位知青，只有两间半屋的材料，但考虑到大家能居住生活，决定建造三间。但队里又无能力为我们增添材料，只能寻找替代品，主要是墙头泥和土坯来替代砖头。墙头泥是在水稻田里间隔地划出几块地方，用大的木榔头将泥土敲打结实，再用平板铁锹按 $15 \times 25 \times 15$ 的大概尺寸挖出晾干，用于堆砌前后包沿。土坯是挑上一些岗上的泥土，用水和好，搅熟，放入木框内成型，再将木框取出，就成了规格比85

砖略大的土坯，晒干削平，主要用于室内的隔墙和砌土灶所用。这些工作花了好几天，在年轻社员的帮助下才完成。到了夏秋交接的时候，队里在村西靠近社员住户的水田中划出一块地，开始为我们建造房屋。社员范盘根是瓦匠，由他任指挥，首先是划线开挖墙基。一般社员住屋的墙基挖得较深，并且要用石块作墙脚，但我们没有石块，砖头又不够，只能挖得很浅，并且由社员到大队部里将一堆废弃的煤矸石挑回来铺上用木夯夯一下就作为墙基。木工活是请了申港的曹木匠师徒3人来做的。三间屋的东西山墙是砖砌的，由于砖少，还是空斗的。前后包沿下面有80公分左右的是砖，其余是墙头泥块砌的。柱子是木料的，但是粗细不匀，最细的一根柱子顶端只有10公分不到。梁是方木桁条，长度不够，拼接后用一尺长的熟铁钉铆住，椽子是杂树棍，排列很稀，上面铺了芦秆帘子，芦帘上铺瓦，原来2间半屋的瓦铺在三间屋上，只能铺得很薄。三间六步的屋，中间是大门，后面三步屋隔出来由女知青邬菊芬居住；东面一间一隔二，前半间三步屋由张覃彪住，后半间三步行屋由许品方住；西面一间我和我二姐居住，也在后面二步屋处隔出一卧室，我二姐住后面，我住前面。东面的两个半间屋中，都各自砌了一个土灶，大门进来靠邬菊芬隔墙处又砌了一个土灶，由邬菊芬使用，我的屋中也砌了一个土灶，我们姐弟二人使用，这样三间屋中共有四副土灶。我们用毛竹做了阁楼，搁上一些杂木板、棺材木板，用来放置稻草编制的米囤、柴草、箩筐等物。我们每人半间屋约10平方米，在这10平方米中需放上一张竹榻，砌一副灶，还要置放箱子、衣物、桌凳、水缸、水桶、马桶，十分的拥挤。

前后一个多星期，在社员们的帮助下，三间崭新的、劣质的、多烟囱的知青屋落成了。8队的屋比我们稍晚落成，他们是造了二间，因一人病退，留下的三人是每人半间，也是有三个烟囱，半间公用。其余生产队也陆续建造了知青屋。汉墩头十一队条件较好，队里补贴了一些材料，造了三间。因任立新是与本队的女社员结婚，房屋有人照看，目前尚保留，其余生产队的知青

屋在知青走后，因房屋质量太差，先改为猪舍，后就都拆除了。

新屋落成后，我们就告别了九人共同生活的历史，开始了各自为家的真正的插队落户生活。每个人干活收工回来后，都要自己烧饭吃，几个烟囱同时冒出烟火，形成了热闹、可悲又可笑的场景。

过了几年，我队五个知青中有两人先后上调、一人迁至要塞公社，一人回澄代课，就剩我一个居在三间屋中，倒是十分宽敞。后来队里又安排了一个上海回乡的女知青在西面一间居住。由于原来是稻田、地势低洼、十分潮湿，尤其到了黄梅天，所有的家具都是长满白毛，米发绿色发霉，面粉结块。1973年夏的雨季，我回城去了两天，回到知青屋一看，我所睡的竹榻边的隔墙因潮湿倒塌了，将我的蚊帐、竹榻都压坏了。真是苍天有眼保佑我，如果我没回城刚好在睡觉时隔墙倒塌，我可能已经牺牲或残废了。

## 14. 两人一年的劳动收入购买了一辆自行车

我和二姐一起插队于苍山7队，从插队第一天起，除去农闲时回家几天外，都坚持在队里参加劳动，我是8折工分，我二姐是6.4折工分，两人辛苦一年下来挣有5000多个工分（包括早工、夜工及参加宣传队、开会的工分补贴），1969年的年成比较好，我们队里每10分工的分配值是0.59元，我俩一年的劳动收入有两百多元，扣除队里分配给我们的口粮款和各种物品的钱后，年终兑现两人分配到了140多元现金。我们很高兴自己能凭劳动养活自己，还略有节余，赶紧带上现款和自留地收获的作物回家交给了父母亲。

年终分配过后的几天，我和二姐及几位社员一起到西石桥街上购买日用品，在供销社中看到了一辆上海产的凤凰牌42型重型自行车，当时这类物资很紧张，当然有能力购买的人也不多。我看到非常心动，希望自己能有这辆车，这样回江阴家中来去就方

便了。我二姐和社员及售货员都鼓励我购买，但当时身边没有现金，售货员同意我先骑了这辆车回江阴取款再交钱，在大家的鼓动下，我决定买了。我马上骑上这辆崭新的自行车，飞快地赶回江阴家中，父母亲都很支持，立刻取钱交给我，我即刻返回西石桥供销社交了款。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拥有这样的贵重物品，一辆上海产的凤凰牌42型重型自行车也是相当于现今时代购买一辆中档次的轿车了。有了自行车回城来去就方便了，还能经常带东西、带人。但也出过洋相，有一年冬天，生产队上午安排到街上的生产资料部挑化肥，每人两袋100斤的任务。我骑了自行车轻松地先到，将两袋化肥绑好，先骑到街上，和几个朋友聊了一会，等社员来了就一起回村。街上到公路的路是石块路，骑自行车很轻松，到了公路往队里都是泥路，泥路很潮湿，早上去的时候是封冻的，很硬好走，回来时开冻了，十分泥泞，无法骑车，我只能将两袋化肥寄放在路边的社员家，自己扛着自行车回村，第二天一早再去运回。好天时人骑车，雨天时车骑人。这辆车一直陪伴我多年，直到上调回江阴后，才换成了一辆轻便自行车。

## 15. 参加“一打三反”运动，担任生产队会计

1970年年初，中央出台了三个文件，这是文革中继武斗、夺权后的又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在8月份，公社派出了工作组到我们大队，开展了农村的“一打三反”运动。

我们梅家村整个村子实际上是没有地主和富农的。我们7队里成份最高的是梅兴产家，就是我们知青曾寄居的人家，他的成份也就是小土地出租。他和弟弟梅兴生都是种庄稼的好手，无论各种农活都是做得最好的，人也勤奋节俭，还好唱唱滩簧戏。由于成份比人家高，家境比人家好，本人又有点骄，则在文革开始就作为地富坏分子，经常被批斗。我队还有一个是叫梅荣大的社员，家境好，有文化，解放前曾当过保长，他也是被批斗的对

象。他把孩子培养得好，三个儿子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上海当区局党委书记，一个当中学教师，女儿也上到高中后才回家务农。那个在上海当区局党委书记的儿子响应国家号召，将自己的大儿子梅齐鸣送回老家农村，由于梅荣大曾当过保长，是被批斗的对象，梅齐鸣初中毕业时，虽然成绩优秀，但没有被推荐上高中，影响了他的前途。公社不时地派他们两人集中到公社劳动改造，无偿劳动，但实际上队里社员对他们都是很佩服和尊敬的。

那是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公社派工作组到各队开会动员，要求大家进行揭发，公社还派了三人查账小组到我队，我队也组织5人配合，我也是其中1人。由于村中社员之间、姓氏之间总会有些矛盾，结果队里社员互相揭发。年轻的队长因打麻将被告为参与赌博，而会计梅初兆被告为贪污，这两个人当时在30岁左右，都是年富力强，是梅姓和孙姓中的代表人物。“一打三反”运动中都被大会批斗，两人都被撤销职务。另有几个社员因打麻将也被弄上台批斗。队里只能另选了一个50多岁的“老好人”社员担任队长，选我当了生产队会计，实际上队里的领导班子能力是降低了。

我们大队的知青中，包括我在内有三个人当过多年的生产队会计，有一个当大队的农技员，一个当电灌站的电工并负责加工厂的轧米机，还有好几个担任记工员，我们很多知青在农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坚持了比抗战八年还要长的时间。

当时农村中普遍欢迎知青担任生产队会计和记工员，不仅因为知青有文化，更重要的是知青比较公正，不会参与到队里姓氏族群的矛盾中。生产队的会计在队里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队里分配物资时，有着重要的决定权和建议权。粮食分配上上级有着统一规定，定为基本粮和超产粮，并根据年龄来确定。但其他比如豆油、菜油、山芋、瓜果及河塘里捕捉的鱼、队里饲养后宰杀的猪等等的分配是没有统一规定的，可以按人头分，也可以按工分分配。人口多的社员希望按人头分，劳力多的希望按工分分配，经常会发生矛盾，队长、副队长之间也会有矛盾。这样我们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做会计提出的方案就很重要。我们知青会计比较公正，根据不同物品确定分配的原则和方案，既有人口因素，又要劳动贡献因素，要说服大家接受这样的方案，避免产生矛盾，达到一碗水端平。生产队会计还要参加全大队的核产工作，互相调换到其他队里核产量，根据产量才能确定各生产队应上交和出售粮食的数量及队里分配给社员的数量。有的生产队长要争第一，产量希望核高一些，报出去有面子，有的生产队长希望核低一些，这样社员会多分一些，但这是公社所不允许的，属瞒报产量。而且队里分配的经济作物如黄豆、蚕豆、山芋等都要折合成粮食作为已分配数。我是一直站在社员的角度，从不虚报产量，有时分配的一些经济作物，就不入账反映，另有分配账备案，这样让社员实惠一些。我当生产队会计很受社员拥护，在1974年我到大队的五金弹簧厂工作后，还是兼生产队会计，一直到1975年5月才卸任。

## 16. 参加县第二届下放人员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70年9月7日至11日，我和林耐伟、奚亚华三人作为苍山大队的下放人员积子代表，和西石桥其他大队的代表共计33人到江阴参加县第二届下放人员积子代表大会，全县代表共800多名。有幸还保留了当时笔记，对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作一介绍。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庙巷北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1970年9月7日上午举行了开幕式，徐蓉芬同志致开幕词，苏州专区革委会代表读贺信，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澄部队“支左”办公室王副主任作形势报告。他谈到世界上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的新高潮，要求广大下放人员作好充分准备，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积极支援世界革命。下午讨论报告，晚上观看锡剧《沙家浜》。8日上午，县革委会副主任、人武部长、独立团团团长滕英作报告，传达贯彻中央26号文件精神，要求广大下放人员做到思想上革命化，组织上军事化，生活上工农化。下午讨论报告，晚上观看小红花宣传队的演出。



9月9日，一天讨论邓部长报告，晚上举行游行，庆祝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拥护全会公报。

9月10日，举行积子代表讲用会。贫下中农、知青、大队党支书、知青家长、老红军战士、公社革委会成员、省级机关下放干部、下放居民等13位代表人物作了讲用，一直到下午6点10分才结束，晚上观看了朝鲜电影《战友》。

9月11日，上午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讨论了积代会的“决心书”，下午举行闭幕式，首先通过了积代会800多名代表的决心书，接下来长泾公社革委会代表、月城公社贫下中农代表陈才喜、璜土十大队7小队知青代表苏慰年、夏港红旗大队18队下放干部赵金荣、澄江镇革委会代表吴启生、北涧公社金华代表等作了发言，表示了决心。人武部政委、江阴县革委会王副主任致闭幕词。并希望代表们广泛宣传，戒骄戒躁，继续前进，会议结束。晚上看电影《铁道卫士》。

12日早上，西石桥公社代表合影留念，但我没有拿到这张照片。

我还记录了当时积代会发给我的补贴：（1）路费（西石桥来回公共汽车费）0.82元；（2）伙食补贴0.45元×6天=2.70元；（3）工分补贴2.81元。

## 17. 告别油盏灯和牛轧机

1970年11月初，梅家村7队、8队的社员终于走进了电气时代。两个队联合购置了水泥电杆、电线、电表等，由公社和大队的电工从大队电灌站拉线将电接到了两个生产队，他们将线拉好，在最后的电杆上装好电表和闸刀就工作结束了。

我们生产队马上购置了电动轧稻机，但怎样接线大家都不知道，社员们祖祖辈辈都没有接触过电，对电又是喜欢又是怕。作为知青，又是城里人，有过用电的常识，我就担负起主要责任，成为了业余电工。电动轧稻机安放在场上，我将三根火线和地线

从闸刀上引下，接到轧稻机的电动机的接线盒中，大家在边上看着，都很紧张，接好后，我将闸刀按上，电动机转了，带动轧稻机欢快地转动，大家一片欢呼。但是转动的方向是反的，我也傻了眼，不知所措，后来我队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年轻人提醒我，书上讲电动机转的方向与三根火线的位置有关，只要交换其中的两根火线位置，转的方向就会改变。我按照这个提示作了调整，轧稻机正常运转了，社员们都很高兴。电动轧稻机的效率比老牛带动的轧稻机效率提高了好几倍。随之，队里的老牛结束了它的使命，也结束了它的性命，在通电不久后就被宰杀了。

通电后，我还为每户社员家拉线接电，每户社员家只能安装2只电灯，而且只能是25W和15W各一只，因为没有能力各家购买电表计量，只能统一标准，按户收费，如要求增加，则相应增收电费。有了电灯，社员们更忙了，特别是妇女社员，在灯光下绣花、编芦花靴、织蒲包，孩子们也能在灯光下做作业了。

队里又添加了一台直流泵，用来抽干池塘里的水，捉鱼和挑河泥积肥。有的池塘很远，队里没有这么长的电缆线，只能用一般的电线代替，有很大的危险性。这项工作也是由我和盘根为主。我们将直流泵抬至要抽水的池塘，再放线到最临近的电杆旁，踩了梯子爬到上面接线，一般都是带电作业，很危险。有时电线不够，插地线就只能在水泵附近插一根铁棍，接上一根短的电线就作地线。在深夜抽水时，用测电笔在水泵底部一测，都是红光闪闪，说明金属壳体上都带有低压的电流，真的很危险。我每次都注意穿上胶鞋，这样虽然感觉有时会麻电，但不会有性命危险。

触电的事故在农村也时有发生。曾经在苍山6队（渣沟村）发生过一起非常巧合的触电死亡事故。这个生产队中有一个邱姓的年轻社员，他的父母解放初去香港生活，留下他与爷爷奶奶生活，长大后爷爷奶奶相继去世，队里培养他当了拖拉机手。1971年春节期间，他去了广州，他的父母和弟妹从香港来和他见面，当时过关时不能多带东西，他的父母和弟妹身上穿了很多毛衣

等，过来后脱下送他带回村，社员们都很羡慕，并为他介绍了女朋友。回来几个月后，队里西边的一条小河抽水，由他负责水泵接电抽水，电源的闸刀装在一块木板上，靠在河边社员房屋的东山墙上，离开水泵有二三十米远。水泵抽水一段时间后，突然不转了，他就拉下闸刀，到河底水泵旁边进行检查，原来因水泵抽水时的震动，将接线盒中螺丝固定的电线震脱落了。他就赤了足，下到河里，一只手拿着电线，另一只手用螺丝刀将线重新拧紧。就在他一个人操作时，刚好他队里有一外嫁的女社员带着儿子回娘家探亲，临走时，儿子带上一卷报纸，准备回家包课本。女社员走在前面，儿子在后面，手中拿了这一卷报纸，东瞧西望，走过竖着的闸刀旁，他十分好奇地用卷的报纸将拉下的闸刀推了上去。由于时点的巧合，这位邱姓的年轻社员就触电了，由于赤足在水中，加上触电时间较长，当即就不幸身亡了。大家都感到十分惋惜，也提醒我们在用电时一定要十分小心，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并准备一些木棍、竹子一类，可在有危险时挑开电线，所幸，我们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故。

## 18. 种双季稻苦煞众社员， 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

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增加农田的产量，在1971年，苏南地区推广种植双季稻。西石桥公社也向各生产队下达种植双季稻的任务，要求各生产队在1971年种植总水稻面积15-30%的双季稻。大队也确定了我队的种植任务，社员们都没有种过双季稻，公社就先培训各生产队的农技员，我除了担任生产队会计外，还担任了生产队的农技员，根据上级的布置和本队双季稻面积，要为生产队作出茬口安排计划。

前季稻一般需要在4月底，5月初落谷，秧期在25-30天。由于这个时期气温还很低，不能在水中育秧，因此只能旱地薄膜温室育秧。

根据上级教授的方法，先是浸种加热、地窖保温发芽。将稻种放入蒲包中约20—30斤一包，用绳捆好，放入池中浸上一天一夜，使稻种浸透。然后在生产队的大浴锅（每个生产队一般都有一只大浴锅，在冬天多户人家合着去洗澡，先去的人家自带柴草将水烧热，锅中放一木板，防止皮肤直接接触铁锅而烫伤，家人一个一个去洗，先男后女。然后换一户人家，用自家柴火续温，再一个一个洗，洗一次澡要持续几个小时。洗上几十号人，最后洗澡的人就像是混水中洗白萝卜一样，水是十分的混、脏、臭了）中将水烧至40度左右，将放有稻种的蒲包放入锅中，用力左右摇晃搅和，使稻种加热均匀，取出后捆好，在场边挖一深1米多的坑，先用柴火烤一下，将加热后的稻种逐步放入坑中，上面用柴草压紧保温，待2—3天后，稻种就会发芽了。在场上浇上一层厚约3—4公分的泥浆，将发好芽的稻种撒上，用竹片做成支架，再用塑料薄膜盖上，让里面保持较高温度，稻苗很快长出，到25—30天左右就有12—15公分长了，这时已到5月底，6月初，就可移栽到原来的红花田、油菜田中。这样的秧苗不能插，而是从场上一块块铲出，挑到田中，再掰成小块，摆在田中，因为秧短对田块的平整度要求也十分高，很费时费力。6月上旬，早稻秧插好，就要收麦种单季晚稻，7月上旬单季晚稻秧插完，要耖稻耨稻，治虫施肥，不久又要开始收割早稻，栽种后季稻。原有的农闲没有了，从5月份要忙到12月份，冬季还要积肥，真是一年四季忙。

第一年，我们队栽种的双季稻不多，由于精心管理，两季加起来比单季稻产量要高出每亩近200斤。但第二年增加了种植双季稻的面积，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后季稻栽种的时间要求很高，晚一天栽种可能会歉收或无收，又没有机械化生产，只能靠社员早工、晚工的拼命做，但有时还是不能如期。加上当时有机肥不多，化肥也只有碳酸氢氨，双季稻的产量逐步变低，特别是后季稻，晚栽的后季稻亩产只有300—400斤。而单季稻产量相对比较稳定，加上品种也不断改良，我队栽种的字红一号产量能接近

千斤。

通过二三年的实践，社员们都认为栽种双季稻的决定是不利于老百姓的。栽种双季稻有几大不足：①时节要求高。没有机械，靠社员超体力的劳动，加大了社员的劳力成本，还不能保证时节，造成低产无产。②肥力要求高。要多施一次基肥，而有机肥不足，用化肥又使土地板结，使田块酸化，不利农作物生长。③米质不好，双季稻多数为籼米，生长期短，米质差，社员们都将双季稻售给国家，而自己吃单季稻米。④产量无保证，霜期如果提早，则后季稻减产很多。⑤售价比较低。交到粮站的双季稻价格要比单季稻低15%左右。因此社员们认为种植双季稻加麦子三次收获还不如种植单季稻和麦子两季的收获。真所谓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后来上级也根据实际情况，不再强迫生产队种植双季稻。种双季稻这段时期，是我们插队知青和广大社员感到最苦最累、收获最低的时期。

## 19. 我成了拖拉机手

1970年通电之后，队里唯一的老牛也被宰杀了。有了电，有了轧稻机，脱粒是不成问题了，但是犁田又成了大问题，没有牛，只能用人来翻地，加上种植双季稻，又要多翻一次地，时节要求高，地翻不过来，秧插不下，就会耽误农时。在1971年的后季稻种植时，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当时来不及翻地，只能高价请其他大队的拖拉机来帮助翻田。

当时农村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有拖拉机的生产队很少，一是购买拖拉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二是没有拖拉机分配供应。我们苍山大队当时只有渣沟村6队有一辆东风12型的拖拉机，由邱文禄（小名叫小六子）担任拖拉机手，农忙时耕地，农闲时运送货物。知青们经常搭乘他的拖拉机回江阴，他为人热情，很肯帮忙，和我们知青关系很好。

汉墩头11队也想购买拖拉机，但没有供应指标，好在他们村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有一位姓丁的老工人在上海拖拉机厂工作，他没有能力搞到整车，就一样一样购买拖拉机配件，请他的徒弟们进行装配。在1971年终于装配成型，是上海的工农11型手扶拖拉机。我们梅家村7、8队的干部合计后，决定两队联合装配拖拉机。找到了丁师傅，丁师傅非常热情，同意帮忙。这项工作很细致、很繁琐，我们都不懂，只能先付一些钱给丁师傅，由他一样一样购买配件，有的配件很紧张，还要四处托人。买到一批配件后，队里派人去拿，丁师傅有时还亲自送回来。连续了几个月，终于购全了柴油机和拖拉机的主要配件，购回来的东西都堆放在我的知青屋中。上海来了一位青年师傅，帮助装配柴油机，我在旁边打下手。他的技术很好，只用大半天时间，就将柴油机装配好，加好润滑油，加好0号柴油，一次就发动成功。拖拉机及旋耕机、犁等是由汉墩头的拖拉机手来协助装配的。到1972年的夏季，我们就用拖拉机来犁田了。第一次犁田时，发现拖拉机有问题，会突然90度转弯，拆下来多次解决不了，大家心中很烦恼，后来才发现转向弹簧下少了一个垫片所引起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是边学边开的。

我们7队8队每个队出两个拖拉机手，7队是我和盘根，8队是梅小玉和江小金。我和盘根是好朋友，又是棋友，小玉是8队队长的弟弟，比我大一岁，他们家弟兄很多，而房子很小，他曾在我知青屋中和我睡一张竹榻近大半年时间。江小金比我小两岁，但人高马大，能力很强，后来到公社农机厂工作，再后来去常州发展，现在已是有实力的房地产老板了。我们四个人很团结，协作分工，很好地完成两队的机耕任务。拖拉机就停在我队的场上，农忙时，两队轮流使用，歇人不歇机，24小时运作，翻麦田时用轮胎和犁，翻水田时用防滑轮和旋耕机。冬天发动柴油机很吃力，因为里面的齿轮油冻结，用摇手柄摇时需很大的力量。我人较瘦，力量不足，他们都会来帮我。除了完成我们自己队里的任务，我们还去其他生产队耕田，去其他队耕田会得到他们的热情招待，有肉吃，有时还会有酒喝，我们都愿意去外队耕地。



有了拖拉机，两队又购置了挂车，这样能运送粮食，购买农资化肥等。我们都没有经过培训、没有驾照，当时也没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的胆子还比较大，有一次开了拖拉机到公社，后来坐上了许多知青，一致要求我开去江阴，无奈我就硬着头皮往江阴开，到江阴西门车站处差点与一辆汽车相撞。回到家，父母亲得知是我开拖拉机回来的，又惊又喜。那时开着拖拉机在街上晃悠不亚于现在的人开了一辆宝马汽车，是很受人羡慕的。到了1974年我到大队五金弹簧厂工作时，才由梅兴产的大儿子梅国金接替了我拖拉机手的工作。

## 20. 饲养一只半猪

1969年秋知青屋造好后，我队五人都搬入知青屋中居住，并各自生活，不再吃9个人的大锅饭。我和二姐在一起生活，互相有一个照应。我们在知青屋大门进去靠我们居住的西屋门口垒了一个鸡棚，养了一只老母鸡。这样一天隔天的生下个蛋，在饭锅上蒸一蒸，是一道很好的小菜。不料在那年的冬天的一个夜晚，在睡梦中听到老母鸡咯咯地大叫，跟我一起睡的社员梅小玉跳起来，来不及穿衣服，穿着短裤开了房门出去，只见大门敞开，老母鸡已不见了。我也起来寻了好久，没有发现，心中十分懊恼，由于疏忽没有关好大门，心爱的老母鸡被黄鼠狼叼走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在屋后转悠，在我们知青屋的山墙旁，有社员垒放了一堆一人多高的墙头泥，墙头泥与墙体间有一个缝隙，缝隙中看到一样黄澄澄的东西，走近仔细一看，像是我那饲养的母鸡。马上花大力气，将墙头泥搬开，果然是那只心爱的老母鸡，它还活着，但是很瘦很虚弱。原来那天被黄鼠狼惊吓后，它钻进了这道缝隙，由于这道缝隙北宽南狭，它从北钻进后往南躲藏，进去了却出不来了。在那呆了一个星期，虽然被我们拯救了出来，但它已丧失了生育能力，养了很久，不再生蛋了。

到了1970年春，我在要塞粮库担任主办会计的父亲也被带薪

下放，分配到要塞公社。我们考虑到我和二姐在西石桥插队，而父亲在要塞下放，相互无法照顾，最好能在一起。后来通过与单位和队里以及张覃彪协商，我父亲的接收生产队名额由张覃彪与我父亲对调。这样张覃彪就去了要塞公社，那儿离县城很近，比较方便和富裕。我父亲就来到苍山7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973年回澄进入燃化公司。父亲来后就睡我原来的地方，我睡张覃彪的屋中，并将其屋中的土灶拆除，地方宽畅一些。

父亲来后，基本没有参加队里的农活，他是带薪下放，就由大队安排一些工作。有一个阶段是研制生产“920”，这是一种植物生长激素，喷洒到农作物上能促进生长，“920”是生产了一些，但并没有推广，反而在生产时由于封闭潮湿的环境，使我父亲得了肺气肿，对后来的身体健康有不少影响。

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父亲有些空余时间，加上有自留地上的作物，和自己轧米磨面后的糠和麸皮等，我们决定自己养上一头猪，这样猪粪还可以卖给队里，猪还可以出售。在1971年，我们在屋西面搭了一间7-8平方米的草屋猪舍，再请队里有经验的社员一起到西石桥捉了一只18斤重的小猪回来开始饲养。猪小的时候非常可爱，吃得不多，看到人去了十分亲热。猪慢慢长大，每天的猪食成了我们很大的心病和负担。糠和麸皮不足、青饲料不足，自留地上的山芋藤、南瓜、胡萝卜都给它吃还吃不饱。饿了就叫唤，天热时要跳出来到沟里打滚，真是猪肉好吃，猪难养呀。这样养了六个多月，终于基本达到食品站收购的标准，就请盘根帮我抬到食品站，向收购员讲了不少好话，以收购的最低标准约140余斤收购，大约卖了40多元钱。终于松了一口气，感觉轻松多了。

到了1972年春，我们又捉了一只小猪饲养。我二姐在4月份因南菁中学老师的推荐，她回到南菁中学去做代课教师。走了一个人，我们感觉吃力了一些，加上双季稻面积增加，我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我父亲也无精力喂养，在猪长到80多斤的时候，与队里商量，折价给生产队，并入生产队饲养。我们在农村期间有了

饲养一只半猪的经历。

## 21. 难破大锅饭，难立新规矩

人民公社成立后，大型农具如水车、牛轧车都收归集体所有。大型牲畜主要是水牛也归集体所有，社员都是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靠出工挣工分来确定年终的分配。生产队都没有工业，很少有副业，主要靠粮食生产。有手艺的人，如泥瓦匠、裁缝、剃头匠等外出打工，还需向队里交纳每天1元多钱，再为他计上10分工，因此社员们都是吃的生产队的大锅饭。

生产队里评工分是一件大事。有的生产队是先评后计，就是先评定你的工分折率，一年结束按此折率计算你的工分进行分配。有的生产队是先计后评，平时出工进行记录，年终根据你的表现评定你的工分的折扣。这两种方法都有利弊，先评后计的，有的评为10折的人表现不好，又不能再给他打折扣，这样就影响了其他人的积极性；而先做后评的，会评不清，因为本身评工分中有许多的不公平，再加上一年中有很多农活，有技术活，有力气活，有的社员技术活很好，但力气小一些，挑担可能不如人家；有的人力气大，挑担多，但技术活不太好；有的人技术活好，力气也大，但出工不出力。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很难调动所有社员的积极性。每年评工分时都会吵吵闹闹，队里领导也只能和稀泥。

评工分中最大的不平等是男女同工不能同酬。农村中绝大多数的农活，女社员并不比男社员差，如割稻、蒔秧、拔秧等，女社员的韧劲好，男女社员在一起基本上是完成一样的任务，但女社员只能得到男社员的八折工分。男社员的优势主要是在挑担上，一般都比女社员要重一些。西乡有传担的传统，男女社员在一起互相传担，如挑河泥、挑猪灰等，这样也分不出高低。男社员还经常要坐下来抽一筒烟，偷一下懒，而女社员也会回家去上厕所，一来一回半个小时，所以，经常有人出工不出力，生产效

率较低。

生产队上工一般是由队长叫喊，如上午7:30上工，则队长在7:25分左右到场上喊上一阵，大家陆陆续续来上工。或者队长隔夜就布置好明天的任务，确定明天7:30到什么地块做什么工作，但总会有人拖拖拉拉，迟上一二十分钟到工。为了减少这种情况，队里也商量要严肃纪律，迟到要扣去1—2分工，队长拿了一只挂钟在身边，到了时间就叫计工员将迟到的人计下，扣去2分，社员们戏称为“分秒必准”。这样下来迟到的情况要好一些，但社员也学精了，他可以不迟到，先来报到，稍一会再借故回家处理事情，这就无法扣2分。队里也希望采取计件工的形式，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上级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加上采取计件的形式后，还要进行质量的检验与评定，又会产生矛盾。由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所以后来才会在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激发提高了农民发家致富的热情。

在生产队里，每家每户都喂养一些鸡鸭，一般生下的鸡、鸭蛋都舍不得吃，而是要拿到集市上去卖了换回一些日用品，去为孩子交学费。也喂养老母猪和肉猪，而喂养老母猪是社员最大的经济来源。养的鸡鸭会跑出来到田里场上和附近社员自留地上吃菜吃谷，经常发生矛盾。我们生产队召集社员讨论，立下了一个规矩：社员所饲养的家禽只能圈养，不能放出，如放出来吃食队里和社员自留地上的东西，只要有人检举，就将出来的家禽就地正法。社员们都同意了，但大家乡里乡亲的，难拉开面子，我这个知青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生杀大权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被推选为总执行官。我先后两次执法，两次都是裴姓社员家的家禽。他家在队里谷场的贴西边，一次是他饲养的大白鹅跑出来吃了队里场上的谷子，被社员举报，当场拿下。我按照大家商定的民约问裴姓社员如何？他说按法执行，我就在众社员面前手起刀落，将大白鹅斩首，却不知大白鹅血性猛烈，头颈断了，还摇摇晃晃在场上走了十多米才倒下，真是死不瞑目。第二次又是裴姓社员家的一只生蛋母鸡出来吃了邻家社员自留地上的青菜，社员举报

后又将母鸡捉拿归案。这次裴姓社员含泪与我商量，母鸡出来确是自己没看管好，但这是一只生蛋的母鸡，是一个小银行，是否可以特赦。我这个法官是铁面无私的，但由于同情这种情况，就叫裴姓社员捉来家中的一只小雄鸡，将老母鸡赎回，由小雄鸡代替老母鸡执行了死刑，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偷梁换柱戏剧，好在社员们都没有意见，一笑了之。这个条约坚持了近一年，后来也就慢慢地失效了。

## 22. 进入大队工厂当工人

1971年，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我和队长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我们去华西参观，我们自带了盒饭坐了手扶拖拉机到华西参观学习。我们看到了华西平整土地后的丰产田，还看到了华西的五金厂、小砖窑。回来后大队领导受到了启发，也想在大队里办工厂，来弥补大队财政资金的不足。我们大队有不少亲属在上海工作，渣沟村6队邱林保的父亲是上海弹簧厂的8级技工，他愿意帮助大队创办一个弹簧厂。因为他懂技术，并且开这样的厂，不需要大的投资，容易上马。经过一个阶段的筹备，大队在1972年办起了苍山大队五金弹簧厂，由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任厂长、邱林保任主管。工厂设在大队部里面。大队部在梅家村的东面，处在苍山大队的中心位置，原来是一座寺庙，前面三间，后面四间，中间有一棵200多年的银杏树，寺庙周围是池塘，只有一条小路进入，工厂就设在后面的四间屋中。开始时，只有一台手摇盘簧机、一台脚踏冲床，还有一台电动砂轮机，再砌上一只淬火炉就开始创业，后来逐步添置了冲床、钻床和车床。主要是承接加工各式各样的弹簧和冲压件。弹簧生产主要是压簧和拉簧，不少特殊的扭簧和大规格的压簧还没有能力生产。这个企业从1972年创办，到1997年转制，转制后仍由邱林保经营至今，生产能力提高了许多，但规模仍不大。

我是因身体原因于1974年被照顾进入大队工厂的。插队下来

后我各项农活都能掌握，但我最怕的是挑担，一则我本身身材较瘦，力量较小；二则我右膝的半月板受过损伤，不能承受重的压力。但农村中男劳力不挑担是不可能的，当时仗着自己年轻，也总是为自己压重担，我也曾经和社员一起到西石桥街西南的生产资料部去挑过氨水，一担氨水连同两只瓷潭有180多斤重，我也硬着头皮挑着走上近五里的路程。几年下来，我的右膝损伤更严重了，还影响到坐骨神经痛，冬天晚上睡觉，右侧大腿会冰冷麻木。到医院拍片检查后，医生诊断为右膝半月板盘状软骨，建议不能重体力劳动。由于这一情况，经与生产队和大队领导反映，大队决定我进入大队工厂工作。

我进工厂后，虚心学习，认真地将加工弹簧的工序一道一道做过来，并买来书籍增加知识，不久就成了工厂的骨干。工厂工人不多，总共只有10个人左右，厂长不管事，由邱林保全面负责。邱林保原来主要精力是负责生产和质量。我到工厂后不久，他就将这一块交给我负责，他主要外出开拓市场，联系客户。我根据他接回的业务，组织安排生产，把好质量关，我们合作得很好。

在工厂时，我对五金加工、开模具、冲床、车床知识也了解了不少。知青高敏英自费学习了车床技术后也在大队厂中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1975年底离开五金弹簧厂回城后，邱林保还感到不适应，必须心挂两头，一直没有找到一位令他放心的人来主管生产。

## 23. 六周年聚会

转眼就到了1974年，我们下乡插队已经整整6年了，在这六年中，苍山大队的知青情况有了不少变化，那时还有十一位知青在苍山生活。

在1974年的国庆节，我和奚亚华、匡立伟三人倡议举行一次活动，将知青聚在一起纪念下乡插队六周年，我们向其他知青发



出了邀请。我和匡立伟回到江阴，6日一早就到菜场购买了一些肉、豆制品、甜汤料及蔬菜。回到苍山，在我的家中进行分类整理，因为当时我的三间知青屋中只有我一个人居住，地方比较宽敞，地点也在苍山的中部。我们将肉烧好，其他的菜搭配好，等大家来了，要求每两人合作去烧一个菜。我们没有买鱼，鱼的任务交给奚亚华，因为他是钓鱼高手。不料那天到了下午五时都不见他的身影，也没有见到鱼的影子，大家十分焦急，一直到五时半他才到来，连声道歉，说今天的手气太差了，一直没有钓到鱼，后来好不容易他的钓鱼徒弟帮他钓到了一条一斤多重的黑鱼，才急急忙忙赶来交差。我们赶快将碎肉塞在黑鱼肚中进行了红烧。

到了晚上，来了八位知青和大队的赤脚医生梅彩琴共9人。我们将预先烧好的肉、鱼等菜肴拿上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倒上一些劣质的曲香酒，边喝边回忆和感叹六年的知青生活。

接下来轮流去灶上炒菜，都是很简单的农家菜。记得有两道菜最令人难忘，一道是雪菜炒豆子，由章乃洪和梅彩琴合作，那时他们俩正在热恋中。章乃洪灶上炒菜，梅彩琴灶下烧火，我们在隔壁桌上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章乃洪放了盐，尝了一下，说不



苍山老乡（后排左二为作者）

知味道怎么样，梅彩琴讲“杀猪杀羊，厨子先尝”，章乃洪就叫梅彩琴也尝一尝，梅彩琴讲太淡了，就又加了一些盐。实际上第一次加盐差不多，但由于当时是粗盐，没有马上溶化，尝的时候感觉淡了，又加了盐，等到盐溶开菜烧好端到桌上，已是咸到不堪入口了。另一道菜是麻辣豆腐，由沙盈和高敏英合作。当时我们都没有麻油和辣油的，就买了几只尖头小辣椒，在案上拍碎，当油烧热时放入油中，马上一股辣烟腾起，她们两个在灶旁被呛得连连咳嗽，我们在隔壁也是呛得够呛。虽然菜肴很简单，但大家相聚在一起相互倾诉、相互鼓励，感到很开心。最有趣的是5队的纪玉华来时，还带了一包米，因为当时粮食比较紧张，她怕影响我的口粮，被我责怪了一通，令她带了回去。

## 24. 经受身体和精神双重磨难

我们插队知青从小生长在城市，虽然当时大家已经历过大炼钢铁和吃食堂、三年自然灾害等等的运动和艰苦岁月，但都还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的。插队落户后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生活，我们是在磨难中逐步成长、逐步成熟的。

刚到农村的第一年，就是一个湿冬年。这一年的秋收秋种，每个人手上都是血泡，手上的裂口很大，脚上生了冻疮，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肩膀上因为挑担都压肿了。夏收夏种时，腿上都被蚂蟥叮过，淌血不止。夏天的蚊子很多，钻进厚厚的纱布蚊帐，没有电扇，只能用扇子扇上半夜才昏昏睡去，身下的席子上总是一身的汗渍。冬天，知青屋透进凉风，只能在竹榻上铺上厚厚的稻草。在种双季稻后更是艰苦，夏天都会脱皮。最困难的是一日三餐都要自己烧了才有吃，经常是饱一顿饿一顿，经常吃夹生饭、冷饭、咸菜饭。长期的饮食不正常，我患上了胃病，在插队时曾两次胃出血，但当时医疗条件不够好，只能硬挺，按土方吃上几片痢特灵加B6。在1971年秋，我还因重感冒引起右侧面瘫，嘴巴都歪了，由于正值年终分配，作为会计要进行结算，我只能

在村里坚持工作，好在公社派到大队的戴医生用解放军的新针疗法为我针灸，虽然我酸痛的大喊大叫，但总算治愈了。还有一次在公社开会，只觉头痛得厉害，全身发热，摇摇晃晃回到大队医务室，一量体温达到41.3摄氏度，是患上了疟疾，经多天治疗才治愈。

身体的磨难是有形的，对我们知青影响最大的还是精神上的磨难。我们知青都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从小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欧阳海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都非常要求上进。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在工作、上学、入团入党、提干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文革中又有“血统论”的极左路线思潮的影响。插队下乡后，我们这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虽然都有很好的表现，但在政治上还是经受了許多磨难。

我从1968年10月插队后，一直表现得很好，劳动积极，思想进步，成为生产队的骨干，当了生产队会计、农技员，全心全意想把生产队的工作做好，也被评为上山下乡的积极分子。1972年，大队团支部在文革后恢复活动，准备发展新的共青团员，我就积极要求加入，可是并没有获得批准。听说原因是我的祖先是地主，伯父从印尼回国，有海外关系，还要进一步考察。我当时心里就凉了一大截，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而且团支部的领导没有一个人来和我交流、解释，再过了一年多时间，才被批准入团。

我们大队的知青表现都很好，虚心接受再教育，认真务农，都成为队里的骨干，大家也想通过积极的表现能早日上调。在1971年至1974年中，有过几次上调机会，但我们这些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这些机会都给了家庭出身好或有一些其他因素的人，上调成了我们无望的期望。

种植双季稻，劳动更加辛苦，而收入反而下降。有的知青辛苦了一年，分配时没有一分钱兑现，反而还要倒挂。是否我们就要长期过这样的生活，是否就要真的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我们

一直处于这种无望的焦虑之中。伴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无望和焦虑的情绪也不断增长。

后来对知青上调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体现了“照顾”的味道。从1975年起，先后对独生子女的知青照顾上调，家中无人照顾的知青照顾上调，家中多农少工的知青排序照顾上调，一直到1979年全部知青上调回城，最晚上调的知青在农村呆了近12年。

由于经受过多年身体和精神上的磨难，广大知青回城后，工作上能吃苦，生活上容易满足，政治上求平稳，学习上能自觉，都感到虽然称为知识青年，但我们却缺乏时代需要的新知识。

## 25. 苦涩又甜蜜的爱情

年轻人在一起总会产生许多爱情故事，但我们知青这一群体中，浪漫的爱情似乎与我们无缘，更多的是命运相怜的爱情。

相同的命运是我们知青爱情生活的基础、基调，少了许多浪漫，多的是怜情，但基础却是稳固的。苍山知青家庭都是同舟共济、同甘共苦，没有出现过一例离异的时髦故事。

我和苏立华成为夫妻似乎也是有缘分的。苏立华的老家与我在城里的老家相隔不远，与我的一位亲戚家是在一个大门里，我们从小就了解双方的家庭，但在插队前并不认识。在动员插队时，我曾要求去吴江插队，居委会为了男女比例搭配，去动员苏立华也到吴江去，因她哥已分配去吴江，她就没有同意去。因此我也就未去吴江。后来我没去石庄，而与二姐一起去了西石桥，我是分到前周大队的，没去前周到了苍山，她也是分配到前周的，而为了与沙盈等街坊同学在一起，就到了苍山。到了苍山，我在7队，她在8队，我住梅家村的最西面，她住梅家村的最东面，相距不到200米。她是苍山知青中最小的，插队时17虚岁，我也是较小的，是18虚岁。开始几年虽在一个村中，但交流较少，几年过后，她队里的其他三位男知青都病退、上调了，剩她一人。而我队里五位也仅剩我一人在知青屋中生活。共同的命

运，使我们相互关注对方，对对方的人品、能力都知根知底，虽然都不乏有人示爱与做介绍，但我们似乎都有意识的回绝和回避了。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产生了相互的爱慕，是上帝将我们安排在一起的，那我们就成为一家人吧。我1976年初上调，她1977年3月才上调，我们终于在1978年春节结为夫妻。我们的爱情是苦涩的，我们的爱情也是甜蜜的。

## 26. 上调进厂，开始了新的生活旅途

1975年12月，根据上级对多农少工家庭知青照顾上调的政策，我获得了上调进厂的机会。我们家姐弟五人，大姐是1965年去新疆新园农场，我和二姐去西石桥插队，我妹妹1970年去徐州沛县大屯煤矿工作，剩下我弟弟一人进入江阴钢厂工作，由于是多农少工，我才获得上调机会。

1975年12月，我用拖拉机将知青屋中一些重要物品拖回江阴，离开了生活工作了近8年的梅家村，到江阴新华布厂报到。1976年1月正式上班，分配到保全车间担任平车木工，工资为月薪18元，那一年我是26虚岁。第二、第三年都是一级工工资月薪26元。我和苏立华结婚时两人都是26元的月薪。我们结婚时都很节俭，家中的家具是业余时间自己和师傅、师兄做的，她的嫁妆是我们两人在晚上用扁担悄悄地抬到我家的，喜宴是请知青朋友来烧了几桌菜就办完了。

我们知青相遇在一起，常回忆起当年的插队生活，也向自己的子女讲述，但对于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对现在80后、90后的青年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1998年10月，我和匡立伟、奚亚华三位发起，举行了苍山村知青插队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24位知青相聚在一起，感慨万千。2003年10月，我们又相聚。到了2008年10月，我们再相聚，这次相聚，已有两位知青离开了人世，大家都很悲痛。我们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苍山村，看望了曾经共同生活劳动的村民，还看

到了汉墩头尚保留的知青屋。

在我4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插队是我从事的第一项工作，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我以后的工作、生活、婚姻有着巨大的影响，我深深地怀念这段生活。“想当初二十上下风华正茂，看眼前已是花甲白发渐增”。时间过得太快了，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历史，插队生活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依然深深地怀念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和如梦的岁月。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上山下乡十三年琐忆

柳蕴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千家万户，持续一、二十年。1966年，本人与一大批江阴知识青年一起前往吴县参加山区建设，先后经历了两次上山一次下乡，历时十三年，把青春和汗水全部抛洒在广阔天地里。曲折的经历、艰苦的磨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是记忆犹新。

### 一

1966年，苏州地区组织知识青年支援吴县山区建设。3月下旬，周庄公社党委组织知青学习班，参加者有7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生，少数为小学生，大部分是居民户口，也有一些“缺粮队”的青年。经过几天学习动员，许多青年人便跃跃欲试，争相报名。周庄有24名知青批准去吴县。

4月8日下午，周庄公社在大西街戏院举行欢送大会，本人在会上发言，告别家乡父老。公社领导徐才云给我们佩上“光荣参加吴县山区建设”的粉红色胸卡，挂上大红花。周庄街上鼓乐齐鸣，爆竹震天，夹道欢送的人群一直排到后郭桥车站。我们登上汽车，热泪盈眶，依依惜别。10日上午，江阴城里万人空巷，欢送的队伍将我们从东门送到人民大会堂（现红磨坊剧场），县政

府举行盛大欢送会。会后，我们分乘十多辆大客车，浩浩荡荡驶向吴县（澄江镇的4月24日出发）。中午，我们到达吴县藏书公社善人桥镇，吴县县政府举行欢迎大会，本人被推举上台发言。会上还颁发了任命书，我被任命为吴县东方山区建设专业队队长。会后，当地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热情地帮我们搬行李，冒着蒙蒙春雨，踏着泥泞山路，领我们走进山区小村——毛坞里。由于当时为上山青年新建的住房尚未完工，我们的吃住被安排在贫下中农家里，当晚，我们就睡在一排排稻草铺上，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 二

当时1200多名知青（江阴800多，吴县400多）开进了藏书山区，苏锡、苏光公路两侧新建起十一个工区，其中东方、向前、民主、向阳、银锭、真山、北峰七个工区为江阴知青，林海、凤凰、穹窿、光福四个工区为吴县知青。我们所在的东方工区离苏州约15公里，离善人桥仅一公里，原为东方大队的金家山。上山工作组干部2名（吴县戚兴根和江阴周福仁），还有东山果农师傅1人（陈顺奎），共100人，后来农业局又派来了一个女农技员。从知青中产生的领导班子由当时吴县劳动局上山下乡工作组直接领导。5月初，领导班子集中到东山吴县党校学习培训。三个月后，工作组撤销，知青自主管理。

东方工区的知青一般为16至19岁，最大的26岁，最小的还不足15岁。现在回想起来，感到这批人真是纯真可爱、朝气蓬勃，而且各具特长、多才多艺：他们中有能歌善舞的、会吹拉弹唱的，两个小时就能凑出一台有声有色的文娱节目；有学过书画、爱好文学的，一块钢板一支笔便能刊出《东方红》队刊；有爱好无线电的，将一台旧收音机拆拆装装，就能对各宿舍“新闻联播”；有学过照相的，周末外出游玩即可摄影留念；有学过理发的，队里买了一套工具即可解决大家的理发问题；有学习炊事的，食堂的条件虽差，但也能努力办好伙食；有擅长种菜的，刚

一个月功夫，大家就尝到了自己种的蔬菜……那时组织开会学习的时间比较多，但大多安排在晚上或雨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劳动。开始时突击搞基



周庄知青学习班（动员上山）部分青年在定山上合影（柳蕴强提供）

建，搬运建筑材料。三、四里有座穹窿山，山上有穹窿寺，我们去时，政府已派人拆了大殿周边的辅房。巨大的木料顺坡滚下后拖进锯木厂加工，大量的砖瓦则要靠知青挑下山来装车运到工区。山高路陡，一上一下要两个多小时，半天一般走两趟。压了重担，下山时跌跌撞撞，跌伤擦伤是常有的事。大部分知青从未压过担子，半天下来肩膀就被压肿磨破了，一些女生肩上垫了毛巾，含泪坚持挑下山去。大家硬是靠肩挑手搬，配齐了建筑材料，建起了男女两排宿舍（五人一间）、食堂、俱乐部、浴室等，五月份搬进了新屋。接着就组织生产，全工区分为垦荒、蔬菜、果树、养猪、基建、后勤等小组。当时分到的山地多是当地农民难垦的荒山，荆棘丛生；用的工具是粗重的洋镐和乌尖，遇到沙土还好，遇到树根或石块，一记下去，虎口震裂，鲜血直流。一天下来，人人手掌布满血泡，无法下水，连衣服也不能换洗。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中，硬是开出上百亩山地。蔬菜组常从山下挑水浇菜，起早带晚，精心管理，种出的蔬菜不仅供应了自己的食堂，还有部分用小车推到浒关出售，令当地农民羡慕不已。果树组在老师傅的带领下，去东山、长方山果园参观学习，很快学会了营养钵育苗、杂交嫁接等技术，并种下一大批桃、梅、桔、茶等树苗。养猪组盖起一排猪舍，割山菜、打水

草，到木渎拖糠糟、草糠，最多时圈存60多头生猪。基建组开山挖石，上千斤的石材硬是八人抬下山，驳石嵌、筑梯田，还在山坡上平出一片篮球场，改善了活动条件。为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工区组织大家参观部队营区，与解放军战士、社员群众开联欢会，外出看电影，请县文化馆老师来工区教唱革命歌曲。知青的生活，充满了活力，有苦也有乐。

### 三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山区，知青中也成立了“战斗队”，部分知青外出串连，接着是揪斗“牛鬼蛇神”（其实也只是发发牢骚的“落后分子”或所谓的“黑五类”子女）。许多工区正常的秩序完全被打乱，知青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东方工区一直是最平稳安定的，绝大部分知青坚守生产岗位，也未停火断炊。吴县劳动局“靠边”干部张道友（副局长）等也都“蹲点”在我们工区，与我们一起学习生活。至1967年底，120多亩山地大部分开垦利用，昔日的荒山已是果树成行，各季蔬菜连连丰收，但知青的生活仍很困难。当时上山青年的生活费由上级拨付，每人每月9元，全部作为伙食费，食堂精打细算，还是一周难开一次荤，平时全是蔬菜，甚至只有咸菜汤，大家没有一点医疗费。

女生柳正雨为工区到苏州装大粪，冒着烈日高温，低头背纤十多里，结果造成视网膜剥离，终因无力医治，双目失明。因长期抑郁，几年后患癌症而早亡。大部分知青家里也很困难，无法资助子女，时间一长，知青的生活更为艰难。许多青年已到婚嫁年龄，也已找到心仪之人，但无钱无房，只能苦苦相恋，而不能终成眷属。为增加收益，工区先后派出两批知青去吴县石灰氮厂和西山石厂务工，同时开始筹划创建小工厂，此设想还得到江阴方面的支持。

但到1968年春，上级开始实行“军管”，山区也开来一队“支

左”的解放军。为首的王队长每次开会总是把手枪掣在桌子上，叼着个板烟斗，吞云吐雾，做报告。他主持“斗批改”，重组各工区领导班子。经解放军“调研”，认为那么多知青在一起不是好事，而且山区人多地少，难以保证生计，必须扩大山区规模。



1966年江阴上山工作组留影于天平山（柳蕴强提供）

10月初发动了第二次上山运动，从原来的11个工区中，分出部分知青，再建7个工区，东方工区留54人，本人与其他42人被分往横泾山区。此时橘树已开花，桃树已结果，但命令已下达，我们只能与情同手足的战友和亲手建起的家园挥泪告别，悲怆的《送别》之歌久久回荡在苏锡公路上。我们扛着红旗，背着行李，翻越木渎七子山鸭踏岭，到达横泾旺山，住进生产队的仓库中，开始重复三年前的工作：基建和垦荒。我们用大塌车到山下河边船上驳运砖瓦上山，日夜加班，不到三个月抢建成了宿舍食堂；我们在山上平坟整地，开辟果林，在冬天来临之前种下第一批果苗。大家抱着新的憧憬，规划着新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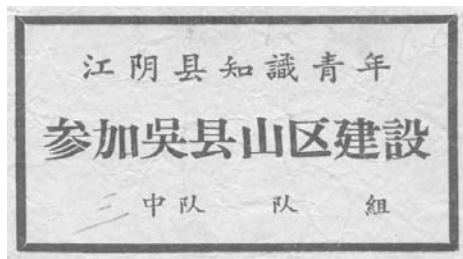
#### 四

但情况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当时支左的解放军马上表态：上山青年生活在一起，仍是知识分子成堆，必须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吴县革命生产领导班子闻风而动，于1969年1月23日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解散所有山区专业队，1200多名知青分别插到藏书、横泾、金山、光福四个公社各生产队。1月24日，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一夜未眠的知青像无家的孩子肩背手提着行李，欲哭无泪，他们在雪地里奔走呼号，等待有关生产队来人“认领”。前进大队的团支书濮仲贤同志摇了船来迎接我和两位女生，当晚安排在第六生产队的仓库暂住。老队长生火给我们烤衣服，乡亲们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男女老少围了一屋子，问寒问暖，插队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原来的集体生活变成了个体，每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是生产队送来了粮食和柴草，社员群众送来了蔬菜。大家从学做饭菜、学种蔬菜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拜师学习水乡农活。白天与社员们一起挑肥挖沟，晚上还借着月光学习撑篙摇船，不久就跟随强劳动力天天出工。夏种时，挑着一二百斤的河泥担穿行在泥泞的田埂上，不知滑倒了多少次；双抢时，半夜晒，五更起，干得又黑又瘦，活像“田鸡干”；烈日下，摇船外出罾泥积肥，热得发晕，就靠跳进河里降温；寒冬里，围湖造田，敲开冰层，站在没膝深的冰水中挖泥，拔起腿来，每个毛孔都在冒血……

一年深冬，我与十几个小伙子作为大队的青年突击队下太湖测量标高，做围圩的准备。谁知遇到寒流大雪，湖面封冻，连续多天无法与村里联系，陷入断粮挨饿的困境，是住在附近苇塘里

的吴江渔民小姑娘（可惜当时连她的姓名也未问）撑着“滩排”（能在浅滩开雪地上滑行的平底小船），送来了半袋大米，让我们熬粥充饥，还有一盆小杂鱼。那里既无姜



知青标牌（柳蕴强提供）



葱，亦无料酒，仅撒点盐花，烧了一锅滚烫的“水煮鱼”，那鲜美的味道，此后再也无法尝到！一次夏日，我与社员们在太湖圩田挑泥，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眼看雷雨将至，生产队来接我们回家的船还没有来，大家决定步行回村。步行途中要经过一条六七十米宽的大河，社员们纷纷泅渡过河。我刚学会游泳，水性不好，肩上背了畚箕扁担，一手提着钉耙，游到河中央竟直往下沉。我师傅蒋宜安已到对岸，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跳下河来，与其他社员一起，好不容易才把我从水中托起，当时我已淹得喘不过气来。此种救命之恩，令我终身不忘。

艰辛的劳动磨练了我的意志，也培养了我与农民群众的感情。那时，我被推荐当上了“土记者”，经常向《苏州工农报》和吴县广播站投稿。为及时报道农村新事，我在灶边放了张矮凳，边烧火边写稿，饭烧焦了也全然不知。我参加过大队文艺宣传队，经常白天劳动，晚上演出，走遍了附近镇村，还演到过苏州木渎。我为大队创建了“九二〇”（一种作物生长素）实验室，在全公社第一个拿出了合格产品向上级报喜。我参与了大队第一个电灌站的建造，完成了各生产队的电网布局，实现了队队马达响、户户电灯亮。我也曾参加了大队塑料厂的筹建，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收益。1971年，被推荐到横泾中学担任民办教师之后，我才重新拿起书本，一边钻研教学工作，一边开始自学进修。时间显得特别宝贵，但是每年暑寒假和两个忙假，我都要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把前进六队看作自己的家，六队的社员也把我看作他们中的重要一员，生产队里分粮、分草、分瓜果总给我送上门来；社员家婚嫁建房办酒都不忘发来邀请；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中秋的月饼、过年的糕，老乡们都会准时送来，堆满我的灶台。我也时刻惦念着周围的老乡，努力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谁家有困难，我也设法给予帮助，每年多余的粮草总毫无保留地送给他们。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形成的感情和友谊，是多么淳朴，多么可贵！

但是，知青的生活艰苦而漫长，少数人找关系提前“上调”

了，许多女青年找对象“攀高枝”了，而我却一直原地不动。恢复高考的消息给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但是当年因为我是65届高中毕业生，不属于“老三届”而被“踢”了出来，第二年又因年龄大两个月被“拎”出来。与我一同复习的学友都进了大学，我却只能自认命运多舛，含泪开始了默默的自学和长达七年的专科、大学函授学习。

## 五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党中央顺应民心，果断决定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我们那批知青，除个别提前上调之外，绝大部分是1979年上半年返城的。我属最后一批，于6月底办理了上调手续，结束了13年的农村生活，我与爱人带着孩子回到周庄，继续教书。回来后才发现，自己耗尽十多年青春，结果却是两手空空，内心深处留存的只有不畏艰辛的倔强性格和对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回来的知青们分别进厂、任教、从商等，很快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凭着顽强的意志创造着新的生活，但当见面之时，总以“插兄”、“插妹”相称。4月10日也成了大家念念不忘的“上山节”。在上山20、30、40周年纪念日，成批知青结伴同行，重访第二故乡，那里的干群像迎接贵宾一样招待大家，叙旧话新，胜似亲人。值得欣慰的是昔日贫困落后的吴县山区如今已是面貌巨变，日新月异：东方工区已变成现代化的藏书中学，旺山工区已变成一片兴旺的“农家乐”景区，一望无际的太湖圩田也已建成了经济开发区，处处莺歌燕舞、生机勃勃，人民生活也跃入小康。而我们这些当年的知识青年转眼都已年过花甲，退休在家，儿孙萦膝，生活安康。可惜的是周庄24位上山青年中已有4位因病早逝，实为憾事！

愿所有上山下乡插场支边的兄弟姐妹珍藏青春记忆，笑对悲喜人生，共享幸福盛世，快乐健康长寿！

## 梦回精神家园

周锦艳

当白发悄无声息地爬上双鬓，岁月老人仿佛在提醒我，你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这些年来，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闲暇时，每当皓月当空，我常忆起孩提时流行的那首歌：“月亮像白莲花般地在云朵里穿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于是，我也给女儿说起自己年轻时在兵团亲身经历的艰苦岁月。谁知女儿对我的倾诉，尤其是我们知青战天斗地的事迹，充满了诧异和不解，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时常泛起涟漪而又镌刻在心的，恰恰就是这天方夜谭般的八年，那是三千个难忘的日日夜夜啊！

1971年到兵团一师三团那年，我与江阴同道们虽说是被冠以知青的桂冠，但却大多是些初中毕业、未满十八周岁、乳臭



四名江阴顾山公社知青于1972年春天  
在东辛农场场部合影（后排左一为作者）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未干的青少年。自幼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在连队，我们睡在两头用土坯垒起、中间搭着柳条编的“床板”上，身体稍稍一动，就吱吱作响。吃的是发过芽的黑麦面馒头，喝的是村头水塘里的碱味十足苦涩的水，日常生活的艰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老实说，生活上的艰苦和不适应一开始谁都不习惯，但为了生存，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比起“生活关”，那么“劳动关”就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诸如开沟挖河、锄草间苗、插秧割柴、打药治虫、采摘棉花等“十八般”农活，样样都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重体力活，何况我是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江南小姑娘。期间，有两件事至今还刻骨铭心，不能忘怀。有一次，因劳累过度，我病倒了，发着高烧，为完成任务仍然坚持到大田参加棉花间苗。在烈日下，中途实在支撑不住，我倒在地里，凭着一股韧劲硬是半蹲半趴着，把任务完成了。另一次，是到十余里外的芦苇地割芦柴，我背着约二米长，五、六十斤重的一捆芦柴跟着大家回连队，在途经三个六、七米宽，四、五米深的沟时，顶着刺骨嚎叫的北风，我猫着腰从沟底拼命向上爬，反复几次都没能爬上去。当我最后从沟坡滑下来，连人带柴倒在沟底时，体力已经耗尽，怎么也站不起来了。眼见夜幕降临，身边却空无一人，这时意识到我掉队了，一阵孤独与无助的哀伤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于是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的战友回到连队没有见到我的踪影，知道我可能出事了，连队指导员和几位战友带了手电，在沟里找到了我。当地老职工见此情景，怜悯地对我说：“娃呀，你们爹妈如果看到你现在这样，该多心疼啊！你一个小姑娘，干这么重的活真是难为你了，你是好样的！”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动，我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在连队除了大田劳动外，当时我还担任了扫盲老师，一到晚饭后，不顾白天的疲劳就去连队教老职工断文识字。有次我病倒在宿舍里，老职工到宿舍看我，我硬是带病起来给他们上课。经过努力，连队大部分文盲都摘了帽子。

由于我在连队良好的表现，被推荐参加了苏州卫校招生考

试，因某些不明因素而未录取，对于好学上进的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在沮丧和迷茫之中，几乎不能自拔。后来，连领导又安排我去团部医院，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卫生员培训班。培训结束后，解放军王院长亲自找我谈话：“小周你被我们选中，到县医院妇产科进修半年，学成后回来。”我在团部医院妇产科一干就是五年多。从此“妇产科”这一行成为我的终生职业，直到现在，我还乐此不疲地从事着这一职业。

当时农场医院条件差，不但缺医少药，医护力量也十分欠缺，除了科主任以上的骨干是部队派来的医生外，其他各科的医生全是知青经短期培训后上岗工作的，缺少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临床经验。硬件设备也极差，连洗衣机、自来水都没有，手术用水也是从池塘挑到水箱里，经沉淀烧沸后使用。产科、妇科、门诊只有一人顶班，没有人换班，产



1975年作者在东辛农场各分  
场巡回医疗后回到医院的留影

科只要有产妇来，我们就随叫随到，不分昼夜，不分班次。顺产时一个人接产，难产时就请另外两个医生一起上台。我们就像不停运转的机器，不知疲劳地工作着。

一次我值夜班，一下来了十一位待产产妇，我一个人为她们接生。前十个还挺顺利，最后一个横位，恰巧另一个医生探亲回家了，这样我一个人就无法做手术了。于是我当机立断将产妇转院，为抢救两条生命，顾不上劳累和饥饿，亲自护送。一路颠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簸送到上级医院，当婴儿呱呱坠地母子平安，我悬在半空的心才真正放下。翌日拂晓，我又匆匆赶回医院，把堆积如山的脏布进行清洗、晾晒、消毒和打包，当时，这些勤杂活计也是我们知青医生的份内工作。

我们知青从医人员，除了在医院正常上班外，还经常参加巡回医疗，徒步下连队为适龄妇女做计生手术。有时上午安排十个手术，下午再安排十个手术，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腿发软。繁重超负荷的工作，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按说我们从事这项技术性强、风险高、责任大的职业，应有一份较为丰厚的收入，可当时在团医院的知青，从连队当农工时的十五元，来院后才加到十九元，我还从这笔“工资”中抽出几元钱买业务书给自己“充电”。当时除了这微薄的收入外，什么奖金、午餐或夜餐补助都是一概没有的。

有一年春节，轮到我在医院值班。我妈从老家来到了我单位，陪了我一个月，看我几乎每个晚上睡不到一个囫囵觉，妈心疼地对我说：“女儿呀，你的工作太辛苦了，又肩负着母子两条人命，体力透支不用说，精神压力又这么大，你太不容易了。”我安慰她说：“妈妈，不要紧，我能吃得消，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我能成为当地老乡服务，心甘情愿。”令我欣慰的是，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当地老职工的认可，他们把我们当作“活菩萨”，为报答我们的辛勤付出，逢年过节都要送一大堆好吃的给我们知青。每当此时此刻，就有一股如沐春风的暖流将我们心田浸润……

感念兵团，梦回东辛，因为在我脑海里，那里是一方永恒的净土，是一片纯真的精神家园。那里有我当年洒下的辛勤汗水；那里有我奋斗成长的身影；那里有我曾朝夕相处、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



## 跨越世纪的年代

徐士复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66~2011，45年，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从1966年奔赴吴县参加山区建设到今天，前进的步伐已跨越了近半个世纪。1966年，有志青年志在四方，响应祖国号召，支持吴县山区建设。江阴的八百青年和吴县的四百青年一起组成了吴县山区建设的大军，一千两百多人分成了11个中队，奔赴11个山岭，为建设新山区而艰苦奋斗。



欢送上山（徐士复提供）

我们山区一中队的江阴青年分别来自江阴9个公社，共141人，其中男知青84人，女知青57人。1966年4月10日，我们从江阴乘车来到吴县，天刚下过雨，我们沿着泥泞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目的地走去，终于来到了五峰山。这里一片荒凉，我们当时全部居住在当地农民家中，借用县林场的食堂吃饭，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知青们成立了各个生产小组以及篮球队、宣传队。大家开垦荒地、种菜种粮、培育果树、饲养家畜等，立志要将这荒山变成花果山。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走上穹窿山，担砖背瓦，建造工区用房。肩膀磨破了、肿了，手上脚上打起了血泡，可我们都鼓足了劲坚持着，山路上留下了我们顽强坚定的足迹。

宿舍建起来了，猪棚也搭起来了，种下的果树成活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山区的面貌。正当我们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十年动乱的风暴使平静的山区涌起了阵阵波涛。破四旧、大串连，使山区变得一片混乱，生产也处于瘫痪状态，直到促生产的号令发起，军代表进驻山区，混乱状况才慢慢改变。

不久，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浪潮再一次涌向山区。1969年1月，上山青年插队落户到各个生产队。头顶蓝天，脚踏黄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活和工作。经过艰苦的磨练，有的担任了生产队长，有的当上了会计、农技员、老师等，知青们把知识和青春献给了山区、献给了农村。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45年的历史记载了太多的天翻地覆。正如唐代诗人贺知章诗中写到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如今，当年的知青已先后退休，尽管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我们永远怀念第二故乡——五峰山，那里的一切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昔日云飘五峰路，今朝风吹各西东。1997年4月19日，山建一中队部分人员相邀聚会于五峰山，历经31年风雨，旧址已成为一片平地，仅存的一些断壁残垣让人依稀分辨出当年的宿舍、厕



慰问知青（徐士复提供）

所、猪棚、食堂的位置，唯有当年栽种的毛竹郁郁葱葱，枝繁叶茂，遍布整个山坡。

上山44年后的2010年4月10日，我们93名知青再次相聚五峰山。当年上山的泥泞小路已变成平坦的水泥大道，当年居住的低矮房已换成了整齐林立的楼房，穹窿山往日挑担背石的小道早已消失，展现在面前的是直通山顶的环山公路。乘浏览车一路来到山顶，山中美丽的景致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的艰难沧桑和新时代的魅力。

往事将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慢慢被人遗忘，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再一次相聚在一起，共同回忆、怀念、畅谈过去难忘往事。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上山下乡追忆

胡云湘

1966年春天，夏港公社动员居民及大队的一部分知识青年去苏州上山下乡，我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夏港知青到吴县藏书公社民主大队建设山区，民主大队后称民主工区。那时社员们冒雨把大家的行李搬运到自己家里，为我们妥善安排好住宿、晚餐。后来知青的宿舍建造好了，我们才搬离社员家。

在“民主工区”，我们每天干的是重体力活，吃的是糙米饭、咸菜汤。国家补贴每人每月只有9元钱，很难吃到新鲜蔬菜，更谈不上荤腥，青年们上山时的热情已消减大半。为安定大家的情绪，克服困难，我们工区领导班子决定思想、生活、生产一起抓。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再派一些骨干力量去南京马坝（一个优秀的知青点）参观取经，看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为了改善伙食，我们特地成立了一个蔬菜种植组，一个养猪组，专门种菜、养猪。同时去吴县东山请来两位有经验的果农，帮助我们种植果树、传授果树嫁接技术。果树的收益要在数年以后，当时正是种山芋的季节，我提议在果树间隙种山芋，大家一致认同，说干就干。我和几个夏港知青推着板车，徒步去30里以外的横泾镇购买山芋苗。为了赶时间，中午每人只吃一个大饼，马不停蹄赶回工区，坐下时才觉得脚痛，原来脚底起了血泡。大家虽然又饿又累，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山芋苗种下

了，可是水源离种植地有半里路，而且要从山下往山上挑。我们组织共青团干部带头下山挑水，让力气小的在上面浇水，顶着炎炎烈日，人人干得满头大汗，休息时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语录，以此鼓舞大家的斗志。就这样，我们共种了四十多万棵山芋苗。经过三个月的不懈奋斗，橘树、枇杷树、板栗树、桃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曾经是荒秃秃的山坡上，树的株距间镶嵌着一行行绿油油的山芋苗，放眼望去真是美极了。我们仿佛看到树上已挂满了硕果，苗下已结满了山芋，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困难真是一个接一个，种下去的果树、山芋、蔬菜急需肥料。那时工区经费不多，没钱买化肥，眼看着种下去的果蔬一天天变黄，大家都愁得睡不着觉。我提议去苏州装大粪，以解燃眉之急。大家认为办法是好，船也可以借，可谁来摇船呢？我们就向当地社员学习，从一招一式学起，仅用三天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摇船的技术，然后向生产队借了一条船，我带了两个知青连夜出发，争取第二天早上能装到粪然后当天返回。任务完成后，大家又饥又累，我还大病了一场，但缺肥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解决了生产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住宅问题。民主工区的住宅选址在砚台山山坡上，大部分建材如砖、瓦、木料都要从穹窿山的庙宇中拆解搬来。当时我们都是十八、九岁刚出校门的青年，每天要登上340多米高的穹窿山，力气大的一人扛，力气小的两人抬，硬是把这些建材运下了山。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民主工区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有了自己的食堂、水井、猪棚、篮球场。大家从社员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新宿舍，心里兴奋异常，每到晚上，山坡上空总会传出悠扬的琴声、笛声。有时大家会围坐在篮球场上，唱唱歌或邀某人来段快板；有时会和解放军一起联欢。我们至今还忘不了这段曾经艰辛但又快乐的生活。

由于居住集中，山区的建设有序进行，迅速发展。我们研究制订了一个十年规划：一年开垦荒山；二年育全树苗；三年种满果树；四年搞好梯田；五年、六年争丰收；七年、八年翻一番；九年、十年超东山。正当我们想大展宏图时，1966年秋天文化大

革命开始了。在这场风暴中，山区建设完全瘫痪，工区里一片混乱，食堂里贴满了大字报，自发组成的各个战斗队纷纷奔赴上海、北京串联。果树没人管，饭没人烧，猪没人喂。

直到两年后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这里所有的工区都解散，人员全分配到当地生产队插队落户。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我的十年“回乡”生涯

何达源

1968年以前，我们河塘地区是没有中学（普高）的。要上中学，范庄、河东的大多上黄土塘的怀仁中学；西片王家、南山等地大多上祝塘中学；中片河塘、蒲市的就上长泾中学了。1966年7月，我在长泾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准备高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长中是江阴全县最早掀起“文革”运动的8所“试点”中学之一。在经历了一年半的边搞运动边希望参加高考的焦虑、痛苦的等待后，1968年秋，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展到高潮。我们这批人于是就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纷纷到农村这一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有作为”了。9月17日，我和宁慈美等8位同学一起在长泾“金都”照相留了个合影，9月18日，就挥挥手各奔前程，小诗惜别。

几载求学泾水畔，今日一别相思远。

人在乱世不自由，命如飘蓬难团圆。

君去“插青”茅檐低，我欲回乡知音稀。

月到中秋勤相看，一片清晖祝平安。

宁慈美等镇上知青被敲锣打鼓簇拥着光荣“插队落户”去了，而我们这些农村出生的学生则背上行李离开长中，悄悄踏上归程，开始了漫长的“回乡”务农之路。

虽然自小生长在农村，在农业生产知识劳动技能各方面比城镇知青要强些，但要讲真刀真枪下田干活，同样是头一遭，生活的磨难，一视同仁地落到了我们身上！

农活都是体力活。刚回家下田，沉重的担子压得双肩红肿、腰椎欲断。一把钉耙，一副担子，早出晚归，寒暑易节，总不离身。无论是盆田翻地，无论是挑河泥浇化肥，都需咬牙坚持。任双手红肿，老皮脱了又生、生了又脱；任猪灰的臭味熏得人直欲呕吐；任腿抖肌疼，难以支撑，也是“欲说还休”，否则，总会招来嘲笑和讥讽，因为当时不会干活的我们，常是农人干活时的“开心果”。吃过晚饭，总是倒头就睡，极度的疲劳连个梦都不会去做！1972年春，队里派我去蒲市低坝头小窑上烧窑去，那进窑出窑，每担都有一百五十斤重。装完一窑下来，我就随处躺下休息。那时只要能歇上一会，便是最大的幸福了，至于满脸黑色的窑灰，涂得像周仓似的，早已顾不得清洗了！最可怕的是砖烧好后挑窑水的活计了。一担水从大河里挑起，吃力地爬上10多米高的岸头，挑到窑顶，我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但值得庆幸的是，那些窑工们对我这个“书生”是极为理解，在劳动上是极为照顾有加的。逢到挑窑水，总有人主动替换下我，让我干些轻微的杂活儿。在回乡10年劳动中，农民的质朴和真诚是始终铭刻在我人生记忆中的珍宝！

农活又是技术活。任何农活在老农的手中总是得心应手，应付自如。而在我拿惯笔杆子的手中总是那么生涩，无法达到圆熟的境界。于是劳作时总是落在人家后面，并且往往出差错。割稻时不熟练，镰刀割到手指上，鲜血直流，疼的直吸冷气，却只得挖块湿泥土堵在伤口上。割麦时，任我怎么努力，麦茬总是割不短、割不平，麦捆头怎么也不如人家的大小整齐，总是手忙脚乱一团糟，老受到队长的批评。而我最感到头皮发麻的农活就是插秧了！插秧纯粹是个技术活儿，那些熟练的秧手在插秧时，那种动作的利落，手法的轻盈，株距的匀称，行行如线的规范，简直是一首首富有韵律的诗行！但我却不行。顾得了左手的分秧，顾

不了右手的插秧；顾得了手的动作，顾不了脚步的配合；顾得了6棵的水平，就顾不了行列的整齐，更顾不了秧棵的匀称。等心急火燎插了一会，抬头一看，人家已快到田头了。我就夹在田当中，秧多时，身后扔满了秧把；秧少时，早已被左右的人搬光。我总是最后一个到田埂上，于是招来了大家的“赞扬”：你啥农活都是拖尾巴，唯独插秧时“在前头”。一到下雨，雨水淋下来，眼镜上一片模糊，那种窘迫、难堪，真是不可名状。而看看我的秧行，真如天女散花般，如同一幅涂鸦的画。通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逐渐掌握各种农活技术，同时也学到了许多在以前的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体会到了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重新认识生活也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干农活也是有危险的。一年四季中，割破手脚是常事，就是被毒蛇咬伤也常有发生。一旦发生，则全家惶急，全村惊慌，大都要送到张泾桥医院去治疗，最后还得花上一大笔钱，歇上十天半月，损失可谓大矣！一次在单季稻田里除草，厚厚的一层绿萍把水面遮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突然，我的双手抓到了一条滑腻腻的东西。“蛇！”我似遭雷击般大叫一声，甩掉手里的“那东西”，狂奔向土埂，在满田惊愕的眼光中，坐在田边直冒冷汗，大脑里一片空白。“黄鳝，是黄鳝！”在大家无邪的笑声中，我只得心有余悸地又回到田里，但眼前满是蛇的影子在晃动。直到今天，我看到黄鳝还仍不敢去抓杀，可见烙印是如此的深刻。

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次长江中行船。1973年春，队里向长泾范家角租了一条8吨的大水泥船，派我和3个小青年一起去镇江摇煤灰（当时每天有2角钱伙补，是个大数目，所以人人争着上船）。那几年烧柴紧缺，河塘公社派了2个采购员常驻镇江钢铁厂采购煤灰，各队自行用船去装。船至丹阳，前面运河却在疏浚，只得出丹徒港走长江。饭后出港，沿着南岸，逆水向前。幼稚的我们完全不懂长江行船的危险，何况又不是机动船！3时多，上游天际忽然升起一线灰色，逐渐拉长扩展，带着风向我们压来。

南岸打鱼的老翁向我们急呼：“快，靠岸、靠岸！”然而晚了，刹那间，乌云满天，狂风夹带着大雨向我们铺天盖地压下来。原本平静的江面上激起浪花，浪打着浪连成一堵墙似的，直扑船头。最可怕的是那一个连着一个巨大的漩涡，带着炫目的速度，飞奔而来，真是撼人心魄！急雨如鞭无情地抽打着全身。风声雨声浪声，如战场上的万马奔腾，金鼓狂鸣。这平生未见的险境来得如此的突兀，如此狂野，把我们几个惊呆了。这时我们中间有3个人产生了分歧，有的要回橹靠岸避风雨，有的说不能回航，否则就要船翻人亡！相左的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他们一致要我表态定论：因为我是他们中唯一年长的已婚者，并且是唯一喝多了“墨水”的人，虽然我弄潮的技术只能滥竽充数而已！这时我想到了曾读过一本书《开顶风船的角色》中的几句话和曾学过的名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则舟覆人亡。于是我表态只能迎着风浪，上！大家认可了我的意见，就齐心协力，4人轮换工作，3人摇橹，1人在船舱中舀出积水并用竹竿测水深，当时迷茫得连江岸也看不清了。大家都是赤膊，无言猛干，顶着风雨逆水向前。好不容易，风雨停歇了，早已是暮色四合。当夜半时，在船左前方乌蓝的江面上突然映出一片光灿灿的灯光时，我们就知道镇江到了。一任船儿在平静的镇江水面飘荡，我们几人早已身心疲惫到极致，横七竖八地躺倒在满是积水的舱面上了。蒙老天爷的垂怜，我们捡得了4条小命。

1978年秋，我终于收到了苏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它距我离开长中回乡后刚好10年！在这10年中，我当过小队卫生员、现金会计；当过大队夜校扫盲教员、赤脚兽医、宣传队员；当过公社宣传队员，演过《沙家浜》；当过粮库司秤、县广播站土记者、通讯员和故事员；当过公社文化站土编剧；当过蒲市大队幼儿园、小学和河塘中学的代课老师，也做过大队螺丝厂供销员……这10年，一路坎坷，一路风雨，强壮了我的体魄，更历练了我的心志，扩展了我的眼界，融化我所学的知识于实践之中，它实在是我人生中最不可多得的精彩阅历，真是胜读十年

书。

1979年元旦，我跨进了江阴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大门。当时苏州师范在江阴录取的120个学生分中文、英语、物理、化学4个班，设在江阴教师进修学校。我们这一批“老三届”有幸登上了祖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历经经济腾飞的伟大时代变革，亲身感受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伟大真理，同时也感受到了时代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 四十年前支疆的回忆

许一青

四十年前，一群来自锦绣江南的青少年，到离家12000里的南疆沙漠里安家落户、垦荒造田、兴建家园，并为此奉献自己的青春。

我们的目的地——新园农场就坐落在喀喇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我们是白手起家，那时单位除了每人发一把坎土镩，其他便一无所有。为了把沙丘搬平，我们用带去的面盆运沙搬包。满满的一盆黄沙，足足有30多斤，来来回回一气不歇用手端整整8个小时，就是钢铸铁打的人也难以承受，何况我们都是患有营养不良症的青少年啊！我们的手指被盛满沙土的盆沿抠出了血，依旧壮志不减，端沙不止。

那年的隆冬，我们在团结渠里筑坝引水灌田，忽然大坝被冲出一条口子，水位霎时下降，大田中断进水。我们几十个支边青少年奋不顾身地跳进渠中，手挽手用身体组成“人坝”，拦住被越冲越大、缺口，一边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坝在人体的掩护下被筑牢了，渠水重新流进大田，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知青，由于长久被水浸泡，患上了终身不愈的严重风湿病。我还记得一个叫孟元宝的支边青年，他是江阴西郊人，一天他突然腹部剧痛，瘫倒在工地上。有个别人怀疑他是诈病，为了消除别人的怀疑，他咬牙忍痛，下芦荡打芦苇，结果因抢救不及而终于永远



地倒在了那块热土上。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地而饮；筑渠以灌，垦荒造田，挖沙不止。我们为把农场建设成锦绣江南而舍生忘死地作战。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开垦的土地，灌上水后，却泛起了盐碱，硬如铁甲，厚若坚冰，我们播下的种子，颗粒无收。原来，在远古，这里是海洋，地面上下都浸透了苦涩的盐份，农场又建在低洼处，经水吸引，盐份就自浮上地面，变成让人生畏的盐碱。我们的农场竟建在了死地上！我们幼稚的心灵震颤了。尤其在“文革”时期，农场陷入混乱，分成两派。两派尖锐对立，观点相左，目标却都是为了捍卫“革命路线”。“文革”结束时，大伙互相诘问：我们用生命拼死捍卫的“革命路线”到底是何物？在何方？十年青春白白地荒废了，大家在深刻的反思中，走向了成熟。

我们的农场在沙漠深处，与世隔绝。虽然我们也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一切燃料就地取材，但毕竟贫瘠的沙漠产出能力有限，芦苇割光了，芦根也挖光了，我们就到一百里外挖红柳根，甚至到三百里外的原始森林去砍回胡杨树盖房。虽然十年的浩劫和错误地被安置在这不毛之地，但我们艰难生存，顽强拼搏，虽苦犹乐的精神长存！岁月催人老。时光之剑把青少年的我们雕琢成青壮年了。直至1980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15年支边生涯，奉调回江苏家乡。

朋友们，记住我们的回忆吧！只有记住历史，才能使我们变得更加扎实、厚重、睿智和聪慧，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未来。在支疆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深情回眸：大漠沉沉情依深……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

## 初到掘港农场

王福民

“到农场啦！到农场啦！”知青们兴奋地大喊着，蜂拥上岸，第一次踏上农场的土地。但是，眼前的景象与自己的想象落差太大，许多知青和一些送知青赴农场的家长代表都潸然泪下，年龄小的女知青竟然蹲在地上“呜呜”哭泣。个别男知青犟着要跳上船，跟回江阴去，大家七手八脚赶忙拉住，七嘴八舌地劝阻。

开弓哪来回头箭？600名知青按家庭居住地所属居民管理区（简称管区，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划分到农场的五个工区（六工区是1965年插场的南通知青）。我被分配到农场与公社交界的最偏远的西北角五工区。前来接我们的老职工带着我们沿一条蜿蜒的无名小河，冒着小雨在崎岖泥泞的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步行十多里。

这条无名小河位于农场的北半部，是1958年9月建场时开挖的，横贯农场东西，连结农田中一条条小沟谷，由涵闸与掘竖河相通，是农场的一条重要排涝水道。农场西北片原是沼泽地，沟谷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平整的成片农田。我们到达农场时，尚能看到当年沼泽变农田的遗踪——散落千亩农田的大小堰塞塘和架在小沟谷上的小木便桥。五工区被戏称是农场的“北大荒”。

走小木便桥，我们中闹出许多笑话。二、三根细树棍捆扎固定在一起，宽约尺余，两头搁在沟谷的两岸，便是一座“桥”。长一点的小木便桥，中间还用树桩作支架。桥仅能容一个人通

过，而且，人一走上桥，桥就颤悠，似乎是知青到农场后必须逾越的第一道“障碍”。有些胆小的女知青，一走上雨中又湿又滑的桥面，便吓得大



作者当年的公费医疗卡

呼小叫，想让人搀扶吧，又怕遇到个“促狎鬼”反被作弄，只得手脚并用，匍匐而行，一个个被泥水弄得似泥猴（听说别的工区有女知青滑落水中）。就是胆大的知青，第一次走上小木便桥，看到脚下一两米深的沟谷里潺潺流动的水流，两腿哆嗦，踩钢丝般一步步慢慢挪动，像颤巍巍的老太太。有个顽皮的“小男孩”知青想逞强，伸着双手作平衡状，大步飞跨小木便桥，不小心被桥板接头绊了下，一个趔趄差点栽下桥，幸亏他机灵，有惊无险，双腿骑坐在桥上，吓得脸刷白，众人忙将他拉起。小知青逞强未成，却落下日后茶余饭后大家说笑的谈资。

有一地名叫“孔家窑”的，我们到农场时，那里的砖窑已废弃多年，剩下一个大土堆。旁边有一所小学和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卫生室，还有五间砖墙旧茅草屋，分别开着5月“一个人的小店”：副食店、缝纫店、理发店、肉店和自行车修理店。这是农场西半部最“繁华”的地方。

初到农场，物质文化生活确实十分匮乏，听不到广播声，看不到报纸，各方面条件都十分艰苦。我们到达后，只能分到老职工家吃住，一户两三个知青。

老职工的住房大都是低矮的茅草屋，坐北朝南，三间或四间正房，两侧各建一两间厢房，作厨房或堆杂物用。茅草屋的三面

是就地取土夯实的土墙，叫垒土墙，十分厚实，有两尺余，纵面下宽上窄，呈梯形，这与当地常年刮风不无关系。向南的一面是用当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芦苇茎秆编织的“墙”，颇具古风。前面是晒场。土墙挖出的门洞和窗洞很深，似碉堡的门洞和窗洞。正房与厢房有门洞相通，人必须低下头才能通过。一家一户就是一座院，平面图如汉字的一个“凹”字，散落在田野。

我和沈继华住在一户姓季的单亲家中，房东老太50多岁，黝黑的、饱经风霜的脸，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她有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十七八岁。一家三人住三间茅草屋，中间一间是客厅兼厨房，两边各有一个房间。听说她的大儿子已说上对象，快要娶媳妇进门，所以一个人住在西边的房间。房东老太和小儿子住在东边的房间。紧靠客厅北土墙铺着我们的“双人床”。说是床，其实极简单，两张“三脚马”凳，搁上芦苇秆编扎的“床板”。“三脚马”凳用树棍做成，十分粗糙且单薄，人往床沿上一坐，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甚至担心，不知道哪天夜里，床会突然间坍塌。

那天，我们到房东家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队会计顾善富刚把我们领进房东家，热情好客的房东老太就端上一杯橙黄的“天水茶”。原来，每年夏天下雷阵雨时，用盆和罐在茅草屋檐下盛的雨水，经沉淀去杂质后珍藏起来，唤作“天水”。据说越陈年越香，专等客人到来时取出煮沸待客。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也是最隆重的待客礼遇。我有些受宠若惊，呷一小口“天水茶”，细细品味着一股说不太清楚的清香味。房东的儿子告诉我们，如东县濒临黄海，平时喝的水和用的水都是又涩又咸的河水。我突然恍然大悟，难怪一路走来时，看到裸露在田头地边的白色盐碱，连刮到脸上的风也都感觉到有一股咸味。说话间，房东老太已在饭桌上摆放好热气腾腾的饭菜，喷香的大米饭，诱人的三、四个地头新鲜家常炒蔬菜，还有待客时才上桌的粉丝、蛤蜊肉、鸡蛋“炒三鲜”。虽然没有奢侈的酒菜，但有的是房东一家的诚意和真挚。我俩和房东一家三人围坐在饭桌旁，吃了顿热热闹闹

的舒心“团圆饭”。

房东家平时吃的和其他老职工家吃的大同小异，一天三餐都是大米和大麦粳子混合煮的粥，中午才有馒头干搭着吃。他们已习以为常，相沿为俗，但我们新来乍到的不习惯。当地的风俗，一年之中春节才蒸一次馒头，家家户户要蒸二、三百斤面粉的馒头，考究的老职工家在发酵的面中掺些煮熟去皮的甜山芋，这样，蒸的馒头就会有些许甜味，好吃。馒头都做成长条形状，约半米长，然后切片，摊在屋顶或芦苇秆帘子上晾晒干，贮存在有盖的木柜子里或缸中慢慢食用，一般可吃到麦收季节或端午节。不过，馒头干贮存时间久了也会受潮，生出星星点点的霉斑，发出一股难闻的霉酸味。开始，我们一点也不习惯这种餐食方式，特别讨厌吃发霉的馒头干，只拣些没有霉斑或霉斑少的吃，故每顿吃得很少。饿了，就吃些从江阴带来的马蹄酥之类的糕点充饥。后来，带来的糕点也吃完了，肚子饿得再也扛不住，硬着头皮也只能吃，不然，就只有挨饿的份。

房东老太是个很节俭的人，平时在吃的方面用钱攥得很紧，蔬菜都是房前屋后地上长的，很少买荤腥吃。蛤蜊、蛏子是如东县盛产的海鲜特产，价格非常便宜，但从不舍得花钱买，都是房东老太的儿子半夜起床，骑自行车到黄海边沙滩挖的。

有一件事印象也很深。有一天，饭桌上放着稠糊糊的大白菜叶煮面条，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每人端起一碗面条就吃，只是觉得味道有些咸。当房东老太发觉，说是中午的搭饭菜，我们已是半碗面条吃下肚。房东一家三人都哈哈笑起来，我们也跟着傻笑，以掩饰自己的窘态。后来，我把“吃面条”的故事当作笑话讲给其他知青听，方知他们中许多人也曾遭遇过和我们类似的尴尬事。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生活上仍不习惯，劳动强度又大，人一天天消瘦。老职工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队会计顾善富积极筹划，四、五月间，我们办起农场第一个知青食堂，在六队大场仓库东50米处建了第一个男知青集体宿舍。那天，许多女房东拉着

知青的手，有些依依不舍地说：“伢儿啊，把我家当作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男房东亲自将知青的行李搬到集体宿舍。有的老职工还把自家当柴草的棉花秆、自备过冬度春的大白菜送到知青食堂。全队男女老少像赶集、办喜事那样，来了一拨又一拨，观看我们的食堂和宿舍。

初到农场，五工区六队就涌现一批知青骨干。老职工说：“我们队里的江阴知青细伢儿啊，男的个个棒，女的赛穆桂英！”

岁

月

有

痕

青

春

无

悔